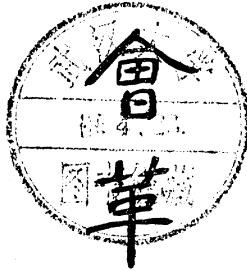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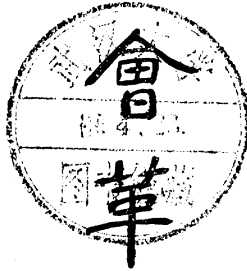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日本河上肇著
郭沫若譯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莊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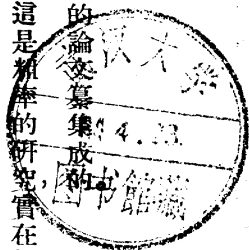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原序

本書是由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將近兩年間隔時所發表過的論文集成『唯物史觀研究』一書——這是粗率的研究所，實在值得研究之名，寧可稱爲『唯物史觀入門』的，此處所發表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考察社會之組織及社會組織之變革的時候，我是始終立足於唯物史觀上的，這可以說是唯物史觀之實際的應用，自然與前著便成姊妹篇了。

各篇所收的論說，在初原沒有哀集成書的預算，各各是獨立的論文。所以有些取的是論辯的 (polemic) 形態，有些又是取的講義之體裁，從此至彼之間每有論旨重複處，連引用文相同的地方也有。但是一旦成書之後，終覺沒有辦法，只好大概保存着原形了。這些多少的重複假如能爲各章之有機的連絡，這是作者偶然之慶幸了。

關於社會組織及社會革命之研究，是作者二十年來切身的問題，恐怕也會成爲終生的事業罷。現在覺得最近的考察達到了一個段落，所以姑且哀集了這一本論集。回想起來是前年的冬天，我當時抱病家居，友人櫛田民藏君訪我於病榻，告別而出遊海外。櫛田君搭乘的是緩慢的貨船，想他慢慢在爪哇方面停船不久又纔坐到倫敦的時候，我也已經恢復到從前的康健了；當他更在歐洲各地巡遊時，我在日本幾乎腳不會出京都一步，此處所哀集的論文正是在這時候寫成的。櫛田君和我的父親一樣，凡是我寫的文字，他幾乎一字不漏地都要過目的。現在在同君出遊中而輯成此書，我想到我的父親先要捧在手中莞爾而笑，並且不久之間我的一位友人便可以通讀



一過，我有有這樣的期待的幸福，就在此書之編纂校正上費了若干的時間我也並不失悔。若以此為機緣更能新得一位讀者，這在作者不消說，更是引以為幸福的了。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話，此書中關於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實現上所必要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之研究是省略了的。據馬克斯主義，以為無論是實現社會主義之社會革命或實現社會革命之政治革命，是以舊組織之資本主義下社會之生產力再無發展之餘地為前提，所以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發展之限度如何，這在馬克斯主義研究上，自然不能不為重要問題之一，但據我看來，這個問題有世界的（即不使限定於一國）考察之必要。馬克斯主義運動帶着國際之色彩來的，恐怕是這個原故。但是這種國際的方面（aspect）之研究，且讓諸異日。對於此書怕不免有一二之批評，作者預定他日答覆。

一九二二年初冬

河上肇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目次

上篇 關於資本主義的若干之考察

第一章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下的生產力之分配及其所含的矛盾之進

增

第一節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力之分配	三
第二節 生活必要品的生產制限	五
第三節 貧富懸隔所資致的禍災	九
第四節 資本主義與機械的生產之矛盾	一二
第五節 資本主義與資本增殖之矛盾	一七
第二章 資本堆積之必然的停窒	二六
第一節 福田博士新說之要領——與圖甘舊說之相符合	二七
第二節 批評之第一段——生產手段之本質	四〇

目次



第三節	批評之第二段——奴隸經濟與資本經濟之本質的差異·····	四三
第四節	批評之第三段——圖廿數字表之討核·····	四八
第五節	批評之第四段——圖廿立腳點之討核·····	五三
第六節	關於資本復生產的馬克斯之表式——其一，單純復生產之表式·····	七一
第七節	關於資本復生產的馬克斯之表式——其二，擴張復生產之表式·····	七六
第八節	剩餘價值實現化之一條件的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	八四
第九節	剩餘價值實現化之一條件的社會之消費力·····	八六
第十節	擴張復生產之必須條件的資本主義組織外之販路·····	九二
第十一節	先資本主義的外圍之重要·····	九九
第十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的史實之左證·····	一〇三
第十三節	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必然的停窒·····	一〇九
第十四節	結論·····	一一二
第三章 資本積聚之必然的傾向 ·····		
第一節	資本之積聚集中與堆積·····	一一三
第二節	所謂結合生產費之理論·····	一一五

第三節	固定資本之使用與生產費之結合	一一八
第四節	一般工業與結合生產費之關係	一二一
中篇 社會組織與個人之生活		
第一章	奴隸制與雇傭勞動制	一二八
第一節	奴隸與雇傭勞動者之異同	一二八
第二節	自由勞動者之所謂自由	一三四
第二章	勞動之痛苦與社會組織	一三七
第一節	生產的勞動之筋肉勞動	一三八
第二節	勞動何以是痛苦	一三九
第三節	資本主義組織下的勞動	一四一
第四節	伴隨活動自身的肉體的痛苦與快樂	一四四
第五節	勞動之繼續時間與其痛苦	一五〇
第六節	勞動所伴隨的精神的愉樂與痛苦	一五一
第三章	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的自由	一五五

第一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其一，企業之自由……	一五七
第二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其二，免受國家的強制之自由……	一六三
第三節	社會主義制之特徵——生產及分配之國家的管理……	一六六
第四節	社會主義制下勞動者之義務……	一六八
第四章	社會主義制下的個人之生活……	一七七
第一節	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之非難……	一七七
第二節	對於社會主義之非難的答辯……	一八二
第三節	社會主義之未來國……	一八六

下篇 關於社會革命的若干之考察

第一章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之過程（馬克斯之理想及其實現之過程）……	一九六
第一節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之過渡期……	一九六
第二節	共產主義之半成期……	二〇〇
第三節	共產主義之完成期……	二〇四
第二章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	二〇八

第一節	問題之所在——馬克斯學說中之所謂二個的交流	二〇八
第二節	戎巴達與豚涅司之解釋	二一一
第三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	二一五
第四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關係	二一九
第五節	政治革命之必要——平和的革命之可能	二二四
第三章	社會革命與社會政策	二三〇
第一節	共產宣言中所含的社會政策	二三一
第二節	奕斐爾特綱領與社會政策	二三三
第三節	社會革命之要素的政治革命	二三七
第四節	社會政策論者與革命家之同異	二四〇
第四章	時機尙早的社會革命之企圖	二四三
第一節	時機尙早的社會革命招致生產力之減退	二四三
第二節	時機尙早的社會革命終歸於失敗	二四八
第五章	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二五〇
第一節	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	二五〇

第二節	社會主義革命史之三時期·····	二五二
第三節	今日之俄羅斯還不是社會主義國·····	二五四
第四節	政治戰鬪(征服有產者)之時期·····	二五五
第五節	政治革命與暴力·····	二五九
第六節	反革命之鎮壓與暴力·····	二六二
第七節	精神的準備(宣傳思想)期與無產者之執權·····	二六六
第八節	經濟的經營(產業經營)期與社會主義革命之成就·····	二六八
第六章 政治革命後俄羅斯之經濟的地位·····		
第一節	序言·····	二七一
第二節	現時俄國經濟層之種種·····	二七二
第三節	德意志的國家資本主義·····	二七四
第四節	國家資本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之通路·····	二七五
第五節	農業稅與『軍國共產主義』·····	二七七
第六節	利權割讓政策·····	二八二
第七節	合作的資本主義·····	二八四
第八節	向社會主義之推移·····	二八六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上篇 關於資本主義的若干之考察

第一章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下的生產力之分配及其所含的矛盾之進增

凡於一定的時代，一定的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大概是一定的。此處所謂物質的生產力，是指人類製出其生活上所必需之物的力量而言。

這種力量，隨社會之進步而增加；譬如糧食，在技藝幼稚的時代，一人之力量，只能勉強產生得一人份之食糧，而在知道利用肥料或機械以後，一人之力量，可以產生得數百人份之食糧了。如今從事於農業的人，只是國民之一部分，其他的國民不須耕田，可以任意做農業以外的事體而能生活的，便是這個緣故。我看過一本前好幾年出版的書籍上說過：美國的大柯塔地方的農民，農業上機械之應用是最為廣遍的，在這個地方勞動者，一人一年間所生產的小麥，平均產額約有五千五百布塞（bushel，約千一百石）。而在製粉業發達的彌涅索塔地方，於其機械之應用最完備的工場裏面，從上面所述的五千五百布塞中取出五百布塞的種子料之後，把殘餘的五千布塞小麥在一年之內全盤製成麥粉時，大概可以得一千桶之小麥粉。一桶的小麥粉，大概可以供一人一年份之食料，

所以舉大柯塔地方的勞動者一人與彌涅索塔地方的勞動者一人相比較，前後合計二人的勞動者一年間的工作，大概可以生產一千人的一年間之食料。雖說在製造農業機械與製粉機械上是不得不消費若干人的勞力，在製造這些機械的原料上也是不得不消費若干人的勞力，漸漸窮源溯流地追想上去時，簡直沒有窮盡，明確的推算到底是不能夠；但是人類的生產力，總是在非常的逐漸增加，這是無庸置辯的事實。就以紡絲事業而言，日本全國一直到明治初年，都是用的一種簡單的器具，名叫紡車——就在現今鄉間之一部分的人，也還是在使用，那麼要使用一個紡錘，當然不能不要一人份之勞動了。但是以今日進步了的紡績機械而言，一人的職工，有同時可以運轉一萬二千個的紡錘的實例。不消說我們不能從這件事實立刻斷言是人類的紡績力增加了一萬二千倍，但是人類的物質的生產力，在逐漸的成就偉大的發展，這總是不能懷疑的了。

使我們人類這項偉大的物質的生產力日見發展前進，這在增進人類之福利上是頂重要的事件。但是，這種物質的生產力，在一定的時代與一定的社會之內，大概是一定了的。牠不消說是在逐漸增長，但是無論在甚麼時代，牠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是有限，這種有限的生產力之利用，應當如何分配之處，這從社會的一般民衆着想，也是頂重要的問題。假如人類之物質的生產力是無限的，那麼把牠任意地使用到任何方面，都沒有成爲問題的必要；唯其是有限的，所以從人類一般的慶幸上着想，便不能不講求最上乘的使用法。譬如空氣是人類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幸得空氣這樣東西，多量地存在着，超過於人類之必要以上，——即是從人類之必要上而言，可以說空氣是無限地存在，所以關於空氣之分配問題可以不起。無論爲甚麼人使用，使用了多少分量，怎麼

樣使用了的，這於其他的人全無何等的利害關係相涉及，所以沒有成爲問題的必要。假使空氣之分量是有限的，有怎樣一個人在必要以上多量地佔領了，餘外的人弄到窒息的地步時，問題是又要變化起來的了。無論甚麼人，都是想充分地吸收新鮮的空氣，但是新鮮的空氣是很有限的時候，一個人所得吸收的分量假使不加限制時，那麼他人便要受害了。所以說空氣之分量少時，愈少則一個人之使用量愈不能不加限制，有時不僅要禁止在必要以上多量地佔領的行爲，而從全體均分上的關係，一個人之使用量還要限制在必要以下。在這種事情的見地上，假使人類不限制其自由時，多數的人便不能共同生存起來。(一)有一派第三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想反抗在人類共存的目的上所必要的這種自由之限制，他們全是人類之叛逆者。這些事情，暫且不說，總之在人類生活上有 一定的物質是必要的，而製出這種物質的生產力，又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怎樣把這有限的生產力之利用分配於一般民衆，這便成爲社會組織之根本問題。

(一)參照中篇第三章「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的自由」

第一節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力之分配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全體之生產力，因爲要把各樣種類之財富，於各種分量之程級，向組織社會的各樣的人們供給，所以被分配於各種的事業之內；但是目前這樣生產力之分配，究竟是以甚麼來做標準的呢？是依何人之意志而決定的呢？我在此想先從這個問題說起。

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決定把各種貨物應得生產到若何分量的人一見，好像完全是企業家之意志。固

然在法律上沒有特別的例外規定以外，他們無論從事於何種貨物之製造販賣，完全是他們的自由。並且他們能用種種廣告術與販賣法，以指導 (guide) 或者創造 (create) 消費者之慾望。但是這些企業在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上，一切都是以獲得利潤為最後的目的。他們從事於種種貨物之製造販賣，他們是想賣卻這些貨物而得利。所以在法律上，雖然生產任何種類之貨物，完全是他們的自由，而他們於某種程度之內，雖然有引導消費者的能力；但在一般消費者完全不至於需要的物品——不需要，便沒有買主，沒有買主，便不至於賺錢——到底是處在不能繼續生產的境遇。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任何種類的貨物都可以產生的話，歸究起來，是一般消費者之需要何種貨物而決定；一定的貨物可以產生至任何分量的話，也是同樣地依一般消費者之需要該種貨物至何種程度而決定。歸根起來，社會生產力之支配，決定牠的最後的權力的，是掌握在一般消費者之手裏。

這樣抽象地說了之後，關於社會的生產力之分配，目今好像已經完全是德模克拉西行使着的一樣；其實實際行使的是完全的——恐怕是理想的字魯特克拉西 (Plutoeracy 金力主義)。何以故呢？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力之分配，決定牠的雖然是一般消費者之需要，而所謂需要，實是經濟學者所特別稱呼的『有效需要』，與單純的需要異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原則上，要使居住於其社會的人們之要求有效，那是非賦與人們以一定的購買力不可。無一定購買力的要求，是無效的，一切的要求，隨其所伴結的購買力之大小而增其效能。經濟學初步的教本上，已經是說得很明瞭的。被服襤褸的乞丐，立在珠寶店的窗前，縱使他想要金剛石指環，金製手錶，但是

他這欲求，因為全無何等的購買力相副，這在資本主義的憲法上是無效的需要。原來消費者可以左右生產者的話，是生產者專在以營利為目的而生產的緣故。企業者產生種種的物品，本是想把來發賣之後賺錢。我們想多買甲種物品時，自然甲種物品便多多產生；我們想多買乙種物品時，自然乙種物品便多多增殖。所以連購買物品的資力也沒有的人，縱使想這想那，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這全是無效的要求了。現在的日本憲法，有貴族院和衆議院之區別，公爵或侯爵一類的人們，平地便可以充當議員，多額納稅者，僅僅從數人或數十人之中選出議員一人，而納稅至若干圓以上者，譬如京都一市，從有選舉權者數萬人以上的大都會中，纔僅僅選出議員四五名，最後大多數的貧民們，因為無有所謂選舉權的緣故，全國之中，竟連一人也不能送入國會。像這樣同是日本國民，而以社會上的位置或資產之關係，在政治上的發言權上竟有這大的懸隔；經濟上的發言權，恰好和這一樣，——不僅和這一樣，其等差的程度比這還更甚。一年有一千萬圓的收入的人，一年可以起與一千萬圓相當的需要，並可以應此需要去導引社會之生產力隨其意慾之所歸趨；而一年僅有十萬圓的收入的人，僅有其百分之一的發言權；一年僅有一千圓收入的人，更僅有十萬圓收入者的百分之一的發言權了。關於決定一國之全生產力向若何方面灌注的事體——這是已如前述，在我們的物質的生活上，是根本的大問題，——各人所有的發言權，精確地與各人的收入成比例。這樣完全的理想，的李魯特克拉西，是資本主義國中的經濟上的不文憲法。

第二節 生活必要品的生產制限

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社會內，物質的生產大概是一定的。把這一定的生產力利用向各項的事業應作如何

的分配，若何種類的貨物，應各產生到若何的分量，這種問題，是依何種的組織而決定的，這是社會之經濟組織之根本問題。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如上所述，是依完全的李魯特克拉西而決定着的。

生產力之分配上一旦採用金力主義的時候，其必然的結果，是社會之生產力，概由富者所要求的貨物之生產所吸收。然如上所述，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社會內，生產力大概是一定了的。此有限的生產力如爲富者所要求的貨物之生產所吸收時，——其所吸收的程度愈多，——則多數貧民所要求的貨物之生產事業，其生產力被其吸取，其生產便大受限制。所以社會之生產力，無論發展到若何程度，假使生產力之分配不適宜——對於一般的貧民不適宜時，則多數人所要求的生產，不能如意地增加。由是其生活之改善，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之程度相比較，竟遙遙落後。

富者所要求的貨物，何故與貧民所要求的貨物不同呢？富者愈富時，其所要求的貨物與貧民所要求的貨物愈見異其種類，這是甚麼緣故呢？大凡對於人類的生存愈是必要的貨物，則對於這種貨物的欲望愈容易滿足，錢有多餘的人，只把極小部分的錢來充買對於生存所必要的貨品，其所殘餘的大部分，——這一部分的比例，隨其人所消費的收入之分量而遞增，——卻用來充買對於人類生存上不十分必要的貨物。貧民則反是，貧民只有極少量的收入，即把其收入之全部全以充買對於其生存上所必要的貨物時猶虞不足。

吾人消費物質而得享快樂，有一種名叫享樂遞減之法則，這在多數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大都是有說明的。譬如我們飢餓的時候，吃第一碗飯時可以感受非常的快味，但吃到第二碗第三碗的時候，分量愈增，逐漸與飽滿點

接近；及至達到飽滿點以後再要吃飯時，反轉成爲痛苦了。痛苦之程度，依所增食的飯量而增加。因爲有這樣的緣故，假使從吾人物質的欲望之種類而言，種類無限，人類物欲實在是無限。然而一定之物質的欲望要滿足時，早晚總可以達到飽滿點的。假使從這上面說來，人類的一切欲望又都是有限。雖同是有限，然其程度之差異，依欲望之種類而不同，這是自明的道理；好在欲望之滿足，其對於人類之生存愈必要時，大概有限性的程度愈勝。譬如食物對於人類生存是第一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每日吃三次或四次，各次攝取若干分量後，便甚麼人都感覺着滿腹，無論若何的饕餮，每日總不能吃上一斗白米。衣服大體是一樣，家屋也是一樣。無論如何寒冷，無論如何有錢，一時總不能穿上多少件的衣裳。無論如何富豪，共總只有一個腦袋，一時也不能戴上多少帽子。有這樣的緣故，所以無論衣服，無論是家屋，對於牠們欲望，在維持健康之必要上，大概是有限的，過細想來，也應該是這樣。甚麼緣故呢？因爲人類生存上所必要的物質的欲望假使是無制限，不把這無制限的欲望滿足時，吾人之生存便不能維持。我們人類是具有這樣不適宜的生理的性質的生物的時候，那我們僅有有限的物質的生產力的人類，應該早從地球上絕滅了。好在無論甚麼人都只有一個身體，而這個身體之大小重量都是有限的。太刀山（日本的角力家）已經是不數見的巨漢，但他的身長也不過六尺三分，體重也不過三十六貫。（一貫約合中國六斤）無論說有多大，大概是有限的。所以馬琴（日本的舊小說家有八犬傳一書摹仿水浒传）說得好：『想到這兒這兒的時候，家庫只是容膝的器皿，始皇之阿房，原憲之蝸居，皇宮藻屋，或都或鄙，所差只是廣狹，把兩脚一伸而睡，不能出一席之外。』隨處縱使建設多少宏壯的別莊，但在隨處的別莊中，總不能同時伸長手脚而睡。身體既是有限，身體上所附麗的器官也是有限。就是世界的富豪如羅克匪

勒或駱士階德，總不能以金錢之力量增加其胃臟之個數。所以無論耗廢多少金錢，窮奢極欲地美食，但他們一日之中所灌注於胃臟的分量，總是有限。在昔我們的祖先屢屢死於飢饉，所以他們所最恐懼的便是飢；如今的富豪却以空腹感的襲來為最所歡迎的了。無論若何豪富，他們的胃臟總和常人是一樣的大小，並且總和常人一樣，只有一個，平生疏於筋肉勞動的他們，始終為食欲不進之苦况所窘，飢餓之不來，在過於幸福了的他們，却是不幸的了。

人類生存上所必要的貨物之需要量大抵有限，因為有這個事實，所以在人類物質的生產力成就了偉大的發展之今日，我們可以期望，對於一切人類得以保證其生存的社會組織之實現，但此事非目前所討論的問題。在此我們所追求明瞭的理解的，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事實，而大富豪們所有的資力愈大時，却愈要需求無用的貨物。前面說過，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愈有資力的需要，其效力愈強。高貴的貨物，便先見生產。所以有限的社會生產力，便先為富有階級所需求的比較無用的貨物之生產所吸收，而為社會一般人民生產其生活必要品的生產力，竟殘留無幾了。在社會主義的組織之下，一切的人還未能飽食麵包時，決不准任何人享用糖點，有這樣的原則支配，所以有限的社會生產力，第一先利用於一般人民之生活必需品之生產，猶有餘力的時候，所餘的生產力纔次第利用到比較無用的方面去；但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有限的社會生產力應該充當向若何方面之決定，愈有錢的人愈有發言權，而有錢的人因為有過餘的資力，對於生活必需品已經鑿足，其所要求的貨物必常向比較無用的方面上擴展。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與社會主義的時候恰恰相反，多數的人連充分的麵包也還

不能到手，而一部分少數者，豈止享受糖點，更在窮奢極欲地食用甘旨了。由是社會之生產力便從一般民衆所切要不可或缺的事業上拔去，在需要供給的原則之下，儘向比較無用的——而在買主方面當付高價的——貨物之生產事業上灌注。這在人類共存之情誼上，我以為是痛心的事體。

第三節 貧富懸隔所釀致的禍災

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社會內，物質的生產力大概是一定了的。社會上一部分的人，把這一定了的東西向比較無用的方面消耗了時，其餘大多數的人當然要受窘迫了。所以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在同社會中有大富豪出現時，——富豪是把一定了的社會之生產力，專為自己的方便，向比較無用的方面消耗的，——這是一般貧民之災害。貧民不願意同儕之中有大富豪出現，這並不是僅僅的嫉妒。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富豪愈大時，一般貧民因為從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之生產事業上，社會之生產力是被人剝取了，事實上是愈受窘迫。所以貧富之懸隔愈甚，是資本主義之社會上的一大禍災。

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者，以為勞動者之工資逐漸增加，可以用統計證明，資本主義之恩澤，在勞動者階級也要算是均沾的了。其實這不過指出近代偉大的生產力之發展所釀致的恩惠之幾分，多少也滴落了幾點到勞動者階級罷了。關於社會福利之分配，有一定不易的關係的，不是貧民階級所收入之絕、對的、增加，是其相、對的、增加。社會之最低層即使多少提高了幾分，然而位在最高頂上的人們，更以數倍於此數千倍於此的比例而提高時，貧富之懸隔愈甚。貧富之懸隔愈甚，則社會生產力之發達所釀致的恩惠之分配愈趨於不平。我們一方面看見勞動

者階級之收入雖然極緩慢地增加幾分，而於他方面卻看見富豪之收入實以可驚愕的速度增進，我們是不能安心逸意謳歌事體之自然的進行的呢。

我曾於拙著『社會問題研究』中，登載有『現代社會上財富之集中』一文，現在再錄其一節於次：

『據一九一四年美國所得稅之報告……約翰羅克匪勒——石油大王羅克匪勒——之收入，爲五億法郎。把這五億法郎的收入作爲五分利看時，大羅克匪勒之財產，至少是上了百億法郎（約四十億圓）……我們所計算的是幾十億幾十億的數字，但是諸君對於這十億的計數能夠有明瞭的觀念麼？……自入二十世紀以來，時鐘之鐘擺所搖出的秒數還沒有達到十億次呢！達到十億的時候，要再隔十幾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的午前一時四十六分十秒。所以我們每一秒鐘積數一法郎，要隔三十四年有奇，然後纔能達到十億法郎的數目。然而羅克匪勒之財產，更足足上了十倍的百億法郎了……全財產已有此數，從此年年還要生出五億法郎的收入。一年五億，一天有一百三十七萬法郎，一分鐘間有九百五十一法郎，一秒鐘間有十六法郎弱點子了……』

像這樣一面有可驚愕的財富之集中，而於他方面復有可驚愕的財富之浪費相隨伴。據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魯馬唐新報（Le Marin）的記事：「昨日汪達畢德姑娘結婚，當日所用之鮮花費用去二十五萬法郎」云云。

美國不僅有最大的富豪，美國亦當然有最顯著的貧富之懸隔。一九〇六年，經濟學者亨利·佛郎司可·柯

爾氏已經有下面的記述了——「半世紀前，美國的素封之家只有五十，而其財產之總額與國民全體富力百分之十相當，僅僅纔上一億美金；而在今日，單是約翰羅克匪勒之財產，已經有十億美金以上，其收入爲七千萬乃至一億美金，與國民收入之總額四十分之一相等。像這樣的財富之集中，使社會分析成兩種階級，一方面有非常豪富的人，而他方面有非常貧困的人……」

一九〇七年，日內瓦（Geneva）開催商人社會聯盟第一次國際會議的時候，我曾參觀過其中的家庭賃工萬國博覽會……我把當時所攝錄的記載一二罷……次所揭列的諸例，都是取材於美國——巨億富豪國的美國——之部門的。

嬰兒用的毛絲綾（Mouseline）衣裳，很費手工而非常美觀，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但是牠的縫工，十二件衣裳，平均只費一法郎二十五商提母（Centime），據附箋所錄，勞動者一日須工作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而一日所得工資，爲五十商提母乃至六十商提母（一百商提母約合中國四角），一小時只有四商提母的份子。一月三十日，一日工作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而一月之收入，纔僅僅十五法郎至十八法郎的光景……在前面已經說過，羅克匪勒之收入，通晝夜計算，每一分鐘可以得九百五十一法郎，而此等從事賃工者之收入，一月纔十五法郎至二十法郎——這樣可驚愕的距離，不是有天與地之懸隔嗎？

『可驚愕的距離有天與地之懸隔』，這個便是問題了。『有可驚愕的財富之集中，而於他方面復有可驚愕的財富之浪費相隨伴』，而這可驚愕的財富之浪費，是指說有限的社會生產力，爲極少數人幾乎近於無用的慾

望所消費，回頭是說社會生產力，從一般民衆生存上所必要的貨物之生產上被人剝削——這個便是問題了。所以馬克司說：

『家屋不在大小，假如圍繞着牠的家屋一樣是小時，牠在住居上，算滿足了一切的社會的要求；但是假如在小屋之旁建築了一座宮殿，小屋便因之而形成側陋了時，那家小屋是證明住在牠裏面的人，不是不能主張何等的權利的人，便是只能主張僅少的權利。隨着文明的進步，不怕這家小屋就如何增高，假如隣接的宮殿在同樣的程度，或者更在其遙遙以上的程度增高時，這比較小的家屋之住居者，在四壁之內，總時常感着不快，時常感着不滿，時常感着不發揚……我們的欲望和享樂，是社會地發生的，所以我們要以社會來測量牠，我們不能把充足牠的對象來測量。牠是因爲有社會的性質，所以有相對的性質。』(Lohnarbeit und Kapital)

我們時常聽着學者說，今日的勞動者，就是最貧窮的人，也比野蠻社會之酋長還過着很富裕的生活；我們也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我們是生在所謂文明人之社會裏的，野蠻人要到文明人之地步，社會生產力不知道要有多少的進步纔行呢！把豐富的生產力任隨少數者浪費，而多數者相對地不能不過極可憐的生活，這是我們所極引以爲遺憾的。

第四節 資本主義與機械的生產之矛盾

以上的議論，是我從前在種種機會上論說過的，以下我要把來做出發點，把資本主義中所含的三三矛盾指

摘出。

第一當述資本主義與機械的關係。近代經濟之特色，是在機械之應用，我想這是不待言的。我在前面關於紡績曾經說過一句話，紡車那樣簡單的器具，運用一個紡錘，要一個人的勞動者。但說到機械上來，一個動力同時可以操縱多數器具，在現代精巧的紡績機械，一人的勞動者，可以運用一萬二千個紡錘了。人類之發明器具，原是用來補足不完全的器官手之不足的，故纔造出了特殊的文明，而爲他種動物終始不能追及；但是器具發明之後，仍是不能不把這不完全的器官去運用。所以就是紡車，要運用一個紡錘，也要用一個人手，一個人同時不能操縱多數的紡車。說到機械上來——一架的紡績機械裝置有幾百紡錘，而這幾百紡錘只受一個動力之運用——機械是把器具之操縱，從人體器官之不備上解放了。機械已經發明，運動機械的機械，又隨之而發明了，人類之物質的生產力，實際上成就了數千倍數萬倍的增加。我們說到近代的偉大的生產力之發展，把那功績之大半歸之於機械和隨機械而起的勞動之結合（尤其是工場內的分業）的，畢竟是這個緣故。

於是機械爲物，自然被資本家的企業者所深愛好，所不得不愛好的了。何以故呢？企業者生產貨物，原是想賣出後賺錢，使他們多賺錢的捷徑，是在節省貨物之生產費。他們歡迎這項有力的武器，使勞動之生產力增加，使貨物之生產費減少的機械，這是當然的事理。從事於貨物生產的企業者，他們的利益，是成立於由賣却貨物後所得的收入與生產該貨物所需要的費用之差額，所以貨物之賣價增高，與乎貨物之生產費減少，都是增加企業者利益之途徑，但是貨物之賣價，是由市場之需要供給之關係而定，這是一人的企業者所難隨意左右的；而貨物之生

產費上的問題，這是限定於自己工場內部的問題，——雖說這種生產費是由種種的生產手段之價格所左右的，仍不能離脫市場上的需要供給之關係，——但比擡高自己所生產的貨物之價格總是要容易一點，所以企業者專注意於生產費之節減；要節減生產費，利用機械最是有力的手段，所以機械之發明和改良，自然最爲企業者所歡迎了。一人的企業者既採用新式機械以節減其生產費，則從事於同種貨物之生產的別的企業者，於競爭上亦不得不立時採用新式機械。何以故呢？因爲採用新式機械的競爭者，因採用新式機械之故，得以節減其生產費，使其貨物可以廉賣幾分，則全市場便爲所佔領。由是新的機械一發明，便立即普及於產業界之全體；其機械之利用漸漸普及於全體之後，又有更新的機械，更爲誰何的企業者所採用，由是又普及於全體；如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好像一個自然法則一樣作用著的『競爭』，把新的機械之不斷的發明和機械應用之不斷的擴張，在沒落的刑罰之下強制於一般的企業者。馬克斯曾說：『把有產者的生產，不斷地再從其舊軌道上拋出，使他的資本因爲已經使勞動之生產力緊張了的緣故，更不得不再事緊張的法則……不假以一毫的休息，不斷地只是耳語着「前進！前進！」的法則，』便是這個了。又如『競爭不斷地以生產費之法則追窮資本家，而資本家對抗其敵人所煅冶的武器，却盡是對抗自己反攻的武器。同時資本家不息地採用新的，雖高貴然可以廉價地生產商品的機械和分業，使之新陳代謝，不敢等待到競爭之化新式爲陳腐，孜孜不息地努力着，想在競爭上制勝利。這樣熱狂的躍起運動，在全世界的市場上同時起着的，我們想像到這兒，則資本之增殖，積聚，集中，其結果是怎樣地把不斷的躁急的，且以加速度擴大其規模的分業，與乎新的機械之應用，和舊的機械之完成招致來了的，我們可以知道了。』

也是說的是這個。

機械之發明如是愈益進步，這事、自身、不待言，對於人類福利上是可喜悅的。因此而物質的生產力發展之可能愈具，人類之一步一步走近理想社會的物質的條件也成就了。但是，對於資本主義一方面，在此有一困厄的事情存在。所謂機械的生產，其實便是多量的生產。馬克斯說過：商品之生產，隨着機械之改良而愈見低廉，同時則機械自身愈見昂貴。要安置高價的機械幾架，並要使用運轉這些機器的機械的時候，這實在要耗費莫大的費用。出這樣莫大的費用，也還可以合算的緣故，是因為由此可以生產極多量的商品。因此之故，需要少的物品，終不能經受機械之生產。機械生產之目的物，非是廣為社會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不可，即是多量生產，是機械之經濟的利用之必要條件。但是這在資本主義上，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困厄的事體了。

多量的生產為甚麼便是資本主義的一件困厄的事情呢？這是因為牠以營利為目的的緣故。資本家的企業者以營利為目的，其所生產之物總要能得一定的利益纔能發賣。以賣的目的上說，當然想多生產富者所需要的物品，但社會之富者極佔少數，其餘的大多數都是貧民，專生產富者所要求的貨物，則與以機械為多量生產之技術上的要求不相容。假如世間上的組織是社會主義的時候，則第一當生產的物品，是社會各員所要求的生活必需品，這儘可以達到多大的數量，便安置無數的機械，大規模地行多量生產，這誠是很好的事情；但在資本家的企業者，是以暢銷贏利為目的而生產物品，本來想以擁有巨萬資財的富豪為對手，而不幸此等富豪僅佔少數，要應其所要求時，則不能應用機械以營多量生產；掉頭若要以貧窮人為對手時，而貧窮人又沒有十分的購買力；於

此便不能不遇着一個巨大的矛盾——這便是組織與技術之矛盾。因為有這個矛盾的緣故，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便限制了機械內所含的技術的可能上生產力之偉大的發展了。

我在前揭的『社會問題研究』第二十四冊所載『現代社會上財富之集中』一文內，關於現代社會可驚愕的財富集中之所伴隨的可驚愕的財富之浪費，又曾介紹過二三實例。有一位匪拉德爾匪亞地方的最豪富的銀行家，名叫吉姆斯保羅（James Paul），因為他女兒初出社交場（Debut）的緣故，在紐約開了一次舞蹈會，真是豪華已極：『費用到五十萬法郎以上，其中鮮花一項，費去金額十二萬法郎；當晚最使來客驚目的，是在大廳內飛放從南美洲及印度地方採集來的許多珍奇的蝴蝶。』又有灰突乃夫人，是有名的富豪汪達畢德的女兒。她的兒子『在最初的聖誕節受了一個玩具的贈品，那玩具是在象牙上嵌黃金和寶石，端上掛着幾個金鈴，價值是八百美金。』這個小孩子被他父母帶到法國去過一次，『那時玩具的保險金額是十二萬五千法郎。』這些不消說都是極端的例子，但是貧富之懸隔愈甚時，無論何國，在社會一部分上為大多數貧民所夢想不到的財富之浪費，是鬧到了可矇惑的程度的。生活上所必要的消費既有限，有有餘的收入者，自都會向有害無用的方面窮極其奢華，但『在象牙上嵌黃金和寶石，端上掛着幾個金鈴』的這樣值得八百美金的玩具，到底是不宜於機械之多量生產的。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國內出了不少的暴發戶，大阪有一家襪店受了雇主之訂約，襪扣要用金的七寶（日本襪形如半手套指端）（開）又後跟用套扣束。只要是有購實力的人——即是有錢的人——之要求，便無論是甚麼無用之物都可以供應，這便是現世之組織。但是像這樣的奢侈品，需要的人只限於極少數，不是可以應用機械來作多量生產

的物件。而貧富之懸隔次第加甚的意思，便是把有限的社會生產力必然的向這方面奪去。資本主義上所特有的生產制限，就這樣發生出來了。

資本主義下有生產制限這句話，切不可誤解；不可以爲社會主義下便沒有若何的生產制限。屢次重複過的一句話：一定的時代與一定的社會內，物質的生產力，大概是一定了的。所以縱使採用了社會主義的組織，一切的貨物也不能無限地生產。變化所起的，只是有限的生產力之利用的方面。在社會主義之下，其決定應生產的貨物之種類，不以銷路之好壞來做標準，是以大多數人之必要與否來做標準。所以有限的生產力，第一要先分來作社會各員所要求的生活必需品之生產；一切的人麵包足食之後而生產力尚有餘力時，纔能作爲糖點生產之使用。在這樣的意義上，社會主義下對於生活、必用品之生產制限解放了，機械之利用，纔能毫無餘憾地得以實現。近代特有的生產手段，以機械之多量生產爲精神，其所以切望社會主義而不可已者，正以此故。

第五節 資本主義與資本增殖之矛盾

資本家的企業者爲消售而生產貨物，這是他們自己殖貨致富的緣因。但是他們自己能够達到殖貨致富的目的，漸漸把龐大的富力集中時，其必然的結果，是使他們自己以外的多數人相對地愈見貧乏。貧乏是甚麼？便是減少購買力的意思。多數的人已經把購買力減少了，資本家的企業者所生產的貨物便不能消售。貨物不能消售，這在爲消售而生產貨物的資本家之企業是致命的打擊。於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某種程度之後，其自然的命運，是對於生產力發展之根本動力自動地加以一層鐵皮。這樣的說，素是我自己的意見，與所謂 *Unterconsumtion* 。

theorie (消費過小說) 大略相當。但這『消費過小說』的名稱實在不恰當，資本家的企業者其生產貨物之目的，並非爲供給社會一般之消費，只是爲圖利益而求銷售，所以對於其所生產之貨物，社會多數人即使如何熱心想要消費，假如這些人們無有相當購買力(即所謂需要)時，這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是不成爲問題的問題。不是消費力之減退，是購買力(需要)之減退。所以與其說是消費過小說，寧說是需要過小說。只是人之所以需要貨物，是圖消費，——而在資本主義之下，要消費物品時，又不能不付一定的價值以購買(即需要)——所以不必說需要過小，只說是消費過小，也不至生出甚麼誤解的。

再說對於這消費過小說，學者之間是有種種的異論。一九一九年十月及十一月的『改造』雜誌上福田博士所發表的『資本增殖之理法與資本主義之崩壞』一文，便是此例。

福田博士的論文，雖是結構雄大的長篇，但假如我不會十分誤讀的時候，牠的要點覺得是在次列的主張上。資本主義之下『消費即愈減少，而生產愈見擴大，不起甚麼障礙』，『資本制生產上的資本之形成與生產之擴張，可以和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並且是儼然獨立着的，這是牠的(資本制生產的)本質』，『馬克斯所謂擴張再生產無限地增大起來，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無限期地擴張起來……像由消費而來的制限之類，連痕跡也不能認出』。

要理解博士以何種理由而主張是說，我們關於博士所謂資本之形成與生產之擴張，稍稍有先了解其真相之必要。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職司資本之形成的，是資本家階級。勞動者階級只有少額的收入，其收入之大半已消

費於生活必要品之購置，更無十分的貯蓄之餘裕了。而在大資本家，因為有這大的收入，即使窮奢極侈也還有不少的餘裕。暫舉一極端的例以說明罷，譬如前面說過的羅克匪勒之收入，通晝夜計算，一分鐘有九百五十一法郎，所以無論若何奢華，尚有有餘的金錢存在手裏。這些資本家之收入，並不是全部消費了的，消費了的只是一部分，殘餘的大部分儲蓄起來化成了資本。即是『資本之形成』是在他們的掌握裏。其新成資本，又由他們的手裏重新使用於生產，其結果便是『生產之擴張』。像這樣不消費其收入之全部而資本化其大部分以擴張生產，坡勒氏（Pohle,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3 Aufl., 1921）以為這是資本主義對於資本家所要求的道德的義務；實在好得有這樣好的道德的義務，不然如像羅克匪勒一分鐘內幾乎有一千法郎的收入的人，假使要把全部收入和盤消費以為其義務時，恐怕他已經早成了精神病者了。幸得不消費其收入之全部而資本化其一部，正是資本家階級之職責，而又幸得近代資本家的企業者，尤有所謂資本家的精神。有一位富豪，是有名的大富豪，可布扶格之競爭者，已經到了老年，想從事業界退隱的時候，向着扶格商量道：我們平生惟利是求，一直到了今日，我們彼此可以放鬆一步，隱退了去把機會讓與別人罷。但是扶格答道：我自己的想法全然不同，我自己是儘想賺錢到底的。像這樣單以富之積聚為目的而無限期地追求利潤的精神，這正是所謂資本家的精神，實在他們是全不知足。就這樣他們纔把收入之一部——之一大部，逐漸地化成資本。

於是這些資本家之收入便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為享樂而消費，一部分是化為資本；他們之收入愈大時，化為資本之一部分比享樂用的部分之比例愈大。然則所謂資本化的收入，又怎樣地資本化的呢？這是由於用作生

生產手段之購入，更說詳細些時，便是用以重新建築工場，安置機械（向這等方面化成固定資本的佔其大部分），或者購買原料，招雇勞工，依這種種手段使貨幣資本化了的更成爲生產資本。所以資本化了的收入，在消費上說來是沒有區別的，但其所不同的地方，只是非爲享樂而消費，是爲生產而消費，非用以購買享樂財，是用以購買生產財，罷了。資本家階級收入之大部分，就這樣依不斷的資本化而引起對於生產財的無限的需要。於是社會全體之需要便分爲三種：第一種是貧乏者幾以其僅少的收入之全部所引起的對於享樂財的需要，這是大部分趨向於生活必需品；第二種是富裕者以其巨大的收入之一部所引起的對於享樂財的需要，這是大部分趨向於奢侈品；第三種是該富裕者以其巨大的收入之主要部分，資本化後所引起的需要，這是全部趨向於生產財（機械原料之類）的。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漸次足重的是這三種需要中的第三種，福田博士說：『資本主之自己消費，不消說是顯着地增大了，但是遠不及生產額（？）之資本化與生產要具化之比例的增大云云』也就是指說的這一點。單只說到這一點時，就是馬克斯，就是福田博士，就是我自己，都大概認識着相同的事實；但所奇怪的，是從此同一事實之認識出發，而所生的結論纔完全相反。

資本家的企業者爲消費貨物而生產，故其所生產的貨物只要能够消費，資本家的生產可以毫無障礙地發展起來。但如前述，富者所有的巨大的收入之大部分不斷地資本化以充生產財之購入，故福田博士得以推進其論理——資本無限地增殖時，對於生產財的需要無限地增加，而且已經有了需要，只要所生產之物可以消費，資本家的生產可以全無障礙地運轉。對於生產財的需要既是無限地增殖前進，不怕對於爲消費之故所引起的享

樂財之需要（前所述第一第二兩種）即見減退，在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上全無何等的窒礙。所以說『消費即愈減少，而生產愈見擴大，不起甚麼障礙。』

但是這種議論，我們假如一旦把生產財之性質弄明瞭時，實在是不費吹灰之力便全盤覆墜。生產財是甚麼？資本家的企業者爲甚麼需要生產？他們不是把來作爲生產享樂財（可供消費的貨物或勤勞）的嗎？一切的生產財都一概稱爲生產手段，這已經是明白的了，即是牠的究竟是在作爲生產其他的享樂財的手段。不消說鐵成爲製造機械的原料，而某種機械復成爲製造他種機械的手段，由機械（例如紡績機械）而製成的貨物，更成爲製造他種享樂財的原料（例如絲作爲綢緞的原料）之類。財與財之交互關係，在今日的經濟界上實在是無限地複雜；但是歸根極底，一切的生產財，總要作爲生產可供人用的甚麼享樂財的直接或間接的手段，纔有存在之意義。這不僅從人類之立腳點看來是這樣，就是從資本家的企業者之立腳點上看來也是這樣。不消說從一個的企業者之立腳點上說來——譬如只從生產鐵的企業者之立腳點上說來：製造機械的人要購買他的鐵去作爲生產『機械』這種生產財之原料，這是可以說的。又譬如從生產絲的立腳點上說來：機械業者要購買他的絲去作爲生產綢緞的必要的材料，這也是可以說的。但是最後的機械業者所生產的綢緞，這是必然地爲人消費之用、需要的；假使機械業者不受人何種的需要，則機械業者可以不買絲，機械業者不買絲，則紡績業者可以不買機械，紡績業者不買機械，則機械製造業者可以不買鐵；像這樣經過各種的生產階級最後所生產的享樂財極局總要求得一定的需要者，這是很有關係的事體，一切絲呀，紡績機械呀，鐵呀，及其他直接間接作爲其生產的手段之

生產財都倚之而存在。即是一切的生產財，都是朝宗於爲消費之需要的。我們如想到這種易明的道理上來，則『像從消費而來的限制之類，連痕跡也不能認出』的話，是絕會沒有的了。

在這個地方，明明有『從消費（爲消費之需要）而來的制限』之存在，值此之故，資本主義的精神之特徵所謂『資本之無限增殖』，便屢受有力的阻窒，而資本主義時代之特徵所謂『產業恐慌』亦因之而引起。資本家之收入過度地資本化後，各種或特種的生產階級之生產財（工場機械之類），便不能適應消費界之需要，這是因爲生產財之供給過分地充殖了的緣故，生產過分地擴張了的緣故。於是機械便中止或省縮其運轉，而多數的勞動者便不得不領受少許的失業津貼被拋出於街頭。此處正是資本主義所無可如何的一個矛盾。資本家雖欲無限地增殖其資本，而消費界都是不許。但是流入資本家手中的莫大的收入，又時常迫促其行此不見容許的資本之增殖。於此便生出衝突，於此便生出破綻。

不消說隨着產業之進步，因爲固定資本漸次作重，存在於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社會之生產財，對於享樂財是會次第增加其比例。所以像福田博士所說的『物之蓄積不管人消費無限界地擴張起來』，雖是錯了，但如說『不管人類所直接消費的享樂財如何，生產財之蓄積到某種程度，可以擴張前進』，這便是事實。（註）『資本之形成與生產之擴張，可以和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並且是儼然有獨立着的』。這樣的放言雖是錯了，但是資本如愈有固定的性質時，這是以將來的享樂爲目的的，假如說『資本之形成與生產之擴張是可以與現在的，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並且儼然有獨立着的』，這樣也是事實。像這樣資本主義可以把現在的矛盾移展幾分到將來去，

在其若爾的範圍內替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者也可以彌縫其理論上的矛盾。我於他日的機會時，當更詳細地指摘其矛盾（我把這個預約，於次章的論文與本章的附註內履行）。

〔註〕「不管人類所直接消費的享樂財如何，生產財之蓄積到某種程度可以擴張前進」——這「到某種程度」的說素是很曖昧的，但為簡約的緣故，除如是措辭之外，別無他法，我在此處，更想稍稍詳細地敘述一下。

離開對於享樂財之生產額的相對關係單就生產財而言時，其生產額有無際限地增加的傾向，這誠是自明的事實。只有弓矢一類的簡單器具的人類，如今在生產着種種複雜的機械了。尤爲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以後，此等機械之生產額繁夥地增殖了，即使將來經濟組織變革成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此等機械之生產，不消說仍然是要無際限地增加前進的。

但是此等生產財是爲生產享樂財的手段而有效的，生產財之生產增加，則享樂財之生產亦必隨之而增加。例如紡織機械之生產額增加——此等機械因爲是要用來紡紗絲——則絲之生產額亦必隨之而增加。不消說在資本家的生產組織之下，紡織機械之生產，是屬於甲資本家之事業，絲之生產，又是屬於乙資本家之事業，所以從機械製造業者說時，他們所製造的機械，無論早爲絲之生產所用或所不用，他們都是不管的。他們只要有買主，便無論多少機械都可以生產。這樣說時，究竟甚麼人買他們的機械呢？不消說這是從事於絲之生產的乙資本家。乙資本家買他們的機械，不消說是要拿去產絲。所以機械之生產額增高時，絲——所謂享樂財——之生產額亦當然增加。機械之生產增加後，順暢地被乙資本家買去，乙資本家又順暢地運轉其機械，這樣的時候，絲是沒有不增加的道理。不消說機械製造業者不管賣與不賣，要想製造多少機械，他儘可以製造多少，但是那樣的時候，機械不能賣去，只留在自己的手裏，這位資本家是只有受損失的了。這不僅從廣泛的見地上看來是愚蠢的事，就是從該資本家之見地上看來也是再愚蠢沒有的。極高明的資本家爲利慾所驅，每每做出這樣愚蠢的事情，本來是有的。但是做蠢事者受損失，受損失者遭滅亡，我願意這樣的蠢事成爲世間之常態呀！

前面的說法，不消說是一種經過長時期的觀察，若使從特定的短時期說來，享樂財之生產不見增加，而同時却有生產財蓄積之機會；換言

之，便是直接消費者之需要雖不增加，而生產財有單獨地蓄積之機會。這是由於大部分的生產財，是由於有永續性的恆續財而成立的緣故。

現在我要說明這個事實，我且取鐵路為例。鐵路這種交通機關，和紡績機械之生產絲，織機之生產布帛是不同的，牠不是製造有形的享樂財的。所以在要說明生產財與享樂財之關係上，話很複雜，稍稍有些不便，但鐵路是固定的生產手段之楷模，鐵路發揮牠運輸人與物的效用，是與紡績紡絲，織機織布是同一的，即是在運輸乘客或最後的消費物（可供直接享樂用的既成品）上發揮其效用時，可以看作生產一種享樂財的工具；又如在運輸爲他物作生產手段的物品上發揮其效用時，可以看作生產一種生產手段的工具，要而言之，牠和更簡單的機械在經濟上的性質是相同的，所以我要借鐵道做例以事說明。

在歐戰以前，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對於半開化國及後進國所加力投入的資本，大半是從建築鐵路之事業入手。像這樣事業，在創設上是要費多少年數，一直到鐵路開通，開始運送貨物或乘客的時候，只有生產手段之巨大的蓄積，這是與直接消費者之需要全無關係地而獨立的。例如製鐵業者所生產的軌條，這是一個資本家之生產所出的生產手段；但軌條由從事鐵路建設的別的資本家繼續買去時，這便是一字不易地只有生產手段之蓄積了。這不僅是限於鐵路，大凡生產手段有固定資本之性質者，當其生產手段之創設時，於多少的程度內，一時之間，必有勞動之集中。像這樣的固定的生產手段被使用的時候，即使是以單純複生產爲原則的，然後從技術上的要求，也不能不定期的行擴張複生產，這是羅利魯森堡說明過的了。（參看 Rosa-Luxemburg,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S. 62.）

就在鐵路漸漸開通以後，使用於鐵路的生產手段是有耐用極長時期的性質的，爲此所投下的資本全部之一時的收回，到底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有固定性質的生產手段，在一生產時期內只消耗其一部分，其餘的部分依然留存於生產界，繼續可以用經用，所以於一生產時期內所複生產的，不過其價值的一部分，其全部之價值，在極長的時期內可以徐徐收回，次章的論文中，我有詳細的敘述。所以像鐵路這樣東西，一不怕就蓄積了巨大的資本在裏面，直接消費者之資力便一時的不能不膨脹的話，這是決無的事體。

說到船舶上來也是一樣。試把最近羅依特公司之船舶簿來一看，凡所登錄的船舶之中，其最古的是一八五〇年所造的。又請看一九一八年末，日本輪船之年齡別罷。

年 齡	船 數	總 噸 數
一〇年以下	一、三一三	一、一九一
一〇——三〇年	一、〇六一	八一四、二五〇
三〇年以上	一八〇	二三九、七〇五
不 明	七八	六五、一六三
計	二、六四一	二、三一〇、九五九

就單看日本的輪船，有這一點東西作爲生產手段而蓄積，並且接連使用了好幾十年了。不消說鐵路輪船都時常要人修理——卽是構成分子某部分之複生產，但是只要把這所必要的修理施行了，便可以經得很長的時間使用，只消舉這樣的一二例來，便可以想像了。這便是說資本之投下，是以遠的將來之需要爲目的的。因此，所以我說「資本之形成和生產之擴張，是可以與現在的、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並且已有獨立着的，這是事實。」

但是這個事實並不是說這些資本之形成和生產之擴張是可以全然、和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的。

不消說資本家之所以造輪船建鐵路，並不是專於爲的要促進文明；索取運費而賺錢，這是他們自始至終的目的。但是弄到取得運費而賺錢了，直接消費者之需要便不能不與之生出關係。例如專門以運人爲目的的鐵路，鐵路之直接消費者便是乘車的人，他們總得要有支出運費的實力。和直接消費之大小好像完全獨立的鐵路建設，到這樣也不能不保有一定的連絡了。又其鐵路運輸貨物時，其運費結局是由最後消費該貨物者負擔，所以仍然要與直接消費之大小有一定的關係。固然所運輸的貨物中，也含有爲別的資本家所買去的生產手段，但這些生產手段，結局是使用於享樂財之生產，歸根極底，仍然與直接消費者之需要不能不有連絡了。

前面已經是說過的，有固定性質的生產手段，牠的特徵是不能在一生產時期內收回其價值之全部，所以對於牠所投下的資本，是以比較遠的將來之需要爲目的的。所以牠雖是和直接消費之大小不能完全獨立，但和某、時期之內的直接消費之大小幾乎是獨立的。尤其是輪船鐵路材料之生產手段（例如種種的鐵材），更由輪船鐵路從此到彼地運送，那道生產手段之蓄積和直接消費相連絡處，在時間之關係上覺得

是更相懸隔了。生產手段和直接消費全無關係的推想之所以發生，正自有故，然這不過是把難解的問題移到將來去解決，便一時以為是解決的一樣罷了。因為有『資本之形成和生產之擴張可以和和現在的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並且已經有獨立著的』這個事實，所以我說『資本主義可以把現在的矛盾移展幾分到將來去，在其若爾的範圍內，替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者，也可以彌縫其論理上的矛盾。』

第二章 資本堆積之必然的停空

我在前章的論文之終部，對於福田博士的『資本增殖之理法與資本主義之崩壞』一文，加了若干的短評，然於意猶有未盡。我現在要於本章更以博士該文之批評為主題，稍稍詳述已見。假若自己有幾分的誤解時，也更想於此機會得收啓迪的教益。

我所批評的博士之論文，其後又編入『社會政策與階級爭鬪』一書中之第二篇第三章。博士於此新著之序中，敘述其『貫通全體的思想之結構』，據云：『社會主義，至少在馬克斯主義上，關於此爭鬪（階級爭鬪）的唯物史觀，是極持樂觀說的，即是這樣的階級之對抗，當然是早晚總會消滅的，因為資本主義自身是有必然的崩壞之運命。我所講的社會政策，不耽溺於這樣的樂觀，我不認資本主義自身有崩壞之必然的運命。假使就此放置時，資本增殖之氣勢愈見強烈，人生之真正的厚生之幸福，只有完全為其所蹂躪了。我們主張不聽其必然的運命之到來，我們要以人為的政策對抗此大勢，這便是社會政策存在之理由。由是社會政策為物，要根據馬克斯派之唯物史觀，到底是不能建立的，否，而且是當得否認的，而在我們不取唯物史觀的人，社會主義所教錯了的，我們要教正牠，這便是社會政策了。』現在在這一節中，博士把唯物史觀與機械的必然論同一視了，這是顯然地對於唯

物史觀之誤解或者曲解，但與當面的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故此姑置不論。只是我在此所想指摘的，是博士深信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資本增殖之氣勢』之『愈見強烈』，而『人生之真正的厚生之幸福只有全爲其所蹂躪』。所以博士決不是資本主義之謳歌者，否否，他還是要主張不得不對抗在資本主義之下的資本增殖之大勢的。博士是一方面主張社會主義學說有打破之必要，主張對抗社會民主主義的學者——這是我在『社會問題研究』第九冊中指摘過的，現在所指摘的，可見博士於別方面又是對於資本主義下的資本之大勢不得不對抗的主張者了。像這樣一方面對抗社會主義，一方面對抗資本主義，由此而博士所謂『社會政策存在之理由』便於以誕生，此其所謂社會政策者，究竟成爲何物，這不是我現在的問題。我現在的問題，是博士所謂『資本增殖之理法』是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可以無限地增殖的一種思想。這個思想，敘述在前揭的博士論文『資本增殖之理法與資本主義之崩壞』中，此文雖不過是博士新著的『社會政策與階級鬭爭』之最後一章，然在實際上好像是博士所謂『社會政策』之重要的礎石之一。我現在要檢討這礎石的鞏固與否，以豫卜其上層建築之安全與否。

第一節 福田博士新說之要領——與岡甘舊說之相符合

福田博士之『資本增殖之理法』，其大要我已於前章之末尾介紹過了。據說資本主義之下所生產的物品之消費即使不見增加，物品之生產是可以無限地前進的：『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如何無限地擴張前進』云云。這個學說有人稱爲是一九二一年日本經濟學界中最可注意的一個產物，其實這並不是我們初聽得的新

學說，在好久以前早由俄國之圖甘、巴爾諾夫斯奇 (Tugan-Barnowsky) 倡導過的了。據羅利、魯森堡說：俄國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時代，資本主義下的資本之增殖為當時論壇之題目，有種種的學說出現。(一)圖甘、巴爾諾夫斯奇之說，便是其中之一種，最初是以一八九四年用俄文發表的，隨後他用德語發表自己的學說，在一九〇一年發行的『英國的商業恐慌之理論及歷史』(二)與一九〇五年發行的『馬克斯主義之理論的基礎』(三)中。我在下面想先指摘出福田博士之構想，與圖甘、巴爾諾夫斯奇如何地多所相類之處。

(一) Rosa-Luxemburg: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13, S. 280.

(11) Tugan-Barnowsky: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1.

(三)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1905.

福田博士說：『於生產料與消費料間之出入推移上立脚的資本再生產之複雜的作用，明示之者實以馬克斯為嚆矢……但是馬克斯之研究，決不是已經完成了的，他沒有這胆量透澈到他的理論上之當然的結論。而後之學者，不僅怠於承繼其業，連一讀難解——其實並不必然——的資本論第二卷，也一並置之高閣……社會主義者不待言，便是經濟學者也一樣地無為放棄。』(四)——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氏也說：『資本論第二卷中，載有關於社會資本復生產之精密的分析；據我們想來，凡關於資本制經濟上的社會的物質代謝之一切科學的理論，當以此為基礎。但是此分析尚未由馬克斯所完就而殘留……至於今日，幾為馬克斯派學者所不顧。就我所知道的，例如德國之經濟學界，連想把馬克斯關於社會資本復生產之分析，多少利用點去說明資本主義之發展法則

及其恐慌的嘗試者，可以說全然沒有。』(五)

(四)『社會政策與階級鬥爭』四二五——四二六頁。

(五) Handekriksen, S. 199.

馬克斯之資本復生產之理論是堂皇的，但是是未完成的，這一部分在馬克斯派之陣營裏與反馬克斯派之陣營裏從來都差不多被人忽視了。岡甘、巴爾諾夫斯奇如是說，福田博士也如是說。好，我就算承認，我要看乘虛而啓的究竟是甚麼。

先儘福田博士說罷。『從唯物史觀之立腳點說來，要證實資本主義崩壞之必然性和社會主義經濟成立之不可避性，總要先把現在的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這是立足於資本之擴張再生產的，加以充分的說明，說明牠達到某階級的時候，在經濟上便再也不能存續。這種說明，這種證實，能在學問上確立時，社會主義纔從烏托邦之世界而於學問之世界中佔一堅固的立腳地。不然時，社會主義還未能脫盡世界改良家的書夢之域，至少不得不與無政府主義一樣，僅有曖昧的存在。馬克斯之擴張再生產論，實在是這個工作之重大的努力。我們當更把視野擴張起來，考察這以再生產理論爲關門的資本主義崩壞之必然的理論。值此之故，問題便分而爲二：第一是資本主義生產窒塞之理論，第二是利率漸減之理論……我把第二的問題保留在別的機會，以下就第一問題考察。』(六)

——岡甘、巴爾諾夫斯奇也在二十年前同樣地說道：『從唯物史觀之立腳點上說來，社會全體之發展，是依經濟之發展而決定的……要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崩壞之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推移之不可避

性時，先要嚴密地證明得資本主義達到一定的階段時其存續在經濟上之不可能。這樣的不可能確定了後……社會主義纔從烏托邦之世界安全地引到學問之世界……馬克斯與恩格爾斯爲成就這項事功，嘗試了種種的計畫，這是自然的了。現在我們從馬克斯與恩格爾斯關於此項的許多議論之中，去其皮殼而尋其理論上的核心時，我們……會遇着兩個理論之構成……其一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之販路壅塞論，其二是利潤率漸減論。』(七)據此看來，福田博士與圖甘、巴爾諾夫斯奇全然是英雄所見了；所見同，因之而用語乃亦大略相同。兩人都同揭出兩個問題，只是福田博士『把第二的問題保留在別的機會』，批評者的我，只消半途而了事，這是何幸如之。但博士關於第二問題的所見，究竟與圖甘同與不同，這却不幸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六)『社會政策』四五九、四六〇、四六一頁

(七) Grundlagen, S. 209, 210.

在此，我們的問題，是限定於馬克斯『資本主義生產壅塞之理論』，博士與圖甘均否認馬克斯之主張，以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決不會壅塞的，他們要說明這個理由，都同把經濟制度分爲兩羣而立論。據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所說：『我們從現在所引以爲問題的見地上看來，經濟制度當得分爲兩羣：第一羣之特徵是經濟主體的人和經濟上的勞動者的人同歸於一人，我名之爲調和的經濟；屬於這一羣特殊的經濟制度的，我舉出(一)自家生產即是生產者爲自家之用而生產，(二)立於社會的分業上之小獨立生產者之交換經濟，(三)將來的社會主義之生產……；第二羣我名之爲對抗的；在這一羣的經濟制度中，經濟主體的人和經濟上的勞動者的人不一致，這是

牠決定的特徵。經濟的勞動者編入於自己以外的經濟——其主體是不加入於經濟上的勞動的他人。生產手段不屬於勞動者而屬於經濟主體，經濟主體行生產之管理而決定其方針。如奴隸經濟制，封建經濟制，及資本經濟制便屬於這一羣之中。此等以利害之對立為其本質，故我名之為對抗的經濟制。』(八)圖甘這樣說了，而福田博士雖然用語稍稍不同，而以大略相同的內容說道：『在自足經濟裏……生產者與消費者屬於同一單位，所以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對立全然不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裏，此對抗亦不存在。然在營利經濟裏……生產與消費是對抗的兩方面，生產者之資格與消費者之資格又是相對抗的。生產者的勞動者，在非營利經濟裏，都是在自己經濟的單位內從事生產；而在營利經濟裏，原則上生產者的勞動者是在非自己經濟的他人之經濟單位(企業)內從事生產與勞動，所以生出次列的差異。非營利經濟中經濟主體在原則上自己也是一個生產者的勞動者，而營利經濟中經濟主體，不直接參與於生產勞動，其從事者是單位以外的人，從單位以外以從屬的關係或雇傭的關係拉入者。』(九)據此看來，圖甘的調和經濟制，與對抗經濟制之區別，為博士所修正而成為非營利經濟與營利經濟之區別了，此等細微的修正或改惡暫置不論，我們要曉得經濟制度之區別何以會由這兩種而成立的，這是因為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和奴隸經濟制封建經濟制同類視了的原故。

(八) Grunthalgen, S. 220, 221.

(九) 『社會政策』四九〇、四九一頁。

先看福田博士之議論罷。博士說：『營利經濟中……其從事者是單位以外的人，從單位以外……拉入的。所

以此等外來者之消費，不在經濟主體之單位內，而在生產經濟以外。生產經濟者，其生產物之一部，不消說是供自己經濟消費之用，其他的一部以充經濟以外的消費，更其他的一部是換值成馬克斯所說的剩餘價值。在現在的資本經濟，這些都不是就其經濟之生產物立地生出的，要全生產物悉換成價格而消售之後纔有右列的分配；所以事情稍為複雜，不容易捕捉其真相。反之，如封建經濟和奴隸經濟，則不必經此換價之程序，故事情比較平易。」

(一〇) 本此理由，博士便想由奴隸經濟之觀念進而「捕捉」資本經濟之「真相」，而於此點，博士又與圖甘、巴爾諾夫斯奇同一其揆。我在下方為讀者的便宜起見，把兩人之議論上下並記：

福田博士

「在奴隸制度之下，奴隸是一種生產要具，所以其消費雖在奴隸主之經濟單位內，然非本質地經濟單位之消費，恰和畜餌之消費非其經濟單位之消費的一樣。這是所謂生產的消費，和原料之消費，器具之消費全然相同。」

「生產的消費與生產同其範圍，生產擴張，生產的消費便相應地擴張，其界限不出於生產之外。即是彌爾(Mill)所說的，資本之增加是無限地增加對於勞動的

圖甘、巴爾諾夫斯奇

「單是作為生產手段而工作的」勞動者是和牛馬器具原料一樣，不是經濟之主體，是客體：例如奴隸，便明明是這樣。……奴隸之消費，在其主人是與所謂生產的消費，即在生產進程中的生產手段之消耗，並無何等區別。」

「單作為經濟手段的奴隸之經濟的特徵，把奴隸之位置，用他種生產手段（對於奴隸經濟之最高目的並無妨害的）來替換時，最為明白。……奴隸之主人，知

需要。生產之必要把奴隸之消費限制了，在以牛馬或動力代替奴隸時，表現得最明顯。使用牛馬比奴隸有利，所以奴隸主把從來的奴隸之食糧減少以增加牛馬之養料，這便是制限奴隸之消費。由此制限，奴隸主增大其生產之結果，因而能夠增加自己的消費量。即是減少生產要具的人之消費，而增加生產主體的人之消費。

『這樣的轉換如果大規模地施行，奴隸大減，奴隸之消費亦大減時，不怕奴隸主就過送着窮極奢侈的生活，而於全體上，人之消費總量仍然可以大減，而生產物且大見增加，即是消費大減而生產大增了。在這樣的時候，生產是全不受消費之制限。』(一一)

圖甘、巴爾諾夫斯奇之文字，我是抄譯的，或者比較容易看懂，然而大體上和福田博士之學說是一樣的。就這樣，福田博士與圖甘並駕齊驅，把奴隸經濟之觀察剛好告終，便一躍而飛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於是福田博士說：『同一的理法關於複雜的資本制生產也可以考察，資本制生產中與奴隸相當者，為僱傭勞動者，……與奴隸消

道馬做事情比奴隸更有效時，他便要用馬來代替奴隸之一部。他把他的土地為人產裸麥 (Moggen) 的，改來為馬產燕麥 (Hefe)。奴隸主不因此而愈貧，實因此而愈富，何以故呢？他的土地增大其收成，在他自己便有更多的消費資料作為剩餘生產物而自由處分。即是生產手段的人之消費減少，而同時經濟主體之消費增加。

『這樣的減少（奴隸消費之減少）如大規模地施行時，在該經濟上的人之消費（奴隸主之消費加奴隸之消費）可以絕對地減少。而且經濟之客觀目的，即經濟主體奴隸主之欲望滿足……仍和從前一樣可以達成，或者比從前還要容易……只是人之消費在總量上減少了，奴隸經濟之平衡是一絲不亂的。』(一二)

費之減少相當者，即此支銷工資之減少。』(一三)

(一〇)『社會政策』四九一頁。

(一一)同四九一、四九二、四九三頁。

(一二) Grundlagen, S. 221, 222, 223.

(一三)『社會政策』四九三、四九四頁。

奴隸與傭工之間，本有幾多相類似的地點，我自己在『奴隸制與雇傭勞動制』一文中(本書中篇第一章)已曾述其大概；然奴隸經濟制與資本主義經濟制之間，關於我們現在所欲研究的問題，有不容看過的——如看過時，便會生出千里的謬誤的——重大的差異存在(此事在後將詳論)。在古時雖有犧牲了多數人之消費以建築萬里長城和金字塔之史實，然在資本主義時代，不能與這同樣說是『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如何而無限制地擴張』。『消費即愈減而生產愈擴大，於資本制生產上不起何種障礙。』萬里長城和金字塔，並不是作為商品販賣而建築的，是作為『物之蓄積』而存績，便達到牠們生產之目的；販路問題，需要問題(資本主義之特徵的販路窒塞問題)，當然全不會出現。但是今日資本家所築的萬里長城——鐵路，浮動的金字塔——輪船，這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經營的。資本家所投下的貨幣資本(金錢)，假使不能以更大的貨幣資本收回時，他是不能實現他本來的目的以增殖貨幣的。單是『物之蓄積』是不能完事，被蓄積了的物不能被消售。『剩餘價值蓄積於商品與將此剩餘價值利用於生產之擴張，其間常有一個決定的跳躍——馬克斯命名為商品生產之 *Salto*

mortale (賭命的飛躍)——存在，即是有賣却後換成貨幣的事體存在。(二四)無論若何的盲馬總不能蔑視這個難關，而福田博士與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所並駕的名騷，只在紙面上加減一些數字，便輕輕飄飄地跳過了。他們把在奴隸經濟制所『捕捉』得的理法，囫圇地引用於資本經濟制。在這一段上，福田博士纔起初把圖甘、巴爾諾夫斯奇之書名和頁數引用了出來，指示他們同跨的是一頭駿馬。我怕我所批評的對手者不滿足，對於他的議論之決定點不敢加以省略，不嫌冗長，把博士這一節的全文全揭如次：

『與奴隸消費之減少相當者，即此支銷工銀之減少，關於此點之考察，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成功了戎巴達(Sombart)所稱爲唯一的嘗試。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氏假定一個極端的例，即是支銷工銀大見減少，而資本主之直接消費全不增加，把剩餘產物全盤充作資本形成之用；準此假定，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而作如次的推算。支銷工銀之減少率，每年爲百分之二十五，資本主之消費全不增加，第一年之總利潤假定有四分之一被蓄積爲生產擴張之資，餘四分之三充作與生產無關係的消費之用。以後的年份資本主之消費額因爲絕對不變，利潤中所蓄積的比例自然逐漸增加。其推算即如左：

(p 生產要具 a 支銷工銀 r 利潤)

(一) 生產要具之生產

第一年份 $1632_p + 544_a + 544_r = 2720$

$405_p + 136_a + 136_r = 680$

$360_p + 120_a + 120_r = 600$

第二年份

$1989_p + 496_8a + 828_r = 3312,3$ $372,6_p + 93,2_a + 155,2_r = 621$ $360_p + 90_a + 150_r = 600$

第三年份 $3285.4_p + 4846_a + 1239_r = 4309$ $366.9_p + 65.9_a + 175.5_r = 611.3$ $360_p + 67.5_a + 172.5_r = 600$

『對於右表試加以說明時：第一年份生產要具之價值假定爲支銷工銀額之三倍，支銷工銀與利潤假定爲同額，於是假設（一）生產要具之生產中工銀與利潤爲五四四，生產要具額三倍於工銀爲一六三二，此三者之總計便是生產要具之生產一年的結果，其額爲二七二〇。（二）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中工銀與利潤各爲一三六，生產要具爲四〇八，三者總計爲六八〇。（三）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中工銀與利潤各爲一二〇，生產要具爲三六〇，三者總計則爲六〇〇。然於第二年份支銷工銀額（a）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利潤額假定與這樣減少的同量增加，資本主之消費額假定不變，於是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上生出如次的變化：所要的工銀額第一年份是一二〇，第二年份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而成九〇，而利潤額却應比所減之數而增高（ $120 + 30 = 150$ ），故爲一五〇。生產要具之價值不變，第一年份三六〇，第二年份亦爲三六〇。及到第三年份，工銀更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即一二·五）而爲六七·五，利潤額從一五〇增加爲一七二·五，生產要具額依然爲三六〇。關於（一）生產要具生產，（二）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也起同樣的變化，即右表中所表示的數字是。由是利潤在第一年份（一）五四四，（二）一三六，（三）一二〇，總計是八〇〇。由前所假定資本化，其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五時，即二〇〇被蓄積而爲資本。所以資本主在第二年份充作自己的消費額是 $800 - 200 = 600$ 。資本主的消費額已經假定不變，即其額常爲六〇〇。

『第一年份之終期，生產要具之生產是二七二〇，這已如前表所算，此額全部投入於第二年份之生產時，

生產要具用一九八七、四、勞動者消費料生產用三七二、六、資本主消費料生產用三六〇，以此比例而受分割。同第一年份勞動者消費料生產額六八〇，此額即與第二年份的三部門中工銀合計 $496.8 + 93.2 + 90 = 680$ 相同，即是全部整充為第二年份的勞動者消費用了。同第一年份未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為六〇〇，此額毫無增減，充作第二年份資本主之消費，即是第一年份生產之結果全無餘留，悉充為第二年份的生產與消費兩途費用了。第一年份的工銀總額 $544 + 136 + 120 = 800$ ，第一年份的是 $496.8 + 93.2 + 90 = 680$ ，即 $800 - 680 = 120$ 為第二年份所減少之數。換言之，即是勞動者之消費減少百分之十五，而反之資本主之消費額是假定了不變的，第一年份的三部門全體之總生產額為 $2720 + 680 + 600 = 4000$ ，第二年份的是 $3312.3 + 621 + 600 = 4533.3$ 增加百分之十三。即是消費額雖然減少百分之十五，而生產額反增加百分之十三。在第三年份裏也是一樣，勞動者消費額更減至六二一，生產額四五三三、三增加至五五二〇、三了。』(一五)

(一四) Rosa-Luxemburg: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Bd. II, 1921, S. 32.

(一五) 『社會政策』四九五——四九九頁。

—— 福田博士這樣地把圖廿之數字表說明之後，匆匆地便向結論跑去，他說『這樣地消費即愈減而生產愈擴大，在資本制生產上不起何種障礙。這是圖廿、巴爾諾夫斯奇之推算。……以上的推算，並不能全部滿足，但同時也尋不出一個理由來指斥他的推算。……馬克斯之再生產研究，於巴爾諾夫斯奇所下的推論（推算？）』，可以尋出論理上之當然的歸結。即是資本制生產上的資本之形成和生產之擴張可以和直接消費之大小獨立，

並且是儼然有獨立着的，這是牠的本質……要這樣，馬克斯之周到而破天荒的循環行程中資本再生產之理論，纔得爲學問上的大收穫。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馬克斯把他的事業中途而止，在未達到此當然的結論之前，俄而迷入問道，竟墮在與再生產理論不能兩立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論裏，這真是可惜不盡的了。據此看來，馬克斯逸失了『破天荒的』資本再生產理論之『當然的歸結』，實在是『可惜不盡的』。現在好得這個理論得了圖甘、巴爾諾夫斯奇——又從而福田博士——之修正，『好像纔得爲學問上的大收穫』了。

一 看好像很複雜的樣子，但是僅僅在數行之內所收容的圖甘之數字表，從這裏便可以得到『學問上的大收穫』，這已經有點奇怪了；但我們且把這『大收穫』之內容精算一遍罷。那是這樣說的——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資本家不斷地增殖其資本，擴張其生產，所以物之消費——對於享樂財的需要——即使不增加，否，先想像到極端的事例，就假定對於享樂財之需要逐漸減少（圖甘在對於享樂財之需要中，假定資本家的不變，勞動者的次第減少的結果，需要之總量是次第減少，他是以此假設製出前表的），而社會之生產力亦相應地不向享樂財之生產而向生產財（生產手段）之生產時（圖甘於前表中生產要具之生產第一年二七二〇，第二年三三一二、三，第三年四三〇九，假定的是逐漸增加），這等所增加的生產手段爲生產規模擴張之故，不斷地爲資本家所需要，在這兒不會有生產超過的現象。（一六）在今日的社會有生產超過之現象者，是因爲分配於生產之各部門的生產力之比例不得其常之故，假使比例一得其當，『資本家之生產向着自己製出市場（販路）』（二七）『資本主義的經濟上，凡對於商品之需要，與社會消費之總量，在某種意義內是獨立的，社會的消費之總量

雖減退，而同時對於商品的全社會之需要，有增加的時候。」(一八)如是『不管人之消費如何，生產的擴張即生產手段之生產的消費能夠進行，就好像經濟不是爲人效用，是人爲經濟效用一樣，一切都可以圓活地進行。』(一九)例如鐵與煤產出了，則鐵與煤復爲擴張鐵與煤之生產之用。去年所生產的鐵與煤順次在翌年爲擴張煤鐵生產所需要，如是推移，直至地下之礦脈全部掘盡，而生產之擴張 *ad infinitum* (無限地) 進行。(二〇)圖廿是這樣說，與福田博士所說的『勞動者之消費不足 (*under-consumption*) 不管是事實與不是事實，於此點全無關係。資本主之自己消費，不消說是顯著地增大了，但是遠不及生產額之資本化與生產要具化之比例之增大。馬克新所謂「擴張再生產」無限界地增大起來。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如何無限界地擴張起來。』(三一)這也是大略相同的了。總之一言說盡，資本家把各人所生產的商品互相買賣，各各可以無限地擴張生產之規模，即使多數的勞動者漸次貧困到不能買物，而商品之販路永不會有窮窘的事情，所以馬克斯之資本家的生產窒塞之理論，全然是誤謬。不消說資本家的生產單獨地可以無限地製造市場，這『恐怕有點像最大的矛盾，但是真理是不容易了解的，但牠依然還是真理。』(三二)以馬克斯之才之美，竟不能見及這個真理，真是『可惜不盡』的了！

(一六) *Handelkrise*, S. 34.

(一七) *Handelkrise*, S. 25, 33.

(一八) *Handelkrise*, S. 25.

(一九) *Handelkrise*, S. 227.

上篇 關於資本主義的若干之考察

(110) Handekrisen, S. 230.

(111) 『社會政策』五〇七·五〇八頁。

(112) Grundlagen, S. 230.

我在上面費了好幾頁的紙面把福田博士之議論和圖甘、巴爾諾夫斯奇的比較着介紹了，準此我以為得到了下面之利益。其一，我把福田博士之議論之要點差不多源源委委地傳給了讀者，我所欲批評的對象因此而顯明；其二，福田博士之議論和圖甘、巴爾諾夫斯奇的大概相同，這也是彰明較著的了。我證明福田博士之議論和圖甘的是大概相同，並不是有這樣的私心想把博士之學說缺少創見而無價值的感念灌注於讀者，使自己的議論更易中聽；我實在是因為有兩個理由：第一，用俄文寫的大約在三十年前，用德文寫的大約在二十年前的一位俄國人之思想到現在纔由福田博士『再生產』到日本——三十年前俄國學者之腦中所浮起的思想到三十年後的今日纔刺戟到日本學者之頭腦，這雖然不能便說是日本後於俄國三十年的證據；但恐怕有甚麼人會感生出甚麼意義罷。第二，我把博士之學說證明得與圖甘的相同，是想隨流溯源對於謬說之根本得到徹底澄清的便利。所以以下雖然不是直接出自博士之議論，只要是圖甘之議論中所包含的思想，有時我也有論及的機會。

第二節 批評之第一段——生產手段之本質

此後我便要從事於福田博士之學說——同時又是圖甘之學說——之批評了，據我看來，那實在是罅隙遍體的議論，無論從甚麼地方都可以攻入的，不過要由容易了解處進攻時，便宜上且先從前章所已指觸過的論點

着手。那個論點是生產手段（或作生產財）究竟是甚麼？（福田博士稱之爲『生產要具』，但此中除機械器具之外，還含有原料和補助材料之類，與其稱爲『要具』，似乎稱爲『手段』的方便）。

生產手段（或生產財）是甚麼呢？我們廣義言『財』時，其中含有享樂財（或消費財）、生產財及流通財（貨幣）之三種，暫且把流通財除外，單就享樂財和生產財着想時，享樂財（消費財）是衣食住及其他支持吾人生活所消費的財貨，生產財（生產手段）是以生產他種財貨上有用之故始有財之性質，例如布帛是一種享樂財，織機是一種生產財。但是生產財中有爲直接生產享樂財的手段（如上所舉織機），同時有爲生產他種生產財的手段，例如絲是綢緞之原料，是一種生產財（即生產綢緞的手段），但是生產絲的手段的有紡績機械；織機和紡績機都同是生產財，但生產這些機械的又有機械製造用的機械；更還有生產這些機械的原料的鐵，所以逆轉來說，機械製造用的機械和鐵是生產機械這種生產財的生產財，紡績機是生產絲這種生產財的生產財。所以生產財（生產手段）不能說是全盤是直接生產享樂財的。牠有的是直接生產享樂財的手段，有的更是手段之手段（手段，但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是無論牠是手段也好，是手段之手段也好，歸根極底，牠總是生產享樂財的手段。直接的或間接的，或間接之間接的，都不能作爲生產供人消費之物的生產手段，世間上從古以來所未有。生產雖不必全盤是直接生產享樂財的手段，但總是直接或間接的生產享樂財的手段。由是享樂財之生產不增加，無限地增加生產財時，其所增加的生產財之一部不成爲無用的長物是全然不可能的。由技術的或由學者空想的假定上，綢緞（享樂財）之生產不增加，織機（生產財）之生產是可以增加的。但在這樣的時候，織機不能消售，只留

在機械業者之手裏，這便不能完盡馬克斯所謂『商品資本』之機能；或者誤為機械業者所購買，但亦只能留在機械業者之手中而不能織物，這也不能完盡馬克斯所謂『生產資本』之機能；無論如何，都只成為無用的長物，只是單純的『物之蓄積』罷了。然而以售賣為目的的資本主義，是不許這樣的事態長此繼續的。福田博士和圖甘、巴爾諾夫斯奇，無論如何定要維持他們的主張的時候，那他們不能不證明有這樣特殊的一羣生產財，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是和享樂財之生產絕了緣的。然而好在人間世中——恐怕除却精神病院而外——無論甚麼地方都不會

有從事於這樣無意味的生產的人。

以上是我在前章之末尾已經敘述過的，但是至少恐怕圖甘要說話了。他會說：這樣所生產的生產財不能消售而留積的，是因為對於生產各部門之生產力之分配，忘却了保持着適當的比例；只要比例一保持得適當時，所生產的貨物會全無留積，一一都賣給別的資本家手裏，而於生產上不會起何種障礙。但是對於生產各部門的生產力之分配要保持適當的比例時，我們在擴張生產財之生產的時候，不能不擴張享樂財之生產。生產財是要直接或間接地作為生產享樂財的手段之用，然後纔能有意義，這是已如前述；所以要增加生產財之生產，如不以其所增加的生產財作為增加享樂財之生產之用，則生產財生產之部門與享樂財生產之部門間不能保持適當的比例。對於生產各部門的生產力之分配只要保持着適當的比例時，則享樂財之生產即使減少，生產財也可以無限地擴張起來的說法，這猶如說只要在適當的時間攝取適當的食物，那使一輩子不吃東西人也是可以活起來的說法一樣，這簡直是謊小孩子的話了。圖甘說真理往往是不容易理解的，像這樣的『真理』，我以為實在是不容

易了解。

第三節 批評之第二段——奴隸經濟與資本經濟之本質的差異

福田博士之議論和圖甘之議論，在第一段便把古時的奴隸和現代的雇工同一視了，這已如前述。據他們的說法：奴隸與牛馬工具原料等同樣，是『一種的生產要具』，他們『不是經濟之主體，是客體』，所以這『經濟手段』或『經濟客體』的奴隸之消費（欲望滿足）不更增加或竟減少，而經濟自體之目的，『經濟主體者之欲望滿足』仍和從前一樣可以達成，或則更比從前容易。『奴隸主知道用牛馬比用奴隸還有利時，他把從來充作奴隸之食糧的減少，改來增加充作牛馬之養料』如是則『奴隸之消費雖然減少，而奴隸主增大生產之結果，從可以增加自己之消費量』。奴隸經濟上經濟之主體是奴隸主，只要奴隸主有利益，經濟是毫無障礙地進展。『同一的、理、法、在複雜的資本經濟上也可以考察得，資本制生產上與奴隸相當的是傭工，與奴隸消費之減少相當的是支銷工銀之減少』。所以多數勞動者之工銀收入——即其購買力和需要——即使次第減少，資本制生產自身並不起何等障礙，無限地發展前進。——這樣的說法，便是他們第一段之議論。

這種把奴隸經濟與資本經濟認為同一的議論，據我看來，是根本上的謬誤。（我在『奴隸制與雇傭勞動制』中已經敘述過了。）古時的奴隸和現代的傭工之間，誠然有多少的類似點，但我們在承認有幾多類似點的別一方面，更有明瞭的差別點是不能看過的。試舉其最顯著者而言，奴隸是主人之財產，但現代的勞動者決不是雇主之財產，奴隸是對於他的主人把全身都賣掉了的，雇傭勞動者不過向其雇主賣售勞力罷了。不消說勞力這種商品

是不能離開身體而拍賣的，但拍賣勞力的勞動者只於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工場內把自己的身體委置於雇主之支配之下。在工場內的勞動者，從資本家看來，誠然不外是一種生產手段；但一出工場或公司之大門，勞動者支取出他們所得的工資而購買貨物時，這便成爲商品生產者的資本家之顧客；他們是立在對等的買賣關係上的。在奴隸經濟時代，形成社會的人員是限於自由民，奴隸不論是在生產界和消費界全等於社會外的外界之物體；而雇傭勞動者在其勞動時間內——即是在生產界——雖然是一種生產手段，然一旦離開生產界而移入消費界時，他們是從被人當作工具的 *Sachverhältnisse*（物的關係）離開，而移入於與他人作對等交際的 *Geell-schaftsverhältnisse*（社會的關係），具有社會一份子之資格。在生產界雖是屬於資本家的經濟單位之『經濟客體』，但在消費界，則成爲自營其獨立的經濟單位之『經濟主體』，而有所謂消費之自由。這種消費並不是資本主之生產的消費，是以自活爲目的的消費。勞動者之雇主資本家給予雇傭勞動者以生活資料，一見雖好像養家畜的人給家畜以養料，畜奴隸的主人給奴隸以食糧一樣，然其實所給予者，不是生活資料，是貨幣，在這一點是有截然的區別的。家畜與飼主之間，奴隸與主人之間，不會做過買賣，而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則常常有買賣的行爲。雇傭勞動者比較廉價地把自己的勞力賣給資本家，而比較高價地從資本家手中買其所生產的商品，不斷地在使資本家賺錢。所以依貨幣之媒介，把自己所生產的資本家之商品和勞動者所提出的勞力不斷地互相交換，這在以賺錢爲唯一決定的目的的資本家之生產上是極重要的問題（此事後當詳說）。所以奴隸主所有的奴隸消費力之減少，和資本家的買賣對手雇傭勞動者之購買力之減少，這決不是可以以『同一的理法』推論的。

奴隸與雇傭勞動者異其性質，奴隸經濟制與資本經濟制，其本質亦同，樣地全然不同。在奴隸經濟制與封建經濟制，爲經濟主體之消費或使用而生產剩餘產物，這是牠們的目的。其所生產的剩餘產物，立見消費或使用，以滿足經濟主體之欲望，這便是牠的使命之完成。其大部分大抵是費用於經濟主體的奴隸主與封建諸侯之奢侈生活與戰爭；其遺物之楷模，如中國之萬里長城，埃及之金字塔，猶巍然存在於今日。像這樣建築無用的長物或者有用的長物，在當時定然有大多數的人之消費是因而節減了的；但與此全不相關，乃竟因此之故，社會之生產力被充用於滿足大多數人欲望以外的方面，而如此巨大的物之蓄積公然成立，誠然是『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如何可以無限界地擴張』了。現在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否也可以由『同一的理法』，『消費即愈減少而生產愈益擴大』？福田博士和岡甘答曰然，我則敢大膽主張曰不然。何故不然呢？資本經濟制與奴隸經濟制封建經濟制不同，牠不是單以生產剩餘產物爲其事業之究極，生產剩餘產物之後不賣却以換成貨幣，使最初所投下的貨幣資本換成更大的貨幣資本而收回時，則不能達到資本經濟制之目的——即資本之增殖。假使勞動者之搾取單是限定於使其搾取者營養奢侈的生活之目的時，這不過是一種奴隸經濟制或封建經濟制，不是現代的所謂資本經濟制。資本經濟制之生命是在貨幣形態上的利潤之獲得，貨幣資本之增殖。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不僅是資本家階級在營『相當的』生活上所必要的一點，必還有一定的剩餘換成貨幣，使資本家階級所有的貨幣資本之原額逐漸增大。資本家階級是既要營謀與身分相當的生活，又要不斷地增殖自己的資本；一面奢華一面是殖貨的。像這樣搾取剩餘價值之目的，在把所搾取的剩餘價值之一部更轉用於搾取剩餘價值的存本之增殖，資本

制生產之歷史之特徵便於以生出。譬如只是說造了萬里長城，造了金字塔，資本制生產之目的還不會達到；總要一旦生產了以後收取觀覽費或其他，以收回最初所投下的以上的金額；再把這金額投下，再加倍地把牠收回；如是無限地使資本增殖。要之，只是生產剩餘產物時，事功猶未做盡，須得把剩餘產物賣却而換成貨幣。即是『剩餘價值蓄積於商品與將此剩餘價值利用於生產之擴張，其間常有一個決定的跳躍——馬克斯所命名為商品生產之 *Salto mortale*（賭命的飛躍）——之存在，即是有賣却後換成貨幣的事體之存在。』而這剩餘價值之蓄積在商品者，要發賣給他人而換成貨幣時，則在資本家階級以外的人要有一定的購買力纔行；假使資本家階級以外者之消費不增加時，資本家階級所企圖的資本之增殖，生產之擴張，便自會窒塞。不消說資本家並不是以滿足他人之欲望為其直接的目的而從事於物之生產的，然其所生產的物品消費了自然不得不滿足他人之欲望，即是生產不得不受消費之限制。福田博士說，資本經濟的情形與奴隸經濟無異，因為『要全生產物悉換成價值而賣却之後纔有』一定的『分配』，雖是『事情稍為複雜不容易捕捉其真相』，然『生產是全不受消費之限制』，這一個『同一的理法關於複雜的資本制生產也可以考察』；馬克斯不悟此理，真是『可惜不盡』的事體。他雖然這樣說了，但據我所見，奴隸經濟制和封建經濟制其與資本經濟制之差，不僅是事情複雜之不同，其 *Lebenszweck*（生存目的）實全然異其本質。要這樣解釋，我們纔能理解古時的奴隸經濟制與封建經濟制的時代和現在的資本經濟制的時代之間，其歷史的彩色之顯著的差異。馬克斯沒有看脫這一層，正是他對於資本制的生產洞見得精確之處，所『可惜不盡』的，却是福田博士和圖甘兩人輕視了這個重大的特點呢。

福田博士和圖甘兩人，與舊式的淺薄的馬克斯批評家純然無以異趣；舊式的馬克斯批評家劈頭便是不想理解馬克斯的：例如批評他的勞動價值論時，以爲馬克斯是以勞動爲一切財富之源泉——其實馬克斯對於此說正有明白的反對——便對此假想敵人亂事攻擊而揚揚奏凱；又例如批評他關於資本的理論時，僅把自己捏造的或者從甚麼地方拾得的『資本之概念』之先入見來橫衝直闖，便輕輕易易地論證得馬克斯之『謬誤』而大奏膚功；但是這樣的馬克斯批評在目前日本的論壇要算是全然絕跡了；馬克斯批評已經進化而爲新式的了。即如福田博士也『斷言』『資本論第二卷的後半』（論資本增殖之理法的部分）是『屬於馬克斯一生之學問事業中之最大者之一個』，又說『資本論之別的一部分即使全部失傳，假如這一部分尚以何等偶然的機會而殘留於世間時，馬克斯在經濟思想史上所佔的位置與今日殊無所異』，或則以爲『可看作指示從古至今所嘗試過的學問研究之最高頂』，是『周到而破天荒的理論』，夫然後加以多少『修正』，自行刈得『學問上的大收穫』——這樣的態度正是新式馬克斯批評家的典型。聽他們這些批評家說來，馬克斯是偉大，但是有些地方有『可惜不盡』的謬誤，要把牠『修正』後的他們纔是站在『學問之最高頂』上之頂上。大凡爭戰是只有借敵人之武器以攻敵人纔能制勝，馬克斯批評家採用這種戰術，確是他們的進步。但是他們的戰術進步了，議論也隨之而複雜，我們要把論爭之舞臺不得不移在『資本論』上。

就是福田博士和圖甘兩人，他們一方面主張奴隸經濟制與資本經濟制之間有『同一的理法』連貫，而同時對於資本家的生產非把生產物賣却換成貨幣時不能達到的目的的事體，他們也全未看過。然則甚麼人來買這資

本家的生產物呢？他們答道：資本家同志間相互換質。資本家階級把自己造的東西賣給自己而賺錢！這樣的蠢事天地間是不會有的，但是這兒正是新式馬克斯批評家之特徵之所在，圖甘「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而推算他，他的推算據福田博士說來，雖「不能全部滿足，但同時也尋不出一個理由來指斥他的推算是謬誤。」這已經有點靠不住了；但無論如何，他說是「立腳」在馬克斯之理論上的，那嗎，他究竟是怎樣的光景「立腳」着的呢？問題自然不能不移到馬克斯理論之討核了。——我在次節要嘗試這個討核，要指示那些理論只是憑空立腳，和空中飛行家之立腳是巧相類似。

第四節 批評之第三段——圖甘數字表之討核

奴隸經濟制與資本經濟制之間有不可看過的本質的差異；在奴隸經濟制之下，奴隸之消費縱使減少，物之生產雖亦可以無際限地進行，但在資本經濟制之下不能以為有同一的理法。假使在資本經濟制之下有同一的理法時，則雇傭勞動者之消費即使減少，物之生產亦可以無際限地進行了。但是資本經濟制之特徵，凡剩餘價值之蓄積於物與此剩餘價值之利用於資本之增殖，其間有馬克斯所命名的商品生產之「賭命的飛躍」存在，即是賣物而換成貨幣的事體存在。在此制度之下不能賣時，物便不能生產。奴隸主不是以賣為目的而生產貨物的，資本主專是以賣為目的而生產貨物的。要主張在資本經濟制之下也是和奴隸經濟制之下一樣，人之消費即使次第減少，物之生產可以無際限地進行時，那嗎雇傭勞動者之需要即使減少，所生產的貨物亦可以毫無障礙地賣却的事實非先得證明不可。——我這樣論到這兒來了，福田博士和圖甘兩人把這無際限的販路是向何處尋求

的呢？他們以為這是在生產這些物品的資本家階級的自身，即是無際地需要這些資本主無際地所生產的物品的購買者，仍然是資本主自己。然而圖甘有何種依據而主持這種主張呢？那只是幾行的簡單的數字表。這個數字表便是福田博士也是『不能全部滿足，但同時也尋不出一個理由指斥他的推算是謬誤，』纔原樣地援用了。我這批評的第三段工程便是來討核牠的本體。

左方我再把圖甘的數字表揭出：

(p 生產要具, a 支銷工銀, r 利潤)

(一) 生產要具之生產

(二) 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

(三) 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

第一年 $1632_p + 544_a + 544_r = 2720$

$408_p + 136_a + 136_r = 680$

$360_p + 120_a + 120_r = 600$

第二年 $1989_p + 496.8_a + 828.1_r = 3312.3$

$372.6_p + 93.2_a + 155.2_r = 621$

$360_p + 90_a + 150_r = 600$

第三年 $2584_p + 484.6_a + 1239_r = 4309$

$366.9_p + 68.9_a + 175.5_r = 611.3$

$360_p + 67.5_a + 172.5_r = 600$

據這數字表看來，第一的生產要具(生產財)之生產額，第一年是一二七二〇，第二年是三三一二(小數點以下略去，下同)，第三年是四三〇九，這是年年在增加的；第二的勞動者消費料(勞動者所需要的享樂財)之生產額，第一年六八〇，第二年六二一，第三年六一一，這是年年在減少；第三的資本主消費料(資本家所需要的享樂財)之生產額，第一年至第三年通是六〇〇，但全體的消費量，即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額與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額相加時，年年仍是在減少的。這樣看來，不怕消費料之生產額年年減少，而生產要具之生產額却年年增加。

年所增加的生產要具甚麼人來買呢？這全是第一部門的生產要具之生產業者來買。第二部門的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業中，其所需要的生產要具（P），第一年四〇八，第二年三七二，第三年三六六，這是次第減少；第三部門的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業中，其所需要的生產要具（P），從第一年至第三年通是三六〇，即是第二部門和第三部門爲消費料（享樂財）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要具（生產財）不怕年年減少，而第一部門的生產要具之生產却年年增加其所生產的生產要具之分量，這是因同生產要具生產業的部門內所需要的生產要具（P）之分量，第一年一六三二，第二年一九八九，第三年二五八四，是在無限期地增加着的緣故。由是從這數字表所表示，『消費即愈見減少，生產會愈見擴大，於資本制生產上全不起何等障礙』之理論便證明了。

但是據我看來，這個數字表是把一個必待證明的事項爲前提而製成的——福田博士評馬克斯之議論爲 *petitio principii*（匿證佯爭）——要這數字表纔是 *petitio principii* 之絕好的標本呢！譬如要證明收支之適合，在豫算表上把不可靠的收入加上，把不可缺的支出削除，只求收支相合便了事的一樣，這是所謂賬合而錢不够；福田博士說他對於這圖甘之數字表『不是全部滿足』而我却是全部滿足了。因爲加減的計算一點錯誤也沒有，是算術之答案時我可以給他以滿點了。只是在經濟學之答案上無論怎樣循情，也給不上三十五點。

我是有甚麼根據敢這樣放言的呢？以後我叙述我的理由有二：第一的理由是享樂財之生產額年年減少，而生產手段之生產額却無限期地年年增加，這在事實上是不會有的；這在第一段之批評裏已經叙述過了。一切的生產手段無論直接或間接，或間接之間接，總得是生產享樂財的手段，做手段的物品無法無天地增加，而

其目的之享樂財之生產却是減少，這是決不會有的事體。所以這數字表要想和事實相合時，第一部門的生產手段之生產額增加，第二部門乃至第三部門的享樂財之生產額也不得不訂正成增加；享樂財之生產額年年減少，而生產享樂財的手段之生產手段——或生產其生產手段的別的生产手段——却無法地增加時，在實際的事實上，其生產手段只成爲無用的長物而留於生產者的手裏。這樣無用的長物，無際限地生長牠，或購買牠的蠢人，世間上是決不會有的。然而圖甘之數字表中，使第一部門的生產業者無際限地生產這樣無用的長物，又在使他們相互購買；實際上不會生產不會購買的，只在紙上使人生產購買，這樣只要不怕疲倦，儘管加一下減一下，紙還有鉛筆還有時，在紙上的生產之擴張自然會 *ad infinitum*（無際限地）進行了。但是這只是運算之練習，作爲經濟上的議論之根據時是毫不中用的。假如要全靠運算的時候，那比圖甘所假定的更想極端些，第二部門的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額不待說，第三部門的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額也假定年年減少去，那嗎第一部門的生產要具之生產額依然是可以『推算』得年年增加上去的；更達到極端，第二部門勞動者消費料之生產和第三部門資本主消費料之生產假定全等於零時，第一部門生產要具之生產額依然可以『推算』得年年無際限地增加的罷。並且以上的數字表，假如是有證明甚麼事實的效力的，那嗎就那樣也可以適用於圖甘所謂調和的經濟制的。那不僅是在對抗經濟之一種的資本經濟制下可以證明得消費即愈減少而生產却愈增加，即在各種對抗經濟制和調和經濟制下，消費即愈減少而生產却愈增加的說法都一樣地可以證明了。所以我們要問這樣的數字表何故只能在資本經濟之下成立？我恐怕這數字表之製造者和援用者都會無辭以對；總之，這個數字表只能作爲說

明甚麼事實的例示，除此之外，全無意義。

我說圖甘之數字表是 *petitio principii* 之好標本之第二理由：是圖甘之數字表把資本家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使資本家同志間互相購買的。但據我看來，資本家這樣互相交易，他們到底是不能得到利潤的，圖甘之假定，在資本主義下到頭是不能實現。已經屢屢敘述過的，凡是資本家，都是以賣為目的而生產的，他們以得利潤為其生產之必需條件；假使資本家互相購買其生產物時，他們到底沒有得到利潤的希望。何以故呢？譬如甲資本家有 A 商品以百萬圓拍賣給乙資本家，要想藉此得十萬圓的利潤，同時乙資本家又有 B 商品拍賣給甲資本家，也想藉此得十萬圓的利潤的時候，則甲賣商品時所得的十萬圓利潤於買乙之商品時失掉了，同時乙賣商品時所得的十萬圓利潤於買甲之商品時亦失掉了；甲乙相消，同不能得到何種利益。即是馬克斯所說的：『某人做賣主時不斷地得到的東西，做買主時不得不不斷地失掉。』不消說，就某一位資本家看來，他賣的分量比買的多的時候，只有他可以得到一定的利潤。就某一位資本家之立腳點來說，只要自己能够賺錢，那樣便把問題解決了。但是我們從社會上看來，要想到資本家階級全體的利潤從何而出的時候，那便不能够像這樣的資本家之想法。我們要把資本家階級 *en bloc*（作為全體）觀察，要想到 *Gesamtkapitalisten*（全體的資本家）並且從全體資本家觀察時，像圖甘那樣把資本家所生產的物品使資本家買去，這在資本家階級之收入上沒有生出利潤的道理。不能生出的利潤在前揭的圖甘之數字表中却公然生出了，這只可算是紙上的布陣了。本來資本家階級之利潤是由於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與非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之交換而生的，資本家所賣之物雖全是資本家所生產

的商品，但其所買物中則有非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例如勞力）。他們所買物不必盡是非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他們同時所購買的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亦復不少，但其所買物中有非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存在，這正是資本家之手中生出利潤的根本原因，這件事理隨後當詳細陳述，在目前即無須追索利潤之出處，凡資本家同志互相買賣，這在資本家階級全體上是無從生出利潤的，如上所述，已大概明白了。不能生出的利潤假定是可以生出而製作一定的數字表，即以此數字表反作假定之證明，圖廿之表，正是高華的 *Pettio principii* 之標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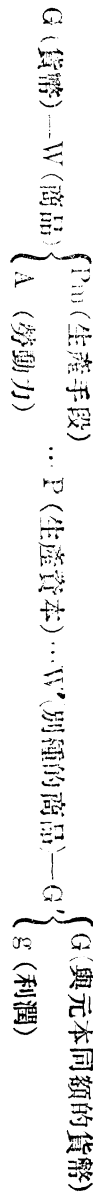
第五節 批評之第四段——圖廿立腳點之討核

這樣看來，依據圖廿數字表之議論只是一場兒戲，而福田博士以爲是『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的推算，於是我在批評之第四段上更不得不闡明牠並不是『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只是『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之誤解了。

既說是立腳於馬克斯之再生產理論的了，那嗎我們在此處不得不把馬克斯再生產理論之大體陳述一下，我們不得不把論爭之舞臺移到『資本論』去。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斯之資本復生產理論，據福田博士說這是資本論中壓卷的部分；那嗎紹介牠的大體，就不必想藉以證明圖廿之懸空立腳，這事自身也不是無益的妄舉了。但這決不簡單的事業，我們在論入資本復生產的理論之前，有先把馬克斯關於『產業資本之循環』的見解紹介一番之必要。

據馬克斯說：凡資本投下於各種生產業時——即作爲產業資本 (*industrielles Kapital*) 作用時——採

取次列的循環形式：



即是有一定的貨幣、資本（作為資本利用了的貨幣——保存於貨幣形態的資本——Geldkapital）的資本家以其貨幣購買商品（W），此買賣於形式上與普通的買賣無別，唯其特徵之所在，是在所購入的商品之實質。即是所購入的商品，資本家不是作為自己消費的享樂財（衣食之類），是以之生產他種貨財的生產財（建築、機械、原料、補助材料等）或勞動力。資本家購入此等貨財，調合生產財與勞動力以圖生產別種商品，於是最初有貨幣形態的資本轉變其形態而成為有建築、機械、原料、補助材料等，具體的特殊的資本財之形態。這便是所謂資本之投下；即是貨幣資本被投下後變形而為生產資本（produktives Kapital—P）。種種的商品像這樣為資本家所購買而成為構成生產資本之實質的分子時，其流通便一時中止而成為生產的消費（前揭循環形式中虛線『…』即是表示流通中斷之意）即是此等商品從流通界吸出而入於生產界，於此受消費而失其原形。但是這是為生產而消費了的，雖然消費了，而別種商品（W'）却於以誕生。所以最初由貨幣資本一旦變形而採取生產資本形態的，又再變形而成為商品資本（Warenkapital）。但是資本家生產貨物是要求銷售而贏利的，這已屢如前述，於此所新生產的商品，又不得不賣却而換成貨幣，即是馬克斯所謂商品生產之『賭命的飛躍』。不事此飛躍以歸復原有的貨幣之形態時，資本家只是成就了單純的『物之蓄積』，不能再反復地從事物之複生產了。所以於生

產界成就了新的商品之生產後，資本家即攜其商品復現於流通界。在初，以商品之買主而出現者，今則以商品之賣主而出現，賣却其商品復使貨幣入手。這就是所謂資本之回收。因此，一旦所投下的資本便又再吸收回來了。即是G（貨幣）復歸於原形的G（貨幣），從貨幣資本上看來，這算終結了一次的循環了。然從資本家之立腳點上說來，使最初存在他手裏的貨幣形態（G）之資本或採取生產資本之形態，或採取商品資本之形態，費了這樣的手腕，纔把原有的金額之貨幣（G）收回，這要算是全無意義的事了。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通例時，是取的W（商品）——G（貨幣）——W'（別的商品）之形式，即是有某種商品（W）的人賣却後換成貨幣（G），再以貨幣買別的商品（W'）。因此在最初有W的人之手——因貨幣作W與W'之交換媒介之結果——新有W'之商品到手了。在這兒即使W與W'是有同量之價值的，因為牠們是使用價值不相同的商品譬如食物和綢緞一樣，所以W就只是變成了W'，也是有意義的。但是貨幣作為資本而作用時，如前所言，最初在手中的貨幣要再以貨幣之形態收回，假如是前後同分量時，這是全然不成就。最初的貨幣一次循環終了之後，牠不是以同量之貨幣回來，牠是以更多分量之貨幣（G + g）回來的。其所增加的貨幣（g），即是所謂依資本之運轉而得的資本家之利潤。

像這樣貨幣資本每回循環一次之後，都生些兒子回來。何故會這樣生兒子呢？這個祕訣，請在前揭的循環運動中檢查一下時，便可以知道了。在此循環運動之前半有貨幣與商品之交換（G — W），其後半又有商品與貨幣之交換（W' — G'）。假使利潤只是把某種商品與貨幣交換而獲得時，如有一定的資本家最初把自己的貨幣和別人的商品交換，只是使別人得一定的利潤，到後來又把自己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交換，就算自己也得一定的利

潤，但是前後相消，也不會有多少剩餘了。是則利潤之產生不在前半和後半之交換——即流通界中之交易，必在其中間所行的生產——即流通界以外的生產界之活動了。把所買入的商品W為生產而消費了，變成別種的商品W'，利潤發生之根本原因便在於此。買入一定的商品W，生產的消費物而變成別種的商品W'，換言之，便是以資本之力生產商品W'，這是把資本獨佔着的資本家階級之獨佔事業，於是商品W，便為資本家之生產物，而有一種獨佔的價格了。既有一種獨佔的價格，則得定價在生產費以上的價格以拍賣，結局是生產出生產費以上的剩餘的利潤了。

即使拍賣商品W'而得一定的利潤，其所買入的生產商品W'的手段W（即是 P_{m+1} ）仍然是以生產費以上的價格買入時，則是把利潤給予了賣主，這是如前所述的損而後益，前後相消也並無何等的剩餘了。所以資本家要想得一定的利潤時，自己所賣出的商品W'不得有一定的獨佔價格，而同時生產W'的手段即所買入的商品W——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要不是資本家的生產物，能够以生產費相當的價格買入的纔行。現在照馬克斯所假定的，假定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實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未曾有的），一切的商品都是資本家的生產物，於是唯一的例外只有勞動力這種商品了。因為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從事於經濟的活動者分為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之兩種階級：把非資本家生產的商品供呈於社會的人，除以自己的勞動力為商品而供呈的雇傭勞動者之外，再沒別的了。所以馬克斯在說明資本家階級所獲得的剩餘價值之成立時，把唯一的重心置於由資本家所買入的勞動力上而建設其獨到的剩餘價值說——論理的必然導引吾人與馬克斯相

會於此美妙的佳境，這是可以使我們悅意而忘食的快事——便在前面所揭的貨幣資本循環之方式中，馬克斯也把資本家所買入的商品W特別分爲物質生產手段E₃及勞動力A之兩種了。但是馬克斯所假定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會存在的，這從現實的事實上說來，便是資本家所買入的商品之中，其非資本家生產的物，除勞動力之外，還有多種（此事於後當更有說明）。現在暫不限定於勞動力而從一般上說時，資本家一方面把非資本家生產的一定的商品買入，而於別的方面把這一定的商品作爲資本家的生產物而拍賣，資本家所得的利潤也不妨說就是這樣纔發生的了。但是資本家一方面買入非資本家生產的商品，別方面又不得不賣出成爲資本家生產物的商品，所以他們不能不把所買入的商品（其中非資本家生產物的商品必然含有）於其所獨佔的資本家的生產之領域中爲生產而消費，更作爲資本家的生產物而成新的商品。資本家不得不從事於一定的物之生產，這在他們是在獲得利潤上的 *necessary evil*（不可避的災害）。貨幣資本以變形爲生產手段及勞動力而超過此 *necessary evil*，纔能把原本價值和剩餘價值蓄積於新的商品；此等商品更要做到馬克斯所謂商品生產之 *sulla mortale*（賭命的飛躍）時，纔能成爲G + g（比最初支出的貨幣更多的貨幣），而復歸於原有的貨幣形態。

以上所述，是貨幣資本爲膨脹自己之故，不得不通過一定的生產行程而循環，且其循環之途中，或取生產資本之形態，或取商品資本之形態，最後復歸於貨幣資本之形態；但此三種資本形態，不是屬於別種事業的各個獨立資本之類別，不過是投下於一定的生產業的資本隨其運轉時順次所經過的形態之變化。（一）所以貨幣資本

之循環往復中，生產資本之循環和商品資本之循環自然也包含在內，但此等事項與本論無直接的關係，茲從畧。

(1) Das Kapital, Bd. II, S. 26.

把社會的資本作為全體觀察時，得如上述；然若就各個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觀察時，屬於某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在該資本家之立腳點上說來，有不必通過上述的行程而能增殖的；馬克斯為與此等資本區別之故，把投下於一定的生產業經過上述的行程的資本特別稱為產業資本 (industrielles Kapital)。然則產業資本以外，更有何種類的資本呢？在此能極簡單地敘述一個大要，也可以免却一些誤解和疑問。

與產業資本區別的，第一是從產業資本分化獨立了的資本，馬克斯命名為商業資本、商人資本、資本 (Handelskapital oder kaufmännisches Kapital)。這商業資本更分為『二種的形態或小類』，即商品交易資本 (Warenhandlungskapital oder kommerzielles Kapital) 與貨幣交易資本 (Geldhandlungskapital)。要說明這些小類時，文字稍涉繁冗，有逸失論點之虞，現在我只就商品交易資本說明其大概。

如上所述，產業資本有左列的循環形式：

G (貨幣) — W (商品) …… 生產行程 …… W' (別種的商品) — G' (更多的貨幣)

即是在第一段上有用貨幣換買商品 (生產手段及勞動力) 之流通行程，第三段上又有拍賣所生產的商品以換取貨幣之流通行程。此等『表現於流通行程的資本機能』——即社會全資本中『變形為商品之故以貨幣而出現於市場』或『變形為貨幣之故以商品而出現於市場』的資本機能——『成為特殊的資本之特殊的機能而獨

立化，因為分業的原故，成爲特殊種類的資本家所分轄的一個機能而獨立的時候，『其資本即爲商品、交易資本。』(二)更說容易一點，凡經營物之生產的資本家，從事於一定的生產行爲以外，一方面不斷地買入種種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別方面又要不斷地賣出自己的生產物，但此等買賣行爲之一部分依分業之結果獨立，而成爲與生產無何等關係的商人所專屬的事業，其商人以獨立的資本專從事於此等買賣時，由此等商人手中所活用的資本，便是此處馬克斯所說的商業資本之一種的『商品交易資本』了。所以牠的循環不是和產業資本一樣，牠取的不是

G(貨幣) — W(商品) …… 生產行程 …… W'(別種商品) — G'(更多的貨幣)
這樣的形式，是取的

G(貨幣) — W(商品) — G'(更多的貨幣)
之簡單的形式。即是『爲賣而買，更完備地說時，爲賣高價而買，即 G — W — G' 者，實爲資本之一種的商人資本所特有的形式。』(三)但是產業資本也時有爲賣高價而買的事體，其差只是『在購買與販賣之間，於流通界(即生產行程)有若干的行爲』而已。

(二)資本論(德國本)第三卷第一冊二五〇頁以下。

(三)同(Kautsky 版)第一卷一一二頁。

其次，與產業資本有區別的，爲借、貸、資本(zinstragendes Kapital)。「貨幣在其作爲貨幣所有的使用價值

之外，更有附加的使用價值，即作為資本而作用時之使用價值。『此種特殊的使用價值，是由於貨幣之化為資本以生利潤而成立。貨幣』於作成這樣的資本而為利潤產出的手段，性質上雖是商品，但是特殊的商品。』(四)這樣的貨幣之所有者，不以其之自營事業，而以其之借貸於資本家之從事於別種產業或商業者而取得一定的利子時，這種貨幣便號為借貸資本。借貸資本上， G (貨幣) \rightarrow W (商品) \rightarrow G' (更多的貨幣) 之流通行程更縮短而成為 $G \rightarrow G'$ ，即是採取貨幣直接與更多的貨幣交換的形式。(五) 就像這樣，貨幣為物或作為單純的交換媒介之貨幣而作用，或為資本循環中所生的資本形態之一種的貨幣資本，或又為資本之類別之一種的借貸資本。(六)

(四) 資本論(德國本)第三卷第一冊三二二——三二三頁。

(五) 同(Kaustsky 版)第一卷一一二頁。

(六) 同(德國本)第三卷第一冊四三〇頁。

如上所述，在資本之類別上，於產業資本之外，有商業資本(這更分為商品交易資本與貨幣交易資本)，又有借貸資本。試比較此等的流通行程時，

產業資本是 $G \rightarrow W \dots P \dots W' \dots G' (G + g)$ ，

商品交易資本是 $G \rightarrow W \rightarrow G' (G + g)$ ，

借貸資本是 $G \rightarrow G' (G + g)$ 。

這其間雖然有簡單複雜之差異，然起點的 G (貨幣) 變成終點的 G' (更多的貨幣) 是全然相同，都是生了利息的。

上述的資本之類別，在福爾博士的論文裏說得更加詳細。博士何故要把這些的說明插在文中，這是我所不得而知的；但是博士既有說明，而我又不得不煩地要重述其大要的原故；並不是要表明我雖是不會讀全，而且也是在讀資本論的證據；也不是要把難解的事體羅列出來，把讀者捲在五里霧裏。我的目的，寧是在消除這五里的瘴霧。我爲此目的之故，在此說及馬克斯之資本之類別，我是要注意資本上雖然有這種種的分類，但是資本家收入之本源，總是在產業資本之運轉上面。商業資本不外是產業資本之分化，已如前述；在產業資本之外，更生商業資本之故，是資本家階級分業之結果。假如這樣的分業不成立時，產業的資本家不得不自行經營現在屬於商業的資本家手中的事業。例如一定的產業的資本家要買織機買絲，又要雇用勞動者，把一定的織品生產之後，還要賣給最後的消費者；如不這樣時，則織品之生產物便不能換成貨幣。並且直到把所生產的織品賣給最後的消費者時，還要相當的時間與費用。在此，商業的資本家纔走了出來，充當各種生產業者之代表，把『商品生產之賭命的飛躍』——有此飛躍，產業的資本家於其生產行程中所成立的剩餘價值，便全部實現而換成貨幣，——一手承擔，一方面受領產業的資本家於生產行程中所成立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的割讓，作爲自己的利益而收納。對於商業資本的利潤便是這樣發生的。借貸資本之所有主，又和商業的資本家不同；他只是把自己的資本借給別人，自己并不經營何種的企業，然而也有一定的坐獲的，是因爲他的資本在借去了的企業家手中作爲產業資本——或者作爲商業資本（商業資本，是『把產業資本之流通運動之一部分作爲自己的特有運動而擔當的，所以我們現在也把牠加上』）——而活用，由此可生出一定的剩餘價值的原故。所以資本——即是資本家——

之種類縱有種種，而分配於全資本家階級的資本家之收入，其本源總是由產業資本所經營的生產行程內發生的。我們只要採取這種態度：把社會的全資本家 en bloc（作為全體地）觀察時，關於資本之複生產和蓄積的問題，把考察的範圍，一切都有限定於產業資本之內。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資本之堆砌行程』處，把這件事情約言如次：『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即是把不虧本的勞動，從勞動者直接取來，固定於商品的資本家，不消說是這剩餘價值最初的佔有者，但不是最後的所有者。他是不得不繼續地把這剩餘價值和在社會的生產之全組織內成就別的機能的資本家，又和地主及其他的人們共同分割。因之剩餘價值分裂為種種部分。其各部分歸屬於種種範疇的人們，採取利潤，利子，商業利得，地租，及其他相互獨立的種種形態。』但是我們在研究資本之堆砌行程時，『我們把資本家的生產者作為剩餘價值全部之所有者，或則作為追求那種野獸的一切人們之代表者』而處理，資本之堆砌行程之『純粹的分析，要求我們暫把隱蔽着牠的機制之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置諸度外。』(11)

現在我們再把問題引回到前面的產業資本上去。前面已經說過，產業資本是以次列的形式循環的：

$$G \text{ (貨幣)} \rightarrow W \text{ (商品)} \left\{ \begin{array}{l} P_m \text{ (生產手段)} \\ A \text{ (勞動力)} \end{array} \right. \dots P \text{ (生產資本)} \dots W' \text{ (別種商品)} \rightarrow G' \text{ (更多的貨幣)} \left\{ \begin{array}{l} G \text{ (原本)} \\ g \text{ (利潤)} \end{array} \right.$$

產業資本以這樣的變形（形態轉變）在起點處一旦脫離貨幣之形態後，而於終點處復增加其分量以復歸於原來的貨幣形態，這便稱為產業資本終結一次的循環運動。產業資本只有依這樣的循環運動纔能生產得一定的

利潤；要想牠不斷地生出利潤時，那就非不斷地行此循環運動不可。資本每循環一次時，於其所通過的生產行程中製出W'的新的商品，這便是商品之『生產』。是故資本要不斷地生出利潤，則不得不往復地循環，資本往復地循環，則不斷地產生商品。本來『一個社會裏面消費是不能免的，生產也同樣是不能免的』，(三)所以無論在若何的社會，生產都不能不徂徠往復；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之往復是在資本之循環中寓行着的。現在我們把這生產之往復命名爲『複生產』(Reproduktion)。『所以一切社會的生產行程，在其不斷的連絡或更新不絕的流動中觀察時，都同時是複生產行程』，(四)我們能夠這樣說，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此則同時爲資本之複生產行程。

(一)資本論(德國本)三卷一册二九九頁。

(二)同(Kaustky 版)五〇〇——五〇一頁。

(三)(四)同上五〇一頁。

說到這複生產上來，這兒有兩種區別：一是生產之往復與從前是同樣的規模，二是比從前的規模更大。即是產業資本終結了一回循環的結果，基金之G被增殖爲G'(G + g)而出現。其資本主不消費其所獲得的利潤(g)之全部，至少資本化其中之一部分(g' X)，更加入於基金中和以前同樣地循環時，其循環運動之起點的貨幣是比前回的(G)更多量的(G + g' X)。因此之故，其生產資本(P)增加，生產之規模擴大，所生產的商品(W')之分量，不久亦將隨之而增殖，這便是馬克斯所謂擴張複生產(erweiterte Reproduktion)；在這時候所謂資本之堆砌(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便實現了。但是假如資本主從其所回收的貨幣額(G + g)中，消

費其利潤相當的全部（ g ），只把最初所投下的貨幣資本（ G ）連續運用時，生產之規模依然仍舊，這不過是單純的複生產而已。馬克斯命名為單、純、複、生、產（*einfache Reproduktion*），以與前述的擴張複生產相對應。

像這樣，生產之往復是或擴大其規模，或仍從前的舊質。我們假設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時，除勞動力的商品而外，所有一切的商品都是資本家的生產物。於是凡有從事於某種商品之生產的一定的資本家的生產者照前揭的形式不斷地運轉其資本時，在這個資本家的生產者以外，當然更須有從事於別種商品之生產的多數的資本家的生產者之存在以爲其先決條件。第一，該資本家要想不斷地能夠買入其生產事業上所必要的生產手段 P_1 （機械原料補助材料等的生產財）時，則在這個資本家以外，不可不有別的資本家以這些生產財作爲商品而不斷地生產。第二，該資本家能夠費一定的工資連續地雇入若干的勞動者——換言之，便是把勞動者之勞動力（ A ）作爲商品而不斷地買入——的原故，是因爲勞動者要以其所得的貨幣購買其生活上所必需的享樂財，所以要這樣的勞動力之買賣得保其不斷地無限進行時，則此等勞動者所需要的享樂財不可不由別的資本家的生產者繼續作爲商品而供給於市面。第三，該資本家要以其所得的利潤（ g ）之全部或一部購買其維持生活上所必需的各種享樂財（利潤全部消費時，只行單純複生產），則此等享樂財（其大部分常爲奢侈品）亦不得不有別的資本家的生產者不斷地作爲商品而向市場供給。第四，該資本家不斷地資本化其所得的利潤（ g ）之一部分時（此時行擴張複生產），其所資本化的資金，當然用以充買生產財及勞動力（至少是其中之任一種），要買生產財及勞動力，則比從前更多的生產財和享樂財（勞動者所需要的）不得不由該資本家以外的資本家

生產。無論要把生產如何擴張，所必要的機械和原料和勞動力不到手時，意志是不能實現的。不消說只從某一位的資本家之立腳點上想來——所謂實業家及實業家的經濟學者，便時常是立在某一位資本家之立腳點上思索，只要自己的事業順手時便不管其他的，——自己想買的商品，無論何時市場上都是有的，好像和別的生產業者之連絡可以全無顧慮的必要。但是我們從社會的生產之全體上觀察時，事情便全然兩樣。例如從一個紡績業者上說來，他所需要的生產財（如紡績機械）之生產額即使不增加，而他比以前更多買些生產財（紡績機械）他的事業之規模也可以擴大；但是生產財（紡績機械）之生產額未見增加而他卻增加其需要額時，別的同業者則不得不減少其需要，更從而縮小其生產之規模，這從社會全體上看來，紡績業之擴張結局是不能實現；要牠實現時，要以其所必要的生產財之產額早已增加為其先決條件。所增加的資本充用於購買勞動力時，也是同樣。要擴張生產之規模，要比以前更多雇用一些勞動者，則不得不有更多的勞動力準備作為商品而販賣，並且勞動者以其所得的工銀所得購買的享樂財之生產額亦不可比以前更加增殖。

總之產業資本要把自己作為資本而活用時，要不斷地脫離貨幣形態，且不斷地復歸於貨幣形態。即是產業資本家於一方面不斷地從別人購買其生產所必要的材料，而同時於他方面又不斷地把自己的生產物賣給別人。不斷地買，不斷地賣，此循環運動之起點和終點，不能連續地圓滿進行時，社會之全資本之複生產——不論是單純複生產或擴張複生產——決不會圓滿進行的。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其圓滿地繼續的條件有兩件事，事情必要第一、此等生產之結果，其最後所生出的一切的享樂財，——一切的生產歸根是朝宗於享樂財之生產，——須

得不停滯地拍賣於最後的消費者，即是社會之消費力要與生產力保持平衡。第二、生產上所必需購入的商品——生產財及勞動力（以及勞動者用的享樂財）——要不斷地提供於市場，值此之故，還要全社會上各種生產業保持一定的比例，即是馬克斯所謂『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Proportionalität der verschiedenen Produktionszweige*）。所以馬克斯說：『剩餘價值之生產，只是資本家的生產行程之第一幕閉幕，——直接的生產行程之告終。……現在是行程之第二幕來了。商品之全量即全生產物……不能不賣去。假使不能拍賣或只能賣一部分，或只能賣得生產費以下的價格時，勞動者不消說是被搾取了，但其搾取所得，在資本家之目的上不能十分實現；即是所搾取的剩餘價值全然不實現，或是只實現一部分，或是招來資本之一部或全部的損失。直接搾取之各種條件與其實現之各種條件不一致。兩者不僅在時與處上不一致，就是在概念上也不一致。一邊是僅爲社會之生產力所制限，一邊是爲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和社會之消費力所制限。』據此看來，此問題雖是複雜，但也是很明瞭的。即是剩餘價值之創造歸根是爲社會之生產業所制限，剩餘價值之實現化歸根是爲社會之消費力所制限，而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一項，一方面對於一定的生產業確保其經營上所必要的諸商品之得以購入，因之而使該產業之剩餘價值得以創造；他方面又確保其所生產的商品得以販賣，因之而使各種產業之剩餘價值得以實現。一定部門的生產業，由他部門生產業之諸商品之繼續的生產，保證其生產上所必要的諸商品購入之繼續的可能；同時又由繼續購入此等商品之故，向他部門的生產業，保證其生產物之諸商品得以繼續販賣。馬克斯之『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使全是這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問題之考

察。現在我以為是他的論敵的圖廿，說是『立脚』於這一篇之理論上，竟至『推論』得『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只要維持得着，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發展可以毫無障礙地進行，社會之消費力之增進全不能成爲條件。』但我以為圖廿之議論是立脚於馬克斯之產業部門比例論之根本的誤解。我因為要證明這個意見，便不得不把馬克斯之產業部門比例論之大體介紹一番；然於其準備上，更不得不把關於產業資本之循環的馬克斯之見解說明一個大概；以下我要更進一層，解說馬克斯之產業部門比例論之大體了。

馬克斯之『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題爲『社會總資本之複生產及流通』，福田博士以這一篇爲『學問的研究之最高頂』，現在我們就請登上這最高頂罷。前面已經反復揭示過的，產業資本是以次列的方式（爲圖便宜上稍有改易）而循環的：

$$G(\text{貨幣}) - W \left\{ \begin{array}{l} P_m(\text{生產手段}) \\ \dots \text{生產行程} \dots W' \\ A(\text{勞動力})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W(\text{生產的消費了尚價}) \\ W(\text{值所蓄積的商品}) \\ W(\text{新生產的價值}) \\ W(\text{所蓄積的商品}) \end{array} \right. - G(\text{基金之}) \\ \left\{ \begin{array}{l} G'(\text{更多的貨幣}) \\ G'(\text{更多的貨幣}) \end{array} \right. - G(\text{收回貨幣化的}) \\ \left\{ \begin{array}{l} G'(\text{更多的貨幣}) \\ G'(\text{更多的貨幣}) \end{array} \right. - G(\text{總餘價值})$$

右揭方式中爲生產而消費了的商品（ W ）之購入所投下的資本，依據馬克斯時可以分爲兩種：一是購入生產財（ P_m ）所投下的資本，馬克斯命名爲不變資本；二是購入勞動力（ A ）所投下的資本，名爲可變資本。把這生產財和勞動力兩者爲生產而消費了，其結果所製出的商品（ W' ）比最初所投下的資本有更多的價值，從其價值之大小而言， W' 是等於 $W + w$ ，這樣所增加的價值，馬克斯命名爲剩餘價值。故以 C 表示不變資本（constantes kapital），以 v 表示可變價值（variables kapital），以 m 表示剩餘價值（Mehrwert）時，前記方式中生產物

W' 之價值是等於 $c + v + m$ 。

但是這 $c + v + m$ 的方式，把來嵌入某特定的產業資本之生產物的時候，與把來嵌入社會總資本之全生產物的時候，其意義大不相同。如就某特定的產業資本而言——例如機械製造業之生產物全是機械，製糖業之生產物全是糖——其生產物全是從同種類的商品而成立的，在牠們的物理的性質上，沒有可以分別 $c \cdot v \cdot m$ 等的差異；我們用 $c + v + m$ 來嵌入的，只是指示其生產物之價值是由這樣的構成分子而成的。但如就社會總資本之全生產而言，則 $c + v + m$ 的方式，不僅表示生產物構成的分子，更是表示構成生產物之實質的貨物之物理的性質。即是 c 在事實上是表示從生產財成立， v 是表示從勞動者所需要的享樂財而成立， m 假如是行單純複生產時，是表示其全部均由資本家所需要的享樂財而成立，如是行擴張複生產時，則除此之外，更表示『生產擴張上所需要的加添份』之生產財和勞動者用的享樂財，都被包含在內。總而言之， $c + v + m$ 的方式，在社會總資本之全生產物行單純複生產時，是由

c (生產用的生產財) + v (勞動者用的享樂財) + m (資本家用的享樂財)

而成的；如行擴張複生產時，是由

c (生產用的生產財) + v (勞動者用的享樂財) + m (資本家用的享樂財)

$\left. \begin{matrix} m \\ x \\ m \end{matrix} \right\}$ (資本家用的享樂財)
 $\left. \begin{matrix} m \\ y \end{matrix} \right\}$ (生產擴張上所要的加添份)

而成立的，無論何者，結局是表示 (一) 生產用之生產財，(二) 勞動者的享樂財，(三) 資本家用的享樂財之三部類。

社會總資本之全生產，分爲上記物理的性質不同的三類，這件事實，我們在考察社會上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時，可以作爲分別此等生產之部門的標準。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樣的事實，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特徵，乃是人類之社會的生存所要求的自然的與技術的條件，無論在若何的經濟組織之下，都是存在的。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徵，牠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共通點和非共通點，總要先弄明白，於此我第一先從生產財（C）上思索。無論在甚麼社會，其所生產的財貨，都有一部分有生產財之物理的性質，而爲生產手段之補充。社會之生產物全體中，每有一部分，無論在甚麼社會，只要一被生產（從生產界流出）時，便立即引回生產界，決沒有走出消費界的。這一部分雖不斷地生產，而不屬於所謂社會的收入。所以亞丹斯密『原富論』卷頭的『各國民年年的勞動，是供給其年年所消費的一切生活上之必要品和便宜品的源泉』這句有名的文字中，各國民『年年所消費』的物品上，只舉了『生活上之必要品和便宜品』而各國民年年所生產的、消費的生產手段全從其中除外了。亞丹斯密所說的『年年的勞動』即是馬克斯所謂『活的勞動』，只有體現牠的一部分的生產物得爲生活的、目的所消費；至於全生產物之中，代表『死的勞動』（即是在過去所費的勞動）之蓄積的部分，——就是行單純複生產的時候，至少這一部分——是作爲已經生產地消費了的前期的生產手段之複製物，而再爲次期的生產所消費，立即引回於生產界的。這無論是奴隸經濟，是封建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或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只要社會不是向退化破產方面逆轉的，一切都一樣。第二，社會之全生產物中，其不屬於生產財的享樂財之一部分（與前方式的V相當）充爲勞動者之生活資料；這也無論社會之組織如何，是古今無異。從事於勞動的人，無論何

時何世，總是不得不生活的，他們生活上所必要的物資，不得不包含於社會底全生產物中，這是不待論的。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制下的雇傭勞動者，於工銀之形式，對於社會生產物之一部分有請求權，與此同樣，奴隸經濟制封建經濟制之下，勞動者的奴隸和農奴，也須獲得生產物之一部以維持其生活。資本主義經濟制之下，勞動者所消費的享樂財之不得不生產，和奴隸經濟制下奴隸所消費的享樂財，封建經濟制下農奴所消費的享樂財之不得不生產是同一的。第三，社會底全生產物中，除去上述項目所殘留下的（剩餘生產物 m ）——行單純復生產時，其全部（但須除去『對於諸種災害天變地異等所起的生產底混亂的儲備豫定金和保險豫備金』的部分）——充用於非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這也是不論社會之組織如何，古今同一的。只有領有坐獲收入的人稍有差異：在奴隸經濟制下是奴隸之主人，在封建經濟制下是土地之領主，在資本主義經濟制下是資本家，在共產主義經濟制下是限定於幼兒、童年、病人、殘廢、老人等之『不能勞動者』及從事於生產的勞動以外的人們（不屬於生產的一般行政』及其他『教育衛生』等的社會底公僕），如斯而已。行擴張復生產時，剩餘生產物（ m ）中不得不包含生產擴張上作為加添份而必要的生產財及勞動者用之享樂財，這也與社會組織不生關係。如是馬克斯所謂『活的勞動』即亞丹斯密所謂『年年的勞動』（ $\lambda + \beta$ 由此誕生的）不外是『各國民年年所消費的一切必要品和便宜品』——以及生產擴張上所必要的加添份的『供給的源泉』了。總之社會底全生產物之內容，無論在如何的社會組織之下，大概都可以用 $c + v + m$ 相當的方式表現，不過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全是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於是乎 c 是代表不變資本， v 是代表可變資本， m 是代表歸屬於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僅有這樣的

特徵罷了。

在資本主義之社會中，其社會總資本之全生產物，如上所敘述，分爲（一）生產財，（二）勞動者用之享樂財，（三）資本家用之享樂財之三大部類。所以馬克斯在研究各種生產業相互關係上，把全社會之生產業分爲（一）生產財之生產業，（二）勞動者用享樂財之生產業，（三）資本家用享樂財之生產業之三部門；更爲使問題簡單的原故，把後二者歸束爲一，便分爲（一）生產財之生產部門，和（二）享樂財之生產部門之二大部門。社會上的生產業，不消說是千差萬別的，要一一揭舉來考察牠們相互之關係，這是不可能，並且也是無用，所以馬克斯把這二大部門各認爲一個的生產業而考察其相互之關係。生產財之生產業雖只生產生產財，享樂財之生產業雖只生產享樂財，然其生產物從價值之構成要素看來，可以用 $o + v + m$ 的方式表現。馬克斯由這樣的見地出發，爲說明資本家的複生產之理法，作成了他所特有的算式，福田博士引用尼可孫 (Nicolson) 語，以爲是『好像冒險小說中所常見的海賊用來指示藏匿財寶處的地圖和隱語一樣的』東西，但我以爲討核這個算式，正好像披展一面地圖，指示圖甘巴爾諾夫斯奇這位論客藏匿馬腳的地點，我在次節以下便要來實踐了。

第六節 關於資本複生產的馬克斯之表式——其一，單純複生產之表式

馬克斯研究各種生產業之相互關係時，方便上把全社會之生產業分爲（一）生產財之生產部門，（二）享樂財之生產部門之二大部門，並且各部門之生產物，從其價值之構成要素看來，各可以用 $o + v + m$ （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之總計）的方式表現，已如上述；馬克斯即從此見地出發，關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之複生產

作成了次列的 Schema (表式) 表式中 c 代表不變資本, v 代表可變資本, m 代表剩餘價值, 而剩餘價值率 m/v 假定爲百分之百 (100%), 數字之單位可任意作爲百萬元或百萬磅。

$$I. \quad 4000_c + 1000_v + 1000_m = 6000 \text{ 生產手段}$$

$$II. \quad 2000_c + 500_v + 500_m = 3000 \text{ 消費資料}$$

這是行單、純、復、生、產的時候, 即『剩餘價值之全部不生產地消費了』的時候, 二大生產部門之比例的關係, 數字之絕對值可以任意, 惟其相互間的相對的比例有上述的一定之法則。

第一, 生產手段的第一部門, 是向社會全體之生產, 即向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之生產供給其所必要的生產手段的, 所以生產要圓活地往復進行時——以從前的規模圓活進行時——第一部門生產物全體之價值, 須與第一和第二部門的不變資本之價值之總和相等, 即是 $I. 6000 = I. 4000_c + II. 2000_c$ 。

(註) 與各生產部門之生產所使用的一切生產手段之價值相當的不變資本分爲『機械、用具、建築、用蓄等的固定資本、與由原料、補助材料、半成品等之生產材料而成的流動、不變資本』。此中流動資本——例如織之原料的轉移其全部的價值於新生產物的線, 而自己全然消滅——於各生產期間移其全部的價值於新生產物, 製出新生產物後而自行消滅; 而固定資本——例如紡織機械一年間作絲紗之用, 只消耗其價值之幾分, 到明年依然可以使用——於各生產期間只移其價值之一部分於新生產物; 所以生產物價值之構成要素上所表現的不變資本, 不是所使用的不變資本之全部。暫且假借羅利格森傑之設例以說明時, 前表式中所示的不變資本 6000 (第一部 4000 和第二部 2000 之總額) 中, 假定 4500 爲流動資本, 其餘的一 1500 表示一生產期間固定資本之消耗, 且其消耗率與現在所使用的固定資本全體的價值之百分之十相當, 現在所使用的不變資本之總額爲流動資本的 4500 和固定資本的一 1500 , 合計是一 9500 。即

前式所現的不變資本六〇〇〇，不過爲所使用的一九五〇〇之一部分。

其次，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門，是爲社會全體的人們之消費，即第二部門與第一部門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消費，供給其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所以社會之消費及生產，要以從前的規模圓活地反復時，於此第二部門所供給的消費資料全體之價值，必須與第一部門第二部門的資本家之收入（剩餘價值 m 全部）及勞動者之收入（可變資本 v ，即資本家支給於勞動者的工資之總額）之總和相等，即是 $II. 3000 = I(1000_v + 1000_m) + II(500_v + 500_m)$ 。

以上所述的兩個事實，即 $I. 6000 = I. 4000_c + II. 2000_c$ 與 $II. 3000 = I(1000_v + 1000_m) + II(500_v + 500_m)$ ，羅利魯森堡已經是指摘過的了，這不過是把一個根本的事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之複生產，凡於一切社會之複生產都是適合的根本的事實，用價值關係來表現了一遍的。社會之經濟組織無論怎樣，其社會之生產業於分爲生產財產部門與消費料生產部門上是毫無變易的。第一，產生生產手段的部門，今年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分量，當爲明年份補充該部門生產手段之消費上所必要的分量和補充消費料生產部門的生產手段之消費上所必要的分量之總和；第二，產生消費料的部門所產出的消費料之分量，當得足以供給從事於消費料生產的勞動者，及從事生產手段生產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和此等勞動者以外的非勞動者之生活資料，這不依社會組織之如何而生差別的。所以前揭馬克斯之表式中所包含着的二個方程式，是『社會的生產之一般的絕對基礎』只是在資本主義之社會時，發現爲資本與從資本所生的剩餘價值而已。

又第一部門之生產物被移於第二部門而為其生產所使用，第二部門之生產物被移於第一部門而供給其從事於生產者之使用，這在資本主義之社會，一切都是依商品交換之原則的買賣；不是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例如國家）徵收社會之全生產物，應其必要而分配於各部門的。所以從事於生產手段之生產的第一部門的資本家及勞動者，其得入手的必要的消費資料之分量，是限制於其所得拍賣於第二部門的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分量。然而第二部門的生產手段之需要，是以該部門所消耗的不變資本——即於該部門年年所消耗的機械、建築等及所消費的原料、補助材料等——之分量而定。兩部門之間有這樣的關係，所以社會之生產及消費，欲以從前原樣的規模圓活地進行時，在資本主義之社會更有第三條件存在：即於第一部門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之總和必與第二部門的不變資本相等，即 $I(1000_v + 1000_m) = II. 2000_c$ 。（此時，假定物之交換——從而其價格——與此價值是成比例的。）

（註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商品以貨幣（或其代用物）而交換，例如於第一部門所生產的生產手段與第二部門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交換時，在這兒不可不有為其交換媒介的貨幣。所以像圖甘巴爾諾夫斯奇把貨幣流通底問題全然看過了，這是生出大謬的根本，然此當於後述，茲從略。財貨之分類，作為生產財、享樂財和流通財，這是我年來的主見，貨幣即是屬於最後的流通財的，不為生產所消費，也不為享樂所消費，以其原狀堅持於流通界中，但是貨幣既不屬生產手段，又不屬於消費資料，在資本主義之社會，於商品交換又不可或缺，則是社會之生產部門只分為生產手段之生產部門，和消費資料之生產部門，殊猶不足，在此外須更有分設第三部門的貨幣生產部門之必要。此事羅利魯森堡已於其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第五章中詳細說明過，茲從略。

〔註三〕據馬克斯所說明的「社會之全生產物分為二大部門：（一）生產手段是成立於有不得不供給或至少是能够供給於生產的消費

之形態的各種商品(二)消費資料,是成立於有供給資本家階級及勞動者階級之個人的消費之形態的各種商品(資本論二卷三七〇頁)然而精密地說時,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並不必是可以割然分別的。例如米本屬於消費資料的,但是所生產的米之一部分,或作為種子使用,或作為釀酒及其他的原料使用,在這樣的範圍內,不能不說是屬於生產手段。所以在消費資料之生產部門所產出的生產物中,屬於生產手段的也有屬於生產手段的一切,不能說都是由第一部門所生產的了。例如煤是屬於補助材料的生產手段,然而所生產的煤之一部分作為暖房用及其他個人的消費時,在這範圍內又明明是消費資料了。

總之,單純複生產要圓活地進行時,在生產兩部門之間,不得不保次列的關係:

- 1, I. 6000 = I. 4000_v + II. 2000_c
- 2, II. 3000 = I. (1000_v + 1000_m) + II. (500_v + 500_m)
- 3, II. 2000_c = I. (1000_v + 1000_m)

只要這樣的關係得以保持着時,社會之生產與消費,可以依從來的規模無何等滯礙而進行。即是在第一部門所產出的合計六〇〇〇單位的生產手段,其中只有四〇〇〇是用作該部門的生產手段(I. 4000_c)之補充,即是屬於第一部門的生產業者相互買其生產物,其殘餘的二〇〇〇,是用作第二部門的生產手段(II. 2000_c)之補充,即是由第二部門底生產業者所購買。而第二部門之生產業者要購買時,須得提出有同量價值的消費資料。如是於第二部門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三〇〇〇單位中,有二〇〇〇是消售於第一部門之關係者,即關係於第一部門的資本家以其所得(I. 4000_m)買其一〇〇〇,關係於第一部門的勞動者以其所得(II. 2000_v)買來其餘的

一〇〇〇，各各作爲自己個人的消費。又於第二部門所生產的合計三〇〇〇單位的消費料，其中一〇〇〇已爲關係於第一部門的生產者所購買，其餘只剩下二〇〇〇了，而此中之一半，關係於第二部門的資本家以其收入（500_m）相互購買，其他一半，勞動者以其收入的工銀（500_w）買入，像這樣一切的生產品絲毫不漏地尋出其買主，社會之生產與消費因而可以全無障礙地進行。

第七節 關於資本復生產的馬克斯之表式——其二，擴張復生產之表式

以上所述，是行單純復生產時的情狀，資本主義之社會，本是以資本之增殖爲生命的，年年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全部消費，而生產之規模全不見擴張，這不過是馬克斯所說的 *eine Abstraktion*（一個抽象）。所以我們就單純復生產觀察了一遍之後，當更以此爲基礎就擴張、複、生、產（*erweiterte Reproduktion*）即資本之增殖——馬克斯稱爲資本之堆砌（*Akkumulation*）——從而有生產規模之擴張的，加以觀察。福田博士所謂『資本增殖之理法』即是關於這後者的問題。

馬克斯關於擴張復生產的表式，舉出次列的數目（資本論二卷四八三頁）：

$$I. 4000_c + 1000_v + 1000_m = 6000 \text{ 生產手段}$$

$$II. 1500_c + 750_v + 750_m = 3000 \text{ 消費資料}$$

這些數字之絕對值，也和前面一樣，可以任意，但兩部門生產量相互間有如次述的比例的關係。

第一，於第一部門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總額，不得不比社會上現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耗額——此在表

式中作爲不變資本分配於第一部門與第二部門——超過若干的程度，即是 $I. 3000 > I. 4000 + II. 1500$ 。何以故呢？這是因爲生產擴張，所新生產的生產手段，不僅補充從來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耗（機械建築等固定資本所消耗的一部分與原料補助材料等流動不變資本所消費的全部），更要供給生產規模擴張用的物質的手段，（此在無論何種社會組織之下都是一樣，現在是僅就資本主義之社會而考察的。）資本家欲圖資本之增殖時，其貨幣化的剩餘價值不全作爲消費資料之購買費，必以其一部分購買生產手段及勞動力（ $P_m + A$ ）——資本家之收入，要由這樣特殊商品之購入始能資本化，——然在市場上，不得不先有足以供應購買的分量之生產手段以事供給。

其次，於第二部門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之總額，不得不比勞動者所得的工銀與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之總和，低少若干程度，即是 $II. 3000 < I. (1000_v + 1000_m) + II. (750_v + 750_m)$ 。何以故呢？假使是行單純複生產時，資本家消費其收入之全部，勞動者收入（這是假定無論何時都要全部消費的）與資本家收入之合計額，不得不等於新生產的消費資料全體之價值，但現在的問題是行擴張複生產，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並不全作爲消費資料之購買費，必以其一部分資本化。假使資本家收入並不全部作爲消費資料之購買費，而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之分量與資本家消費其全部收入時之分量相同時，則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之一部分尋不出買主；這在以拍賣爲目的而生產貨物的資本家的企業，便不得不相應地引起一定的障礙。

於是續行單純複生產時與續行擴張複生產時，假使其生產物全體之價值相同，二者的差異如次（資本論

二卷四八七頁)

行單純復生產時的條件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000_c + 1000_r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 \text{II. } 2000_c + 500_r + 50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end{array} \right\} \text{合計} = 9000$$

I. 6000 = I. 4000_c + II. 2000_c

II. 3000 = I(1000_r + 1000_m) + II(500_r + 500_m)

II. 2000_c = I(1000_r + 1000_m)

行擴張復生產時的條件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000_c + 1000_r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 \text{II. } 1500_c + 750_r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end{array} \right\} \text{合計} = 9000$$

I. 6000 > I. 4000_c + 1500_c

II. 3000 < I(1000_r + 1000_m) + II(750_r + 750_m)

II. 1500_c < I(1000_r + 1000_m)

單純復生產時，其復生產以從前的規模進行——即是年年同樣地反復——關於此的表式只須一個；而擴張復生產時資本次第增殖，生產規模次第擴張，其表式便常年年變易。然則怎樣地變易呢？我們試就前揭表式以事說明：

$$\begin{aligned} & \text{I. } 4000_c + 1000_v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 & \text{II. } 1500_c + 750_v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end{aligned} \left. \vphantom{\begin{aligned} & \text{I. } 4000_c + 1000_v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 & \text{II. } 1500_c + 750_v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end{aligned}} \right\} \text{合計} = 9000$$

把這表式假定為第一年的表式，在這時候，假定第一部門之資本家堆砌（資本化）其剩餘價值（ 1000_m ）之半，五〇〇作為消費資料之購入，餘下的五〇〇使用以購入生產所必要的商品（生產手段 P_m 及勞動力 A ）購入生產手段者成為不變資本（ c ），購入勞動力者成為可變資本（ v ）。生產規模雖擴張，假定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 $c::v$ ）與以前的比率（ $4000_c::1000_v::1$ ）相同時，則合計五〇〇單位之資本中，四〇〇作為購買生產手段之用，一〇〇作為購買勞動力之用。新增加的四〇〇單位之生產手段於本年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總量，是 $I. 6000 > I. 4000_c + II. 1500_c$ ，即是兩部門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耗補足後，猶有五〇〇的剩餘，只消把這買了就是，於是所多生產了的生產手段中，其五分之四先便充用於第一部門自體的生產手段之增加；次如對於勞動力之購買派作一〇〇單位的剩餘價值時，受此的勞動者更不得不以之換成消費資料，其消費資料本年所生產了的總量，是 $II. 3000 = I(1000_c + 500_m) + II(750_v + 750_m)$ 。關係於第一部門的勞動者，前此需要的是 $I. 1000$ 單位，現在雖又新加一〇〇而成為 1100 ，然亦無礙地可以供給。第一部門之資本，在本年之始是 $4000_c + 1000_v = 5000$ ，然資本堆砌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同時增加而為 $4400_c + 1100_v = 5500$ ，其次年的生產規模便見擴張了。

然則第二部門呢？第二部門所生產的消費料如前所述，因為第一部門勞動者之需要增加，比上年度要多賣

一〇〇，便可以從第一部門買入同量的增多的生產手段。然而第一部門所增產的生產手段五〇〇之中，其四〇〇已如前述，是爲第一部門自體之生產擴張用的，還有殘餘的一〇〇剛好相應；就這樣，第一部門所增產的生產手段便全部處分了。現在在第二部門比從前更多用一〇〇之生產手段了，因之雇傭勞動者之數，亦不得不相應地增加，假如其比例與以前的比率（1500：750=2：1）相同時，對於一〇〇單位之生產手段增加後，不得不增加五〇單位之勞動力；即是剩餘價值中更有五〇單位常得作爲工銀以使用新的若干勞動者，既如是，便有五〇單位相當的增多的消費資料不得不呈現於市場；此消費資料是由第二部門生產的，便是從第二部門全體的生產物中，一〇〇單位作第一部門新勞動者之生活資料，又五〇單位作第二部門新勞動者之生活資料，比以前更多受若千的需要了。

現在把關於第一部門及第二部門之總生產物再核算一遍時，第一部門所生產的六〇〇單位之生產手段，其中五五〇單位充補兩部門從來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費，四〇〇單位擴張第一部門之生產，一〇〇單位擴張第二部門之生產，如是便全部處分了。其次第二部門所生產的三〇〇單位之消費資料，其中一九〇單位充當兩部門所使用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 $\text{I}(\text{需}1000, + \text{需}100) + \text{II}(\text{需}750, + \text{需}50)$ ，餘剩一一〇〇，這是該當充作資本家階級之個人的消費的，但是如前所述，第一部門所生產的一〇〇單位之剩餘價值，其中五〇單位依吾人所假定須得化爲資本，所以個人的消費只能有五〇單位。一一〇〇減去五〇〇，尙有六〇〇單位，這爲第二部門之資本家於其個人的消費上所使用。第二部門的資本家，如表式中所示，有七五〇單位之剩

餘價值，其中一〇〇單位購入新生產手段，五〇單位備用運轉此等新增的生產手段，各各化爲資本，剩餘價值中充個人的消費之用者，恰餘六〇〇單位。像這樣，第一部門之資本家資本化其剩餘價值一〇〇〇單位之半，第二部門之資本家資本，只化其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中之一五〇單位，因此第一部門的資本於一年之始爲 1500。
 $+ 750_v = 2250$ ，而於一年之末資本堆積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各增加半數。
 $1600_c + 800_v = 2400$ ，次年度之生產規模，仍是擴張得幾分了。

在此以生產擴張始行的一年爲第一年度，該年度之資本與前年度，其增加如次：

$$\left. \begin{array}{l} \text{基本年度} \dots\dots\dots \\ \text{I. } 4000_c + 1000_v = 5000 \\ \text{II. } 1500_c + 750_v = 2250 \end{array} \right\} \text{合計} = 7250$$

$$\left. \begin{array}{l} \text{生產擴張之第一年度} \\ \text{I. } 4400_c + 1100_v = 5500 \\ \text{II. } 1600_c + 800_v = 2400 \end{array} \right\} \text{合計} = 7900$$

生產規模擴張後的剩餘價值率（作爲工銀支銷的可變資本 v 與剩餘價值 m 之比例）與前年度同是百分之十時，生產規模擴張後生產之結果當如次：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400_c + 1100_v + 11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600 \\ \text{II. } 1600_c + 800_v + 800_m = \text{消費資料 } 3200 \end{array} \right\} \text{合計} = 9800$$

以此與前年度生產之結果比較時，社會之總生產物，從九〇〇〇單位增加至九八〇〇單位，剩餘價值在第一

門，從一〇〇〇增至一一〇〇，在第二部門從七五〇增至八〇〇，生產擴張之資本家的意義，即剩餘價值產出之增加，於以實現了。便在這個時候，也有與前年度相同的次列的三種關係成立：

$$I. \quad 6600 > I. 4400_c + II. 1600_c.$$

$$II. \quad 3200 < I. (1100_v + 1100_m) + II. (800_v + 800_m)$$

$$III. \quad 1600_c < I. (1100_v + 1100_m)$$

即是生產手段一方面在補充從前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耗的必要以上多餘產出了；而消費資料一方面，資本家如全消費其所得的剩餘價值時，則大有供不應求之勢；這便成爲得以使——或是不得不使——資本增殖，生產規模擴張的物質的條件。像這樣一旦開始了的生產擴張，恰是『在數學上可以測定的自然法則之強制下』，促進其以後年年的繼續。現在我們把第一部門的資本之堆砌作爲年年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之半分，又假定兩部門的資本之構成（可變資本 v 對於不變資本 c 的比例）不隨生產之擴張而交易，而兩部門的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 m 對於可變資本 v 的比例）時常爲百分之十時，則依前同樣的算法可以順次算出各年度之資本額及生產額。現在把實行擴張以後至第五年度的表式和基本年度的並列如次：（參照資本論二卷四八七至四九〇頁及 Rosa-Luxemburg,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S. 56—91）

基本年度	{	I. 4000 _c + 1000 _v + 1000 _m = 生產手段 6000	}	合計 = 9000
		II. 1500 _c + 750 _v + 750 _m = 消費資料 3000		

		生產擴張後各年度	
第一年度	I.	4400 _c + 1100 _v + 1100 _m = 生產手段 6600	合計 = 9800
		II. 1600 _c + 800 _v + 800 _m = 消費資料 3200	
	II.	1600 _c + 800 _v + 800 _m = 消費資料 3200	合計 = 10740
		II. 1760 _c + 880 _v + 880 _m = 消費資料 3520	
	I.	4800 _c + 1210 _v + 1210 _m = 生產手段 7220	合計 = 11848
I. 5324 _c + 1331 _v + 1331 _m = 生產手段 7986			
II.	1936 _c + 963 _v + 963 _m = 消費資料 3862	合計 = 13083	
	I. 5856 _c + 1464 _v + 1464 _m = 生產手段 8784		
II.	2129 _c + 1085 _v + 1085 _m = 消費資料 4299	合計 = 14348	
	I. 6442 _c + 1610 _v + 1610 _m = 生產手段 9662		
II.	2342 _c + 1172 _v + 1172 _m = 消費資料 4686	合計 = 14348	
	II. 2342 _c + 1172 _v + 1172 _m = 消費資料 4686		

像這樣隨着生產之擴張資本之堆積，在上記期間內社會之總生產物從九〇〇〇增至一四三四八，社會之總資本從七二五〇（4000_c + 1500_v + 1000_m + 750_m）增至一五五六六（6442_c + 2342_v + 1610_v + 1172_m），即是以 100 : 160 之比例而增殖，剩餘價值從一七五〇（I. 1000_m + II. 750_m）增至二七八一（I. 1610_m + II. 1172_m），同時資本家用以支辦其個人消費的消費資料的，例如在第一部門之資本家，最初是五〇〇單位，到第五年度時，增至八〇五（剩餘價值一六一〇之三分之一）即是資本家階級次第奢華，同時又依『節欲』（一）以堆砌資本。

愈堆砌，社會於物質方面愈富庶，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都增加其產額；更從資本家的見地上看來，多量之剩餘價值愈見產生，資本家的生產全無障礙地愈見進展了。

〔註四〕以上諸表，是關於社會總資本之複生產——即年年所消耗的資本之恢復與其增殖（增殖時行擴張複生產）——的表式，表中所列，只是年年所消耗和所恢復的（行擴張複生產時，不僅恢復其所消耗，更將逐漸增殖）資本，現行於社會全體之資本總額，比表中所示更遙遠超過；就是關於所交換的商品之數量，也是同樣。表中社會總生產物基本年度九〇〇〇單位，到第五年度增至一四三四八單位，這都是資本家的生產物可以賣却而換成貨幣的商品。然可賣換貨幣的商品之總量，並不盡由此等生產物所代表，於此等生產物之外，更有可以和貨幣交換的若干商品存在：雇傭勞動者之勞動力即是。在純粹的資本主義之社會，一切的商品都以資本家的生產物而出現，唯勞動力這種商品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不屬於資本家的生產物的這唯一的例外有作為一種的資本而入於生產行程的運命：由資本家所有的貨幣所買入以構成生產資本之一部。所以勞動力雖和生產物同樣是可以賣換貨幣的商品，但在上表中却列為可變資本 v 而作為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從可知上表中的生產物，不是包含可交換的商品之全部。

第八節 剩餘價值實現化之一條件的各種產業之比例的關係

我在上面把馬克斯關於社會總資本之複生產的有名的表式已經說明了，現在我們就這些表式尤其是擴張複生產之表式稍加思索時，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主義之社會，其資本之增殖，生產之擴張，要圓活地進行時，是受着怎樣困難的條件拘束着的了。例如前揭擴張複生產之基本年度之表式中，先假定第一部門之資本家資本化其剩餘價值一〇〇〇單位之半，而第二部門之資本家只能相應地資本化其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中之一五〇單位——不消說，這些數字是可以任意選定的，不過資本論二卷中馬克斯所設的第二例是這樣表示的罷了——

——資本之堆砌在第一部門是能動的施行，在第二部門是受動的響應，並且兩者之依存關係必準依次之法則：即是『資本之堆砌於兩部門須得同時並行——（圖廿假定只在生產部門行資本之堆砌，已如前述，這全是他的誤解）——而在消費資料之部門，其所能增加的不變資本之範圍，須與生產手段部門之資本家所得增加的可變資本及個人的消費恰恰同額。』此比例（ I_c 之增加 = I_v 之增加 + I_m 中所消費部分之增加）是關於資本堆砌的馬克斯表式之基礎』（Rosa Luxemburg, *Akkumulation*, S. 66）試以置入於前面各表式時，其數目如次：

	I_c	其增加	I_v	其增加	I_m	消費(前年度之半份)	其增加
基本年度	1500	—	1000	—	1000	—	—
第一年度	1600	100	1100	100	1100	500	—
第二年度	1760	160	1210	110	1210	550	50
第三年度	1936	176	1331	121	1331	605	55
第四年度	2129	193	1464	133	1464	665	60
第五年度	2342	213	1610	146	1610	732	67

（數字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像這樣在第二部門的資本之堆砌，生產之擴張，以精確的數學的規則與第一部門的資本之堆積，生產之擴張，相依為命。這樣精確的數學的規則要不斷地嚴守時，擴張複生產纔能年年地圓活進行。這樣不可缺的條件，在

現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色的資本主義之生產界是不能具備，這是不待言的事實。因此之故，資本主義之生產界必然的有不絕的動搖，而其動搖常為擾亂全社會的，或是急性或是慢性的『恐慌』之不可根斷的主要的病源。

第九節 剩餘價值實現化之一條件的社會之消費力

馬克斯把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之維持，作為剩餘價值實現化之一條件的理由，就上述，可以大概明白了。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如不維持時，社會總資本之複生產實在是終不能圓活地進行的。但是此比例的關係一被維持時，僅以這一項的條件，資本之增殖，生產之擴張，便能圓活地進行嗎？這也是決不能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存在。馬克斯在資本論三卷上明白地敘述過的，前已引用，茲再重錄如次：

『剩餘價值之生產，只是資本家的生產行程之第一幕閉幕——直接的生產行程之告終……現在是行程之第二幕來了。商品之全量即全生產物……不能不賣去。假使不能拍賣或只能賣一部分，或只能賣得生產費以下的價格時，勞動者不消說是被榨取了，但其榨取所得，在資本家之目的上不能十分實現。即是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全然不實現，或只實現其一部分，或是招來資本之一部或全部的損失。直接榨取之各種條件與其實現化之各種條件不一致。兩者不僅在時與處上不一致，就是在概念上也不一致。一邊是僅為社會之生產力所制限，一邊是為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和社會之消費力所制限。』

據此看來，在求剩餘價值之實現化上，各種生產業須維持其適當的比例關係，而社會之消費力亦必與之對應，這兩者正是必要的條件。然而這兩個條件何以必要呢？只以其中之一條件的各種生產業之比例關係之維持

爲已足的圖廿之推想又何以一定是謬誤呢？我關於此點不得不更進而說明。以上我不憚煩地把馬克斯關於擴張生產之表式稍稍詳細說明了的原故，一方面也正是想作爲此後議論之準備。

關於擴張生產的馬克斯之研究，福田博士論之如次（『社會政策』四五九頁）：

『馬克斯……從擴張再生產論不會論究到當然所生的歸宿處，尤其是把牠和超過生產的關係之考察太輕忽地弄過了。然而此考察在資本主義崩壞之發展則之說明上無論如何是不可缺的。……馬克斯之擴張生產理論開出一個闡明此點唯一的至少是最妥當無疑的關門。他的確是把這關門衝破了，但此後當如何進行，他却不曾有十分的指示。』

這誠如博士所說，我對於這個批評毫無異議。『資本之堆積與擴張生產』這一章已如前說，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之最末一章，這重要的一章付諸印刷者僅僅三十四頁，這明明是馬克斯遺留給我們的未成品了。資本論三卷只有第一卷是在作者生前出版的，其第二卷第三卷是作者之親友恩格爾斯費了不少的苦心以整理其原稿而公諸於世的，這大約是讀者所知道的了。『愈新且愈深入的研究，長期的疾病，和最後的死，妨礙了他不能完成其全著；恩格爾斯又纔把他友人所遺下的未定稿爲材料，編輯了這兩卷（資本論第二、三）出來。其原稿是底稿，概要錄，抄本之類，其中有有連絡的長篇，也有只爲備忘的簡短的抄錄——這些是經過長期的中斷，覆蔽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八年長期間的一個強有力的精神的勞作（F. Mehring, Karl Marx, 1920, S. 378）。』再據恩格爾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中所說的：『第五至第八之草稿中（此中第八之草稿即吾人現在所論的資本

論二卷第三篇之末章）馬克斯與猛烈襲來的病勢猛烈地對戰之痕跡，真是多而又多的留存着……論社會資本之複生產及流通的第三篇，好像是他最以 *eine Bekehrung*（訂正增補）之必要為切望的。』所以如福田博士所說：『馬克斯之擴張再生產理論開出一個闡明此點（資本主義崩壞之發展則）的唯一的至少是最妥當無疑的關門，』他雖『把這關門衝破了，』但是『此後當如何進行，他却沒有十分的指示，』這誠是最足引為遺憾的；然而我們對於與那樣的痛苦和貧乏戰鬪着的晚年的馬克斯，我們還要更有所奢望，這是過於殘酷了。但是，歸根起來，牠總是不充分的。於是乘虛而起的是甚麼呢？馬克斯之擴張複生產理論是為論證資本主義之必然的停窒而成立的，這已如前述，而圖甘（從而福田博士）却逆用牠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決不停窒之論據；這却是立腳於馬克斯之理論上，而顛覆馬克斯之理論的偉業了。

據圖甘巴爾諾夫斯奇之想法，馬克斯着眼到各種生產業之比例關係，是偉大的功績。馬克斯說：各種生產業之間一定的比例關係不能維持時，則資本之增殖，生產規模之擴張，是不能圓活進行；但可惜馬克斯沒有把這個理論逆轉來推想的腦力。資本之增殖生產規模之擴張要圓活進行時，各種生產業間一定的比例關係不得不維持。這個理論既發見了，逆轉來說，只要各種生產間一切的比例關係維持着時，資本之增殖，生產規模之擴張，可以毫無障礙地前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決不停窒的，可惜馬克斯竟沒有想到這兒的智慧。於是福田博士也同發嘆聲，以為『馬克斯之再生產研究，於巴爾諾夫斯奇所下的推論上，可以尋出論理上的當然的歸結……要這樣，馬克斯之周到而破天荒的循環行程中資本再生產之理論，纔得為學問上的大收穫。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馬克斯把

他的事業中途而止，在未達到此當然的論結（！）之前，俄而迷入問道，竟墮（！）在與再生產理論不能兩立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論裏，這真是可惜不盡（！）的了。』

資本論最後一章沒有前進到可以進達的最後的論點，我們也同樣地承認。這由我們看來，也『真是可惜不盡的』。但是我們所可惜的，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中的當然不可不架的橋梁沒有由原著者完成，並不是可惜的『俄而迷入問道』而『墮在』與第二卷之研究『不能兩立』的議論。因為沒有橋梁而墮入於谷底的，正自有人，但這人是誰，我們恐怕還有思索的必要。

在此我們感覺着當得再回到擴張復生產底馬克斯之表式：

$$I. 4000_c + 1000_v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II. 1500_c + 750_v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前面已經說過，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之間，有這樣的比例關係存在，是無論在若何的社會組織之下，凡是行擴張復生產時的不可缺的條件，並不是只限定於資本主義之社會的。例如便在奴隸經濟之下，次年度要擴張生產之規模時，本年度中生產手段之生產額，只够補充前此所使用的生產手段之消耗時猶不十足，次年度擴張生產規模上所必要的增多的生產手段也不可不生。即是 $I. 6000 > I. 4000_c + II. 1500$ 。不是這樣的時候，縱使奴隸主想擴張其生產規模，却找不出實現他的計劃的物質的手段了。還有要擴張生產規模的時候，一方面要增加生產手段，一方面也不得不增加勞動者之人數。要這樣時，則比現在的奴隸主（非勞動者）及奴隸（勞動者）之生活

上所必要的更多的消費資料，便不得不豫先在本年度內產出，即是 $II. 3000 > (I. 1000_v + 500_m) + II(750_v + 600_m)$ 。各種生產業間像這樣要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的，這決不是限定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不過資本主義之生產界在無政府的狀態，沒有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實現此法則的中樞機關之管理，從這個法則之違犯上，便不免有不斷的動搖而已。

各種生產業之間一定的比例關係不得不維持，這是支配無論若何社會組織之下的複生產的法則。資本主義之社會內的複生產，不消說，是免不脫牠的支配，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個特殊組織，除這一般的拘束之外，還有一種特別的拘束。這便是全生產物不得不一旦換為貨幣而賣出。『假如不能拍賣，或只能賣其一部分，或只能賣得生產費以下的價格，那嗎，剩餘價值便全然不能實現，或只實現其一部分，或招來資本之一部或全部的損失。』所以剩餘價值之實現化『為各種生產業之比例的關係及社會之消費力』所限制。『馬克斯之擴張複生產表式，實在明示着生產物因『社會之消費力』不足，必在『只能賣一部分』的狀態。前述從次年起欲行擴張複生產時，今年度之生產狀態不得不如此：

$$I. 4000_v + 1000_v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II. 1500_v + 750_v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依假定第一部門之資本家消費其剩餘價值一〇〇〇單位中之五〇〇，資本化其餘之五〇〇，又第二部門之資本家消費其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之六〇〇，而資本化其餘之一五〇，如是，則如前所說明的在紙上的計算是順

暢無礙。但是我們把牠來嵌置在資本主義之社會，我們請暫且看看全生產物究竟能不能順暢無礙地販賣。奴隸經濟之奴隸主或社會主義經濟之中央機關，能把社會之全生產物適宜地分配，這僅以加減之計算問題便可解決；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其全生產物之分配，是依買、賣、而行的，購買其全生產物的購買力——馬克斯所謂『社會之消費力』——在該社會中究竟存在與否，我們如不考究到時，問題是還未解決的。再回頭到前記的表式，第一部門之資本家消費其剩餘價值中之五〇〇單位，第二部門之資本家消費其剩餘價值中之六〇〇單位，合計一〇〇〇單位之消費資料由資本家階級所購買了。於此所生產的消費資料之總額三〇〇〇單位中，一一〇〇單位算是賣出了，餘下的還有一九〇〇單位。投入第一部門的可變資本 v 是一〇〇〇單位，投入於第二部門的可變資本 v 只七五〇單位。作為可變資本所投入的這些資本（有貨幣資本之形態的），成為單純的交換媒介之貨幣而支給勞動者之手，——同是貨幣，在資本則盡資本的效用，在勞動者則失其資本之性質——勞動者又以其貨幣購買彼等生活上所必要的消費資料。從這方面所生的需要，合計是一七五〇單位（I. 1000, + II. 750），從前面的殘額一九〇〇減去，尚餘一五〇單位。這便、是、不能、賣、的、物、品。消費資料中有此物品，必然的不能賣掉而留存。不消說，這一五〇單位的消費資料，在明年度兩部門之生產規模擴張時，從而所使用的勞動者增加，其中一〇〇單位可以作為第一部門所增加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五〇單位可以作為第二部門所增加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之社會，不是奴隸制或社會主義制，此等生活資料不能以實物分配，必得由勞動者用貨幣以買入。然而勞動者階級有一九〇〇單位（I. 1100, + II. 800,）之購買力時，已經是資本家之

剩餘價值已經實現化（貨幣化）而行生產擴張的第一年度了。在本年度的勞動者階級，如前所述，是只有一七五〇單位之購買力的。於是這一五〇單位之消費資料如何賣法的問題，尙殘留着而未能解決。並且這到底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好像被馬克斯解決了一般地留存在那裏。拉思金（Ruskin）曾經說過：人之價值，依所成就的而定的機會，不如依所不成就的而定的機會之多。馬克斯把這不能解決的問題，不解決地留存而永眠了，可見他的腦力是到最後也還不失他透明確實的特性呢。現在我借重羅剎魯森堡之周到綿密的研究，在這問題之到底不能解決的事實裏，見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中所內在的矛盾之說明。馬克斯之擴張複生產理論，在闡明資本主義之必然的崩壞之發展則上的確是『開了一個幾乎是唯一的至少是最妥當無疑的關門』。這座關門一旦開了之後，論理的必然之一路導引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出資資本主義之組織終是在不得不崩壞的運命裏。我更於下節再事說明罷。

第十節 擴張複生產之必須條件的資本主義組織外之販路

如上所述，從次年度起欲得施行擴張複生產時，本年度之生產狀態，不得不如次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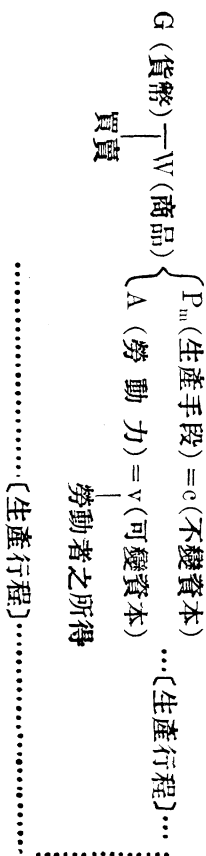
$$I. 4000_0 + 1000_0 + 1000_m = \text{生產手段 } 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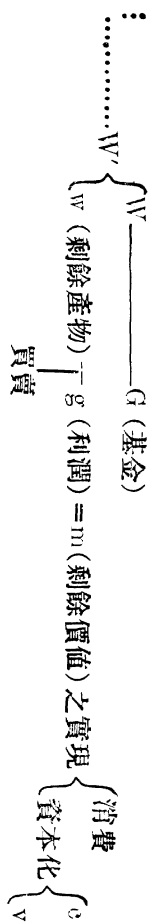
$$II. 1500_0 + 750_0 + 750_m = \text{消費資料 } 3000$$

第一部門之資本家資本化其剩餘價值一〇〇〇單位中之五〇〇，而消費其五〇〇，第二部門之資本家資本化其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中之一五〇單位，而消費其六〇〇，此等資本家所購買的消費資料，合計一一〇〇單位。

其次第一部門及第二部門之勞動者消費其全部所得的工資（ $1000_1 + 750_2 = 1750$ ）以購買消費資料，其總額為一七五〇單位。於此對於消費資料的資本家之需要量與勞動者之需要量合計為二八五〇單位，而現在第二部門所生產的消費資料是三〇〇〇單位，減去尚餘一五〇單位不能販賣。這將如何呢？這是在前節所留下的問題。

這剩下的一五〇單位的消費資料——於次年度生產規模擴張時，其第一第二兩部所使用的生產手段增加，從而勞動力亦不得不增殖——便可以作為次年度所新增的雇傭勞動者之生活資料，決不是無用的，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之社會，此等生活資料不能以實物分給，須得由勞動者支出貨幣以買取。然而勞動者階級要有買此等多餘的消費資料的工銀到手時，不得不從資本家階級領來——『資本家階級是貨幣流通之唯一的出發點』（資本論二卷三〇七頁）——其資本家要能支出比生產規模擴張以前更多的工銀，要在他的剩餘價值一旦實現化為貨幣形態之後。已經是反復說明過好幾次的，資本之投入於各種生產業時，是採取次列的循環形式：





剩餘產物 (w 或 m) 之一部分——即消費資料過剩的一五〇單位——要移到勞動者手裏時，先要該剩餘產物化爲貨幣而新成貨幣形態之資本，再經過 $G - w \left\{ \begin{matrix} P_m = G \\ A = v \end{matrix} \right.$ 的流動行程，其貨幣爲購買勞動者動力之用，從資本家支與勞動者，夫然後勞動者纔以所得的貨幣購買此剩餘產物。即是吾人所引以爲問題的一五〇單位之消費資料不得不賣去，並且要使由勞動者買去時，資本家要賣來成貨幣，把貨幣資本化作工銀以支付於勞動者。但到這樣時，問題便全然窒塞了，簡直沒有解決的方法；子細想來，也是應該如此。何以故呢？問題是在資本家所獨佔的剩餘產物之處分，剩餘產物資本家不欲自行消費，而欲以化成貨幣，尋不出買主是不消說得的了。假使勞動者得着了足以購買牠的工銀時，其工銀是作爲生產費由資本家支出的，與此相當的剩餘產物，當然不會留在資本家手裏了。這樣想來，問題簡直沒有解決的餘地，我就因爲看到有這樣到底不能解決的問題，便看出了資本家的擴張複生產——即資本之增殖——自體中所內在的本來的根本的矛盾。

既有這樣根本的矛盾，然於事實上資本之增殖，却次第進行以至於今日，抑又何故呢？從出發點第一步起，便不得不停滯的，然而至於今日，仍不見停滯，也還勉強地在進行的現實，這當作如何解釋呢？以下我當更就此新的問題思索。

理論上從開始便不能解決的，而事實上却總處理着到了現在，這個原故，是我們的理論——馬克斯之資本復生產理論——所引以為對象的社會是純粹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社會，實際上是不會有過的。純粹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資本之增殖從發軔的第一步便理應是不可能，這種理論的不能存在的社會，歷史上當然不會有存在過的事實了。

大凡無論在何種社會之組織中，舊社會組織之殘滓，總有些遺留着的，全社會之組織，不是如像水與火一樣明白地可以劃斷時期。譬如我們的生理的構造，與犬貓相當之處，在解剖學上有名為尾骶骨的骨構存在；又如盲腸端部，有無用的器官，名為蟲樣突起的腸管，這在他種獸類於食物消化上是很有效用的；又如脊椎動物——不僅人類，其他鳥類獸類於胎生時期，其項之兩側必有與魚類同樣的腮孔；與此等同樣的現象在社會組織之進化的上亦有表現，新構造內終必有舊構造之遺物殘存。在研究之便宜上，雖分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概念，然如以為與概念所描畫的同樣的現象曾存在於地上或能存在於將來時，這便成為概念之奴隸了。以這樣的原故，我們雖然抽象着一種特徵而製出資本主義社會之概念，然與此同樣的現實的社會，在古時是不會有，便在將來也是不會有，這和幾何學上的線和平面不是現實地存在，化學家由養與輕而成的純粹水也不是現實地存在的，恰好是一樣了。

實際上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會有的，但是馬克斯之資本復生產論，却把這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作為研究之對象。我現在隨着羅利魯森堡所引用（*Akkumulation*, S. 301），從資本論中選其足為證據的三三句摭

列於此：

『爲要把研究之對象從種種足爲障礙的附隨狀態脫離而理解其純粹性的原故，我們在此不得不把商業世界全體看作一個國民，並且假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一般地確立了，支配着一切的產業部門。』（第一卷五四四頁腳註）

『此處只有兩個出發點，即是只有資本家與勞動者之存在。屬於第三者的一切的人們，不是提出其勤勞以由此兩階級換得貨幣的，便是於地租利息等形式得以參加於剩餘價值之分與的，不受支付而得貨幣的人們。——所以資本家階級是貨幣流通上唯一的出發點。』（第二卷三〇七頁）

『我們的假定——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一般的及排他的支配——之下，此階級（資本家階級）之外，除勞動者階級以外，全無何等階級存在。』（同上三二一頁）

『在此只有兩種階級，即只能處理自己的勞動力的勞動者階級，和獨佔地領有社會的生產手段與貨幣的資本家階級。』（同上三九六頁）

純粹的資本主義之社會，關係於生產的，只有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資本家以剩餘價值爲其所得的收入，勞動者以由資本家（獨佔地領有貨幣的）所支給的工銀爲其所得的收入。存在於此二階級之外的『非生產的階級』（即『國王，僧侶，教授，娼妓，軍人』等）不過是此二階級的——主要是資本家階級的——附屬物而已。此等人之收入（即其購買力），是由資本家階級或勞動者階級之收入第二次枝生出的，其所消費的消費資料，在

前表中爲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之消費所代表。要以這樣的社會爲前提時，馬克斯之資本複生產之理法纔能够得以說明。所以我們在前面所引以爲問題的一五〇單位之消費資料，不爲資本家階級所買，也不爲勞動者階級所買，全然尋不出買主來，除留存而外，別無他法。

但是，這就我們的純粹資本主義之社會所考察的，實際的社會上有不屬於資本家階級（或其附屬物），也不屬於勞動者階級（或其附屬物）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存在。這等人一方面賣其商品，同時把我們以前所引以爲問題的在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到頭是不得不殘剩的物品買去了。

在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產業資本家作爲經營生產用的材料所買入的商品（ $P_m + A$ ），除勞動力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別的產業資本家所產生的資本家的生產物，然就現實的（自然是不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此等資本家所買入的商品中，不屬資本家的生產物的，除勞動力以外，還有多種，這是我已經說過一下的，現在我要稍稍綿密地考察到這件事情上來了。

我們此處所謂『單純的商品生產者』，是非資本家的企業者之商品生產者。大凡稱爲資本家的企業者的，至少他是要於雇用勞動者的形式之下購入他人之勞動力。爲此之故，便不得不投下（ $C + A$ ）一定的貨幣資本。但是不會具此種條件的生產者，以其商品供給於市場的，亦屬不少。例如在奴隸制或者農奴制之下生產種種產物，而以其剩餘向外發賣的人，又如依自己或自己家族之勞動，以經營小規模的獨立生產業，以其生產物作爲商品而供給於市場的人，此等人均是廣義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有這樣單純的商品生產者在資本主義組織之外，

在我看來，是使擴張複生產可以不停室的必要條件。資本主義之組織裸着身體時，是自然不能存育的，必有先資本主義的組織之胎衣以裹護着牠，牠纔得以發育。一切新的生產關係，都是孕在舊的生產關係之母胎中而發育的。資本主義之組織既已發育以後，若不常爲先資本主義之組織所擁抱，仍不能自行發展。在這兒，資本主義的組織，便不能有無限地發展的固有之約束存在。

前所揭一五〇單位之消費資料不能尋出賣主而殘存的，實係由此等存在於資本主義組織之外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所買取。這樣說來，讀者恐怕要發起疑問了——那項消費資料，是於次年度生產規模擴張時，爲供給新增的雇傭勞動者維持生活之用，豫於本年度所生產的；現在被勞動者以外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買去了，生產規模之擴張不是終竟不能圓活地進行嗎？其實在實際上資本主義之組織下所多生產的該項消費資料，自始便是以具有這樣的實質，足以供給組織外之『單純的商品生產者』之需要的商品而生產的；同時資本主義組織內的勞動者所需要的消費資料，亦須轉仰給於組織外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例如問題的一五〇單位是生產成棉製品的，先由地方上的小農買去；因此本年度之剩餘價值得以貨幣化，資本家更以之化爲資本，即支出其貨幣以購買勞動力，以增加其所使用的雇傭勞動者之數。於此貨幣資本爲資本家變成可變資本，同時貨幣自身作爲工銀而移入於勞動者之手，該勞動者以此貨幣從資本主義組織外的『單純的商品生產者』買其生產物——例如米，以供消費。單純的商品生產者賣得其所生產的商品（米）以換成貨幣，更以此貨幣買入切要自己生活的資本家生產物的商品（棉製物）；同時資本家的生產者得賣其剩餘產物之一部於非資本家的生產者，始能化爲

貨幣（即實現化其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更從而化為資本。在這時候，貨幣在單純的商品生產者手中是 $W'(米) - C(貨幣) - W'(棉製品)$ 的流通形式，這不作爲資本而活用，只是効盡了單純的交換媒介物之機能。所以單純的商品生產者不是資本家的生產者。然而資本家的生產者向此等單純的商品生產者賣去其剩餘產物（棉製品 W' ），是屬於 $C(貨幣) - W'(棉製品) - C'(更多的貨幣)$ 的流通形式，這從該資本家之立腳點而言，不外是資本變形之最後的階段。像這樣推行擴張複生產時，資本變形之一部分是要借助於資本主義組織外的商品生產者纔能實現的。

第十一節 先資本主義的外圍之重要

依上所述的理由，資本主義的組織在資本之增殖，生產規模之擴張上，必以先資本主義的組織之外圍爲必要。資本家產出組織外的商品生產者所需要的一定的消費資料，與之交換以得來組織內的雇傭勞動者所必要的消費資料，即是與組織之外圍作一定分量的消費資料之交換，這是資本主義組織之下要使擴張複生產圓滑進行的必須條件。但是依上所述的理由，所必要的一定分量之某種消費資料與他種消費資料之交換，只是資本主義組織之內部與外部間最小限度之交通，於實際上實還有更多的交通存在；並且交通愈廣時，產業資本家愈能實現其剩餘價值之生產。即是與組織外行一定的交通，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之發展上的絕對條件；而於可能的限度內擴大其交通，這個條件更是實現資本主義的組織之迅速的發展上所不斷地要求的。

與組織外的交通，何故爲資本主義的組織之發展上所歡迎的呢？這是在前面已經反復地說明過的，資本家

是爲得利潤而生產貨物，得賣却其所生產的商品以得一定的利潤，是資本家的生產之必須條件。假如只是資本家同志相互買其生產時，到底是沒有獲得利潤的希望。例如甲資本家以百萬圓賣A商品於乙資本家，由此可得十萬圓的利潤，而同時乙資本家復賣B商品於甲，由此亦得十萬圓的利潤，則是甲於賣A商品時所賺得的十萬圓於買乙商品時損去，乙於賣B商品時所賺得的十萬圓亦於買甲商品時損去，甲乙相消，結局是同無何等利潤了。假如單從一個資本家看來，他所賣的只要比買的分量更多時，不消說，這位資本家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利潤的。但是我們是立在社會的見地上，考察資本家階級全體之利潤從何而來的，我們是不能這樣只就一個的資本家觀察；我們要把資本家階級全體作爲對象。以全資本家階級作爲觀察之對象時，資本家之生產物若全由資本家同志所購買，則資本家階級所得的利潤便無從產出。所以以純粹資本主義組織爲研究對象的馬克斯，他把剩餘價值發生之原因求之於產業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間的商品之交換。純粹的資本主義組織中，只有資本家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所以產業資本家要於資本家階級以外發賣其生產物，則不得不賣之於勞動者。一切的產業資本家以生產費以上的價格賣其所生產的商品於勞動者，勞動者以其勞動力作爲『單純的商品』以賣給於資本家；這雖作爲商品販賣，但不是資本家的生產物。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組織內所買賣的商品中，沒有資本家的生產物之性質，以生產費相當的價格而販賣的，只有勞動力這一種。資本家階級一方面把這樣『單純的商品』用生產費相當的價格買入，他方面又把自己所生產的商品以生產費以上的價格賣出，賣買相消，便有一定的剩餘價值（利潤）產出了。馬克斯於 $G - W < P_m \dots P \dots W' - G'$ 的方式內，把投入於生產手段的資本（ $G - P_m$ ）命名爲不

變資本，投入於勞動力的資本 (C) 命名為可變資本，看得只有這可變資本纔有產生剩餘價值的機能——雖然反對的學者很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純粹的資本主義之社會內，勞動力 (A) 以外的商品，都是資本家的生產物，所以某資本家所買入的生產手段 (B) 便是別的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馬克斯是把投入於這樣方面的資本作為不生產剩餘價值的，即是不變資本。這名為不變資本的原故，不是因為所投入的是在生產手段（原料補助材料機械等），是因為所投入的是在購買資本家的生產物。此外有多少地方的馬克斯之見解在此處恐怕也是能够嵌合的。例如某物是否是資本這個問題，不因該物之物理的性質而定，是因該物之社會的性質而定。與此同樣，某種資本是否是不變資本這個問題，也當得不由該資本是否是成立於原料補助材料機械之物質的生產手段之物理的性質而定，應由於該資本能否生產剩餘價值的社會的價值而定。

這樣想來，我們可以知道在純粹資本主義組織之下不得不成為不變資本的，由與組織外開通交易，便可化為可變資本的道理了。純粹資本主義的組織下構成不變資本的實質材料，如前所述，是原料補助材料建築機械等類，但此等物中至少原料補助材料之類，是先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所生產着的。假使產業資本家得購買此等物品時，則其所購入的商品 (C) 中，不屬於資本家的生產物的，不只勞動力一項了。這事是使除直接、搾取組織內的勞動者外別無產生剩餘價值之方法的資本家，得着間、接、搾取組織外的勞動者之機會了；因此之故資本中當然有不變資本的性質的，也和購買勞動力 (L) 的一部分同樣，能生出剩餘價值而成為可變資本了。資本之構成隨着生產技術之發達而次第變化，其購買生產手段的部分，必比購買勞動力的部分漸次增

加，其結果是在全資本中能生產剩餘價值的可變資本漸次減少，這對於資本主義是必然地把致命的現象所謂利潤率之遞減招來，這是馬克斯已經指摘過的；然而產業資本家從資本主義組織之外購買生產手段之物品時——不變資本遂變為可變資本——由此可以得有力的防衛。

總之，資本主義的組織下行擴張複生產時，生產為剩餘產物的消費資料之一部分的（例如棉製品），不得不賣向組織圈外，同時其雇傭勞動者所需要的消費資料之一部分（例如糧食），不得不從組織圈外買入，而組織內所生產的商品與組織外所生產的商品之交換，對於資本家總是有利的；所以資本主義組織內外之交易不會限制於上述的最小限制，也不會限制於現在所舉例的這種類的產物了。所以以純粹資本主義為前提而制出的馬克斯之資本複生產表式，嵌合在實際的事實上時，便會生出無限的錯綜。據馬克斯之表式，社會之剩餘產物於第一的生產手段生產部門作為生產手段表現，於第二的消費資料生產部門作為消費資料而表現；隨着第一及第二部門生產之擴張所生出的需要之增加，對於生產手段方面由第一部門的剩餘產物（其實質為生產手段）供應，對於新增之勞動者之消費資料，則由第二部門的剩餘產物（其實質為消費資料）供應。但是資本主義組織內外的商品交換於事實上使以上各關係全然變更：例如十九世紀前半，英國資本家的產業所產出的剩餘產物之一大部分是棉製品，此等棉製品賣出於海外，而其生產手段（C）中主要原料的棉花是由行使奴隸經濟制的美洲輸入，勞動者消費資料中主要的穀類是由行使農奴制的俄國輸入。假如我們假定一個孤立的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時，則除勞動力（A）以外的商品，都當得是資本家的生產物，例如剩餘產物中被化為資本的部分，從最

初便不得不具有適宜於資本化的物理的性質（例如生產手段之一種的原料）而生產；然於實際上所生產的，却不是適應於資本化的（例如於國內發見不出其需要者的多餘的消費資料）而適應於資本化的，非資本家的生產物，却從資本主義組織圈外流入。從美洲輸入的棉花，是奴隸制下所榨取的剩餘產物，從俄國輸入的穀類，是農奴制下所榨取的剩餘產物，雖說都是剩餘勞動之結晶，然不是資本制度下所生產的剩餘產物了。在資本制度下所生產的某部分產物遠遠輸出於海外，為資本制度圈外人所消費；資本之複生產——基於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擴張複生產——所依以運行的物的要素之某部分，却是從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的非資本制度的領域輸入而來的。

第十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的史實之左證

不嫌重複地說：資本主義的組織若於組織外沒有先資本主義的領地時，從其擴張複生產發軔之第一步，便有一部分剩餘產物不能賣出。所以圖甘——又福田博士——所說的：資本家互買其產物，可以無限施行擴張複生產而永無停室的話，這是絕對的謬誤。組織外的領土愈寬時，其所生產的資本家的生產物與組織外所生產的非資本家的生產物交換的分量愈大，則於發展上愈益順利。理論上不得不如此，便是過去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史實，也是有力地作此理論之左證。假如如圖甘或福田博士所主張，資本家同志互買其生產物得以實現剩餘價值，資本家的生產能於同階級內自作無限的市場時，則近代國家——即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國外膨脹慾，將何以說明呢？英國的資本家可在英國國內與資本家同志互行買賣，法國的資本家亦然，美國的資本家亦然，像這

樣，則各國資本家關於商品之販路應得無所焦慮了；過去之史實却不是與此全然相反嗎？然從我們的理論上看來，則過去百數十年間資本主義發展史之必然性，便巨細畢呈了。

我在此並不是想敘述這項歷史，我只就日本之社會上甚麼人都能瞠目的兩三個史實加以追想。第一，德川幕府之末葉黑船渡來是甚麼意義？是外國人本着人道主義的慈悲來替日本人開發文明的嗎？或者有人有和這種思想類似的主觀意識的，但能使他們有這樣意識的原因，正西洋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資本主義要謀自身的發展，不得不和非資本主義之組織圈域交通，這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死活問題。以此之故，所以他們不遠萬里而來，扣封鎖國之門戶而強制通商。但是資本主義好像一種傳染病，交通一開始後，不久便會把對手者資本主義化了。日本的封建經濟假使其自然的進行（除却外來之刺戟）時，恐怕還要遲緩多少年代纔能終止；然而世界交通之發展，促進了日本經濟制度之改造，自從黑船渡來以後，在日本國內究竟起了怎樣的變化呢？在都會上資本主義的工業之勃興和交通機關之發達，我們是可以舉出的。但是在這都會上所起的資本家的產業，是相互購買其產物以擴張其規模而至於今日了嗎？不待言是不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不得和組織外的環境交通。牠們暫時在鄉下找出了牠們所必要的外圍了。像我自己是在明治初年生於鄉下的人，那些資本家的生產漸次侵入鄉下的經過，在我自己的生活上也有幾分經驗。我以明治十二年生於山口縣之岩國，十四歲負笈出鄉關——在當時沒有鐵路，這句話的確是實感——入高等中學之豫科；我住在縣會的時候，身上穿的是祖母和母親親手織的布衣，我現在都還記得。我家裏有一架紡線機，在我幼小的時候，我的祖母是時常用來紡線的。此外又有一

架織布機，歸我母親使用。村上有一家紵屋（染房），把藍靛溶在幾個大缸裏，放在簷下有顧客來的時候，便應其求以渲染爲業。在家裏草花爛縵的春日的庭前，戴着老眼鏡的我的祖母把線子括好，時常攜着我的手去照顧這家紵屋。這些線子由紵屋染好後，把括線解了，便現出白痕；把這來做材料而上織機時，便織成有花紋的藍布。我在高等中學的時候，穿的和服，便是這樣手製的棉衣；但是我家裏的紡織手工漸漸廢了，紡車和織機不知幾時已高掛在倉庫底樑上，更不知幾時——恐怕因爲是永遠不用的原故——已經賣掉了的光景，現在是連形影也沒有了。這不是因爲我的祖母和母親年紀老了，不能工作，實在是因爲這樣家庭工業一般地衰廢了。去年我歸省的時候，想照一張紡車和織機底像片，在我鄉裏竟不容易發現出一架出來。這正是說明都會底資本家的生產物侵入了鄉下，把舊式的生產法滅亡了的事實。都會資本家的工業安置巨大的機械，驅使多數的勞動者，經營大規模的生產，其生產物自然價廉。這種商品底廉價，馬克斯在『共產宣言』上說過，是要把萬里長城也能攻破的『重砲』。有十分精巧便宜的線和布，無論你若何保守的鄉人，都好像奉了命令一樣，誰都把服勞製粗的手工業廢去，爭成爲資本家的生產物之顧客了。這樣使鄉下人成爲顧客，在資本家是意外不費力的事情，也是絕對地必要的事情。日本資本家的企業，和西洋諸國同樣，最初是由同國內的（從經濟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圈外的）鄉下人買其剩餘產物之一部分以完成其剩餘價值之實現化，始能實現資本之增殖與生產規模之擴張。在明治年間，日本經濟界底形勢恆爲農作之豐歉，米價之高下所左右，正因爲這個原故。前面說過，資本主義是一種傳染病，與別人交通，立刻便把別人資本主義化了。所以資本主義化之勢力次第波及於全國，現在在我的鄉裏也有中等規模的織布公司

和製絲公司了。從前向鄉裏人報知時刻的，是在山上和小學校鐘樓上的『暮鼓晨鐘』，現在却由工場底汽笛向鄉人報告時刻了。但是要把全國底農村完全資本主義化時，恐怕還要一些年代。現在也還有許多小農還是『單純的商品生產者』在生產米和絲繭之類。這些絲繭由資本家逐次買去，作為資本家生產物底原料（*Raw material*），最後製成生絲遠遠輸出外國。讀者之中閱覽過各地方所調查的農民經濟之結果的想來一定有人，據以看來，把各地方農民經濟依資本主義以計算時，每年得利的時候少，受損的時候多；但他們終還能夠維持的原故，正是因為還未受十分的資本主義化。地方小農所提出的『單純的商品』和雇傭勞動者所提出的勞動力同樣，在其價格中，不含有資本家的利潤。產業資本家一方面以不含利潤的價格購買這些非資本家的商品，他方面以生產費以上的價格販賣自己的生產物，由此而仍能實現其剩餘價值之貨幣化，資本之增殖，生產規模之擴張。

像這樣，便如馬克斯所說：『有產者階級把鄉村隸屬於都會支配之下』（*共產宣言*）。但是『對於他們的生產物不斷地益圖推廣販路的欲求，在全地球上收集有產者階級。他們不得不隨處聚居，隨處殖民，隨處做連絡』（同上）。所以幕府末期被外人強制開港的日本，隨着資本主義之發達，即攻守易地不得不在國境之外尋求資本家的生產物之販路，和非資本家的產物之供給者了。這種資本家階級之物資的必要反射於國民一般的意識而成為國家的膨脹慾，由是入明治以來還不上三十年，先起中東之戰，次起日俄戰爭，遂領有台灣朝鮮樺太，這是彼此周知的事實。我想我年逾九十的祖母假使回想到她出閣當時，她必定會和馬克斯一樣，把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看成一個 *Hexenmeister*（魔術師）呢。

資本主義的確是有傳染性的。在江戶幕府之末世，把日本門戶開放了的西洋人，不久便把日本資本主義化了。資本主義向世界各處要求門戶開放，向世界各處伸張資本之枝蔓，不久也要把世界各處資本主義化了。資本主義像這樣擴張自己的販路，而喚起競爭者，在十九世紀前三分之二期，向歐洲大陸底農民及都市之手工業者與亞細亞（尤其是印度）亞非利加等地底農民供給其棉製品的英國資本主義，其後漸漸移其產業中心於製鐵方面的，都是這個原故。這看日本底過去和現在都很明白的，資本主義在先資本主義的組織領域聚集時，最初發達的是消費資料底生產業（例如紡績業），生產手段底生產業（除農作物以外的原料底工業品機械等之生產業），要在資本主義發達到高度以後纔能成立。所以在現在的日本紡績業雖盛，而紡績機械却不得不從外國輸入。以這樣的原故，資本主義一蔓延於世界，其先進國底產業必然地從消費資料生產業上移其重心於生產手段生產業了。像英國底產業由以棉為中心的曼恰斯達時代移於以鐵為中心的百民剛時代一樣，一切資本主義的先進國之產業，都次第『由消費之衣料時代前進於生產工具的機械時代』的，全是這個道理；決不是如像圖甘與福田博士所說：『物之蓄積，不管人之消費如何，可以無限界地擴張起來』的。此等機械，決不是由生產牠們的先進國互相買賣作為『物之蓄積』無限界地以堆積於自己的工場，牠們是遠遠輸出於世界各方面，在各地受『生產的消費』以生產『人之消費』的消費財的。

資本主義的先進國把產業底重心從生產消費費用之衣料的事業移向於生產生產工具的事業的原故，是因為後進國中生產消費費用之衣料的事實已經進行了。這是資本主義的先進國於擴張販路時同時喚起競爭者的

必然之結果。『共產宣言』上，關於資本主義之強烈的傳染性以非常的勢力蔽覆全世界的光景，是以燦爛的筆致敘述着的。

『對於他們的生產物益圖擴張販路的欲求在全地球上收集有產者階級。他們不得不隨處聚居，隨處殖民，隨處做連絡。

『有產者階級由世界市場之開拓，至使世界各國之生產與消費成爲世界的。他們一面招致着保守主義者之非常的痛恨，而把產業之國民的基礎從根本上拔去。從古傳來的國民的產業已被滅亡，而於目前猶是日地地滅亡着呢！被新的產業所威脅而採用此等新的產業，這是對於一切文明國民提出的死活問題，而此等產業已不僅把本國產的原料加工，更還要使用屬於遠方的原料了；且其製品不僅消費於國內，同時更消費於世界各方面了。……舊的地方的及國民的自給自足和封鎖之狀態破除，一切方面的交易，一切方面的諸國民相互之依存以起。……』

『有產者階級依賴着一切生產工具之急劇的改良，依賴着極其便易的交通，把一切的民族乃至野蠻的民族都引入文明之域。他們的商品之廉價是足以粉碎一切萬里長城的重砲，他們以此征服野蠻人底頑固的排外心理。一切的民族假如不想滅亡時，他們使他們不得不採用有產者階級之生產方法；他們使一切的民族不得不輸入所謂文明，即是強制他們使自行成爲資本主義者。一言以蔽之，他們是準依自己的形態製造出一個世界 (Mit einem Wort sie schafft sie einen Welt nach ihrem eigenen Bilde)』

就像這樣的光景，資本主義乃是「由世界市場之開拓至使世界各國之生產及消費成爲世界的 (kosmo-politisch)」。一切的國度，只要採用資本主義的產業時，便歸屬於資本主義之領內，而成一個世界的社會。此社會中屬於先進國的，專從事於生產手段之生產，屬於後進國的，專從事於消費資料之生產，這個事實，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業分爲生產生產手段的第一部門與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門底具體化罷了。

第十三節 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必然的停窒

本論失之過長，所當論的問題雖然還有，但我現在要漸漸作結論的準備了。

照前面所述之看來，資本主義的組織爲經營「擴張複生產」——資本之增殖——上，常要有非資本主義的組織之外圍。與普丁氏所謂「領外」之「顧客」相交易，是資本主義發展上之必要條件。此處所謂資本主義的組織之領外，是指經濟上屬於其組織外之領域，例如政治上雖是同屬於一國底支配之下，而單純的商品生產者如手工業小農之類，都是「領外之顧客」。列寧把現在存在於俄國的社會經濟層之要素分舉爲：(一)族長的，即程度最幼稚的，農民生產，(二)小規模之商品生產(包含拍賣五穀的農民之多數)，(三)私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之五種。此中第一與第二，便是先資本主義的組織之領域，即屬於資本主義的組織之領外。反之，即政治上雖別隸於異國底支配之下，只要是依資本主義而組織的，其國別之生產與消費成爲世界的 (kosmo-politisch)，世界地製作了一個社會時，便是統合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組織之領內。日本底資本家發賣其商品於鄉間的農民，其農民即是住居於日本國內的日本人，在資本主義底立腳點上看來，也是屬於與領外的交易。假使同

樣的資本家與英國資本家交易時，雖是國度不同，然在資本主義底立腳點上看來，却明明是領內之交易。資本主義常於這樣的意義上要求其『領外』之顧客，然而逮資本主義與其領外交通時，即資本主義化其領域以歸入於資本主義之領內。資本主義同化其所接觸之物，『準依自己的形態』把全世界資本主義化。由是資本主義之領內隨其發展而日見擴張，其要求領外之顧客也日益加甚，然同時與此要求之進增成反比例地使領外的地域日見狹窄了。地球之面積有限，世界之住民有限，資本主義日日擴張其範圍，使日日逸失其彌縫內在的矛盾之手段。無限的資本之增殖，無限的生產規模之擴張，使全世界包含於資本主義之領域內時，此時資本主義之發展達到極度，然同時其屬於領外之外被全失，於是乎資本之複生產便不得不絕對地停窒了。

我想到這資本主義之必然的停窒時，總要連想到我寓居庭前的一株李樹上所湧出的毛蟲。這株李樹，每年初夏之際，總要湧出許多毛蟲，看着看着便漸漸長大了，落糞的聲音如像下雨一樣。因此，絕好的樹蔭竟沒有人敢於走近。及到盛夏的時候，毛蟲以加速度地肥大，樹葉也以加速度地稀少。於是乎每年的成例，毛蟲們便不得不沿樹而下，飄流於四方，爬上廊椽的亦殊屬不少。到這時候再不能坐視了，只得闔家協作開始殺蟲的行動。這真是不快意的事體，我的老病胃癆癱每有因此而激發的光景。這雖是閑談，但那一大羣的毛蟲，蕃榮之極，便不得不遇着一次大崩壞底運命。這件事情，總要示唆我以資本主義之必然的崩壞。毛蟲就是資本主義，其周圍青青繁茂的樹葉，就是資本主義底領外之顧客。如圖甘和福田博士所說：毛蟲如能互相蠶食，或互相食其排泄物而能發展時，毛蟲也可以 *ad infinitum* 地發展，『只有愈見肥大，愈見擴張前進的必然性』，然而無奈牠們要發展自身，却不得

不蠶食其外圍。過去了的世界大戰爭，便是佔據在一株李樹上龐然肥大了的英國資本主義，德國資本主義，法國資本主義，美國資本主義，乃至日本及其他的資本主義，這一大羣的毛蟲們，因為樹葉稀少了，受了脅迫，彼此纔不願一切互相爭嚼起來了的。他們不久從戰爭底創痍恢復了的時候，世界上將又要起怎樣的變化，我們幾乎是可以有數學的精確程度以逆睹了的；但是假如我們是錯誤了的時候，我敢爲人類前途祝福。

要之，馬克斯底資本複生產表式，以數學的精確程度指示我們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到頭不得不停室的原由；純粹的資本主義之組織，在世界上不會有過，然而馬克斯從極複雜的現實世界抽象出資本主義之特徵，『從種種足爲障礙的附隨狀態脫離而理解其純粹性』，以這樣的方法，使我們不得不覺悟到純粹的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擴張複生產於其發軔的第一步便不得不絕對地停室，這真是他學問上的一個最大的功績。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地理解現實的資本主義之組織終必有不能不停室的運命。希望資本主義的組織不停室的人們，不消說是不不少。此等人們就譬如爲不治的病患所感染的患者，對於生之執念死不放鬆，於種種理由之下欺瞞自己而強作樂觀，結局更信到自己的病患終可療治而四處向人宣傳，像這樣被主觀的希望把客觀的觀察遺誤了的人們，也是不能說沒有的。但是只要把這樣的病人除去，馬克斯之科學的研究之歸結，是超越了一切人們主觀的希望，把資本主義的組織之必然的停室極客觀地論證了的。從主觀意見爭持之渦中把事實之認識救了出來，這實在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斯之偉大的貢獻。我因有這樣的解釋——因爲相信馬克斯之資本複生產之表式打破了資本主義之必然的停室得以明瞭地論證的一座關門——所以我說『立脚』於該表式而反證得資本主義

之無限地不停室的圖甘，並不是立脚於馬克斯之理論，只是完全地立脚於其誤解。

第十四節 結論

將要擱筆了，我再把前後數節的要點摘錄於次：

第一，生產手段是在作為生產消費資料的手段上纔有意義的。生產手段之生產增加必然要增加消費資料之生產（這不待言是關於全資本主義底範圍內的考察）。從而證明福田博士所主張：消費資料之生產即使減少，生產手段之生產可以無限地擴張之說之為誤謬。

第二，奴隸經濟制下，奴隸之消費雖使減少，社會全體之生產可以無礙地進行，然此事實不能適應於資本經濟制；以為兩者之間是可以起同樣的事實的，是沒視了兩經濟制本質上的差異之推論。

第三，博士所利用的圖甘之數字表，是『匿證伴爭』之標本。

第四，圖甘雖稱為立脚於馬克斯資本複生產之理論，其實不過是立脚於馬克斯理論之誤解。

以上是我對於福田博士論文所下的批評之論點，現在我敘述這些論點怕往往有失禮的地方，但是福田博士特別寄書於我，以為受十分之批評，是著書者底本懷，毫不責其非禮；並且於其著第十四版底序上更約束着說：『我異日經過十分的推敲……對於種種的批評，當盡微力所及十分拜答，』像這樣也是我們批評他人論著者底本懷了。臨末，我要感謝福田博士新著之刺戟使我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必然的停室之理法』得了一番說明底機會。

第三章 資本積聚之必然的傾向

第一節 資本之積聚集中與堆積

資本之積聚次第以加速度進行，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下的一個必然的傾向；本章即以說明此事之理論為目的。

此處所用的資本之積聚（concentration of capital）一語，意義是使用於一個單位事業的資本分量之增大。事業之規模是隨所使用的資本分量之增大而增大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說資本積聚有必然的傾向，是等於說事業之規模有逐漸擴張的必然的傾向。然而使用於某一單位事業的資本分量之愈見增大，即此處所說資本之積聚，與某一資本家所掌握的資本分量之愈見增大，即資本之集中（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是兩件不同的事項。例如某種事業以大規模之組織而經營，屬於其事業的股份由多數股東所分有時，則資本積聚所行的程度內，資本之集中是沒有的。

馬克斯之用語中，於資本之積聚（concentration）資本之集中（centralization）外，還有一個類似語資本之堆積（accumulation）。

〔譯者註〕此處原作者本有一段小註說明他選用譯語的理由。accumulation 一語，作者最初譯成『集積』，後復改爲『蓄積』，以爲『蓄

積』比『集積』好，可以與 concentration（此字作者亦譯『集積』）區別。但我覺得原作者底兩個譯語都很曖昧，我現在改譯 accumulation

爲『堆積』，concentration 爲『積聚』。

此處所謂資本之堆積，是與資本之增殖相同，這已於前章的論文中屢見。資本家不消費其全部所得的剩餘價值而資本化其一部分時，新的資本爰以形成，這便是馬克斯所說的資本之堆積。

在馬克斯時代，股份公司之組織還不甚有力，所以他於資本之積聚不以一個事業爲單位而考察，是以一個資本家爲單位而考察的。由此，他說資本之積聚有兩種：一種是一個資本家由堆積而形成的新資本所生的，又一種是一個資本家掠奪別個資本家所有的既成資本而成的；前者單稱爲積聚，後者與此區別，稱爲集中。據他的想法看來：資本之積聚有由堆積而來的，有不由堆積而來的，便特別命名爲集中了。現在，資本之堆積如行時——其資本只要是作爲產業資本使用的——生產規模之擴張便隨之而起。生產規模之擴張即是所以行資本之積聚的。從這一點上說來，資本之堆積和積聚，幾乎是一樣的了。所以馬克斯也說過：『一一的堆積是新的堆積之手段。牠（資本之堆積）使作爲資本活用的富之分量增加，同時使個個資本家手中的作爲資本活用的富之積聚擴大，從而擴大大規模生產之基礎及資本家的特殊生產方法之基礎。……此種之積聚——直接本於堆積的或寧與此同一（identisch）的此種之積聚——有兩點爲其特徵云云。』這樣地一個資本家爲自行堆積資本之故，屬於該資本家所經營的一定事業的資本之積聚量增大，馬克斯又曾稱爲『單純的與堆積同義的積聚』（einfache, mit der Akkumulation identische Konzentration）。但是積聚之中有不屬於這『單純的與堆積同義的積聚』的，『那是素來形成了的資本之積聚，此等（資本底）個別的獨立性之廢止，資本家對於資本家的掠奪，多數小資本家向少數大資本家之轉化。此種過程，以素來存在的或素來作用着的資本分配之變

更爲前提，而其範圍爲社會富之絕對的增殖或堆積之絕對的限界所限制，在這樣的兩點上，與前述的過程是不同的。資本於一方面從多數人手中喪失，以此得於他方面於一人手中劇甚地增大。這便是與堆積和積聚有區別的本義的集中，『資本論一卷五八九——五九〇頁』。依此等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斯所用的資本之堆積，積聚，集中等語，是賦有怎樣的意義的了。

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就股份公司之組織甚形發達之今日而言，資本之積聚由其堆積或集中而進行之外，還可以由別的方法進行；所以我們使用這些用語時，以不必依着字面去解釋馬克斯之說明爲便當。即是我們此處所說的資本之積聚是使用於某一單位事業的資本分量之增大，從而其事業規模之擴張；其資本如何增大，或屬於何人，在所不問。而所謂資本之堆積，意思是新資本之形成，從而其增殖；所謂資本之集中，意思是掌握於某一資本家手中的資本分量之增大。資本之堆積，集中，積聚等問題，固然互有密切的關係，然如前述，本章所論的是資本積聚之問題，不是堆積和集中。

第二節 所謂結合生產費之理論

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下，使用於一個單位事業的資本分量有益見增大，其事業之規模有益見擴張的必然的傾向。我現在要說明這件事實，我和說明剩餘價值時所採取的態度一樣，想採取從價格論上去考察牠的態度。值此之故，我不得不先說明『結合生產費』之理論。這對於資本積聚問題好像全無連絡一樣，然於說明此問題時，而我以之爲前提，在對於經濟學有素養的讀者，恐怕要起奇異之感了；但是本章的論文，便是要對於這個態度說

明個所以的。

結合生產費 (Joint cost) 之問題，素來是吸引着學者之注意的。普通所謂結合生產費，是兩種以上的貨物之生產費相互結合的意思。即是由於一定的作業，兩種以上的貨物同時生產，在這樣關係的時候，個別的生產費不能計算，只好把這些貨物之生產費不可分地結合於一定的金額之下；像這樣種類的生產費，普通稱為結合生產費。素來吸引着學者之注意的，便是這樣意義的結合生產費。我現在想把牠的理論比從來所行的還要在廣泛的範圍內擴張起來；但為說明之便，我還是先從普通的結合生產費說起。

兩種以上的貨物由一定的作業同時生產，有這樣關係的實例殊不缺乏：例如牛肉與牛皮牛角，又如羊毛與羊肉，或如一座礦山同時產出金銀銅錫等，或如煤氣，骸炭，亞母尼亞液與炭脂，或如油與油酪（作為肥料用的豆滓），豆腐與豆渣，這些都是在結合生產費下所生產的。

此等結合生產費中有完全地全部結合的，有不完全地一部分結合的兩種。完全的實例，譬如棉花與棉實：要產棉實時同時不得不生產棉花，要精製棉花時同時也不得不淨去其棉實，即是從最初種棉時起至最後打棉時止，其間生產過程全部之費用，必然地對於棉實與棉花二者是不可分地消費了的。然則在這樣的時候所生產的不同種類的各種貨物之價格，與結合而為一體的結合生產費究竟有怎樣的關係呢？假使關於其生產是十分行使着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之守護神——的時候，所生產的兩種以上的貨物之價格合計時，正與結合生產費相當——此處所謂生產費，是指最廣義的生產費，即是狹義的生產費上加以一般所謂利潤，我自己把從狹義的

生產費中更扣除其剩餘價值相當的資本之利子，是稱爲最狹義的生產費的，但是此等問題暫不深入——並且在這樣的時候，問到結合生產費以如何的比例分配於二種以上的貨物之價格時，這是以對於此等貨物的需要之強弱爲比例。美國經濟學家韜西格氏之『經濟原論』上所述，取棉花一磅時取棉實二磅，然自一九〇三年至八年的平均價格，棉花一磅二角，棉實一磅一分。假使棉花之生產是在自由競爭之下經營着的時候，便是棉花一磅和棉實二磅之結合生產費（狹義生產費加利潤）約二角二分。即在二角二分之結合生產費下棉花一磅與棉實二磅同時產生，然對於棉花的需要強，其生產費之大部分便歸由棉花之價格負擔了。

有這樣的原故，假使結合生產物中對於其任一種的需要增加時，則他種物品之價格便因之而下落，這是普通的現象。例如對於棉花的需要增加，則臨時棉花之價格不得不騰貴；而棉實一方面假使牠的需要狀態沒有變更，則因爲棉價騰貴之故不至受何等直接的影響。但是關於棉業之生產是行自由競爭時，棉價騰貴，則增加其生產額，棉額增加，則棉實之產額亦不得不隨之而增加。所以對於棉實的需要即使和從前無異，而因供給增加之故，則棉實價格自亦不能不低落了。又此等物之生產要擴張到二者價格之合計恰與結合生產費相當的程度纔能終止，此時棉實價格當然比從前低下，從而棉花之價格當然要比從前騰貴了。所以結合生產物之一種的需要增加時，其結果是兩方底產額增高，其需要增加的一種之價格騰貴，而他種即使需要無變，因爲供給增加之故，價格必至下落。

以上所述，是結合生產費中之完全的並且是最簡單的一例，其實在許多的事實上，向各生產物各有其特別

生產費若干，生產費之結合不過是其一部分。例如牛肉與牛皮之生產費大部分雖是結合，但離脫皮肉以後，肉則不得受一番整理，如裝入罐頭時更不得不加特別的工夫，皮亦不得受鞣製，使適宜於種種的用途。像這樣爲這等事宜所生出的用費，便是不屬於結合生產費的特別生產費。這種特別生產費不得不由各種生產物各由其價格之內負擔，換言之，即是特別生產費與各生產物最低價格之界限相當。各生產物之價格決不會低廉到這特別生產費以下。假使連這特別生產費也不能取償時，生產者便寧肯放棄不顧，不再作爲商品以耗特別費用。然則各生產物之價格會達到這特別生產費之若何程度上呢？這和前面所述的完全同樣，便是由各生產物以若何比例分擔結合生產費而定奪。

第三節 固定資本之使用與生產費之結合

以上所述，是普通經濟書上所說的關於結合生產費的理論。因爲牠是異種類的兩種以上之貨物（或勤勞），由一定的作業同時生出的問題，所以一見好像很狹隘的光景。但是仔細着想時，我們覺得這同一的理論在多少程度之內可以適用於今日的產業界之全部。因爲無論何種事業沒有不使用固定資本的，而固定資本之重要隨技術之進步益見增大，但這固定資本是以往復效用於多少次生產行程爲其特徵的，所以在固定資本（例如建築機械等）創設上所費去的支銷，對於綿互數回或數十回生產行程所生產的貨物（或勤勞）可以看作形成了一個不可分的結合生產費。這不是異種類的貨物（或勤勞）由一定的生產費同時產生，是同種類的貨物（或勤勞）由一定的生產費異時產生的，與普通所謂結合生產費雖然稍異其趣，然我以爲在這樣的時候，同樣的理論

也是當得適用的。

需要固定資本額最巨的事業，我們且舉鐵道經營爲例罷。例如日本的鐵道投資總額在一九一九年度達到十四億圓了，其結果軌道延長約一萬哩，機關車（車頭）約三千一百輛，客車約七千五百輛，貨車約五萬一千輛，此外還有車站倉庫等種種之貨財。此等均有固定資本的性質，其中尤以佔主要部份之軌道費爲最。既有固定資本的性質可以經久使用，則由此等投資所生的費用，歷經無數回的營業期便至有結合生產費的性質。軌道之建設實耗極大之費用，譬如台灣鐵路之工程，在當時軌道一尺約費四百圓，但費去如此的費用也還能合算的，是因爲能够經久使用的原故。一尺約費四百圓的軌道，如只能經得一回的使用時，鐵路運費自然會異常高價，無論若何的富豪，就要想由火車旅行，恐怕都是辦不到的了。在這兒好在固定資本有一種特徵，最初建設時雖費極大的金錢，然一旦建設後可以繼續地經耐長久的期間，因此所耗費的費用可使長期間中所運載的乘客與貨物負擔，其結果致使火車旅行比用東洋車旅行還要便利了。這樣不過是最初軌道建設上所耗費的費用，對於長期間中所運載的無數的乘客與貨物成爲一種結合生產費之半面。不僅鐵路敷設費已經有這樣的性質，便是鐵路營業費也有同樣的性質。普通的鐵路營業費有總務費，護線費，車輛修繕費，運輸費之四項，然其大部分都是形成一種不可分的結合生產費的。例如車輛修繕費中修繕機關車所用的費用——平常多有以同一機關車牽引客車和貨車的時候——其大部分對於貨物或乘客，終不能分別地計算。其他的營業費雖然有程度之差，然大抵也是一樣；即是只有一小部分的費用作爲乘客或貨物所費的特別費用，可以各別地計算；其特別費中之更一小部分作

爲爲某種類的乘客或某種類的貨物所費的特別費用，可以分別計算而已。據英國阿克羅斯於其鐵道論所記述：一定的時期內鐵道全體費用中約三分之一是常費（constant），其他三分之一依運載（Traffic）之多少而增減。又從長期上說來，總費中約二分之一是常費，餘二分之一依運載之多少而增減。其依運載之多少而增減的部分之費用，形成所謂特別運送費，嵌合在前述的牛肉與牛皮底例中，便是與切離皮肉後對於肉的處理和對於皮的鞣韌等所要的特別生產費相當的。

像這樣，鐵路費用之大部分有不可分的性質，所以各種貨物或乘客之運價以其特別費爲最低限度，自此以上，便是依所謂 *The principle of charging what the traffic will bear*（應能原則）而決定其高下了。即是負擔能力輕的，運價從廉；負擔能力大的，便比較地課以高價，藉此不僅可以收回其特別運輸費，便是一般營業費之大部分也想藉以收回的。關於鐵道運費上有這樣的原則支配，所以雖是同距離的運送，貨物之性質不同，其運價便有雲泥的懸隔。例如木料，石料，石炭等，比珠寶類，鼈甲，珊瑚，象牙，綾絹等之運價低廉得很遙遠了。又如同是一種小行李，在號房過磅的時候，照日本現行運價而言，第一種貴重品是通常小行李底兩倍，第二種貴重品是通常小行李底三倍。此等現象，和棉實與棉花以不可分的生產費生產，而棉實價格不過棉花的二十分之一的現象是同一的了：這是不待縷述的了。換言之，即是前述的結合生產費理論之一適用。

與鐵路同樣的現象，輪船上也有，我可以不要說明了。但我現在想就與此等運送機關有類似性質的郵政機關再說明一二。在日本現行郵政之下，普通郵件分爲四種，郵稅率是各別地定妥了的。其結果通常信郵稅二錢

(合中國三分)每超過一定分兩時遞加三錢；而報章等印刷物，其容積與重量即使超過通常信若干倍，譬如幾百頁的雜誌也只消三錢以下的郵花。這和在結合生產費下所生產的棉實與棉花價格遙遙相異的是同一的道理。譬如郵件底配送，同是一樣的郵差，無論新聞雜誌信札是同裝入一囊，同時配送，這一的費用到底是不能分別計算的。換言之，便是一切的費用幾乎都是結合着的。所以根據結合生產費之理論，在郵稅決定上也有應能原則，一方面負擔力多的信札便比較課以重稅，他方面負擔力弱的印刷物便比較課以輕稅而已。

與本論無甚關係的事體，因為順便之故，在移入於次節的問題之前，在此想附說一句。前面說過的，生產費結合着的時候，一個貨物底生產費究竟需要若干，實際上到底是不能計算的問題，而同時從事於這等物品底生產和運送的人們，其勞動力在全體的結果上究竟有若何的貢獻，這也到底是不能一一計量的。像這樣，一方面許多物品底生產費綿互於一個事業之全體不可分地結合着，而他方面許多人底勞動力也在一一的成果上不可分地結合，其結果究竟某種物品底生產費用了許多，某人底勞動力有若何的價值，都是不得而知的；由是像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各盡所能』之根本原則，便自然不能不實現了。例如投寄郵件，是信札時照付所定郵稅三錢，便各人得應各人底欲求，無論寄到隣近，或寄到海外，都是一樣；又如寄送新聞時只消五釐，寄信時要三錢，各應其負擔能力，以分擔全體的費用。這雖在極微弱的程度內，然已有幾分深遠的暗示。

第四節 一般工業與結合生產費之關係

以上所述的鐵道一例，其運送物中有乘客及貨物之區別，而貨物之中，種類尤極繁夥，所以結合生產費之理

論之能夠適用，也還比較明瞭；但說到一般工業上來，則其關係便不若是明晰了。然而前面已經說過，凡是需要巨額的固定資本的事業，其固定資本之金額愈大，則結合生產費之理論對於其所生產的貨物之適用更廣；並且想闡明這個命題，正是本文底主旨。固定資本之特徵，是於長期中能效用於多少回的生產行程的，例如機械，例如建築物，是可以經耐數年或數十年底使用。從而牠們的購買費或建築費，綿互數年或數十年間，對於利用牠們所生產的無數的貨物，便形成結合生產費了。既是互數年或數十年間而形成結合生產費時，則在數年或數十年間之某時期中，其全部的結合生產費可以收回；所以對於某特定期間內所生產的貨物，此等費用即不全使負擔，僅以足償其特別生產費的價格，便能夠應其供給。這個關係和普通所謂結合生產物中之某物——例如和牛肉同時產生的牛皮——僅以足償其特別生產費的價格便可以發賣的，大體上是同一的道理。不消說，普通所謂結合生產是異種類的貨物以一定的結合生產費同時產生的；假如結合生產物中一物之價格負擔全部結合生產費時，則他物只以足償其特別生產費的價格便可永續地生產；然如以下所述是一種類的貨物於一定的結合生產費下異時而生產的，此物之價格要永續地止於僅足償其特別生產費的程度時，到底是不能夠。這個不同處在後面當更詳述。

需要固定資本大的事業，所生產的貨物依必要上有低廉到僅足以償其特別生產費之價格的時候，這樣的事實，我想舉輪船公司在同一航路上競爭時船價極端的低減以爲例。輪船公司開始競爭時，船價極端低減，例如下等船客之船票，把航海中飲食底費用減去，所剩的有幾乎無幾的時候；這樣的現象怎麼會起的呢？這是輪船經

營者受了競爭壓力之強制，只要勉強可以收回特別運送費的程度，便可以不再苛求的原故。在輪船建造上已經投了莫大的資本，此外還要有種種的設備費，由船長以下至水夫還要雇用若干人，要燒煤炭，如此而由甲港到乙港地作定期的航海，船客即使收容無數，即使一人也不收容，於全體的費用上全無變化。依乘客之多少而生變化的，只是屬於所謂特別運送費的項目，例如乘客底飲食之類，只是極有限的。所以從輪船公司方面看來，無論船價如何低廉，只要除補償此等特別費之外還可以多少有些剩餘時，多吸收得一個乘客，總比全無乘客的合算一些了。輪船公司開始競爭時，乘客底船票低廉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正是這個原故。

一般的工業，也和輪船鐵道一樣，在外行底眼中雖然不甚彰著，而在同業者間的競爭仍然可以引到全然相同的結果；競爭劇烈時，生產物之價格有低降到僅足以補償特別生產費的時候。但是異時生產的同種類的貨物之結合生產費與同時生產的異種類的貨物之結合生產費不同，綿互於長時期間，僅以足償特別生產費的最低價格收回而猶繼續貨物之生產，這非有豐富的資本者，營業上終是不能支持；即使有豐富的資本，要永久繼續這樣的狀態時，到底是不可能的。何以故呢？因為這是永續地使人斷念於固定資本之收回及由此獲得利益的，這樣的事情與以營利爲目的的事業之精神到底是不相容的。

我現在想引斯泰因美池底設例來更明瞭地說明此理。例如有一定的工業，其投資額每一〇〇圓每年有五〇圓之收入，其處分之內容如次(Steinmetz, America and the New Epoch, 1916, Chap. III.)

工 銀.....九

燃料費	六
其他之原料費	一一
租稅	三
減價預墊	六
利子	五
分紅	六
剩餘(積蓄金)	四
	一〇

此等項目中燃料費之全部，工銀及原料費之大部分，以及減價預墊金之一部分，是隨所生產的貨物分量之增加而增加的；事業一中止時，其全部亦即消滅。像有這樣性質的費用暫且命名為比例的支出，這與前述的特別生產費恰恰相當。例如牛肉與牛皮是有結合生產物底關係，屬於結合生產物之一項的牛皮即使棄而不顧，在畜牛上也是不能不要一定的費用的，但是牛已養成，皮肉已離脫後，精製牛皮上所要費用，即是牛皮底特別生產費。這項費用因精製牛皮而發生，若中止時，則亦全部消滅。然於前揭諸項中，若租稅及利子之全部，減價預墊金之大部分，和工銀原料費之小部分，無論以全力從事，或行若干制限，或至全部中止，於事業上終是不能不用的。這種費用暫且命名為固定的支出。這和前述的結合生產費恰恰相當。例如牛肉與牛皮的結合生產物中，牛皮即使棄而不顧，在畜牛上所需的費用仍無何等的變化。於此把前揭的費用以比例的與固定的為標準而分類時則如次：

比例的支出 固定的支出

工 銀	八					
燃 料 費	六					
其他原料費	一〇					
租 稅						
減價預墊金						
利 子						
合計	二六	一四	五	四	三	一

合計四〇(此外分紅及積蓄一〇)

在這兒，假使把生產全部中止時，對於投資額每一〇〇圓可以節省二六圓的比例的支出屬於固定支出的。一四圓依然是必要的，這要算是全部損失了。像這樣的狀態繼續七年時，全部資本便為損失所蝕盡（ $\frac{100}{14} \parallel 7$ ）。所以一旦投下資本着手營業以後，對於其所生產的貨物即使無十分的需要，從而不能以相當的價格發賣，要中止全部事業以待世間需要之增高，終不是可以容易地辦到的。現在假定所生產的貨物賣不上五〇圓只能賣三三圓時，

$$40 \text{ 圓 (不加利潤的狹義的生產費)} - 33 \text{ 圓 (收入)} = 7 \text{ 圓}$$

便是對於原本每百圓年年有百分之七的損失。這樣的狀態長久繼續時，經過十四年，全部的資本便被耗盡（ $\frac{100}{7}$ ）。

但是比較中止全部事業時，年年要招百分之十四的損失的，還要有利益了。於是貨物之價格即使比全體生產費四〇圓還要低賤，低賤到三三圓，事業依然是要繼續進行的。即是一旦投下資本開始營業，爲競爭之故生產物之價格即使慘落，落到某種程度不怕就受損失，但比把全部事業中止時還要有利。現在暫且計算來一看：生產物之價格爲三五圓時，則年招百分之五之損失，二十年耗盡資本之全部；價格爲三〇圓時，則年招百分之十的損失，十年耗盡資本之全部；價格更低落到二十六圓時，則年招百分之十四的損失，七年耗盡資本之全部——到此纔與中止全部事業的結果相同（在這時候輪船停在碼頭上中止運轉）；在未達到這個程度以前，即使受損，也以繼續營業爲有利（輪船以極端賤價吸收乘客時與此相當）。

以上所述到某種程度雖受損失猶以繼續營業爲有利的道理，在事業底經營上需用巨額的固定資本愈多時，愈見有力。這事是指明從前的粗笨的生產費說全不適用於現代的經濟界的。自由競爭行使到十分時，物價再也落不下牠的生產費（狹義的生產費加世俗所謂利潤）；這是從前的見解；但是事業經營上其所要的固定資本愈多，則競爭爲物可以把物價推到生產費以下。即使物價賤落到生產費以下，然一旦已開始營業後，本前面所述的理由，當然是不能不繼續營業的。而且在這種狀態之下繼續營業時，早晚會把全部資本耗盡。所以競爭之結果，資力之薄弱者便先受失敗，爲資力雄厚者所併吞而自行破產，或則——競爭者之資力互相匹敵時——互相聯絡或合同，以避相互間之競爭。像這樣，事業之經營上所要的固定資本巨大時，競爭必然地招致獨佔。合同不是妨害競爭的原因，是因競爭而起的一種結果。資本主義之組織，其自身有排斥競爭的素質存在。

我們想來，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底守護神。生產上資本主義之一切的長處，在行自由競爭的前提下纔能保證。然而如上所述，一定的事業上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額愈多時，則同業者間的競爭必然地激起。即使競爭激起，然其結果亦必然地依馬克斯所說的素來形成了的資本之『個別的獨立性之廢止，資本家對於資本家的掠奪，多數小資本家向少數大資本家之轉化』的過程，競爭爲物，使盲目招致其廢止。然則一般生產界的固定資本之重要有若何的傾向呢？機械之發明及其應用範圍之擴張，與其他技術的進步，以急激的氣勢在使堆積爲固定資本的生產手段之分量增加。凡是可以目爲重要產業的近代工業，幾乎沒有不擁有巨大的固定資本的。幾乎一切的重要產業都以巨大的固定資本爲必要，而以巨大的固定資本爲必要的產業因而纔能爲重要產業。像這樣的光景，資本主義之發展，其必然的傾向之一，是在排除一切重要產業上的『自由競爭』。前人以爲由資本主義守護神『二隻不可見的手』之作用，使基於個人底營利動機的自由競爭可以不期而增進社會全體之利益，這是一場舊夢了。事業之經營上其性質以固定資本爲必要者，小規模的事業必然爲大規模的事業所壓倒。於是乎個個之企業膨脹——個個之企業聯合 (cartel) 之類——個個之企業合同 (trust) 之類——最後到現在最高形態的混合經營——這便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下的資本積聚之必然的傾向之歷史的表現。

競爭廢而獨佔起，小規模之事業廢而大規模之事業起：這是資本主義組織內的自壞作用，資本主義組織自身是自動地準備着向社會主義推移的需要。最巨額的固定資本的鐵路，在許多國度裏面已經早歸國有，這是水向東流的證據了。以『自由競爭』替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者，究竟是何所見而云然？

中篇 社會組織與個人之生活

第一章 奴隸制與雇傭勞動制

人之生活，沒有不以他人爲手段而利用的。以他人爲手段而利用的事實與人之生命萌芽時同時萌芽。人之生命最初是賦與於胎兒之形，胎兒卜居於母體，於此吸收母體之營養以自營養；這完全是寄生蟲，不費絲毫的代價，把自己生活上所必要的資料從他人奪去。已經成爲嬰兒而呱呱墜地，最初所要求的食料是母乳，母體仍然爲嬰兒供給食料之工具而被利用。像這樣兒女以父母爲手段而利用的機會，後此尙當長久繼續。但是這樣的事實是父母於以自體爲兒女生活之手段上實現自己的目的，事情是自發而起的，在此不生強制之必要。

人們違反他人底意志欲以他人爲手段而利用時，強制之必要於以生出。這樣的強制在經濟底目的上廣行於社會，其固定成一種之制度者，大別而言之，可以有奴隸制及雇傭制兩種。現在我欲就二者之異同而考察其大體。

第一節 奴隸與雇傭勞動者之異同

林康曾經說過：『一種階級向他種階級說道：「你們工作吃苦以求麵包罷，我們要吃麵包。」像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奴隸社會。』在這樣的意義內，今日的勞動者有時也稱爲雇傭奴隸（wage-slave）。然而這是通俗的用語，學問上所稱爲奴隸的，意義更狹隘。『產業組織的奴隸制』之作者（一）說道：『奴隸可以定義爲：奴隸者是他人之

財產或所有物，爲他人所強制而工作的人。」我們依此定義看來，則奴隸與雇傭勞動者間有不少的區別了。

(1) Niebuhr, *Slavery as an Industrial System*, 1910, p. 8.

第一，奴隸是他人底所有物，雇傭勞動者則不爲他人所有。奴隸是作爲物品的人，奴隸雖與其主人在一定的關係之下生活着，其實和牛馬與其所有者在一定的關係之下生活着的一樣，奴隸與主人不是共成着一個社會。奴隸與主人的關係是物理的關係，不是社會的關係。牛馬非其所有者底社會之一員，同樣奴隸也非其主人底社會之一員。構成社會者只是奴隸底主人，奴隸是橫在該社會外的『外界之物體』。然而雇傭勞動者與其主人同構成社會。他的雇主是社會之一員，同樣他也是社會之一員。他不是橫在社會外的物體，他是存在社會內的一個人格。在這一點上，雇傭勞動者與奴隸異其性質。

第二，奴隸爲主人所強制而工作，雇傭勞動者不受甚麼人底這樣的強制。他沒有一生定要限制在一定的雇主之下工作的必要。他不高興時，可以捨甲主而就乙主，更可以捨乙主而就丙主，這都是他的自由。並且不求雇主以就一定的勞動，也全是他的自由。所以他又稱爲『自由勞動者』。

有這樣的區別，雇傭勞動者當然不是奴隸。但是他往往被人稱爲雇傭奴隸的原因，是因爲他有許多地方與奴隸相似。

第一，雇傭勞動者賣自己的勞動於他人，他雖不是把他的身體——生命——蕩賣了，但是把牠零賣了。在現今的社會上，我們的生活所必要的一切物品，都以『買』的形式而得來的，但我們買物時不得不賣一定的物

品以得購買上必要的資金。所以除去自己的勞動力無物可賣的無產者，爲維持其生計，不得不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成爲勞動者。勞動力販賣者與別的商品之販賣者不同，其自己的身體不得不屬於買主支配之下。別的商品離身體而存在，販賣者賣與他人，只是使該物離開自己之支配以歸於他人之支配而已；勞動力是人體底活動，當然不能離開身體而販賣了。既是賣自己的勞動力使歸於他人之支配下時，在發揮所賣的勞動力期間內，自己的身體亦不得不同時歸於買主支配之下。所以賣勞動力的事情是一時的賣身。雖不是一生中賣其生命底全部，然在雇傭中從事於一定勞動的時間內，那一段的生命是零賣了的。在這一點上，雇傭勞動者與奴隸之異同與房屋之買賣和借貸之異同相等。出賣房屋者是賣房屋之體，出租房屋者是賣房屋之用。然賣房屋之用時不能不把房屋之體委諸買用者底支配之下。租房屋的人，在其租借期間是該屋底所有者。與此同樣，奴隸是賣體者，雇傭勞動者是賣用者，其差只此，然而離體無用，勞動力之買主是勞動力之所有者，自然是該勞動者之所有者了。即是奴隸一生中爲主人之所有物，雇傭勞動者於被雇期間內是雇主一時的所有物。在這兒雖有一定的差異，然也有一定的共通。

前面說過，奴隸是爲他人所有的物品，不是社會之一員；但與此同理，雇傭勞動者賣其勞動力，爲其雇主一時所有的目的物，則在若爾時間內成爲一個物，而不是社會之一員了。所有物之特徵，是沒有自身的目的，而成爲達到所有主之目的的純粹的手段。奴隸終其一生，只有作爲手段的存在。雇傭勞動者於爲雇傭勞動者的資格時，亦不過僅有爲雇主作爲手段的存在。換言之，便是他於爲雇傭勞動者的資格時，關於其所從事的產業之經營，他是

並無何等的發言權的。在營業範圍內，他是橫陳在企業者社會外的外界之物體。所以出席於股份公司之總會的股東，在這兒勞動者一人也不能出席。即是他在股東社會裏連其人格底痕影也不受承認，全然是橫陳在該社會外的外界之物體；在這一點上他和屬於該公司的機械和原料是同樣的。所謂產業自治之主張，即是把雇傭勞動者作爲一種人格應離開機械原料等而受別種待遇的要求之一表現。雇主與雇傭勞動者以同等的人格相對立時是在訂成雇傭契約以前，一旦把勞動力販賣了，一日無論八小時或十小時，在這時間內勞動者只是一個工具。但是他和奴隸不同的地方，奴隸是終日終生都是一個工具；勞動者經過一日八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時間，一旦從生產世界——即工場和公司——出到消費世界時，他則得營他自己的生活的。他所得的工資雖是有限，但他支出其所得的工資，換言時是引起一定的需要時，他在需要之世界能有一定的發言權。其發言權即使輕微，但他總是具有一個社會成員的資格。在這範圍內，他不是所有物，是得以物爲所有的人格。一日二十四小時中除去八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外，其餘的時間是他得以營「人」的生活之時間。『對於十二小時中或織或紡，或掘坑，或轉轆轤，或建屋，或用鑿，或鋸石，或運搬，或從事於其他種種工作的勞動者——這綿互十二小時間的種種工作，是值得作爲他的生活之表現，是值得作爲他的生活的嗎？否，恰得其反。生活對於他們，要在這些工作完了後，在食桌上，酒店裏，寢床中纔是開始。』(二)總之工作做完後，或在食桌上，或在酒店裏，或在寢牀上，他的生活便開始了。在這兒他脫離了爲他人所使用的物的關係 (Sachverhältnis)，而入於與人得作對等交際的社會的關係 (Gesellschaftsverhältnis)。要之，奴隸是一生中沒有其自身的生活的，雇傭勞動者失却自身的生活的，只限於工作

的時間。在這兒有一定的差異，然也有一定的共通。

(11)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 (Kautsky) S. 18.

本來凡作爲生產之手段或工具的，無論對於生產有若何的貢獻，關於其生產之結果都沒有何等的權利。譬如種子與肥料不怕對於生產就有怎樣的貢獻，而對於所生產之物之分配不能干預。人種五穀時，種子和肥料是不消說，而上宜與陽光底協作更是不可不有的，然而人們却自以爲把五穀生產了。這是因爲對於種子肥料土宜陽光等不認其有人格——這些都是看作自己做事的手段和工具的——所以只覺得生產是自己一個人所成功的。又如我們照像的時候，不得不借照像機底力量，也不得不借太陽光線底力量，然而我們只說像片是自己照的，不說是和照像機與太陽一同照的。但是我們假如是借他人底力量的時候，那時候我們便不能說是自己照的了。這是因爲把他人看作一個人格者的原故。有這樣的原故，所以在自然崇拜的民族裏，把種種自然的現象看作神祇而人格化，便是生產了一定的穀粟，都不以爲是自己一人生產的，而以爲是由種種諸神之協力而生產的。所以他們收穫的時候，要分割其生產物之一部分以供獻於神祇，即是這些神祇以人格者而參預生產物之分配。總之，參預生產物之分配者，是只有參加於生產的人格者，不怕對於生產有若何的貢獻，假使是生產底手段或工具時，便沒有參預於其分配的資格。前面已經說過，奴隸是不認爲有人格的一種財產，所以他在家畜用具是同樣，沒有參預於生產物之分配的資格的。但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雇傭勞動者也是沒有參預於生產物之分配的資格。這樣說時，有人會說：『雇傭勞動者從雇主獲得工銀，其工銀便是生產物之分配；』其實工銀決不是該勞動者所以參

預於生產物之結果的獲得；工銀是形成所謂生產費之一部分的，決不屬於從生產結果中減去其生產費的剩餘之一部分。這樣的生產費和許多生產手段和用具是共通的；譬如牛馬是一種生產手段，但是牛馬是生物，在牠們的生存上不可不有一定的生活資料。牛馬得了這樣的養料，不能便說是牛馬是和牠們的主人共同參預着生產物之分配了。與此同樣，奴隸也是生物，也要一定的養料。其養料即是奴隸主所供給的，從這一點說來，像馬克斯已經指摘過的一樣，奴隸之生產物全部不是盡歸於主人所有，有一部分是必然要歸還奴隸的。但是不能以此之故，便說是奴隸和其主人共同參預於生產物之分配。雇傭勞動者之得工銀，也全然是同一的道理。雇傭勞動者與牛馬同樣，又與奴隸同樣，他是作爲一個生物不能要一定的生活資料的。此必要的資料由雇傭主所支辦，是形成着生產費之一項的。這是在生產之前有應該先惠的性質，不是生產後由其結果之所分配。所以說企業者是負擔着企業之危險的。企業業向借貸資本者（Zinskapitalist）支付所定的利息，又向雇傭勞動者支付所定的工銀，然後有剩餘的時候纔歸自己所有；有不足的時候也要歸自己負擔。即是企業之成績甚形損失時，不得不支付勞動者以一定的工銀；而非常得利時，則不分配於勞動者而盡歸己有。雇傭主在負擔一定的義務之代價上得這樣地主張一種權利——有許多失業者的現象是企業者不履行義務之證明，從社會組織之全體看來，這是暗示企業者權利主張之難以永續——總之，雇傭勞動者在以雇傭資格工作時，沒有參預於分配生產結果之權利。他只有由工作而得一定的工銀，從生產界退出消費界時，支出其工銀以參預於所謂社會所得之分配。從這一點上想來，消費界是要比生產界更德謨克拉西的，社會的關係（Gesellschaftsverhältnis）所行的範圍是要更寬廣的了。

奴隸在生產界與消費界均沒有參預的機會，雇傭勞動者所得參預於生產結果之分配的，只限於生產界。在這兒又有一定的差異，然也有一定的共通。

第二節 自由勞動者之所謂自由

第二，以上所述，是奴隸爲他人所有的財產，雇傭勞動者於某種意義上仍是賣身，因而兩者之間有二三的不同；此後我所想說的是：奴隸受強制而工作，而雇傭勞動者被人稱爲「自由勞動者」，但這實質上的差異，究竟是否有現於文字上的這樣的明顯？

奴隸是受強制而服務於工作的。但是強制必須暴力。所以不是暴力被組織化的地方，奴隸制是不能十分發達的。幼稚的狩獵種族及捕魚種族間奴隸制罕見存在的原故（三）是（一）生產技術幼稚，一人之工作不能生產二人以上的生活資料——卽剩餘產物，所以卽使養畜奴隸，那是 *not worth his food*（值不上他的食糧）的；其（二）因爲他們須於寬汎的地域內探索食料，所以不能構成大的部落，因而缺乏於維持強制制度的奴隸制上所必要的組織的暴力。凡是無定居的土地，營着離羣彷徨的生活的種族，卽使擒捕敵人以爲奴隸，也沒有可以防備他逃亡的方法。有這樣的原故，奴隸制是非暴力組織化的地方是不能成立的，奴隸是在組織化的暴力之強制下，從事於主人所命的一定工作的勞動者。

(III) Nieboer, *Ibid.*, p. 190.

然則現代的雇傭勞動者是怎樣呢？他們與奴隸不同，他們有所謂自由。但是這自由是選擇雇主的自由，不是

不要雇主的自由。他們雖不和奴隸一樣賣了自己的身體以爲他人所有，但他們是把自己的勞動力賣作生產手段而爲他人所有的。凡是要想依一定的工作而生產一定的物品的人，原料機械工具等是在所必要。沒有此等生產手段，只以赤手空拳是不能生物，而無產者便是沒有此等生產手段的人。所以他們不能具體化他們的勞動力，使成爲貨物以販賣。他們除賣勞動力以外，別無他法。即是他們無論是受何人底雇傭，這是他們的自由；但他們却受着不能不有雇主的強制。他們雖不是爲一個雇主用鎖鎖定的，但他們的階級全體是爲有產者階級所限定。鎖鑰雖解，仍不得不入檻穽，不在甚麼地方求得一個雇主，把自己作爲雇傭勞動者而工作時，他們是沒有生活的路可走的。不爲一主人所鎖定——有所謂居住移轉自由，擇業自由——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有奴隸所沒有的自由。但是在到底不能不爲雇傭勞動者之一點上，他們依然是受着了一種強制。

我們請一思索這強制之本質罷。這在理解雇傭勞動者之所謂自由底實質上是必要的。我現在暫且定名牠爲非人身的強制，把來和人身的強制區別。這種非人身的強制，在社會之生存所必要的生產手段爲一部分階級所獨佔的時候，無論何時，都是很強有力地加到獨佔階級以外的人們頭上。現在試就農業民族，以土地爲主要生產手段的農業民族而觀察，人口稀少尙有不毛之地殘存於社會時，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可自由利用其土地，獨立生產其生活資料。有人想把他人底剩餘勞動吸收時，則必須依暴力的強制使他人隸屬於自己，於是便生出以他人爲自己之財產的奴隸制度——以他人爲自己部下的農奴制度也是這樣生出的。但是在天下底土地已盡歸人所佔有時，則無土地的人必向有土地者販賣其勞動力以獲得生活資料，這從有土地者說來，不必以一定

的人們作爲自己的奴隸或部下以縛束於自己的土地上，無論何時也可以榨取他人底勞動力了。即是奴隸與農奴底必要消除，奴隸與農奴們便被解放而得所謂自由。但是這是表面上的自由，實則他們在經濟上是失却了自由的。所以他們即使有居住移轉底自由，有擇業底自由，但歸根是不能不在甚麼地方去做雇傭勞動者。即是自由底束縛由人身的變爲社會的了。雖不被眼可見的人底束縛，却被眼不可見的經濟法則之束縛。所以在法律上一切的人名目上雖有自由，一切的人雖受平等的待遇，而實際生活上依然有階級區別之嚴存，社會上一部人仍能以他人爲自己生活手段而利用。

以上所述，不僅限於土地，無論何種生產手段在該社會佔有主要位置而爲某一階級所獨佔時，無論何時都能起同樣的現象。例如畜牧種族間從古便有所謂自由勞動者之發生，這是因爲可爲財產的家畜有限，並且都已成爲個人的財產了。『畜牧種族間沒有家畜的人，除依其所有者以得生活資料之外無他法，所以凡是需要勞動者的時候，無論何時都有自由人可以供獻自己的勤勞。因此之故，在這兒大抵是不需要奴隸底勞動的。』(四)現在的文明國家，所謂資本——機械及運轉機械所必要的資金——是屬於資本家階級之獨佔。所以在今日的社會奴隸也是沒用的，然有『有自由的奴隸』之雇傭勞動者存在。『勞動者所得之唯一的源泉在勞動力之賣却，所以勞動者如不自棄其生存時，他不會和勞動力之買主之全階級即資本家階級絕緣。他雖不是隸屬於甲或乙的一個特定的資本家，他是隸屬於資本家階級的。』(五)

(五)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 (Kautsky), S. 20.

僱傭勞動者所受的強制，雖是所謂非人身的強制，然一切強制之行使時，其間必有暴力（Gewalt）存在。不過這種暴力有時是現於表面上直接地作用，有時是不現於表面上間接地作用罷了。壓迫僱傭勞動者的非人身的強制中所含有的暴力，正是這不現於表面上間接地作用的。僱傭勞動者不是由力之物理的強制使不得不進工場。凡是有所謂自由勞動者存在的社會內，使強制成爲強制的物理力不直接作用於勞動者之肉體，而集中於生產手段私有權之保護。畜牧社會內使集中於家畜之保護，農業社會內集中於領地之保護，資本家的社會內集中於資本之保護。假使有人想要把藏在背後的武力喚出表面來見面時，在勞動者佔領工場的時候，請跑到工場附近去見面罷。在那兒必然可以看見若干的警官和軍隊的了。暴力是於私有權保護的消極作用之下，使自由勞動者永遠爲自由勞動者。奴隸雖無自由，而僱傭勞動者有一種的自由。在這兒有一定的差異，然也有一定的共通。無論何人，可以不爲他人生活之手段，無論何人，可以不受暴力之強制；一切的人都爲自己而生存，一切的人都是爲實現共同之目的，各本其自由意志而團結；這樣的社會，名爲（Gemeinschaft）（大同）。奴隸終其生被置於 Sachverhältniss（物的關係）之下，僱傭勞動者一日之間半被置於 Sachverhältniss 之下，半被置於 Gesellschaftsverhältniss（社會的關係）之下。一切勞動者能在 Gemeinshaftsverhältniss（大同關係）之下組織 freie Assoziation（自由社會）的日期，前途還很遼遠呢。

第二章 勞動之痛苦與社會組織

第一節 生產的勞動之筋肉勞動

我們要維持我們的生活，不得不備食物，製衣服，建房屋，及生產其他種種物品。我們把生產這等物品的勤勞命名爲「生產的勞動」，但是這生產的勞動，仔細着想時，正如吉母士彌爾所說，終不外是由於動外物而成立。譬如製米，我們不得不先耕田，耕田是由動犁鋤，動土壤而成立的。田耕了要下種子，我們是動這種子使從倉廩而移向田間。禾苗抽出了要施肥料，我們是動這肥料使從某處以至於田面；便是除草的時候，我們也是動草使從田面以至於某處。稻成熟了我們要刈取，那時便要動鎌刀動車動馬動稻穗了。像這樣由稻種以至於白米，人力所爲的都是動外界之物，此外則是外界物中所固有的自然力盡其效用。又如米成了要煮成飯時，也不得不先下米入鍋，這是把米動了。鍋中要放水，這是把水動了。擦自來火也是動外物，燃薪也是動外物。我們投米放水劈柴上火，沒一樣不是動外物；但是人只要把這點事情做了，柴便依其固有性質發火而生熱，水便依其固有性質變熱而沸騰，米便依其固有性質受蒸汽而爛熟。有這樣的道理，所以生產的勞動力一切都是由於動外物而成立的。要動外物，只靠人底精神力是不能濟事，還須動用自己的筋肉。人底精神力有時發揮異常的作用，不假筋肉而外物可動，但是這是罕有的事情，普通一般不是這樣。

生產的勞動畢竟是動外物的工夫，要動外物，不能不動用筋肉，是則人們爲營生起見，終不能不有一定的筋肉勞動之負擔，宿命地由自然所課賦；但是這種負擔在我們人生成爲了一件大痛苦事的，究竟是甚麼原故呢？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思索，這是本文底要旨。

第二節 勞動何以是痛苦

勞動是痛苦的負擔，學者有以爲是目的在外的活動——爲實現達到存在活動自身以外的一種目的——的原故，無論若何種類的活動，只要是以其自身爲目的的，便是快樂，若爲達到某種目的之手段時，必成爲痛苦。我現在且舉季特「經濟學原論」上所說的以爲一例：

「一切生產的勞動不能不含有一定的痛苦，這是經濟學上一個重要的大法則。假使勞動不是痛苦時，一切的經濟現象不會像現在所見的一樣了。譬如奴隸制度和機械等或者不會發現於世上。因爲兩者都不外是以避免勞動爲目的。

『然則勞動何以是痛苦呢？這雖是甚麼人都感覺着的，但是甚麼人也難於說明。因爲勞動畢竟是活動底一種形式；然而活動自身決不是痛苦，否，活動便是生命了。不錯，要絕對的無爲，那纔是殘酷的刑罰呢。試把人囚獨禁在一間牢房裏，監禁久了的時候，他不會病死，便會發狂的了。

『這然則是勞動常合力作底原故，人類是生來便是懶惰的動物嗎？這個答案恐怕快不是可以滿足的說明。何以故呢？因爲普通所視爲快樂的活動——例如登山，競渡，乘腳踏車及其他種種遊戲和舞蹈等——比勞動還要要求力作，然而人們却不是樂於耽溺的嗎？

『這是不錯，但是遊戲中的力作是隨意而且自由的。人欲要求滿足，可於遊戲自身中得之。遊戲自身便是目的。然而勞動中的力作是迫於實現滿足慾望之一定的目的而起，力作不過是享樂目的之先決條件。這

真是一種「課業」。勞動所以爲苦痛的原因，實在於此。爲娛樂而競渡的人與爲找錢而弄船的舟子間，登山者與所雇用的鄉導者間，在舞蹈會上徹宵尋樂的年青姑娘與在舞台上出演的舞姬之間，只有一個唯一的差異。即是一方以弄舟、登臨、舞蹈爲唯一目的而力駛而攀陟而跳舞，他方則以糊口爲目的而力駛而攀陟而跳舞。有此差異，所以雖是同一的活動，在前者則爲快樂，而在後者則爲痛苦。以園藝爲娛樂的人，雖以耕種其菜圃爲快樂；然彼如不能不販賣其蔬菜於市時，則耕耘便化爲痛苦了。同一的道路，在以散策爲目的而逍遙的人，則感快樂，而在爲一定的目的朝夕往來的腳夫，則只有釀出倦怠與疲勞了。對於人類之大多數，勞動不過是爲求生計的手段。他們爲糊口而勞動，不是爲遊樂而勞動的人。」

此處如季特所說，雖是同一的活動，在以活動自身爲目的，便是快樂，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時，則爲痛苦。假使這所說的果其是真理的時候，則從痛苦的勞動負擔之下把人生救出的方法，使從事於勞動的人們以勞動自身爲目的時便可辦到了。例如製米，不以製米爲營利底目的，以替天下人供給食物這件事情爲目的時，則可不感痛苦了。又如電車底司機者正專以月薪爲目的，他們纔自朝至夕運轉電車，然這不過單爲生活底手段，教他們好好把想頭變過，存心在爲市民謀便利而從事工作，則可以免却痛苦了。單是製米，單是運轉電車，這誠然是無聊的事業，但是想到是爲社會服務的時候，同一的事業都應得成爲含有崇高的道德意義的神聖事業了。這樣想時，便無論從事於甚麼事體，只要以該事體自身爲目的時，我們沒有不能服務的道理。一切的人都以爲社會服務爲自己生存之目的，於各人底勞動之中尋求其目的之實現時，便無論何人都能以自己的工作自身爲目的。只要以工

作自身爲目的，使無論何種活動都是快樂，那我們以這樣的方法使得從一切勞動底痛苦免脫了。——像這樣的想法是可以隨之而起的。

第三節 資本主義組織下的勞動

但是在上述的見解中可以發生兩個疑問。第一，無論如何的活動，只要以其活動自身爲目的時便爲快樂，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時則爲痛苦，這事究竟是真確不真確？第二，把現在的社會自由放任着，向各人要求各於其所從事的工作自身內尋求目的，這事究竟是可能不可能？第二的疑問比較簡單，我爲便宜起見，且先從這個問題底思索入手。

經濟活動之道德化——這是屢屢爲人所倡道的。已故的斯馬特教授便可以看作此中之一人。教授於其死前所執筆的『一個經濟學者之第二思想』一書，可以看爲關於社會問題的教授之遺言，教授於此著作中屢屢主張着『道德的改造』（moral reconstruction）。教授以爲今日的經濟生活，從其本質上說來，是服務之競爭——相互服務之無意識的協力。農民製米，世人食其米而繼續生命。司機者運轉電車，世人因以得交通底利便。農民和司機者雖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但從結果而言，他們都是在替社會底人們服務，即是在行『相互服務之無意識的協力』。在本人雖只意識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會意識着爲社會服務的方面，但如今後使人意識到後者底方面時，則耕田與運轉電車都成爲崇高的事業。所以『我所要求的變化只是目的之意識的採用』。人人只要各各意識到爲人類服務的目的時，則『此 bread-and-butter life（餬口生活）由於作爲人類服務而採用之故，可以變爲

最高的道德目的之生活。』(1)

(1) Smart: Second Thought of an Economist, p. 113.

這樣想來，無論何人都把作爲餬口手段不得已而從事的勞動，不改其形態而轉變其性質，變爲以替人類服務——這是無論甚麼人不能不以爲其生活之目的——爲目的的，所謂以其自身爲目的的活動了。這樣的時候，一切的人都從爲手段而犧牲其生命之一部分的事實脫離，四六時中自由自在地可以生活起來了。誠然是很冠冕的話。假如能夠這樣時，那是苦海卽天堂，在今日這樣狀態之下，甚麼人都可以各遂其志了。然而這個道德的改造案是過於輕便了一點，這在實現上是不可能，也就是無效。因爲是無效，正好樂得不成爲危險思想，就使如何地高調提倡，也不會有被投禁在監獄裏的憂慮了。這一點是牠唯一的可取處。

何故這樣的道德的改造是不可能呢？我能舉兩個理由。第一，今日的社會取的是資本家的組織——資本家本位之社會組織，勞動者自以爲替社會服務而專心工作，其實是專心在替資本家工作着罷了。例如自來水工場所雇的職工以替世間供給良好的自來水爲自己的目的，工銀即使低廉，勞動時間即使長久，這些事情全不在心上，只忠實於自己所擔負的任務而熱心從事時，良好的出品廉價而出產的利益立地可見，但是其利益大半是歸到工場主底懷中。社會上一切的事業都是以資本家之利益爲本位而經營着的，我們不能通過這個組織立地爲人類服務，我們是被置在直接爲資本家服務之外無他法的必然的關係之下的。資本家雖是爲自己營利的目的而經營事業，要想如意地得到利潤，自然不能不圖謀世人之利益；勞動者爲資本家服務，也便是間接爲社會服務

的，這固不待贅言；但是這只是限於與資本家之利益一致的時候，即是由資本家所榨取的渣滓間接地滴落到社會上罷了。有這樣的原故，想把一切的經濟活動合致於爲人類服務之最高目的的提倡，在社會是採取着資本家本位之經濟組織時，實在是只能言而不能行的一個空想。

第二，人人只要意識到爲人類服務之目的，則一切的經濟生活以今日的狀態便立即『可以變爲最高的道德目的之生活』的思想，是把意識作用過當地評價了的謬想。現在我們爲得自己的生活資料而從事種種手段的工作，不消說從其結果而言，我們由此是行某種程度的『相互服務之無意識的協力』，但是我們只意識到爲自己圖利益，我們沒有意識到相互服務之結合。而主張『道德的改造』論者以爲：我們如能把圖謀自己利益的意識方面忘去，把幾乎不會意識着的利他方面爲目的時，只消這樣，便把今日目前的生活都『可以變成最高的道德目的的生活』。這樣的說法是怎樣地錯謬着的，我們只消想到我們把從前意識着的方面忘去，把從前幾乎不會意識着的方面專於意識到時，我們的生活外相是怎樣地不得不變化的，我們便可以知道了。我現在舉一個捷近的例，我們想像醫生底生活罷。醫業古來是稱爲仁術的，無論彼我都以爲是救人的事業。不消說這是不錯。但是現在的社會組織並不能保證任何人底生活，醫生也是人，他不能不吃飯，他不能只是專想着治好別人底病患的。他爲養自己及養自己的家族，而診病而投藥而行手術；他不得不依此以得一定的報酬，無論甚麼時候，他始終是不能忘記的。所以無論是若何重病的患者，假使他是赤貧，醫生會把他輕視的；反之，即使是十分輕微的病人，只要他是素封，醫生會把他看成重寶了。看護婦這種職業不消說也是很高尚的，但是在社會不能保證其生活時，她們也

和醫生一樣，不得不先服務於有產者。這樣追索起來，今日的社會，與其說是如斯馬特等所想像的是行着『相互服務之無意識的協力』，寧可說是對於有產者行着無意識的服務罷了。不消說，今日的社會因為是有產者本位底社會，所以我們於不識不知之間把有產者和社會是同一視了；但是假如我超越了附帶着『活計』這個條件的『意識』而觀察世相時，我們可以知道在今日的社會中一切人們底勞動只是以對於有產者的服務為中心而被組織的。社會之組織是如此。一切無產者是被人剝奪了生活底保障。所以他們不得不把一切丟開而選擇足為生活手段的工作。然而供給其生活手段的人是有產者階級，所以一切的無產者以得生活資料為意識的目的而從事於一定的工作，其結果竟成爲無意識地對於有產者的服務。一切的人如都以替人類服務為意識的目的而採用時，一切的經濟的活動都『可以變爲最高的道德目的之生活』。這是不錯。但是以替人類服務為意識的目的而採用時，則醫生所當出診的病家與現在的便不得不異其選，看護婦也大半會從現在的病家走出，更當走向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在今日的社會之下，要這樣行動時便不能自給，所以不得已只能作爲生活底手段而服務於有產者。我們的勞動是不能不作爲生活底手段的。縱使要教人改變念頭，無奈念頭是改變不過的。各人要能從事於各以工作自身爲目的的工作時，要先有可以無須乎從事於以生活爲目的之手段的工作——各人均得其生活上之保證——爲先決條件。即是各人專心於其目的以成就『自由的發展』，要各人之生活保障的物質的條件先備後，然後纔能實現。

第四節 伴隨活動自身的肉體的痛苦與快樂

把現在的社會組織自由放任着，向各人要求其於所從事的勞動之中尋出其自身之目的，這個要求照前文所述對於一般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暫且假定其可能，假定各人均能於所從事的勞動之中尋出其自身之目的，則我們真個便能從一切勞動底痛苦解除了嗎？無論甚麼活動，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時便爲痛苦，以其自身爲目的時便必然是快樂；這果真是真理嗎？我現在更思索這個問題。

據我想來，一定的活動之快不快，不必一定是專由於從事於其活動者之主觀——是以其自身爲目的或以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而判決，活動自身似乎本來有快不快的性別。關於這個事實，我以爲野蠻人之遊戲與勞動間所存有的極端的差異便是最明瞭的材料。最原始的野蠻人在獲得其生活資料之目的上是極懶惰的，這幾幾乎是一般學者和旅行家等之觀察之所一致；但是他們一方面這樣懶惰，而於他方面在舉行跳舞的時候，在我們所想像的以上，他們又是極其熱心，這也是一般的觀察者所同然的。關於此點，我在一九一五年『論勞動之發展』一文中曾述其大略，恐爲大多數讀者所不曾見，我不嫌重複，再揭其大部分於左：

野蠻未開的民族性極懶惰，這是周知的事實，沒有詳述的必要，只舉示其二三例時：例如關於非洲中部之野蠻人，據虎蛙氏所記載：

『將來底觀念對於他們是不注重的。他們想不到將來。假使到了老年無力動作時，他們便以饑餓與窮困而死，救他們的人，幫助他們的人都沒有……他們只被必要所迫，爲得糧食而活動。假使有二日的糧食時，他們便在自己的小屋中席地吸煙，一半是睡着過日。』(Dowd: *The Negro Races*, Vol. I, pp. 376-)

377.)

關於非洲南部定居着的普徐曼的記事是：

『他們是懶惰得恐怕是無論甚麼人種都是趕不到的光景。他們活動底唯一動機只是饑餓……他們到來禮拜時便記不起今禮拜底事。他們只是被動物的本能所支配而已。』 (Ridpath: *World's People*,

Vol. III. p. 676.)

這樣的事實不遑例舉，只要讀者諸君把最幼稚的野蠻民族是極懶惰的事實記着，便充分了。但是，不可思議的是這樣極懶惰的民族，在舞蹈時却是非常的熱心。例如前舉的普徐曼族有次揭的記事：

『舞蹈是自日暮以後開始於酋長之小屋中。小屋中充量地容受多數男女，坐成圓形，僅僅跳舞的地面留着。入口處燃起熊熊的篝火。跳舞者以非常的奮邁和滿足陶然於三昧之中，好像把自己都忘記了的一樣。便是最高大的小屋，一個大人也不能站立起身來的，所以不能不用兩根長杖來支持着自己的身體。兩手持着杖，適宜地離開自己的身體以撐拄於地面。所以跳舞者底身體以勉強的形態蜷屈於前方，跳舞時是很不便當的形式。衣服是甚麼也不穿的……腳上也沒有裹纏。他們以這樣的姿勢不息地跳舞。不要支持着身體撐杖的時候也有。跳舞的人是輪次的，輪到自己的次序上來，便充分自足地跳舞……跳舞是很奇妙的，就我自己所知道的，無論那一種野蠻民族中都不曾見過。先把一支腳立定，把另外一支腳急激地作不規則的運動。膝部和膝以下的部分充分地前後動搖，立的一支腳底部位全不變易。手是支着身體的，也不過僅少的動

搖而已。跳舞者不斷地唱歌，和自己底運動和調子合拍。時時把身體落地立刻又伸立起來，到頭爲此困難的運動所疲憊的時候，便頹然坐地休息。但是看的人仍然合着拍，唱着歌，搖動着身體。經過數分鐘的光景，跳舞者又立起來重新鼓舞着元氣而跳舞。……在屋外所行的跳舞，其性質與此全然不同。他們在十分飽食後，聚集於部落之中央，在月光之下跳舞。動作是由不規則的跳法而成立的。……跳舞者疲到盡頭，跳到汗雨淋漓也還不見止息。發出種種的叫聲。動作好像很困難的光景，到頭各各不能支持，鼻孔流血，前後相繼以倒撲於地上。因此之故，這種跳舞，名叫「魔可馬」，卽是血舞的意思。】(Thomas: Source Book for Social Origins, pp. 581-583.)

「懶惰得恐怕無論甚麼人種都是趕不到的」這普徐曼族，竟這樣熱心跳舞，跳到汗流岷出，疲倦之極至不能再起；這前後亦何若是其相異呢？我們想到這層相異，便可以覺得勞動與遊戲之間其性質是全然不同的了。

我們現在所引以爲問題的，是這樣同是一種肉體運動，何故爲得生活資料的便深遭嫌惡，而跳舞却反而極受歡迎呢？現在解答這個問題的人說是前者是爲實現別種目的之手段所以痛苦，後者是以其自身爲目的所以快樂；但這種單純的主觀的說明，就以常識想來，也有難於心服之處，所以我們不能不更進一步，向這活動自身探尋其究竟有無何等的差異了。現在我們且先就跳舞底特徵思索罷——前面所說的普徐曼族底「血舞」誠然是「奇妙的跳舞，無論那一種野蠻民族中都不曾見過」的，這與普通的跳舞實在有點不同。我們且就日本所行的「盆舞」思索罷——盆舞是把簡單的肉體運動所成的若干單位動作依一定的節奏不斷地反復的。其特徵大體

可分爲兩部，即是（一）單簡的若干單位動作之規則的反復，（二）其反復須依一定的節奏。我們請通觀人類底一切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活動罷，凡愈有這樣的特徵的，愈能耐長時間底繼續，其所隨伴的痛苦底程度愈少。例如心臟底鼓動，肺臟底呼吸之類，這是終生不斷的無意識的活動，此等活動雖一日也不許休息的，但這是簡單的活動之規則的反復。又如徒步，是我們意識的活動中最能耐久的，但這也是極簡單的動作之規則的反復。尤其是多數的人同唱軍歌取一定的步趨進行時，很可以愉快地持久。從這些事情上看來，生產的勞動所以不能免却肉體的痛苦，是因為這種活動之外形的性質都是缺乏着跳舞底特徵——即簡單的動作於一定的節奏之下規則地反復——罷。然則想把一定的勞動能夠持久，並且少感肉體上的痛苦時，我們是應該把那肉體運動之形式盡量地使與跳舞底形式接近，人爲地把勞動分析爲簡單的肉體運動之若干單位，使於一定的節奏之下規則地反復。果然這種方法在古時已經有人實行過，我所說的勞動舞蹈化便是這個了。勞動歌與勞動樂，畢竟是從這種要求生出來的。（二）

（11）參看 Bücher: Arbeit und Rhythmus.

勞動之舞蹈化有兩種方面：（一）是把一定的勞動分析爲簡單的肉體運動之單位，（二）是使運動反復時依一定的節奏。發生勞動之節奏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隨勞動而自然發出的聲響。其聲響無論是本來的或人工的，含有高低大小之差時，便可以利用來作爲勞動之節奏。但是勞動底種類中有各個勞動都發出同樣的聲響，不能分別出高低大小的；尤其是須要大力的勞動，要迅速地反復牠使依一定的節奏時，更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時候，可

以使二以上的人『合作』在其聲響中付以一定的韻調，由此便把本來不可分析的勞動分析成爲若干的單位了。例如鐵匠鋪之相互打鐵，便是一個實例。這件事情好像很不關緊要的，但在輕減勞動之單調上有很大的效果。打麥用的連枷，假如是兩人對打時，決不同時下地，必定是交互相應的，也是同一的理由。

假如勞動不發生一定的聲響時，或則其聲響不足以取節奏或不便於取節奏時，則有人工的發響的工夫：有時是在用器上加以響器，有時是由勞動者口中自出聲響。在鏈上付鈴便是前例，馬夫在駝馬頸上付鈴也是一樣。軌道底修繕夫，商船上運炭的苦力，在工作時發出咳嗽的聲音的便是後的一例了。像這樣的實例更見發達時，則前者有勞動樂，後者有勞動歌。現在的軍隊所行的軍樂和軍歌便是一例。

據以上所述，可見人類底活動自身本來有快不快的區別，即是不管是以其自身爲目的或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有某種活動定能使人快樂，有某種活動定能使人不快，這是很明瞭的了。而其中愉快的種類之活動即使別無目的，專爲追求其所伴隨的快感之故，從早便成爲一種遊戲而盛行；然於人生所必要的生產的活動却不幸因其形式不同便多不免伴隨着生理的痛苦。即是生產的活動不是因爲爲達到他種目的之手段而伴隨痛苦，實因該勞動自身本是有痛苦伴隨着的活動，只有希望達到一種目的時不得已始作爲一種手段而從事。這樣看來，如季特所說，無論若何的活動，只要以其自身爲目的便是快樂，以爲手段時便是痛苦的說，這無論如何是不能不說是謬誤了。

這樣說來，前面所說的『道德的改造案』不唯在實現上不可能，即使可能，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免却勞動底痛

苦了。

第五節 勞動之繼續時間與其痛苦

活動自身本來有快不快之別，已如上述，但與此關連着有不得不帶說的事項：便是無論是若何愉快的活動，繼續到某種程度以上時，便次第伴生着痛苦，且其痛苦與繼續時間之長短成正比例。所以某種活動作爲一種愉快的遊戲而活動時，支持了一定的時間以後，其所伴隨的快感遞減，而其所伴隨的痛苦遞增，逮到最後只成爲一個痛苦了。本來純粹愉快的活動或純粹痛苦的活動在世間上恐怕是沒有的，大概的活動恐怕是愉快和痛苦底混成罷。例如吸香煙，煙入眼中或煙屑着舌總不免有多少的痛苦，但其痛苦由其他刺戟所生的快感減殺，所以全體上只意識着一種快感。又如經商，雖不免要費用多少支出，但與收入相比較，假使收入超過時，便感受着利益。且看我前面所引用的普徐曼族之記事罷，看他們的『跳舞者疲到盡頭，跳到汗雨淋漓也還不見止息……動作好像很困難的光景，到頭各各不能支持，鼻孔流血，前後相繼以倒撲於地上；』疲到這步田地了，要到終止時，痛苦底分量必然是次第增大的。但是遊戲時除追求其所伴隨的快感之外別無他種目的——本來人類決不是全無目的而甘受痛苦的，——假如全體的感覺上成爲了痛苦時，便立即終止了。所以普徐曼族跳到鼻孔流血便不得不相繼而止息。然而生產的勞動與此不同，這是爲達到一定的目的而行使的活動，即使活動自體是若何的痛苦，然爲實現一定的目的上不得不繼續進行。其活動假如不延長時，或許還可以與人以若干的愉快；然於必要時每延長到一定的程度以上，其結果則終不能成爲一個的痛苦了。

第六節 勞動所伴隨的精神的愉樂與痛苦

然則生產的勞動其感得痛苦的原故，只是由於其活動外形的性質或繼續時間底長短嗎？許多學者說明生產的勞動之痛苦，以爲是達到別種目的之手段的活動，這可斷言是全然錯誤或全無根據嗎？只要有同一外形的活動，不管是目的在內，或目的在外，行爲者底主觀對於其活動之快不快是全無關係的嗎？我現在想更進而思索這個問題。

據我所見，凡從上述的原因所生出的勞動之快不快是專屬於由生理的原因所生的肉體上的快感或痛苦。但是在人懷着目的而從事於一定的活動時，他不僅感受着這樣的快不快，同時他也得感受着由目的成就之意識所生的精神上的快樂。活動之目的愈高尚，或是活動與行爲者之目的愈密接時，這樣精神上的快樂便愈大；反是則得其反。我在從前曾做過『反射的快樂之臆說』一文論說此事，我的意思是：將來的目的之實現反射於現在，其所齎致的快樂譬如放置在一定距離的物體之投影；其物體（即目的）愈高或愈近，則所及於目前的投影愈大。目的成就之意識所生的快樂，我以爲是有這樣的性質，從這樣的原因所生出的精神上的快樂，隨着意識之發達，其重要的程度會次第增大的。尤其是在我們近代人，我們對於同一的活動，在尋出其內在目的與單作爲手段看待時，我們精神上所感受的快樂便有不少的差異。生產的勞動之大部分由近代人視爲苦痛的原故，活動自身所引起的肉體的痛苦自是一因，然其主要原因寧在於勞動只是生活手段的這個事實所齎致的精神上的痛苦。在這樣意義上，像李特所說的同是一種活動以其自身爲目的時便是快樂，以爲手段時便是痛苦的話也可以成立。

這樣的說明雖不能說明勞動所伴生的肉體上的快樂和痛苦，然人意識到目的之實現時所生的精神上的苦樂無妨看作是爲這樣的事情所左右的。這樣說時，我的說明又照例成了二元的了。但我現在不知道一元地能夠說明牠的方法，我以下仍以二元說而進行。

凡避痛苦而求快樂，這本是人之常情。生產的勞動伴隨有一定的肉體的痛苦，這確是人生底一大負擔。然而人不是單求感覺的快樂而生存的，如其別有高尚的目的存在時，則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即使不能免肉體的痛苦之負擔，然由其活動自身可以達到各自的本來之目的，則勞動自身不必一定會成爲人生之大問題了。是則從來生產的勞動只是被置於單作爲手段而活動的狀態之下，不得不是對於人生的一大負擔的根本原因了。

在勞動之中能尋出自己的目的，則勞動對於行爲者成爲其眞生活之一部分。勞動若是單爲生活之手段，則勞動成爲行爲者生命之犧牲。在意識覺醒了的現代人，是最以生命之犧牲爲痛苦的。並且現在的雇傭勞動者正被置在這種痛苦之下，此所以勞動時間之短縮成爲現代社會底文化問題上之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天從事於十點鐘以上或將近十點鐘的勞動，這所齎致的肉體的痛苦當然不少；假使時間縮短——如上所述活動之痛苦與時間之長短成正比——則此項痛苦之負擔也可以減輕一些了。但是我以爲負擔減輕並不一定是人生之一大問題。某種事業假使對於我們是有意義時，不怕就是若何的痛苦，我們也必會甘受。而今日的雇傭勞動者之從事勞動，是單作爲得工錢的手段，處在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的境遇之下，所以他們的勞動完全是他們生命之犧牲了。勞動時間之縮短，在這要求生命犧牲之減少上纔有文化的意義。

端確地看取着雇傭勞動底這項性質，是考察勞動問題的前提。關於此點，我現在引用馬克斯『雇傭勞動與資本』中之一節於次：

『勞動力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勞動者販賣於資本（即資本家之意）的一種商品。他何故要賣呢？為求生生活故。

『然而使勞動力活動，即是勞動，這件事體是勞動者自身的生命之活動，勞動者自身的生命之表現。他把這生命活動為自己確保其所必要的生活資料而販賣於第三者。所以他的生命活動對於他只是求生存的一種手段。他是為求生存而工作。他不把勞動算作他生活之一部，勞動寧是他的生活之犧牲。勞動是讓賣於第三者的一種商品。所以由他的活動所生的產物，不是他活動之目的。他為他自己所生產的東西，不是他所織的絹布，也不是他在礦山上所採掘的金塊，也不是他所建築的宮殿。他為他自己所生產的東西是工銀；絹布金塊宮殿等變為生活資料之一定的分量，例如棉布，若干的銅塊和地下的居室。對於十二時中或織或紡，或掘坑，或轉轆轤，或建家屋，或用錢，或鋸石，或運搬，或從事於其他種種工作的勞動者——這綿亙十二小時間的種種工作，是值得作為他的生活之表現，值得作為他的生活的嗎？否，恰得其反。生活對於他們，要在這些工作完了後，在食桌上，酒店裏，寢牀中纔是開始。……』

現在的勞動者之從事於勞動，只是作為為得工銀而不得已的手段。其工銀不是由『他的活動所產的生產物』中所支付，只是由資本家底資本中所支付。領得一定的工銀以之買米買衣付房租，由這樣所得的若干的米，所得的衣裳，所得的房屋，是他們的勞動之目的，其勞動與其目的之間幾無何等連絡的關係。對於他們，勞動只能

作爲單純的生活手段，這是不得已的了。勞動既只是單純的生活手段，這更不得不成爲他們生命底犧牲了。他們要抗拒這生命底犧牲的時候，誰能有反對他們的權利呢？

我自己是一個無產者，然幸而運好，就了一個教職，衣食不缺，可以沒有這樣的不平。我們在自己所從事的事務之中可以尋出自己的目的。所以我們決不厭勞動時間底長久。人生每日必有適度的睡眠和運動和飲食，不然便於健康有害，於是每日不得不割愛些時間以虛費於此；假使睡眠和運動和飲食都無須乎必要時，熱心學問者必定會不問晝夜，常沈潛於其所業之中毫不間斷了。雖是這樣說，研究學問一事，也決不是快樂的事業。『在這兒有無數單調的並且是可厭嫌的工作存在；』然而常有一定的目的置於眼中，其目的不外是向着同一目的之方向的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成長，更多的成效之基礎而已。』一言以蔽之，研究學問是在研究自身之中可以尋出目的，並不是隨伴着生命之犧牲。『幾乎無論是何程度的教員，自朝至夕，都是生生不息生活着的。』所以教員所從事的事業與雇傭勞動者的全然不同。所以我們雖不厭自己研究學問的時間延長，而我們對於雇傭勞動者所要求的勞動時間之縮短，時常是懷抱着十二分的同情的。

生產的勞動何以是痛苦的犧牲，這個問題就我們以上所考察，得到兩個結果：一個是肉體的原因，一個是精神的原因。秤較兩個原因所生出的苦量時，前者不足成爲問題，後者對於人生是極有關係。現在的勞動之大半都是作爲生活手段的，全不外是生命之犧牲，這便是成爲苦痛之犧牲的最大的原因了。人生是極願把無意義的苦痛之犧牲輕減的，所以使各人於勞動自身內尋出其內在目的，這不得不成爲關於勞動的根本的問題。

然則我們要如何纔能使各人於勞動自身內尋出目的呢？簡單的『道德的改造案』是全無意義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人間世中一切問題之解決，於其解決上所必要的物質的條件不得不具備。當面的問題之解決，也正
要這樣！

各人生存目的之具體的內容是千差萬別的，要使各人於其工作自身內尋出目的，則職業選擇之自由，便於此出現。這從歷史上觀察來，百般事件之綜合作用底結果，無論貧富，無論男女，職業選擇之自由隨着人類底進步是次第實現着。但在今日的社會，各人得不着生活底保證，所以在選擇職業時，第一的問題便是依此職業可不可以維持生活。所以在法律上雖然人人有選擇職業之自由權，然在實際上貧窮人選擇職業的自由範圍是很狹隘的。我們要使一切的人都有完全的選擇職業之自由時，我們對於社會底全員不得不先付與生活之保障。要無論從事於何種職業都於生活無礙時，一切的人纔能獻其全力於其所志的事體。然而要保證各人底生活，這要社會之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以上纔能實現，所以結局是怎樣纔可以增加勞動之生產力的這個問題竟成爲根本的問題了。我前面說的『一切問題之解決，於其解決上所必要的物質的條件不得不具備』正是這個原故。

生產力之發展——這樣的物質的條件之具備是我們的理想實現之前提。我們作生產的勞動時，得免於犧牲生命的痛苦的，正在這生產力之十二分的發展實現了的時期，不是在其前，也不是在其後。不求此條件之具備，理想之經濟社會雖容易發出支票，然終不容易領現。

第三章 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的自由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在社會主義制下當受如何的變化？考察這個問題是本文底目的。社會主義下的自由是以社會成員之某部分得免被他部分所榨取的自由為源泉，我想把這樣的自由明白地與個人主義下的自由區別，但這詳細的討論且留待異日，此處在以個人主義的自由為主題的本文內，說到社會主義下的自由處只以必要的限度為止。

社會主義是甚麼？與此對立的個人主義又是甚麼？這個問題在牠自己便要費一個長篇。我此處從以個人主義的自由為論題的立腳點上，姑且簡單地把一個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有意識地負擔着責任與否為標準，把社會之經濟組織分為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兩極限，於此前提之下向前立論。即是我此處所說的社會主義之組織是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有意識地負擔着責任的，與此對立的個人主義之組織是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不負責任，使其責任由各人自負的。不待說，實際上的歷史上之經濟組織不是根據徹底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根據徹底的個人主義，是以其任一為原則，同時仍雜取他方之主義，立腳於兩極限間之任意的地點的。所以今日之社會普通雖稱為根據個人主義的社會，但於實際上，現代的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例如國家——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並不是全不負責，且從近代的傾向而言，更以急激的速度次第地加重其所負之責任了。更以最近的俄國而言，這樣的變化更非常的急激。現在的俄國，一般的人以為是在從資本主義轉移到社會主義之過渡期中，這從社會之意識的機關是有計劃地有意識地企圖着經濟組織之原則底變更上說的，的確是這個樣子，但是客觀地觀察時，便在俄國以外的諸國，雖其大部分是無計劃的無意識的，然經濟組織之重心是

漸漸地——或者可說是急激地——從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着的，此等國家也可以同說是在由資本主義推移向社會主義之過渡期中了的。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意義，我依上所解釋而立論；我的論點是（一）闡明個人主義制的自由之性質；（二）考察其自由在社會主義制下當受如何的變更。

這個問題決不是新提出的問題。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不相容之非難，是數十年來對於社會主義所加的非難中最主要的一個（次章所介紹的波耳哈特的議論，便是關聯着這個問題的）。然自最近的俄國自所謂無產者執權以來，這個問題便新穎地引起了人們底注意。此時取入眼前的事實所齎致的若干教訓，再重新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思索，也不會是全然無益的事體。

第一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其一，企業之自由

我現在先從個人主義組織下的所謂自由上思索起。如前所述，個人主義的組織下，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條件使成員各自負擔，既向個人使各負如此的責任時，則社會對於此等個人之經濟生活當然不能加以干涉。既要負擔責任，則不得不有行動底自由。所以在以個人主義為原則的現代社會，一切的國家以對於國民之經濟生活取自由放任政策為其大體的方針。這就是個人主義經濟學之鼻祖亞丹斯密所謂『自然的自由之制度』（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其所著『原富』一書之第四篇第九章說明如次：

『這樣的保護或干涉之一切的制度全然撤去時，所謂「自然的自由」之明白而簡單的制度，便自然地

樹立了。在此制度之下，各個人只要不侵犯正義之法則，可以隨其所欲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是則不問他人之事業及資本如何，以自己的事業及資本與之相競爭，這是全然可以聽其自由的。像這樣，則世之主權者便得以全然從一種任務上免却，這種任務如行時必難免陷於幾多之妄想，且以人之智慧或智識終是不能十分適當地實行的，這種任務便是監督私人之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之利益的指導任務。』 (Wealth of

Nations (Cunnam's ed.) Vol. II, p. 184.)

我們要知道個人主義制下的所謂自由是甚麼意義，我們在此請研究斯密氏所說的自由之內容。

第一，斯密氏所說的自然的自由之制度，其重心是置於資本家、企業之自由。我們看他在他政策底綱領上，說明自由是『不問他人之事業及資本如何，以自己的事業及資本與之相競爭』的自由，便可以曉得了。以一定的資本經營一定的事業的，不消說是限於資本家的企業者。所以在無產者沒有何等的資本並且不能獨立經營事業的人，這樣的自由認為有沒有的問題，這是從第一步便置諸焦點外了的。斯密氏又說明因為採用自然的自由之制度故，國家所免卸的任務是『監督私人財產』之任務，此處所謂的私人財產，不消說是資本家的企業者所經營之產業，此等產業不受國家之干涉，不外是資本家之企業得以自由而已。

此資本家的企業之自由是投資於自己所欲的事業，以自己所欲的價格賣販其生產物，由此所得的財產依自己所欲而處分；簡單言之，是成立於（一）貨物生產及交易之自由，（二）財產之所有及處分（消費、贈與、遺贈等）之自由。此等自由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之精髓。所以斯密氏認用法律以限制生產及交易之自由為『自然的自由

之明白的侵害』(evident violation of natural liberty) 這不僅是『不公正』(unjust) 而且是『無禮』(impolite)。例如『原富』第四篇第五章說：

『禁止製造業者經營小賣的法律……強制農業者販賣五穀的法律……此等法律是自然的自由之明白的侵害，所以是不公正，同時又是無禮。這種事業之決不受強制，不受妨礙，是對於一切社會的利益。……法律常常把人民注意於自己的利益一事放任於人民。……』(Wealth of Nations, Vol. II, p. 32.)

斯密氏於同書第四篇第七章第二部上(二卷八三頁)以禁止事業家自由處分其生產物和禁止他們依自己所信爲最利益於己的方法以處分其資本及事業，是『對於最神聖的人類權利之明白的侵害』(a manifest violation of the most sacred rights of mankind) 其說如次：

『妨害素封之家(a great people)不使其關於自己的生產物之全部，行其所能爲的一切；妨害他不使依其自信於己最利的方法以使用其資本和事業，這是對於最神聖的人類權利之明白的侵害。』

在個人主義者底意見上，最神聖的人類權利是甚麼，我們看這些文字便可以知道了。不消說資本家的企業之自由中，對於僱傭勞動者的所謂勞動之自由，也是包含着在的。因爲如奴隸經濟制成立上必須有奴隸存在一樣，在資本主義制成立上，亦必須有所謂『自由勞動者』之存在。有所謂自由的勞動者存在，以其勞動力爲商品而販賣於資本家，資本家底企業纔得以成立。但是此其所謂自由，是勞動者可以自由選擇資本家以販賣其勞動

力的自由，不是可以不賣勞動力的自由。要想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之堆積固然是必要，然更所必要的是所謂自由勞動者之無產階級之充分的供給。依所謂 enclosure（圍地條例）之故，使農村底勞動者流離，一時製出了無數的無產者的英國，原來以富力而言，是比大陸諸國遠有遜色的，而從十八世紀末葉以後，資本主義之發達竟忽然遠駕於隣國之上，這是不足怪的了。沒有生產手段，沒有物化自己勞動力的手段，只單以勞動力販賣以維持其生計的勞動者，是與不自由勞動者的奴隸有區別的所謂自由勞動者的雇傭勞動者。這種勞動者不是被一定的主人所有的奴隸，也不是被束縛於一定的土地的農奴。他們是如馬克斯所說：『不願意時可以隨意離去他所被僱使的資本家』的，在這一點上，他們有所謂勞動底自由。『但是勞動者收入之唯一的源泉是在勞動力之賣却，所以勞動者如不自棄其生存時，他不會和勞動力之買主之全階級即資本家階級絕緣。他雖不是隸屬於甲或乙的一個特定的資本家，他是隸屬資本家階級的。因此之故，要把自己賣到甚麼人底地方，即是在資本家階級中尋出一個買主，這便是他的事務。』即是勞動者被束縛於資本家階級全體，只在這範圍內有選擇買主之自由。現在在斯密氏的自然自由制度下也得要求勞動底自由的，完全是這樣意義的自由而已。這樣的自由即是財產——其中包含勞動力——之處分當得自由底原則之一適用，而同時又是資本家雇入勞動者的自由之半面。『原富』第一篇第十章第二部上說：

『各人得各以其勞動力為財產，此財產是一切他種財產之根本基礎，同時又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貧民底財產全存在他的腕力和熟練，他不害及隣人，只依最適當的方法使用其腕力與熟練時，要妨害他

的人是對於最神聖的財產之明白的侵害。這是對於勞動者及其雇用者底正當的自由之顯著的侵害。這是妨害一方面的人從事於其所信爲適當的事務，同時又妨害他方面的人雇用其所信爲適當的人夫。雇用勞動者之可否，與雇主之利害最有攸關，這個判定是應該安心地聽隨雇主的……』(Wealth of Nations,

Vol. I, p. 123)

有這樣的原故，所謂自然的自由雖然包含有勞動者之自由，但這與資本家之自由比較是極可憐的，這可待多論。個人主義制下所承認的自由，是貨物生產與交易之自由，是財產之所有與分配之自由。有此等自由最多的人是有巨大財產的有產者，這更不消多說了。勞動者在以其勞動力爲自己的財產上，不消說他有賣牠的自由，然這已如前述，只是賣牠的自由，不是不賣牠的自由，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選擇買主的自由罷了。財產權之神聖在其中心的自由制度之下，勞動者是少所干預，這是當然的。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正如盧梭所說：『法律常對於有者有利，而對於無者有害。』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普通稱爲有產者的自由，無產者在此制度之下有人主張說：『除鐵鎖而外別無可遺失的甚麼』的，畢竟是這個原故。我想要把這一點更加闡明，我在此且先把次章所譯載的波耳哈特底議論引用其一二於次。波耳哈特說：『反對論者說社會主義一實現時有這樣這樣的不祥事將出現，他們所摠列的不祥事項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於勞動者是已經存在着的。』

『第一，論者說，社會主義實現時，便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及勞動地點；但是在今日又誰能有這樣的自由呢？這樣的自由只有恰巧到盡頭處選擇着有錢的父母而生下地的人纔有。此外一切的人不怕就稍爲富

裕，但在選業的時候，也不能不先問可不可以維持生活。更何況勞動者底兒子連受教育的錢也沒有，職業選擇自由底話簡直是不成問題。鑛夫車夫底兒子，與他老子同樣，依然是做鑛夫車夫罷了。就是勞動底地點也決不是能够自由選擇的。只要有甚麼地方有事可做，這便不得不高興的了。

『第二論者說，社會主義實現時，關於消費，關於生活之享樂，便不能自由選擇；但是現在的勞動者誰又有這樣的自由呢？就想吃上等的牛肉，想喝芳醇的酒，想看戲，想聽音樂，想爲養病或修學而旅行，沒有錢便是沒有自由的。在現在的社會，有消費之自由的，只有有錢的富翁。貧窮的勞動者早已失掉了自由的，社會主義的世界，就說會成爲怎樣怎樣，在他們是毫無恐怖的必要的。』

『反對論者又說社會主義實現時，相續權便會廢止；他們雖這樣說來威脅我們，但在每日連吃喝都感困難的勞動者，這是不成問題的呀！』

『或者又說社會主義實現時，人人都被課以勞動底義務，夫婦便不能在家庭相聚；他們更這樣說來威脅我們，但是在倡言這樣議論的先生，他們是不會想到，這在數萬的勞動者中已經早早就成爲現狀的了。』

『總之，這等的不平明明是有產者底不平。這不過是極少數的人自己過活着目前的安逸生活，比大多數的同胞先受着種種的利益的，他們怕社會主義實現時會失掉這些利益的不平罷了。』

被征服者不爲人所殺而得到生存的自由；從這一點說來，奴隸制度之成立，也是人類自由伸張之一階段；奴隸更爲農奴，農奴更爲雇傭勞動者，這也同樣是人類自由伸張之一的階段。所以今日之勞動者比昔日之奴隸

農奴那是自由得多了，但是以勞動者與現代有產者所享受的自由相比較，這幾乎是微末不足道。此所以對於隨着個人主義制之破壞而起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之喪失，有產者階級頻發哀愁之嘆訴，而無產者階級則幾乎全不關心呢。

第二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其二，免受國家的強制之自由

第二，斯密氏所說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之自由，意思是免受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強制的自由。所謂 *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放任主義）的政策即是。所以斯密氏以爲『自然的自由制度之下主權者所應行的任務只有三種』而列舉如次：

『其一，使一國不受他國之暴力及侵害而保護之的任務。其二，盡力使社會各個人不受他人之不正或壓制而保護之的任務，換言之，樹立正確的正義之行政的任務。其三，某種公共事業或公共營造物，作爲個人或少數個人之事業到底出入不能相償者，有創設且維持的任務；因爲這等事業作個人或少數個人之事業時，其利潤雖終不足償其費用，然作社會的大團體之事業時每每有出入相償而有餘的時候。』（*Wealth of Nations*, Vol. II, p. 185）

此處所列舉的國家之三任務中，第一之軍備及第二之司法與經濟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在自然的自由之制度下，國家所得染手的經濟事業，畢竟只有最後第三的一種。這作爲私人之事業到底入不償出的，國家始出而撥任辦理。這是關於政府之干涉的所謂個人主義的最小限（so-called “individualistic minimum” of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把國家之干涉限制到這樣的最小限度的, 是個人主義制下的政策之根本原則。即是私人可以賺錢的事業, 悉以委諸私人, 像軍備司法或其他私人經營時終無賺錢希望的, 便歸由國家措舉, 這是自由放任政策之根本要求。所以譬如政府要調節物價, 限制商人底投機交易, 或經營簡易生命保險的時候, 這便是『對於最神聖的人類(有產階級)權利之明白的侵害』, 是不當的『民業之壓迫』, 必然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了。

像這樣個人主義制的自由, 意思是免受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干涉的自由。但是無一定的秩序則不能維持共同生活, 所以無論在若何社會之下, 共同生活之要約上所必要的自由之限制是不能不有的。只是在個人主義制下, 其自由之限制不行以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命令, 也不行以法律上之強制, 是由於經濟上之法則所強制的, 只有這一點是牠的特色。我們先就現代的資本家的企業家觀察罷, 前面說過, 他們是有生產及交易之自由, 有財產之所有及處分之自由, 所以無論造出甚麼物品, 賣出甚麼價格, 完全是他們的自由; 他們就要全部消費其所得的利潤, 或全部資本化, 無論何人也沒有干涉他們的權利。但是市場上是有需要和供給之法則支配着的, 依此而物價以定, 生產需要少的物品則不得不賤賣而受損失。產業界中又是有競爭之法則通行着的, 所以要不斷地圖謀生產法之改善, 講求生產費之節減。由是他們便不得不為馬克斯所說的『絲毫不假以休息, 不斷地「前進前進」的耳語着的法則』所鞭策。他們要維持他們經濟的生存, 他們是由斯密氏所說的『一隻不可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 所導引, 不得不走向一個必然的方向。在這兒雖沒有法律底強制, 而於某種意義上, 有更苛酷的

經濟的法則之強制。

其次，我們便就勞動者觀察時也是同樣。他們是稱爲有勞動之自由的，而於事實上要限制他們在一定的地方服務於一定的工作的法律上之強制，本是一點也沒有。但是前面已經說過，他們是除賣他們的勞動力之外沒有生計的方法的，他們不得不從事於勞動的法律雖然沒有，但他們終不得不在甚麼地方去從事於勞動。法律把他們從奴隸狀態解放了，但經濟的法則却束縛着他們使爲資本家階級之奴隸。更就消費自由方面說來，這是波耳哈特所說過的，在多數的無產者全是實質不相副的空文上的自由。勞動者以其有限的收入以求享樂之方便時，這兒也有需要和供給之法則支配，所謂文化的產物之多數到底不是他們所能購買的。勞動者不準吃上等的牛肉，勞動者不許住宏壯的大廈，這樣的法律雖然沒有，但是和有這法律同樣的結果是經濟的法則所實現着的。這樣地限制自由，不是由於國家所制定的法律之強制，是『自然地』運行着的經濟的法則之結果；不是社會之意識的機關有意識地規定的，是社會組織之個人主義的制度無意識地之所自然發生的；正因這樣的緣故，使多數的勞動者沈淪於過刻的自由之束縛，而却自以爲是自己天分底拙劣，或是前世底因果，竟不容易洞見其所由來。這個由於『不可見的手』所行的強制，要發見牠的真相實是困難；但這真相一旦發現了時，勞動者之自覺起，勞動者之自覺必然地要促進這經濟組織之改造了。

要之，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不過是免受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強制。社會之意識的機關有意識地所規定的法則成爲國家所發布之命令而出現，這是法學之研究對象；但由社會組織之必然性所生的無意識的經濟法則

全在法文之規定以外，發見牠的任務這是經濟學底任務。這便是在法學家認為平等和自由的社會中，而經濟學家却能看到有階級之對立和自由之束縛的原故了。

第三節 社會主義制之特徵——生產及分配之國家的管理

個人主義制下之所謂自由是甚麼意義？這對於有產者階級所賦與的是何種實質的自由，對於無產者階級所賦與的是何種內容的自由？這些問題我們大體考察了一遍了，以下我想更進而思索此等自由在社會主義制下當遭遇如何的運命。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的組織是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負擔責任的組織。所以採取這樣組織的社會必有一定的機關以作為社會意識之代表，其機關以保證社會成員之物質的生活為目的，管理其社會中的物質之生產與分配。一定的機關管理社會之生產及分配，是可以由種種目的而行使的，有這樣的管理之處不必便有社會主義的組織存在，但是社會主義的組織一被採用時，其社會中必有以保證社會成員之物質的生活為目的的管理。即是社會成員關於其勞動之秩序與生產物之分配，同立於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central control）（中樞管理）之下，各各意識着是一個生產共同體（Produktionsgemeinschaft）之分子，而相互融入於一定的生產關係。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制正相反對。個人主義制下生產無論若何種類的貨物至無論若何程度的分量，是任隨各個人（在資本主義制下是資本家的企業者）之自由意志。其所生產的貨物分配於社會各成員之間時，也不過是由於『交換』底私的行爲之結果。各個人各各獨立生產一定的生產物，互相交換其所生產

的貨物以行所謂無意識的分業，由此始能社會地相互連絡。例如礦山中掘煤鐵的礦夫，運動火車輪船的勞動者，生產米麥的農夫等，此等勞動者相互融通其勞動，農夫之米麥成爲礦夫運轉手之食料，礦夫所生產的煤鐵成爲火車輪船之軌道與動力，而農夫亦得沾與於火車輪船之便利，以此關係雖然互成一種協力，然這是所謂無意識的分業，此等連絡不僅不爲當事者所意識，即當事者個人間之經濟的關係一切都由個人之私的意志所結合，沒有統制全體的有計畫的公共機關。所以經濟界全然是無政府的狀態。有這樣的狀態而經濟界還能勉強保持一定的秩序的，是因爲個人之私的活動之結果自然地間接地形成了一定的社會關係，而支配私人行動的法則無意識地存立了的原故。然在社會主義制下，這種經濟關係是成爲有意識的直接的社會關係而出現。這是由於社會之公的機關依公的權力所規定的，不本於私人底意志。所以從法學上說時，私人之經濟關係由個人主義制移向社會主義制時，是由私法的關係移向公法的關係。這件事情請徵諸革命後德國與俄國之新憲法，觀其與從來的憲法不同，凡關於國民經濟生活的條文多數含孕着的事實，便可以知道了。像這樣支配着國民經濟生活的無意識的經濟學上之法則，被有意識的公法上之規定所攝取，從而經濟學自身，隨着經濟組織之由個人主義制向社會主義制之推移，於其對象及職分上便生顯著的變化。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立腳於資本家的商品生產的社會之告終，便是經濟學之告終』了。(註)

(註) Bucharin: 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2, S. 2.

個人主義制與社會主義制有如上之相異，所以在個人主義制所認定的自由不能照樣爲社會主義制所承

認的，這是必然之數。我在前面說過，個人主義下所認定的自由是可以稱爲有產者的自由，不待言是不能爲社會主義制所承認的。社會主義制是社會以保證其成員之物質的生活爲原則，所以必設立公的機關，以管理社會全體之生產與分配。所以不待言是不能聽隨個個的私的企業家隨其意所欲爲，而社會之意識的機關爲完成其負擔之責任，更不得不於某種程度之內自營生產。因之社會從個人主義制向社會主義制推移的時候，大規模之資本家的企業便先移爲社會經營，其次便推及一切資本家的企業。事業既移爲社會所經營，生產手段亦移爲社會之公有。然在個人主義制的社會，此等生產手段是屬於社會成員之一部分底私有，因此所生產的生產物亦同樣爲此等成員所私有。而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亦專以保全此等私有財產之安全爲其任務。對於私有財產制的這樣的態度之相異，在說明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區別的學者，往往以容認私有財產與否爲其標準，這私有財產制是有這樣重要的關係的。要之，在社會主義制下時，凡是在個人主義制下的有產者的自由全被蹂躪，在有產者的自由上所發生的文化亦全被破壞。有產者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懷蓄着極端的反感是不待論，在不知有產者的文化以外更有文化存在的人們同樣愁訴着社會主義之弊害的也是當然的了。

第四節 社會主義制下勞動者之義務

少數企業者的自由之消除，在多數的無產者看來，全是無足輕重的事情，然則一般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制下的一切的人都得擔任若干的勞動，得營非勞動者之生活的是限於老病幼弱者——之勞動狀態，在社會主義制下究竟是如何呢？這個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社會生產力發達之程度如何尤與此有重大的關係，社會之生產

力非常發達時與尚未十分發達時底狀態大異其趣。據摩爾剛之研究，（一）在古代幼稚的社會曾經實行過一次共產制度，這事底發見對於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有力的根據。例如欣德曼便以馬克斯和摩爾剛二氏爲自己的思想之二大源泉。（二）因爲共產制度曾經久實行過的事實，是證明這種制度並不是與人性（human nature）全不相容；而文明底搖籃既存在於古代的共產制度，則在共產制度下，生產力之發展與文化之發達有十分的可能，亦因以證明了。古代共產制度之發見對於社會主義之議論加以堅確的強度，這是不待論的。但是這個事實對於馬克斯主義同時亦不能不說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據馬克斯底見解，一切社會組織是要隨着生產力之發展而後始能變化的；『各應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共產主義之實現，要在『勞動不是專爲謀生的單純手段，勞動自身却成爲第一生活要求之後——生產力與個人之全整的發展同時增加，共同富力之一切源泉十分流出了以後』。所以一種共產制度在生產力最幼稚的古代實行過的事實，這在馬克斯主義上不得是需要新的解釋的問題。我現在沒有詳論這個問題的餘裕，我只帶說幾句以請求讀者注意的，是同一共產制度依社會生產力之發展程度也有種種的不同，其姿態不必是全然一律的。這不僅限於共產主義制爲然（社會主義制之徹底地發展了的），便在個人主義制（資本主義制之成就了特殊的發展的）也是同樣。要之，社會主義制下的勞動狀態視其社會生產力發展之程度如何不必全然一致，而社會主義制下對於其成員之勞動是社會之意識的機關直接地加以一定的——依生產力發展之程度如何而殊其嚴緩之程度的——統制，這是牠的共通的特色。

（1）Morgan: *Ancient Society*, 1818.

(1) Hyndmann: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1921. Preface.

馬爾塞斯人口論底第二版上有有名的一句話：『生在已被佔有的世界的人，假使他不能從其可要求的兩親求得生產資料，而社會又不要求他的勞動的時候，他便對於食物之最小部分也沒有些兒權利。……在「自然」之大饗宴中爲他設的空席，一個也沒有。』「自然」命他退避。假使他向來客之一人求憐而讓以座位，「自然」便立地要執行牠的命令。』這樣的生存權之否認，是個人主義之一特徵。個人主義制之經濟組織是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生活不擔負責任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個人當各各注意，各各努力於其生存，對於社會沒有要求保證其生活的權利。無權利的地方自然也沒有義務。所以在個人主義制下，像當兵義務一般的『國民義務』之勞動義務是沒有的。所謂有產者——如自己心願時——可以心身兩方均成爲純粹的不勞動者，以其由財產所生的收入而營華奢的生活。法律不僅不以爲違法，而公的機關寧爲保護其財產之安全，保護其『最神聖的人類之權利』而傾注其全力。他們是『合法的勞動之迴避者』受法律的保護而享受其非生活的生活。在無產者方面，前面是說過的，假使不賣其勞動力時，便不能維持其生計，所以在實際上是，在死刑威脅之下受着強制以從事於勞動的；但在國法之規定上當然沒有勞動義務之明文。他們沒有自殺底權利，但是有餓死病死底權利（在自然的自由之制度下的死之權利依然是『自然的死』之權利）。在這意義上，雖是勞動者也可以說是有不勞動的權利了。在有產者是樂生的權利，而在無產者是賭死的權利，在容認此等權利的個人主義制的社會，國民義務的勞動之義務是沒有的。但是有這種義務的，是保護一切成員之生活的社會主義制之特色。

社會主義制以社會保證其一切成員之生活爲制度之精神，社會既負擔着保證成員生活之義務，則社會必向其有勞動力的成員要求其勞動，這是必然之數了。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的人，社會要一一供養他，人數之生產力有限，到底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勞動者不得食』便成爲此制度之根本原則。即如在今日之憲法，國民義務的當兵納稅義務是規定的一樣，在社會主義國之憲法，國民義務的勞動義務是不得不規定了。不消說雖說是國民義務，並不是說一切的個人都要擔負同樣的勞動。在這一點上，就以今日之當兵義務而論也是一樣，一般女子作爲無當兵能力者是從這種義務免除了的；就同是男子，其體質之羸弱者，亦得免除其義務。納稅是國民一般的義務，但無能力者亦可以免除，且依其擔負之能力如何，於其義務亦甚有等差之別。與此同樣，在社會主義制下，『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憲法之根本原則雖然認定，而老人，幼孩，病者，殘廢等是作爲非勞動者爲社會所供養的。社會之成員分爲勞動者與非勞動者之二類，恐怕是共通於去來今三世的現象；只是在奴隸制度與雇傭勞動制度之下，像奴隸之主人與奴隸，資本家與勞動者一樣，是依階級而區別；而在社會主義制下是依生理的能力以區別而已。在社會主義制下，國民義務的勞動義務當課加於一切的個人，在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得免却這樣義務的階級雖以爲是可恐怖的自由侵害而戰慄，然從無產者階級而言——如前所引的波耳哈特之議論中所有的——於實質上實與今日無異。

個人主義制下由一隻不可見的手所施行的強制，在社會主義制下是由社會之意識的機關之命令而行使。對於今日勞農俄國之勞動狀態，個人主義的自由論者分外在戰慄的原故，是因爲這外形的變化太令人注目了。

從來的俄國生產力之發達是落後了的，一朝實行社會主義，則直接的勞動之強制不得不大膽地勵行，不得不勵行所謂『勞動之軍政化』(militarization of labor)。突羅次克 (Trotsky) 在『Terrorism 與共產主義——駁 Kautsky』中之一章『勞動組織之問題』內說道：

『這(勞動之組織)不消說不是除去了從最穩和至最嚴峻的一切可能的表現的力之要素的。義務之要素，國民的強制之要素，不僅不從歷史的舞臺上隱退，恐怕在長時期的進行中，還要呈出大大的活用。

『經濟的困難之唯一的解決——在原則上及實行上都是正當的——是把全國人口看作必要的勞動力之貯水池——這差不多是不竭的源泉——嚴密地制禦這勞動之登錄、動員與適用……我們至少在我們的第一期，實行勞動動員之故，有充分地在廣汎的範圍內使用軍事的裝置之必要。(一)』

『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是表明從(依買賣底作用由市場及工銀之變更而行的)勞動力之不完全的分配，推移向通於縣省全國之經濟機關所行的勞動者之計畫的分配。這樣的計畫的分配以被分配的人們服從國家之經濟的計畫為前提。這是勞動義務之精髓，無疑地是一個基本的要素，被包含於勞動之社會主義的組織之綱領中。(二)』

『……在社會主義之下強制機關的國家將要不存在了。國家將完全被吸收於生產及消費之共同社會內，但是走向社會主義的路途，必經過國家組織之強化的道路，我們現在正在通過這個時期之中。譬如燈油將盡時，必大亮一次一樣，國家將盡時，取行無產者執權之形式，即取行於各方面掌握其市民生命的最無

情、的、國、家、之、形、式、在、此、困、難、的、過、渡、期、中、像、勞、動、階、級、之、國、民、的、組、織、一、樣、這、樣、嚴、烈、的、強、制、加、行、於、人、上、的、除、軍、隊、而、外、無、論、在、若、何、組、織、之、內、都、不、會、有、過、我、們、正、以、此、理、由、稱、之、爲、勞、動、之、軍、政、化、。』(三)

(1) "Soviet Russia," Vol. IV, No. 3-6 (1921)

(11) 同上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號 五一—五二頁。

(三) 同上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號 九一頁。

突羅次克又在俄國共產黨第九次大會上(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演說中說道(四)

『勞動者之多數在統一經濟制下，不得不全、依、軍、士、同、樣、的、方、法、由、某、處、被、動、員、到、某、處、被、送、到、某、處、指、定、到、某、處。這、是、勞、動、之、軍、政、化、底、基、礎。假、使、沒、有、這、個、的、時、候、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紊、亂、和、飢、饉、之、下、要、想、把、產、業、建、築、於、新、基、礎、上、那、是、甚、麼、也、不、能、認、真、想、到、的。』

帕斯屋爾斯奇 (Pasvolaky) 關於此問題有如次之記載：

『此制度中(勞動之軍政化)第一的根本要素是、一、般、的、強、制、勞、役、原、則、之、樹、立。這、是、說、國、內、一、切、的、人、民、凡、是、健、康、而、有、做、有、用、的、工、作、的、能、力、的、當、負、擔、着、從、事、於、何、等、有、用、的、工、作、的、義、務。假、如、有、這、樣、資、格、的、人、而、拒、絕、履、行、其、義、務、時、不、問、男、女、得、由、國、家、強、制、其、從、事。勞、動、軍、政、化、制、度、中、第、二、的、要、素、是、一、般、的、勞、動、籍、編、入、之、採、用。……在、以、一、般、的、兵、役、原、則、樹、立、於、法、律、上、的、國、家、當、服、兵、役、的、一、切、的、人、由、國、家、自、由、裁、度、被、編、入、於、兵、籍。一、旦、被、編、入、於、兵、籍、時、其、人、人、失、却、選、擇、之、自、由、及、移、動、之、自、由、全、然、服、從、於、國、家、之、權、力。蘇、埃、特、時、代、

以來，俄國所採用的勞動籍編入，與兵籍同樣的條件，精確地適用於勞動。

「爲普及勞動籍編入之觀念故，由勞動人民委員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從莫斯科以無線電信所發的布告中定義，其語如次：——「一般的勞動籍編入云者，是說一切的勞動者有從事於由國家所指定的工作之義務。」

「爲實行勞動籍編入之制度，其最初豫備條件是可以服勞役的一切市民之 *счетов*（戶口調查）或登錄。其第二條件是依職業而分類。其次是分析全國所必要的勞動，從勞動需要之見地上分別種種之事業。設立一特別的委員，名叫一般勞動籍編入委員，以實現此等條件爲目的，由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全俄非常委員會會長柴爾經斯奇兼任其委員長。其第一次開會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的月尾。

「在蘇埃特俄國，關於勞動所適用的軍政化之制度生出一個新名詞——用這樣名詞的機會不會有過，以前是決不會用過——即是勞動忌避。前面所述勞動委員會之布告中，勞動忌避者之定義是「忌避勞動籍編入的人們」……

「五月末關於勞動忌避的特別命令由「關於勞動忌避的委員長」所發布，對於種種形態之勞動忌避規定了一列的刑罰……

「其命令之第六條對於勞動忌避所定的刑罰如左：

「放棄其工作，於爾後三日以內被發覺的勞動者，縱係初犯，亦必須追還其所就業之地，且以 *salutano*

(怠業)之罪名被拘引於懲戒法庭。

二，怠業至前項之規定以上或再犯之勞動者，處以二禮拜以內之禁錮，或五六禮拜以內之期間被收容於懲戒勞役所。

三，對於被命令去執行公共作業的動員而遲怠其報告者，處以罰金及公的強制勞動，或處以三禮拜以內之禁錮。

四，隱蔽其專門或特向其所適當之作業而遲怠其登錄者，有相當之辯明時，處以罰金或二禮拜以內之禁錮；無何等之辯明時，五六禮拜以內之期間收容於懲戒勞役所或召喚於臨時革命裁判法庭。(六)

生產力發達之比較落後的俄國，承戰爭與革命之後，迅速地企圖着向社會主義制度之推移時，以這樣基於國家權力的嚴峻的勞動強制為必要，這是自然的徑路。據欣德曼所記述，在原始共產制下，怠惰是死罪。生產力發達如幼稚時，欲保證其全員生存的社會，要求其成員之勞動甚急，在此不得不有本於公的機關之有意識的計畫之勞動強制。我以這樣的原故，雖不能雷同於多數的 *Liberarians* (自由論者) 反對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期的國家之統制；然我相信馬克斯所說的由一種制度推移向他種制度時，想除去舊制度之『惡的方面』而保留其『善的方面』之全不可能；所以我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在社會主義制下全被蹂躪的事實，只想作如實的觀察。

如前所述，便在資本主義制下已有大多數的人為經濟的壓力所強制而勞動，只有少數的人得免於這種強制的資本主義制使他們得以生活於他人底勞動之故。現在在資本主義制下享受這種特權的人們，在企圖推

移於社會主義制的時候，被編入於勞動籍而受強制，雖然是很感不便，但在多數的人已如上所敘述，只是由無意識的自然的強制變為有意識的法律的強制，在實質上是並沒有甚麼劇烈的變化。不消說不怕牠就單是形式上的變化，單是自由之 semblance（假冒）之廢止，然以為於大多數勞動者之心理上是不全生甚麼影響的，這是退爾（D.）所說的一個心理學的謬誤。（七）但是這件事體於全體之生產力上究竟有何等的影響呢？雖有多數的著者主張着說，因此勞動強制之故使勞動之生產力異常減退了，然我於此暫不加以判斷，且待更多的事實之發現，且待更久的時間之經過罷。

我以為除去政治之自治化不論外，多數的勞動者（一）自覺到資本主義制下從來所謂的勞動自由之真相；（二）自覺到社會主義制下所產生的新的自由是不存在於免受國家權力之管理的自由，是存在於免受資本家階級之榨取之自由，要這樣的自由纔是『最神聖的人類權利』；這於發展社會主義制之支配上，是最必要的心理的要素。突羅次克說：（八）

『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創造——以「勞動之生產力增加」的不變的一個目標——是指新的基礎上的勞動者之組織，對於此等基礎的勞動者之順應，趨向於勞動之新形式的勞動者之教育……要改教勞動者當用如何的手段呢？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是支配 ideas，是不專依行爲的 propaganda（宣傳）。』

新的社會組織之創造，劍與筆同是需要的。我以為由思想之啓迪可以緩和由物理力的強制之必需，這怕是文明人特有的權利。

(四) Pasvolsky: The Economics of Communism, 1921, p. 192.

(五) 同上，pp. 189, 191, 194.

(六) 同上，p. 198.

(七) Dell: Socialism and Personal Liberty, 1921, p. 88.

(八) 同上，p. 93.

第四章 社會主義制下的個人之生活

〔原註〕這是波耳哈特底『科學的社會主義序論』(Borchardt: Einführung in den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1919) 中題為 Zukunftsstaat 的兩章，處處有省略的地方，然大體是直譯出的，爲前章參照之便，收錄於此。

第一節 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之非難

社會主義之目標，通常總容易以爲是生產手段之私有廢止。這是不正確的。私有廢止只是對於目的的一種手段。社會主義所企圖着的是社會組織之變革，廢除資本家的社會組織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是直接依存於生產；變革生產，則同時社會組織之變革也就實現了。所以社會主義之目標，可以說即是社會主義的生產之實現，或者如像奕爾虎特綱領(Erfurter Programm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舊綱領)上所表示的是『商品生產之向社會主義的生產之推移。』

然則『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甚麼意義呢？社會主義之反對者以爲社會主義者方面對此從未有滿足的說明，而他們爲補足這種缺陷之故，對於社會主義之『未來國』隨意捏造地羅列了許多惡狠的事項，對於社會主義

盡力地挑唆着反感。其中最有名的是自由黨領袖根理虛特 (Eugen Richter 一九〇三年死去) 底著作了。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之實現是怎樣地想法，並且資本階級全體和他一樣是怎樣地想法，我們在此且從他於一九〇三年所著的一冊小書題爲『社會主義者之明鏡』(Sozialistenspiegel) 的，引用其一二節來以見其思索的一斑罷：

(原本四一—四二頁)『私有財產……在社會民主主義之未來國中，生產手段之私有權已經不再有的，所以抵當證書，公債券，股票，貯蓄簿，及其他類似物之私有權，亦不得存在。於是私有權及相續權，必然地只限於直接供諸個人使用的物品了……』

『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貨物只以國家之豫計而生產，無論何人，於國家以外不能得到生活手段，所以各個人(婦人亦在內)對於國家不得不擔負勞動之義務，依國家所指定的而服務於勞動。』

『從勞動收益中須減去生產費，損失費，以及屬於共同經營的勞動手段與生產消費品——即資本——之維持或擴張上所必需的費用。其所殘餘，一部分作爲國家之設備(無論何人可以無費地利用的國家之營造物)，別部分分配於各個人之間。各個人間所得的分配不得不全然平等，不然時，因不用的享樂手段之儲積，又會見私有資本之發生了。』

『……據此書(卑貝爾底「婦人論」)所述，勞動時間對於一切的勞動者是均一的，家庭之生活限於夫婦間之共同生活，兒女是以國費養育於特別的設備內。食物之調治由中央之設備施行，衣服之洗濯修補也

是同樣……」

(二四—二六頁)『社會民主主義未來國中之家庭生活』(著者先引用 Kautsky 關於農政問題的著書而說道)：據考次克云，將來各個人於各自的家庭之內得營『愛』底生活，然而『愛』底生活中自己的兒女是不能不有。而卑貝爾之婦人論，是說兒女要全然離開兩老，以國費公育的。假使不這樣時，家族所有的兒女爲數不同，則不平等之狀態與不平等之要求便會成立了。兒女能回到兩老底家庭的會只有禮拜日一天，就好像現在的陸軍幼年學校底生徒一樣。

『並且家族要一同在自己的家裏會食，不論是禮拜日或不是禮拜日，不消說，都是辦不到的事情……各家庭中沒有廚房，有中央調食局代替了……家庭的生活只限於不能已的必要(卑貝爾婦人論一八六頁如是說)；因爲中央調食局之外，更有中央洗衣局，衣物都在那兒用機械化學的方法洗濯，乾燥，整理。(引用者在此加一小註，著者威更理虛特直到晚年猶是獨身生活者。假如我們的記憶如無誤時，他是到了六十三歲纔結了婚的。所以家庭內的洗濯是怎樣的麻煩，他好像是不知道的樣子。他好像把來當成了家庭內的一種喜事，在家庭內不洗衣服，是一個沒大的犧牲的光景)……』

『但是兒女不在，大人是每天三餐都在家外用食的，然則家庭生活還留着甚麼呢？這不是就像現在的客棧生活一樣嗎？現在的客棧生活至少早餐是在棧內用的，有時晚餐也可以不須外出呢。考次克還說在未來的居所裏，社會民主主義者還可以營『他的友誼』之生活。但是有友人來時，連冷的東西，熱的東西，飲的食

的，甚麼都不能供應，這豈不是大殺風景了嗎？

『丈夫罷工回來，他的夫人在不在家也不能保定；夫人也要盡勞動義務不得不出，並且勞動義務夫婦間是可以有種種的不同的。又據考次克說，未來國底人們或讀書，或從事於科學上及藝術上之創作，是人人底自由。但是要這樣時，我們不可沒有書籍入手。然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是不能買書的，充其量只能從圖書館借來。並且關於科學上及藝術上的事業，只限於關於科學及藝術的家庭需要。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中，無論是學者或是藝術家，都不能向外部獨立生產的，不然，則一部分之學者藝術家賺錢得名譽，在人人底生活狀態上生出平等來，便要構成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了……』

（五九—六〇頁）『監獄國 將來萬一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實現了時，會只是一個監獄國罷。全生產由國家經手之結果，為豫防生產之超過，國家不得不禁止職業及勞動地點之自由選擇。各個人不得不依從國家之所命令，於一定的地點作一定的工作。就像這樣，關於職業的個人之自由是全被蹂躪了。同時國家也不得不調節消費，以豫防生產超過需要時所常引起的巨大的損害。然而消費由國家調節，是蹂躪了對於生活享樂之種類的自由之選擇，是全然把各個人奴隸化了。——要之，今日的監獄，正是社會民主主義未來國之模型。』

關於『未來國』的這種描寫，不僅限於反對黨的煽動的文書中，有產者之學術的文獻中亦有表現。例如有名的邁奕爾百科辭典中，其說明共產主義之處如次：

『共產主義之特徵，是以爲人類之幸福和正當的經常的社會狀態存在於這樣的社會，這兒各個人之無條件的平等，是成立着的。所以共產主義之社會中，凡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無論如何的差別都不存在，而勞動之負擔，收入，享樂，都一切平等了。……一切的生產手段及享樂手段歸於總體之所有。在此無私有權，亦無相續權。社會依平等之原則以規定物財之生產，分配，消費。有勞動能力者都要受勞動底強制。兒童之養育以共同費用平等地施行。一切的共產主義者都在此思想範圍中活動，不消說，在個別的點上……亦互有相異的地方。……有一派（指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想用一個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實現共產主義，但在這時候，中央底官吏就像在木偶戲中操弄木偶一樣指揮着一切個人之行爲。……』

我們現在把橫在這些文章之基底上的思想摘出時，其大要如次：

假使不能得利潤時，則私人便不會有何等興致，使用其資本以事生產。私人之企業消滅了。因此一切的生產業都由國家之官吏所經營。國家成爲唯一的經營者。於是國家或其當局者便在各個人之上有非常的權力，可以使現在和過去的一切虐政只和兒戲相類了。因爲那樣的時候，各個人爲其生活不得不服從國家官吏之命令，而勞動於其指揮之下。不僅如是。因爲國家之官吏不得不時常注意着務使消費與生產相調協，則關於生產及勞動上僅僅指揮人們以嵌合於一定的型式是不夠的了。他們不得不還要勞心於消費底事項上；他們不得不指揮各個人消費的質與量。不然時，則消費過多，不得不出缺乏和饑饉了。又如某種商品因爲消費者不足，便不得不殘留而待腐了。所以官吏對於消費之不斷的干涉，無論如何是必要的。由是一切個人的自由，便於以絕跡。

還不僅這樣，官吏不外是準據『對於一切人的平等之權利』的原則而行動的。其結果是不得不向各個人課以平等的勞動量與同數的勞動時間，又向各個人分配以平等之消費。……於是人人底一切個性消滅，一切個人底差別消滅，一切都沉沒於寂寞的灰色的平等化裏。

第二節 對於社會主義之非難的答辯

數十年以來，以上的非難不絕地對於社會主義放射，總想把社會主義的社會當成可嫌厭的東西。現在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此當作若何的答覆呢？假使社會主義者頑梗地回答時，答辯是極簡單的。便是說：即使如反對論者所云，勞動階級也不因此而受何等損失：因為反對論者替社會主義的未來國所摭列的一切的不祥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的現在的國家對於勞動者是已經存在着的呢！我們請檢核一遍罷！

論者說，社會主義實現時，便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和勞動地點；但是在今日誰又有這樣的自由呢？只有恰巧到盡頭處選擇得有錢的父母而生下地的少數的人罷。此外一切的人不怕就稍為富裕，但在選業的時候，也不能不先問可不可以維持生活。而在勞動者底兒子，不怕他們就有絕頂的聰明，他們沒有錢去受教育，石匠底兒子只好世襲石匠，挖煤的兒子只好世襲挖煤。自由的選擇職業在他們是不成問題的。就是勞動地點他們也決不能自由選擇。只要有甚麼地方有事可幹這便不得不高興的了。

論者說，社會主義實現時，關於消費，關於生活之享樂，便不能自由選擇；但是現在的勞動者誰個又有這樣的自由呢？就想吃上等的牛肉，想喝芳醇的葡萄酒，想看戲，想聽音樂，想為養病或修學而旅行，沒有錢便是沒有自由

的。在現在的社會，有消費之自由的，只有有錢的富翁。貧窮的勞動者是失掉了自由的，社會主義的世界就說會成爲怎樣怎樣，在他們是毫無恐怖的必要。

反對論者又說，社會主義實現時，相續權便會廢止；他們雖這樣說來威脅我們，但在每日連吃喝都感困難的勞動者，拿甚麼金錢來使自己的兒子相續呢？

或者又說，社會主義實現時，人人都被課以勞動義務，夫婦們會整日整禮拜不能在家庭相聚；他們便這樣說來威脅我們，但是在倡言這種議論的先生們，他們是不會想到，這在數萬的勞動者中已經是早早就成爲現狀的了。總之，這等的不平，明明是有產者的不平，即是極少數的人過着目前安逸的生活，比大多數的同胞先受了種種的利益，他們怕社會主義實現時，會把這些利益失掉罷了。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總要把社會主義當成洪水猛獸一樣，苦心慘淡地羅列出許多事實出來；而他們拼命地所捏造出的事實，纔不外是無產者之大多數，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已經忍受着的，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呀！

對於反對論者頑梗地抗議時，我們以上的辯明爲已足，但是我們要更進一步，對於反對論者要提出我們這一方面的問題。據他們所說，廢止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消除利潤時，則有上述的種種惡果出現。我們現在姑且全部承認。我們就假定怕有這樣的惡果出現，便中止我們想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的努力。我們對於利潤全不敢捫觸，便使他依然繼續。假使這樣時，究竟會怎麼樣呢？

要答付這個問題，議論和想像都可不要，我們只看現在的事實，便能够十分明瞭而且確實地答覆。

Kölnische Volkszeitung —— 對於一切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取決定的敵對態度的中央黨之有力的機關報 —— 一九〇七年一月號載有次列的幾行國民經濟的雜譚：

『法國駱士階德一家底財產現在達到一百億法郎了。一百億法郎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呢？法國國民全體底富力是二千億法郎，即是這一家的財產有全國二十分之一。每年有二十分之一的財富，從貿易和產業上流到了這一家的錢囊呢。』

然而法國底富豪不僅駱士階德一家，與他相似的素封，無論是舊教新教猶太教的，無慮還有幾打，那末，我們可以容易想到，法蘭西全國的現存財產已全歸於這些富豪的幾百人的掌握之中；而其餘的三千五百萬或三千六百萬的法蘭西人是甚麼也沒有的了。還有更重要的，是繼續上文的次列的記事：

『駱士階德之祖先雅可布駱士階德移住於巴黎時，只有八十萬馬克之財產，在不足九十年之間便增殖到上記的巨額了。……然則駱士階德家以後將如何呢？這不待言是要更加繁昌的。老阿爾封士男爵在死前數日說道：「我的父親遺我以十億的財產，我現在遺我兒子以百億的財產。」而這十億變成百億是僅僅三十六年間的事。假使駱士階德家底財產以這樣的氣勢更見增殖時，將來在甚麼時候，法蘭西之全財產有集中於這一家的一日，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譬如磁石吸引其近旁的鐵片一樣，小財產便全爲大財產所吸收了，經濟學者瞭然失路地凝視着這個事實。……巨大的財產積聚於一人之手，這在現在可注意的社會政策上之現象中，尤爲是可注意的現象。』

然而這不僅限於法蘭西，也不僅限於駱士階德，美國號爲『石油大王』的羅克匪勒於一九〇六年度的收入不下二萬四千馬克，即是一日是六十六萬馬克，一小時是二萬七千五百馬克，一分鐘是四百六十馬克了。又據紐育底 Wallstreet 雜誌一九一一年六月號所報，屬於摩爾昂管理的財產之評價額實已達到二百五十億馬克（譯者云計數有可疑之點姑從原文）。

不消說，歐洲大陸與美國不同，還沒有弄到這樣的厲害。但是此等龐大的財產都是由利潤之獲得而生的。假使資本主義得以維持，私人所得的利潤得以容許，則無論何處的世界早遲要現出美國這樣的狀態，這是難免的運命。

資本家的利潤經濟以今日的狀態維持前進時，世界究竟會成爲怎樣，這是很明白的。資本之大部分現在已經歸到僅僅數百人乃至數千人底手裏了，將來還要集中於更少數人底手裏。若干的資本家擁有不可思議的巨額之財富，成爲絕對專制的帝王。君臨於其他一切人們之經濟的生存全部之上，以難堪的方法壓制此等人們底生計與勞動與消費了。此等資本家上其事業之經營上自然要支出相當的報酬，以雇用種種的職員，技師，監督，此等人們是所謂產業界的中等階級，是過活着相當的物質的生活的。但是此等人們時常有依其雇主之一顰一笑，便被蹴落於無產者階級之虞，決不是享受着個人的自由的。在此等中等階級之下，大多數的無產者成羣擁集着，失敗於競爭的落伍者愈多，無產者階級之數次第增大。而此等無產者階級底人於經濟生活上常處於無條件的隸屬之地位，一遇失業便陷入於極端的缺乏，這是不更待縷述的了。

這是資本主義之未來國底光景。

在此我們立在一個進退維谷的絕境前面了。要廢止利潤呢——那時可厭惡的社會主義的未來國會來。不廢止利潤呢——那時又有決不亞於此的可厭惡的資本主義的未來國會來。

在此便全無活路了嗎？

第三節 社會主義之未來國

據以上所述，無論是實現社會主義或維持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底將來都好像是不得不絕望的樣子，是這樣的時候，那反對社會主義論者所說的由利潤廢止所起的可恐怖的结果，究竟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倒很有綿密地研究的價值了。

不消說，我在此處是不想詳細考察『未來國』底樣子的，——這是甚麼人也是不知道的事情，要勉強想像牠，便只有陷入於非科學的空想。只是我們所專想研究的，是社會主義反對論者所說的那些結果，究竟是不是由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前提和要求所必然地出現，抑或能够生出與此不同的結果。

一切的社會主義之根本要求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是不認有利潤，不認有對於生產手段之私有權的一種生產，因而是沒有販賣行為的一種經濟秩序。社會主義所想實現的，不外乎此。

現在我們掉頭再看過去的經濟發展之進行罷，那是有如次列的順序：

自己生產（自行生產自行消費）

分業——手工業；

單純合作；

新分業——手工的工場工業；

機械之應用——大工業；

個個的企業之膨脹；

個個的企業之聯合——Ringe, Kartelle；

企業間之分業——Syndikate；

企業之合同——Trust 及其他；

最後，今日之最高形態，混合經營。

共通於一切的這些發展中，其次第所實現的是勞動之社會化。這樣的勞動之社會化，究竟是甚麼人招致的，甚麼人促進的呢？這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共產主義者，實是數百年來專握着生產界之霸權的資本家自身。本家經營種種的事業，不消說是為賺錢。但是要想賺錢，便有增加勞動之生產力的必要；要增加勞動之生產力，便有實現勞動之社會化的必要。這事是一切資本家所明悉的，也是他們不斷地所實行着的，就是將來也是要益加努力的。

然而由資本家所行的這種發展，今後如更進行時，我們不能不豫想着在將來的甚麼時候，與現在種種事業

被合同於混合經營下的趣向一樣，全國中的種種事業，必有全部互相連絡的時代到來。若然，則社會主義的生產之重要的一部分，即是生產之計畫性（Planmäßigkeit），已經是實現起來了。這不待甚麼社會主義者底助力，只是由於要使勞動愈見成爲生產的之必要，由資本家自己所實現的。成爲那樣的時候，就好像在現在的一個混合經營之內部，由某部對於他部的需要，只有豫事供給沒有生產物販賣之現狀一樣，那時生產之內部也不會有販賣出現了。

〔註〕資本主義漸漸發達，生產之規模也漸漸增大，這是過去數百年以來的不斷的發展傾向；但是自入今世紀以後，大規模生產方法之新方面的大規模經營，以企業合同之形式迅速地發達了的現象，尤足令人注目了。企業之合同有橫斷的（horizontal）與縱斷的（vertical）兩種；橫斷的合同是同種類的企業相集而合同於一個的經營（management）之下，所謂「脫拉司」（trust）即其模範。組織成一個脫拉司的企業數普通是僅少的，並且是限於大規模的企業。蓋因資本主義發達，機械之應用旺盛之後，生產業之規模益見增大，企業之單位數却次第地減少；如此繼續時，有某種性質的事業，其企業單位數會殘存到僅可以屈指計數的程度了。於是這等殘存的若干大企業遂相合而組成一個脫拉司，所以組成脫拉司的企業單位數，普通是僅少而且限於大規模的企業了。其次，縱斷的企業合同是由獨立的企業，各各分擔着去生產最後的（完成到由消費者可以立即消費之程度的）生產物之事業，相集爲一種企業而統一的。此種合同中世界第一大規模的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合衆國製鋼公司）。這個公司是由合同上重集合同而成的，現在的規模之雄大已可令人張目眩惑了。這個公司有鐵礦、煤礦、石灰礦之各種礦山遍於各地。鐵山與炭山之間設立工場，從兩方運其礦石及煤炭來，在此熔礦製鐵。在運送此等原料上又有連絡各礦山的鐵道由該公司經營，此外又有多數的船舶。公司工場中所製的銑鐵，於同公司的別的工場內製成種種形狀的鋼鐵。以此等鋼鐵爲材料製出軌條、鐵板、造船材料、建築材料、鐵管、鐵絲等，也是屬於該公司的各各工場底工事。此處所抄譯的波耳哈特文中，列舉資本主義發展之過程，所說的「最後，今日之最高形態，混合經營」便是指的這一種合同。

如前所記列的發展傾向，不爲國境所限，實際上在好久以前，已經早把國境超過了。例如里符曼關於煤油事業，便舉有次列的顯著的實例。一八九八年德國銀行與維也納銀行合同在羅馬尼亞創辦一所大煤油公司，這是要和當時供給西部歐羅巴諸國的美國及俄國底煤油相對抗的。但是不久之間俄國底煤油生產業者與此合同在一九〇六年便成了一個支配全歐供給的大煤油公司。這是對於美國有名的斯丹大德煤油公司——當時此公司已組成脫拉司，美國煤油生產整整百分之九十已歸入其掌握中——以競爭之目的而組織的。但其後兩者之間並沒有若何的競爭。不久在一九〇七年互相妥協，其結果是由德奧荷美法俄等國之資本家組成一個包括全世界的一大脫拉司，支配全世界底煤油生產及販賣。現在在此脫拉司之外，還有較小的煤油公司也在想依同樣的方法而規劃着呢。

這不過只是一例，其他一切重要的產業都是向着這個方向發展着的，所以這樣的時代必要有到來的時候，那時全世界之生產都是有計畫地被人支配着了。但可惜這樣的時候，只是使極少數的資本家愈見豪富，使沒大的權力愈見歸於他們的掌握，其他的生產者及一切的消費者不得不盡隸屬於他們的支配之下了。

脫拉司之發達以美國爲最顯著。所以我們在此只就美國底事例揭舉一二以示脫拉司之威力之如何雄大。一九一〇年四月發行的『經濟及統計年鑑』(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k und Statistik)所載：當時斯丹大德煤油公司單從德意志一國，每年有四千萬乃至四千五百萬馬克之純利。然而斯丹大德煤油公司究竟是甚麼人組織的呢？據理符曼所說，是有名的羅克匪勒，和已故亨利羅嘉司，和吉母司斯迪曼，只這三人而已。這樣看

來，羅克匪勒一九〇六年底收入在二億四千萬馬克以上，這是不足怪的了。一九〇七年度的煤油公司之純利已經差不多上了三億五千萬馬克，三人均分時已經是很大的金額了。又美國之鋼鐵脫拉司，一九〇七年度有六億八千萬馬克之純利，一九〇八年是四億馬克，羅克匪勒也是和這脫拉司有關係的。像這樣，世界之財富次第集中於極少數的大資本家之手。據一九一〇年度官廳統計之所表示，美國鐵路其全體四分之三，僅歸屬於九十三人之手中了！

隨着這樣財富之集中所起的最大的弊害，是在此等少數人的掌中，集中了一個可、恐、怖、的、權、力。直接隸屬於此等大資本家的，是他們的使用人和勞動者，但這是很多的人數的。例如鋼鐵脫拉司在一九〇七年度已經使用到二十一萬人以上了。但是還不僅這些使用人和勞動者，一般的消費者也是直接隸屬於這些大資本家的。大資本家無論要怎樣提高他們生產物之價格，消費者對此是全無能力的。不僅消費者無力，便是國家之權威對於脫拉司也是全然無力。『此等大資本家在各自的國度內收攬其政權於掌中，他們能夠左右立法，使於他們有利』（理符曼語）將來假如以此氣勢進行時，美國之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全部，全歸於此等少數大資本家直接支配之一日是會到來的。這是資本主義『未來國』之狀態，就以威根理虛特的幻想力恐怕也不能幻想得更厲害罷。

立在這樣事實底前面，我們所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呢？這是極明瞭的。——問題便是這個：我們一方面要保留着脫拉司之利益，即是在全地球上所行的生產之密接的連絡及其計劃的支配；而於他方面却要免掉牠

的弊害，即是使一切的人得免爲極少數的大資本家所擄取，所奴化——我們要怎樣辦到呢？

這個問題底解決手段是資本之沒收。但這決不是資本家自己所肯實現的。至少決不是最後所殘存的最大資本家們所肯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途中，多數的資本家不消說是倒滅了，資本家之數目是益見減少了。但是殘存者底權力也是因而愈見強大了。並且如像某某階級自行投棄其沒大權力的實例，我們在歷史上是不曾見過。爲自己的利益而增高勞動之生產力，又因之而不斷地變換其生產方法，這不待言是支配階級自身。然其必然的結果是由此而生出的社會組織之變革，這決不是由支配階級所能實現的。他們不僅不能實現，反會以其所有的力量反對社會組織之變革。社會組織之變革是由於素來處於被支配者地位的無產者，作爲劇烈的階級爭鬪之結果，始能實現的事業。

爲求資本沒收之實現，我們不得不經過無產者之階級爭鬪。這是最後的決絕的艱劇不可言的時期。要經過這個時期後，資本之沒收纔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於此纔得施行。社會主義的生產不外把近代的大經營之工作方法推廣至社會全體之範圍而已。

隨社會主義的生產所起的最顯著之事實，是社會上財富之生產之非常發達。本來財富之生產力是隨着工作之社會化而增進的，工作之社會化愈增，則財富之生產力愈進；便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之下，由於資本家底利己心，已使工作次第社會化，使企業組織愈見成爲巨大的規模；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是要把這工作之社會化，實現到社會全體的，則因此所生的生產力之增加，恐怕在我們今日是夢想猶難的了。

富之生產成就了這樣偉大的增加時，（原譯者註：這樣偉大的生產力之發展要到共產主義之完成期始能發現，此處波耳哈特所言，應當看作是關於共產主義完成期之說法。）要滿足一切人們底欲望也決不是困難的事了。於是對於各個人之消費，除以各個人之欲望為標準外，以別的標準為必要的事情便全然消滅。

這是特別重要的所在。因為一般的人往往以為社會主義實行時，『對於勞動收益全部之權利（勞動全收權）』是會實現的，或則『對於同一的勞動是同一的工銀』這個原則是會實現了的。此中第一的對於勞動收益全部之權利（勞動全收權）是全無意義，因為各個人的『勞動收益』究竟有多少，便在現今也是不能決定的，在社會主義之共同團體中更是不待說了——各有各的生產物是由極多的人共同工作之結果，各個人貢獻了多少，從而各個人應得收益若干，這有誰能決定呢？第二的原則也是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社會主義是要實現出全無工銀存在的狀態的（原譯者註：但是這種狀態之實現也是在共產主義之完成期以後，到達那個時期之前與今日同樣的工銀大體是殘存着的）。社會主義完全地實現了的社會，可買的『商品』沒有，勞動者以貨幣之形式受領工銀來作何使用呢！各人的消費應得與各人的工作相應，這種想法是非社會主義的想法，是應該排斥的。一切的貨物既已豐富——並且此事是社會主義的共同團體之第一前提——此等限制便全無存在之必要了。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內，究竟誰來決定欲望之種類及其大小呢？假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有人能有權利或威力，對於各個人規定其所消費之種類及分量時，社會主義的社會正成為『監獄國』而個人之自由真是掃地無存了。

但幸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內沒有規定這樣事情的必要。物質既已豐富，各人所欲得的物品隨時都可以到手（原譯者註：但這種社會狀態要到共產主義之完成期纔能實現），則人人從單純的放恣而濫費物品的事實，是無須憂慮的了。無論甚麼人，一食過飽而傷胃時，其後便能以如量而滿足。所以我們可以明白地斷言：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規定個人欲望之種類及分量的是個人自己。我們可以痛快地斷言：彼『各取所需』的文句，作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消費之根本原則的，不外是『各人各得其所欲得之物』的意思。

『無論是甚麼，怎樣，何處，各人得以消費其所欲』的這個根本原則實現時，我們纔能得着真正的個人自由之前提。因為要各個人無論在甚麼地方都能得其生活底保證時，各個人纔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職業。無論何人於其選擇職業時，假使不能專以自己的能力，天分，性好為標準而決定，不能安於其地位，勝任愉快地以從事於勞動時，這人我們能說是『自由』嗎？在今日的社會，處在這樣境遇的人，只限於富豪們的極少數的公子。其他過活着相當的生活的人，在選擇職業時，總不能不先考慮其能否弄錢。說到無產者來，個人的希望和能力是從始以來全不成為問題的。職業和地點均由父母所強迫，而成為終生之苦厄。然則我們要使人類自由，我們不能不在勞動的方面，使他自由了。社會主義對於各人是隨時隨地都得保證其生活之安全的，要到這時候人類底解放纔能實現。真實的職業選擇自由一旦實現時，各個人纔能從事於對於自己有愉快與慰樂的事體，其結果是勞動纔成為牠本來的面目：『真的生活之享樂』了。迴避勞動的憂慮不會有，勞動之生產力反會顯著地增加。從而強制人人去從事勞動的必要也沒有，人們關於勞動能夠享受真的自由，由此『各應所能』的根本原則，可以解釋為『各人

爲、其、所、欲、爲、了。

世界上的狀態成爲了這樣的時候，那便是「社會主義之未來國」那和社會主義反對論者所描畫的恰恰是正反對。那決不是甚麼「監獄國」也決不是甚麼「寂寞的平等化」。反是要在這條路上，纔能奠定基礎，在這基礎上從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下，爲經濟上的缺乏所壓迫所消滅了的人格，纔得於其充分的自由和多樣性上發展。我們只要是想引出正當而且合於論理的結論時，以上所述，正是從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前提和要求所生出的結果。這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有名的一切代表者，常以人格之完全的而且自由的發展爲其最高之目標的，正相合致。試舉一二實例罷；一八四七年馬克斯及恩格爾斯所寫的『共產宣言』中有云：

『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舊有產者的社會消滅，一個共同團體代之而興，在這兒各個人之自由的發展，是對於萬人之自由的發展之條件。』

又馬克斯於其『資本論』上（一）說：資本主義制出生產力及生產條件，

『只有這點是奠定一個更高級的社會狀態——其根本原則是存於各個人之完全的而且自由的發展——之基礎的。』

又一八七五年，馬克斯於批評果達綱領（Gothlar Programm）的書簡（二）中有如次述：

『在以生產手段之共有爲基礎的，組合的（即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內，生產者不行其生產物之交換：

……』

他接着又說到『過渡期』之社會，即『初從資本主義之社會中產出的共產主義的社會，於一切的關係上，無論是經濟的，道德的，精神的，還不會脫去其所從出的母體之舊社會底遺風』的社會，他在這兒加了若干的說明。據他說，在那時各個人是應着各個人所做出的工作而受取一定分量之消費物的。他以爲這樣的制度到底要招致不公平的結果，『但是此等弊害，在共產主義的社會於十分難產的苦痛之後，剛好生出時的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期，是所不能免的。』共產主義經過了過渡期，終於達到完成的時期時，便全然改易其面目了。

『於共產主義的社會之更高級的一階段中……生產力與個人之全面的發展，同時增加，共同的富之一切的源泉十分流出之後——社會始從狹隘的有產者的法律的地平線上拔出，且在其旗號上可以書着「各應所能，各取所需」的標語了。』

社會主義之未來國便是這樣。

(1) Das Kapital, Band I, Kap. 22, 3. (Volksausgabe 1914) S. 527.

(二) 本書下篇第一章有詳細的說明。

〔沫若附白〕此文初稿係據日文重譯，蒙何公敢兄以波耳哈特原書見借，得以逐次與原文校閱一遍，甚爲感謝。河上氏譯文省略處頗多，但大抵無關緊要，故未補入。原譯有過於自由處，譯語亦偶有失當處，於重校時大多改削了。

下篇 關於社會革命的若干之考察

第一章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之過程（馬克斯之理想及其實現之過程）

馬克斯是以若何的社會爲其最後之理想的？要實現這個理想時，他以為須得經過若何的狀態？我現在不想把這問題底全面詳細地在此展開，我只把他一八七五年所寫的信札爲材料，專記述這個問題之關於經濟方面的部分——政治方面的部分力從省略。這封信札是馬克斯對於德國當時的社會黨之綱領，即所謂果達綱領之批評，是寫着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期寄給剝拉克的，是在他死的八年前的手筆。我們據此可以窺見他晚年成熟的思想，而信中關於經濟方面的思想尤爲詳細，在知道『馬克斯之理想及其實現之過程』的經濟方面上，最重要的是資料。德國國內在他死後八年之一八九一年始發表於『新時代』（一）雜誌中。

(1) Die Neue Zeit, IX Jahrgang, I Bd. S. 561-575 (Zur Kritik des sozial 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Aus dem Nachlass von Karl Marx.)

第一節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之過渡期

據其信札所說，馬克斯之所謂共產主義分爲二期：第一期可稱爲半成期，第二期可稱爲完成期。在此等時期之前，由資本主義社會推移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更有一個過渡期——我覺得馬克斯是這樣的想法。

先述他所謂過渡期：

『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由此至彼的一個革命的變革時期存在。因之乎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期與之相應，此時期之國家，不能外乎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獨裁）。』（五七三頁）

這個時期橫陳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嚴格地說時，還沒走進到共產主義底第一期，這從經濟方面而言，是『革命的變革時期』；從政治方面而言，是屬於所謂『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的『政治的過渡期』。

關於這過渡期的說素，馬克斯在寫此信之前將近三十年前的一八四七年末，和恩格爾斯共同起草的『共產宣言』中，也頗有詳細的敘述。『共產宣言』第二章之開首處有云：

『共產黨之最捷近的目的……是無產者之階級的形成，有產者支配之顛覆，無產者的政權之奪取。』無產者依此以導引社會從資本主義走入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過渡期因此而開幕。社會雖不能因此一舉而一躍及於共產主義之第一期，然此是屬於無產者革命之第一步的事業。故同章之結尾處更有次語：

『勞動者革命之第一步（der erste Schritt in der Arbeiter-revolution）是把無產者昇進到支配階級而戰取民主主義。』

此處所謂『把無產者昇進於支配階級』意思是把有產者支配着的社會變更為無產者所支配的社會；而所謂『戰取民主主義』是說把少數有產者的民主主義（Democracy）變更為多數無產者的民主主義。所以前面的

信札中說，『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die revolutionär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開始，社會始入於『政治的過渡期』成功了。『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革命的變革。』

此過渡期中『革命的變革』之眼目，據『共產宣言』是存於

『無產者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漸次把一切的資本從有產者奪來，把一切生產機關集中於國家，即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者之手；由是可以盡力迅速地增加生產力之總量。』

然則這樣的事業以怎樣的方法從事呢？

『這件事業不消說在最初的時候是專以專制的侵害加於有產者和有產者之生產關係，而其方法在經濟上好象是不充分而且不能持續的樣子；但是隨着運動之進行自然會跳出其圈外，並且要變革全部之生產方法在手段上是不可迴避的。』

由此觀之，無產者掌握政權，入於所謂『政治的過渡期』而成功社會組織之『革命的變革』時，是對於有產者之所有權加以專制的侵害，對於從來的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所維持着的資本家本位之生產關係加以專制的侵害。要把一切生產手段集中於國家之手，除行此專制的侵害外，別無有效的方法。這個方法在經濟上好象不能持久，但這不僅在變革全生產方法上是不可迴避的手段，而在事件之進行中，一時的損害漸次消滅，最後終可達到『可以盡力迅速地增加生產力之總量』的目的。

這便是馬克斯所謂過渡期之狀態；此從政治方面言時，是無產者執權之實行；從經濟方面言時，是一切生產

手段歸於國有，革命的變革因以實現。俄國革命是稱爲純粹地奉行馬克斯主義的，目下的俄國便正在這個過渡期內，嚴格地說時，她還不曾踏進共產主義第一期裏。

〔註〕經過過渡期後入於共產主義底半成期時，社會富之分配是以各人對於社會所提出的勞動之量與質爲標準；然入於完成期時，則各人底要求以各人底欲望爲標準，如後所述，馬克斯在本信札中是說得很明白的。但是在入於此等時期之前的所謂過渡期時，以何種標準而行分配呢？關於這一點，卻沒有何等的說明。在現在的勞農俄國，又取的是怎樣的方法呢？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就突羅次克底『勞動組織之諸問題』一文中有如次述：

『對於勞動的工銀，還殘存於我國，恐怕是、要、繼續、殘、存、的。不消說歷史之後，其重要處漸漸成爲只在對於社會一切成員供給其所要求的一切物資之必要；就以這樣，牠便會漸失卻其對於勞動的工銀之性質。但是在現在我們要實現到那個地步時，我們還沒有十分的富力。我們主要的事功是在增高所生產的貨物之分量。而其他一切的事功便從屬於此。像在現在的困難的時期之內，對於勞動的工銀在我們並不是確保個勞動者之生存上的手段，只是記錄個個的勞動者以其勞動爲「勞動者之共和國」效了若何的貢獻之手段。

『所以對於勞動的工銀，無論是以貨幣底形式或以實物底形式，不能不盡力、正確地與個個之勞動之生產力一致……由是比他人對於一般的福祉更多所貢獻的勞動者，自然比怠惰者，不成材者，秩序紊亂者，對於社會之生產物有得更多分量之權利。』Soviet Russia, Vol. IV, No. 3—6 (1921)

在過渡期中又有階級之別。階級之區別全無時，社會始入於共產主義之第一期（社會主義時代），社會成員始一切成爲勞動者；然在未入其時代之前的過渡期中，一切的人不能都是成爲勞動者。但使除去關於勞動者之工銀以外，與共產主義第一期中所行的原則是並差別的。

過渡期完結後，於經濟方面，一切的生產手段之國有始得實現。生產手段之國有既已實現，則私有生產手段者與無者之區別，即有產者與無產者階級之區別消除。階級之區別既已消除——因爲無產者階級之消除，於政

治方面無產者之執權（獨裁）也自然消失。然而據馬克斯底見解是，依此生產手段之國家的統一與勞動之社會的結合之『全生產方法之變革』必然地招致巨大的生產力之增加。巨大的生產力之增加既已實現，社會到此始入於共產主義之組織。馬克斯說：此時是『人類之前史』告終，其真的歷史之第一頁始行展開了。

第二節 共產主義之半成期

過渡期完結後，社會始入於共產主義之時代。然而馬克斯思想之特徵是注重在歷史的發展的。他不是烏托邦的夢想者（utopian），他是進化論者，這一層雖不妨害其為革命主義的資格（參照次章『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然使他深信着完成的共產主義是不能一企而及的，於此他以爲共產主義要先經過半成期，然後才能達到完成期。

此點在『共產宣言』也充分地表現着：

『隨着（過渡期的）發展之進行，階級之區別消去，一切的生產集中於團結着的個人之手中（in der Händen der assoziierten Individuen），由是公的權力便失其政治的性質。狹義的政治的權力是一個階級所組織的權力，以壓制他階級爲目的的。無產者對於有產者爭鬪時，雖必然地結合爲階級，依革命手段而自成爲支配階級，以支配階級底資格高壓地（Gewaltsam）廢止舊式的生產關係；然他們廢止了這種生產關係時，同時把階級對立之現成條件和階級之一般（die Klassen überhaupt）也廢止了，於是乎便廢止了階級上的他們自己的支配。代替從來的有產者的社會，有階級和階級之對立的，而成立一個共同團體，在這

兒各個人之自由的發展是對於萬人之自由的發展之條件 (eine assoziation, worin die freie Entwickl-
ung eines jeden die Bedingung für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

『共產宣言』中只敘述了這一點，其大部分是隨伴過渡期中的諸種現象之列舉，其次關於所產出的共產主義之社會只敘述着『代替從來的有產者的社會，有階級和階級之對立的，而成立一個共同團體，在這兒各個人之自由的發展是對於萬人之自由的發展之條件』的這一句。然而一八七五年底信札中，關於共產主義的說素卻明明分爲二期了；其第一期之狀態先述如次：

『我們在此所想論究的，不是發展於固有的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之社會，卻是初從資本主義產出來
的共產主義之社會。即是於一切的關係上，無論是經濟的，道德的，精神的，都還不會脫去其所從出的母體之
舊社會底遺風的。在這樣的社會內，個個的生產者——減去爲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後——正確地取還
他所給與於社會的。他所給與於社會的，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領取一張證券，證明是供給了這
樣分量的勞動的（減去爲共同團體之基本金的該個人之勞動），以此證券從消費物之社會的貯藏中取出
與勞動所費的同量之物。即是凡於一種形式內給與社會的勞動，於別種形式又如量地從社會取回。』

這是過渡期過後，已經入了共產主義第一期的事情，所以在此沒有以生產手段爲私有，而收獲『坐獲收入』
的階級，一切的人都是社會底勞動者，與其所提出的勞動相應地從社會上各各取得一定的報酬。各個人『於一
種形式內給與社會的勞動，於別種形式內又如量地從社會取回』在這一點上，就說所謂『對於勞動全部收益

的權利』是實現了的，也是可以（但是從勞動全體收益要減去為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從這一點而言，各個人是不能完全地收回其勞動收益之全部的）。然則在這樣勞動全收權公認着的社會，果然是馬克斯所理想的社會主義之未來國嗎？否，否，據馬克斯底見解，勞動全收權也和一切的權利同樣，都不過是有產者社會之殘滓。他在同信札中繼續說明此事：

『此處明明與規定着商品之交換（如是同一的價值之交換時）的有同一的原則支配着。不消說，在變化了的事情之下，無論何人不能提出其勞動以外之物，而於他方面在個人消費物以外，無論何物也不歸屬於何人所有，所以內容和形式都是變化了的。但是關於個個的生產者間消費物之分配，與商品同價量之交換有相同的原則支配着，即是於一種形式的勞動與他種形式的同量的勞動相交換。

『不消說在商品之交換上，「等價物之交換」的原則只是在平均上存立着，對於個別上是不能存立的；而在這時候，原則與實際之不一致處卻不會有。但是其平等之權利，從原則上言，仍然是有產者的權利（Das bürgerliche Recht）。

『此所謂平等之權利，雖有如上述的進步，然仍負着有產者的制限。（何以故呢？）因為生產者之權利是與其所提出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是存在於用「勞動」這個同一的尺度而測量的上面。（所以其結果是免不了種種不平等之發生。詳言時）某人對於他人肉體地或精神地優勝時，則於同時間可以提出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够在較多的時間內勞動。以勞動為尺度而使用時，不得不斟酌其張力及強度（Ausdehnung und

Intensität)。不然，則不成其爲尺度。（因爲有這樣的原故，所以）此所謂平等之權利實是對於不平等的勞動的不平等的權利。（不消說）各個人和他人同樣都只是勞動者，階級之區別是不會容認的。但是在暗默之間把不平等的個人的天分，又從而其不平等的個人的辦事能力，是認爲自然的特權的。所以，平等之權利與一切權利同樣，從其內容而言，時是不平等的權利……更如某勞動者結了婚，別的勞動者還沒有結婚，某人的小孩子比別人更多之類，有這種種的差別。所以同是做一定的勞動服務，對於社會之消費財，雖是得到同一的份子；而一個人所得的物品事實上會比他人更多，一個人比他人更富的事情是會有的。要想避去一切的這些弊害，不得不使平等的權利成爲不平等。

『但是此等弊害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經過難產的苦痛之後，初從資本主義的社會產出時的第一期中（erste Phas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是不能免的。一切的權利決不能超過社會之經濟狀態及由經濟狀態所決定的文化之發展。』（五六七頁）

據以上的引用文看來，在那兒有『在變化了的事情之下，無論何人不能提出其勞動以外之物，而於他方面在個人消費物以外，無論何物也不歸屬於何人所有』又有『各個人和他人同樣都只是勞動者，階級之區別是不會容認的』這樣的文句，這明明是一切的生產手段已歸諸社會公有，從而在社會上已無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階級區別的時期——即是已經經過所謂過渡期而入於共產主義的時期——之社會狀態了。社會雖已入了共產主義，然於其初期猶未能脫盡舊有社會之薰習，關於生產物之分配，不能立刻採用『各取所需』的原則，爲獎勵各

人之勞動上，有準應其所提出的勞動之分量而決定財富分配之必要。即是已經入了共產主義之後，於其第一期與勞動全收權相近的權利是容認着的，但有權利之主張處便沒有平等，一切的權利都是不平等的權利。各人以其提出的勞動之質量如何而得相應的分配；不怕是有同程度的需要的人，甲則多得消費手段，而乙則得少；不怕就是需要更多的人而比需要更少者反而少得；這樣的不公平是會發生的。並且各個人既認有一定的權利，則為保護其權利上須有一定程度的國家之權力。有權力強制的地方，是沒有完全的自由的。所以在社會已經入了共產主義時代，而於其第一期中，舉凡平等，正義，自由，都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地域；但是此等弊害，據馬克斯想來，到底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節 共產主義之完成期

所謂過渡期要經過多少時候呢？共產主義底第一期又要經過多少時候呢？馬克斯對於此沒有甚麼答辭。列寧也說 *wir wissen es nicht und können es wissen*（我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但是共產主義『在共有的基礎上發展』時，早遲社會之生產是會巨大地發展，將來保證個人底生活終不會是困難的事業了。那時候共產主義經過其半成期始入於完成期，關於此時期底光景馬克斯信札中有如次述：

『於共產主義之更高級的一階段（in einer höheren phas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中，分業下個人之奴隸的隸屬（die knechtende Unterordnung der Individuen）消除，從而精神的勞動和肉體的勞動之對立也不存在之後，生產力與個人之全面的發展同時增加，共同的富之一切的源泉十分

流出之後，——其時社會始全從狹隘的有產者的法律的地平線 (die enge bürgerliche Rechtshorizont) 上拔出，在其旗號上可以書着「各應所能，各取所需」(Jeder nach seinen Fähigkeiten, 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 的標語了。」

此處的『各應所能』是隨其能力以爲財富之生產而勞動的意義，『各取所需』是使各人隨其欲望以消費社會之財富的意義，這是最簡明地把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根本原則說明了的。就是現在，在家庭之內部這個原則也是實行着的：例如老人病人或小兒等幾乎全不勞動的人，也能各應其要求有衣食之供給。尤其是病重的人，既已全不勞動，而對於病體之保養上只要是必要的東西，或服以種種高貴的藥品，或養以滋補料，或請看護婦服侍，比勞動着的人，有時還要消費到很遠很遠的程度。雖然不勞動，只要必要時也還是要把必要量去供給，這是人之所爲人的生活。一方面有人全無必要而多事儲蓄，別方面卻有人深感必要而困於窮乏，這樣的情形決不能說是愉快的狀態。各人應其必要而受物之供給，要這樣纔有完全的公平，要這樣纔有不附差別的真的平等；而共產主義正是想把這個原則實現於社會一般的。這件事情只要是能夠，想來不會有人不贊成的。只是這樣的事情之實現，於別的方面不生若何弊害便能成功與否，這倒是一個問題，便是馬克斯他也不是以爲這樣的原則之適用是立地可以實現的。他是十分承認着，在這原則之實現上，須有巨大的生產力之發展爲其先決條件。所以他說這樣的原則要『於共產主義之更高級的一階段中，』在『生產力與個人之全面的發展同時增加，共同的富之一切的源泉十分流出之後』纔是可能的。

『各取所需』的原則既已實現時，各人便皆得受一定的生活之保證。各人已經得到生活之保證，則無以工作為生活之手段而從事的必要。於此『勞動不是謀生的單純的手段，而其自身卻是第一的生活要求』也同時實現了。各人已無以工作為謀生手段之必要，於工作自身發現目的，即是為工作而工作時，各人之『自由的發展』始得實現。馬克斯名此為『個人之全面的發展』。各人成就其全面的發展，各各熱中於其業務時，社會之生產不消說是要非常增加的。所以馬克斯說『生產力與個人之全面的發展同時增加，共同的富之一切的源泉十分流出』並且各人均得保證其生活時，則不會只有貧窮人專於負擔肉體的勞動的經濟上之壓迫，因而也沒有『分業下個人之奴隸的隸屬』了。世間上萬人均得保證其生活，教育不僅為有資力者所獨佔，因而個人底才能得以平等地發展，基於境遇之不同而生的人為的懸隔便消滅了。困難而不快的肉體的勞動歸於社會全體之負擔，一切的方面都有機械之發明與應用，其大部分更轉化為『自然』之所負擔了。由是『精神的勞動和肉體的勞動之對立亦以消除』。要之，此等事情是都有相互關係的同時存在之現象，是於所謂共產主義之完成期中相並而實現的狀態。

以上是專言共產主義完成期中的經濟方面底事情，現在我想順便也稍微說到一點政治方面底事件。如前所述，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過渡期』中，有『無產者之執權』即是於此時期內，『組織成為支配階級的無產者』行使武力的強制。那時我們的社會生活是由強力（Coercion）以嵌合一種定型之中，在這一點上說來，與現在的社會無異。但是『組織成支配階級的無產者』佔社會成員之最大多數。多數者之階級支配少數者之階級，比少數者之階級支配多數者之階級的時候，比較容易。所以隨着『過渡期』之推移，強制的壓力之必要

也漸漸減少。逮昇到『共產主義第一期』的時候，那兒已經沒有階級之區別存在了，一階級壓制他階級的組織力，即『共產宣言』中所說『狹義的政權』之行使全不見其必要。但是此時期中猶殘存着有產者社會之遺習，對於社會各成員應其所提出的勞動須容認其有一定的權利，爲保護其權利上，仍要有一定的組織的社會力。強制的壓力之必要雖已非常減少，但還未全盤絕跡。逮至更進而入於『共產主義的社會之第二期』時，『各應所能』而勞動，『各取所需』而受供給，在這時全不見有何等組織的權力之必要。不消說，我們現在便在一家庭之內，也不免時而夫妻反目，時而婦姑勃谿；將來即使各人底生活得以保證，人與人間之不和爭論要想全然斷絕，恐怕是不可期待的。但是那時的不和或爭論並不會是那麼重大的事情，好像現在的社會一樣要有強大的組織腕力——例如軍隊警察監獄等——去彈壓的。於是社會是成了無爲而治。馬克斯認國家爲強制的權力之主體，所以共產主義第二期是認『國家』爲無用的時代了。一八七七年恩格爾斯於其所著『威根杜林格氏之科學之變革』一書中對於此項消息曾有所概述。茲引用其一節如次：

『在階級對立上活動着的從來的社會是以國家爲必要的。……國家是公的代表者，當然是結成爲眼可見的一個形體的，但是其得以如是之故，是限於牠在各個時代只是代表着全社會的階級之國家。在古代的時候，她是領有着奴隸的市民底國家，在中世紀的時候，她是封建貴族底國家，在現代牠是有產者底國家。然而國家到成爲全社會之事實的代表時，同時便自歸於無用。壓制某階級的必要已經沒有了。……國家是特別的壓制力，因而也是沒有用處。……對於社會關係的國權之干涉，從某種範圍至他種範圍漸次地不用，

像這樣牠自己便靜靜地死滅 (absterben) 在人上行使的統御沒有了，只有物財之管理 (Verwaltung) 及生產過程之指導。國家不是廢止 (abschaffen) 了的，是永眠 (einschlafen) 了的。』

不以國家權力之行使爲必要的社會，這正是馬克斯底理想社會，這在共產主義底完成期纔能實現。馬克斯在『資本論』(一卷二十二章) 上說的『其根本原則是存在於各個人之完全的而且自由的發展中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以及『共產宣言』中說的『各個人之自由的發展爲萬人之自由的發展之條件的一個自由團體』便說的這個社會了。總之，馬克斯是想望着這樣的理想社會而長逝了的。但是這樣的理想社會，能打着『各應所能，各取所需』的旗號，使國家底權力死滅永眠的，這到底要幾時纔能來？這是要在百年之後或是要在千年之後？馬克斯在這封信中甚麼也沒有說及。

第二章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

第一節 問題之所在——馬克斯學說中之所謂二個的交流

關於社會革命的議論，在馬克斯(及恩格爾斯)之一生中所遺下的文獻內，有一見便覺得是互相矛盾，到底是不能相容的實例。我現在想引用其二於此。

第一，我是舉過好幾次的，馬克斯『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唯物史觀之公式內有次揭的一句：

『一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尚有餘地使其盡量地發展時，是決不顛覆的；並且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未含孕於舊社會底胎內以前，亦決不會發現。』

這是馬克斯壯年時代之所執筆，但據他自己說，是「一旦悟得之後，便成爲了我的研究之指南的普遍的結論的。」他至死也不會加以訂正過。並且他在八年之後，一八六七年出『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時，他在序文中也這樣說道：

『在產業上比較發達了的國家，對於發達低度的國家，示以牠自己將來的影像。一個國民是可由他國民做學的，並且是能由他國民做學的。不消說，一個社會就算把牠的進行底自然法則探索着了，——闡明近代社會之經濟的進行之法則的，便是本著之最終目的——那個社會不能跳過自然的發展階段，也不能依法而排除。但是，牠可以縮短並且緩和生產底痛苦。』Das Kapital I. S. VII, VIII.

據此看來，馬克斯底意見是：社會組織之改造（一種社會組織向他種新的更高度的社會組織之推移，即社會革命）是決不會實現的，假使一切的生產力在從來的組織內還有發展的餘地的時候。在社會之進行（即由一組織向他組織之推移）上有一個自然法則支配着，社會是不能跳過自然的發展階段，也是不能由立法以排除的。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在現存的社會組織之內一切的生產力還不會達到發展到盡頭的時候，『只以單純的 Ueberrumpelung（襲擊）而欲贏得 die soziale Umgestaltung（社會的改造）』（註）這是當然歸於失敗的了。

〔註〕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卷頭 Engels 序文中語。

我們從馬克斯與恩格斯底許多遺著中，還可以引用和這相類似的許多文句。但是只是上引的簡單的一二句已經很明白地表示着他們對於人類之宿命是極從順的了。時機未成熟時，單依政治革命以圖社會組織之

改造（社會革命）是怎樣無謀的舉動，他們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們終生所信奉的是從唯物史觀所生出的論理的必然之結果。

然而在別一方面他們又期待着要求着於最近的將來有政治革命之爆發，這樣的文句亦數見不鮮地散見於他們的遺著之內。試從最膾炙人口的『共產宣言』（一八四八年馬克斯與恩格爾斯共著）中引用其一二例罷：『共產宣言』第二章之開首處有云：『共產黨之最捷近的目的……是無產者之階級形成，有產者支配之顛覆，無產者手中政權之奪取。』無產者『於現存社會之內部經過或多或少之潛伏的內亂，遂達到一個公然革命底爆發，由是無產者乃強壓地使有產者顛倒，而自樹立其支配。』然後他們纔能負擔着『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漸次地把一切的資本從有產者剝取，把一切的生產機關集中於國家之手中，即組織成爲支配階級的無產者之手中，由是盡力迅速地以增加生產力之總量』之任務。所以共產主義者正是以輔助無產者這樣的事業爲其目的的。『共產主義者以隱秘其見解及企圖爲卑陋。他們公然地宣言，他們的目的只有由強壓地顛覆一切從來的社會秩序纔能達到。使支配階級在共產主義者革命之前戰慄，無產者除鐵鎖之外甚麼也沒有可以失掉的東西。他們所得是全世界萬國底無產者嘯團結起來罷！——這是『共產宣言』最後的結語。

把這些文字看來，他們又明明是要使支配階級戰慄的政治革命（怕是由暴力的）之主張者。在前關於唯物史觀作理論的思索時，他們在人類所負的運命之重擔下，那樣極端隱忍從順的人，現在却猛然擡起頭來，宣言社會組織之改造，只有強壓地顛覆一切從來的社會組織纔能實現了。即是——暫且用不精確的通用語表示時

——他們在前是沉着的進化主義者 (evolutionist)，在後却又成爲狂熱的革命主義者 (revolutionist) 了。在前他們是很像右傾，在後他們却很像左傾了。我前面所說：關於社會革命的議論，他們一生之中所遺留的著述內，一見有互相矛盾到底不能相容的地方，便是指的這一點而言的。

第二節 戎巴達與豚涅司之解釋

如上所述，一面好像是右傾着的進化主義者，一面又好像左傾着的革命主義者，這到底是矛盾不是矛盾呢？本章底主要目的，便是在解釋這個問題，只是在敘述我自己的意見之前，我且先述一二位學者底所見。

戎巴達之『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一書是頗爲通行的，我現在手中有的是已經賣盡了五萬部的第八版了；其第一篇第四章『馬克斯主義之批評』之第一節『馬克斯學說中之矛盾』其說如次：

『余於十八年前始公佈此書，與於前章所記述的同樣，以馬克斯及恩格爾斯爲現實的（或者歷史的）社會主義之建設者而舉其特徵的時候，我在我的記述上追加了次項的注意：

『不消說，以通俗的見解看來，馬克斯及恩格爾斯……在我所欲舉示於諸君的，會現於全然不同一種光輝裏……』

『普通的見解不僅是把這些人看爲和社會政策的實際家有幾分不同，是把他們看成全然反對的，即是全然是革命思想之父親或看守人了。熟讀過此兩入底著述的人，他會以爲這些思考亦未見得不是正當，他在那兒可以讀着應當打碎的鏗鏘的鐵鎖，潮湧來的革命，流血之爭鬪，殺戮，虐殺等等底文字。這是怎麼鬧

起的呢……

『這個矛盾的現象，在心理上，是很容易說明的。馬克斯及恩格爾斯兩人是賢明地以冷靜的判斷代表着他們的現實主義終其生不會中止過的，現實主義我們以為是他們的世界觀之心髓。但是諸君，你們也不要忘記了，他們是在革命戰爭底霹靂之下起草他們的學說的……你們想想，他們終生除受有力的敵人嘲弄，輕蔑，憎惡，侮辱及迫害之外甚麼也沒有經驗着的這些亡命客底心中，究竟應有怎樣多的憤怒與憎恨鬱積着在呢！……從前的革命志士想起這積年的怨恨，不禁激怒搥咽時，那時現實主義者的精神便飛遁於窗外，昔年革命的激情便爆發而充溢於全身。但是馬克斯主義之特徵是社會政策、的現實主義，我終以為我這個見解是正常的，諸君請讀這主義之創設者底許多重要的言明和承認——這是我們在他們全生涯中所能有的——便可以明白了……』

他在從前曾經這樣記述過的話，他又引用來繼續伸論下去：

『以上我在馬克斯及恩格爾斯學說中看出兩種的性質，即是關於社會發展之本質的兩種見解互相爭搏着的見解，在許多人看來，以為是絕端地冒瀆了馬克斯，因此我竟被他們異端視了。

『現在我回想到當時我所寫的，我以前所代表的見地，即是馬克斯與恩格爾斯，個人地從他們內部之本性上看來，他們常常是現實主義的見解之維持者，而其時時公言着反對的見解的是他們一時的出軌，我這個見地究竟還能夠維持不能夠呢？我自己也有點不敢自信了。我覺得我下面的假定恐怕還要更確實

些。馬克斯及恩格爾斯兩人（或者單是恩格爾斯一人）是在他們生涯底進行中，根據着他們實際的經驗，纔成爲了他們在壯年期內所半無意識的成立了的那個原理底信奉者的。

『總之，馬克斯與恩格爾斯他們爲人是怎麼樣，這本來是不能引起我們的趣味的問題。我們有趣味的問題恐怕是在此兩人之一切著述中所可發見的個個學說間，其社會發展之根本觀有無本質上的矛盾處的一個問題罷。而且無疑地這兒明明有這樣的矛盾……我現在只舉其一例——但是恐怕在實際上是最重要的一例——而更加以注意：那便是「無產者之執權（獨裁）」說，且到現在尚不失頑固的信仰者的。從資本主義的社會向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推移不能不依一種暴力行爲（Gewaltakt）以實現，即是由無產者握取政權，爰以制定創設新社會的法律，而講求行政手段……』

『此無產者之執權說無論如何摶扭，總不能嵌合於歷史的現實主義的見解之框範內。這是從根本地不同種類的觀念世界現出來的一種異物。馬克斯經過了許久的時間——究竟有好久的時間我是不知道——拖着這個思想在走，這不過是對於我所主張的事實，即是馬克斯學說中有種類不同的本流交錯地奔流着，即使把世界一切的詭辯家請來，也是不能調和的，這個事實底正確，好像加添了一個例證罷了。』 W. Stenbart,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1919, S. 73—79.

與以上所引用的戎巴達底意見大抵相同的意見，近來又由豚涅司重新提出了，我不嫌煩複，爰把其主要部抄錄於此：

『我們研究學問的人有不應當忘記的事情：不怕就是最有名的作者也會常常有謬誤，矛盾，和薄弱的議論；並且要正當地理會一種學說，須得把捉着該作者之健全的成熟了的學說之心髓，這是在他智的良心之前最能負責任或是曾經負過責任的。——在這樣的用意之下，去思索馬克斯所建設的批判的社會主義時，下面的見解是全然正確地可以成立的：即是他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向社會主義的或組合的生產方法之漸次的、合法的、變化及進化，不僅認為是可以希望，認為在人道的倫理的意義上是有追求之價值……他更全然確實地立定了一個見解，雖不會以為是全盤正確，但他以為是可能了。他期待而且切望着使無產者掌握政權的，尤其是掌握着使舊秩序向新秩序之立法的推移上所必要的獨裁權的政治革命，不消說，他是不曾止息過。但是他把這種獨裁權認為一種恐怖政治（恩格爾斯語），認為是立在無意識的大眾之頭上的少數者之暴力支配，而躊躇滿志地夢想着牠的，在這被祖國追放了的飽嘗了幾多辛酸的人，是只限於到底是不能免的陰慘的悲憤的剎那時候。在這樣的意義內，他把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團（commune）之蜂起認真地看待，在其中想看見這樣的夢想之最初的實現，這不消說是屬於馬克斯這個人及思想家之心理——可以說是他的病的心理——的事情，與我們對於他畢生事業之適當的而且合理的理解是毫無有甚麼關係的。』Tönnies, Karl Marx, 1921, S. 117.

據以上所引用的看來，戎巴達和豚涅司都把馬克斯和恩格爾斯認為『社會政策的現實主義者』而同時又看出他們是主張『無產者執權（獨裁）』的『社會革命家』他們以為這是『本質上矛盾着的』是『全然反對的』因

此他們說馬克斯和恩格爾斯之學說中有『種類不同的本流交錯地奔流着，即使把世界一切的詭辯家請來也是不能調和。』他們都是在以依『漸次的合法的變化及進化』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實現爲可能的點上，認定馬克斯及恩格爾斯之真價，反之，他們把『期待而且切望着政治革命』的心事認爲『亡命客』在『陰慘的悲憤之剎那』所發的『病的心理』之所產。但是我把這些說明比較鄭重地引用了來的原故，並不是要想把來作自己意見底證明，寧是爲要反對他們的原故。戎巴達和豚涅司都是有名的學者，在多數的第三者看來，他們的說明是容易受人首肯的，但是我以爲這是極明顯的誤解。我以下要順序地說明這件事理。

第三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

我們現在在走進本問題之前，先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弄明白的，是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我在後面『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章中將詳論經濟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此處只稍稍說其大體。

馬克斯是把國家和社會分別得很明的，他把國家革命（即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以經濟革命爲其根底的）也分別得很明白。我也照例查看一下『經濟學批判』序文中所表現的關於唯物史觀公式的『社會革命』之用語例罷。那兒實在是這樣說的：

『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在其發展之一定的階段上，會與從來在其中活動着的當時的生產關係，或是單用法學上的用語時，是所有關係，相衝突。此等關係以生產力之發展外形變成牠爲桎梏。於是社會革命底時代來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之全部，或徐或急地便起了變革。』

據此看來，是『社會革命底時代』要到社會底生產關係（其『總和是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成爲生產力發展上之『桎梏』纔能到來。即是『一切的生產力在其組織內尚有餘地可以發展時非到發展到了盡頭處』社會是決不會走入社會革命底時代的。這兒所說的『社會革命』是種種的生產關係之總和所成的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之變動；並且這個經濟的基礎是『法制上及政治上之社會建築所據以建立的』，又是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真實的基底，『隨着牠的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之全部或徐或急地便起了變革』的。馬克斯所說的社會革命是指這隨着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之變動的，這樣地綿互於社會全般的變革；他這命名的當否我們在所不論，然他所命名的社會革命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由此可以極其明了了。對於這樣意思的社會革命，無論是馬克斯，無論是恩格爾斯，他們雖然『終生除受有力的敵人嘲弄，輕蔑，憎惡，侮辱及迫害之外甚麼也沒有經驗着』，但是他們便在『革命的激情爆發而充溢於全身』的『陰慘的悲憤之剎那』，也不會變過他們的現實主義的進化主義的見解。而且這現實主義的進化主義的見解，是他們所引爲『研究底指南』的唯物史觀之特徵。

然而政治革命是從來的執政者被新的政權攫取者所驅逐，這『常常是帶着政治的性質，自然又是可以 gemacht werden（被人製造的）』（一）借恩格爾斯語（二）表示時，是由『立於無意識的大衆之頭上的有限的少數者』所能成就的。所以這種革命之性質，和決不能被人製造的隨着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之變動而起的上層建築全部之變革的那個社會革命，是根本上不相同的了。

(11)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05, S. 16.

『一切的革命只要是使舊社會解體的便是社會革命，一切的革命只要是使舊權力顛覆的便是政治革命。』
(三) 這是馬克斯底解釋。所以馬克斯所說的社會革命是社會全體昇進了一個進化底階段的。那是舊的較低的生產諸關係推移向新的較高的生產諸關係時所生的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之變動和隨之而起的上層建築全部之變革。那是使社會全體昇進一步進化之階段上所必要的社會各方面歷史的諸事件之綜合的成果。而政治革命是『橫在社會進化之途上的一個插話』。那不過是政治之局面上所起的政權移動之一個歷史的事件罷了。

(III) Diehl,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20, S. 30.

社會之某局面上所起的一個歷史的事件是甚麼？我在此處且引用我曾抄譯過的波耳哈特『史的唯物論畧解』中的一個事例罷。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發起。奧大利敗了，普魯士勝了。這場勝敗之原因固然是關係於種種的偶發事件之全體，然尤關係於普魯士皇太子軍包圍奧軍之成否。當時普魯士皇太子軍到目的地的時間如稍遲數小時，則普魯士不僅不能勝利，恐怕還要大遭慘敗了。就這樣普奧戰爭也就告了結局，但是在那兒被社會全體之生產力之發展程度所束縛着的唯物史觀的必然性，一點也沒有。這便是社會之某局面上所起的歷史的事件之特徵。政治革命就和這戰爭是一樣，是一個歷史的事件。牠有和社會革命相隨伴的時候，也有不和社會革命相隨伴的時候。即是社會革命實現時，於其前後不必有甚麼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即使成功，社會革命也不一定會實現的。例如古代羅馬的奴隸叛亂幾乎全歸失敗了，只有迪勒地方的奴隸佔了勝利。他們在這個地方樹立

着他們的權力，一直到他們的子孫雖然很壯烈地反抗了然而終爲亞力山得大王所虐殺而止。但是他們在這期間中究竟也沒有成就了甚麼社會革命。他們依然守着從來的制度，只是自身成了奴隸主，以前的壓制者成爲了奴隸罷了。(四)社會之生產力在從來的組織內假使還有餘地時，不到發展到了盡頭處，社會革命是決不會實現的。其條件不具備時，不怕奴隸叛亂即使成功，『奴隸制度之廢止』的這個社會革命是不能實現。

(四) Hyndman: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1921, Section II, Chap. IX.

以現實主義的進化主義的見解爲根底的唯物史觀是說明社會革命之進行，不是說明政治革命般的個個的歷史的事件的。『政治革命之勃發，像這樣的橫陳在社會組織進化之途上的一個插話，這不是唯物史觀所欲說明的。這決不是專依係於物質的條件，是由種種的要素——尤其是種種主觀的要素——而決定的。』這個事理，便在以社會主義之實現爲目的的政治革命也是同樣。我在『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文便會這樣說明過，我現在且從突羅次克在一九〇六年年首，即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十二年前所著的論文中，引用右列一文以證明實際投身於運動渦中的馬克斯主義之革命家和我這樣只在書案上求理解的局外人，關於此點，我們的見解也是大概相同的。突羅次克說：

『無產者隨資本主義之成長，而成長且得勢力。由此見地說來，資本主義之發達是趨向執權制（獨裁制——Dictatorship）的無產者之發達。但是政治上的權力歸到勞動階級手中的時日，不是由經濟力之資本主義的發達之程度所直接決定，寧是由於階級鬭爭，由於國際的地位，又由於種種主觀的要素，例如傳說，

敵、懶、決意等所決定的。所以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的發達比較低度的後進國中，比在高度發達後的資本主義國中，可以更容易得以前佔政治上之優勢。……有人以為無產者之執權與一國之技術的及生產的資源間，好像有一種自動的關係存在的，這是想用極幼稚的方法去理解唯物史觀的了。這樣的思想，不消說與馬克斯主義是沒有甚麼關係的。』Trotsky: *Our Revolution*, 1918, pp. 84, 85.

第四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關係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已如上述；然則馬克斯（及恩格爾斯）把這兩者底關係是如何着想的呢？我可以明白地答覆：他們是信着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之推移的社會革命是要以無產者之政權奪取為目的的。政治革命成功時纔能實現的。即是他們在主張唯物史觀的點上，他們是進化主義者；而在主張政治革命的點上，同時又是革命主義者。在他們以前有過許多的革命主義者，在他們以外也有許多的進化主義者；但是以革命主義者而兼進化主義者的，這不得不是他們最大的特徵。

然則革命主義者的他們，對於同時又是進化主義者的他們，究竟是立於怎樣的關係呢？我現在解釋之如次：不待說，他們之所以要主張政治革命的，是因為要實現社會革命的原故。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底性質雖是本來不同，但他們所主張的政治革命是以實現社會革命為目的的政治革命，要革命之後大概有實現其目的之社會革命的可能然後纔能是認，從這一點上說來，這自然與社會革命有密切的連絡了。據他們所見，社會革命是一種社會組織向他種社會組織之推移，假使社會之生產力在舊有的組織內尚有餘地而未發展盡致時，是決不

能實現的。所以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的無產者之政治革命，也要能豫料到資本主義在不久、的、時、期、內、便會窒塞，換言之，是社會之生產力已經差不多發展到了盡頭，在其上更要發展的時候，資本主義這種經濟組織便不得不成爲桎梏的日子，在不久、的、時、期、內、便可以到來的時候，然後纔能是認的。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對於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的政治革命，他們所取的具體的態度通其一生之中於種種機會內雖表示着有種種的不同，但我相信他們的理論的根據，是不得不如上面所述。

在一定的社會組織（目前說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社會之生產力所可發展到的絕頂究竟有多少分量，這不消說是我們人類底智識所不能確實地豫測的。假使我們是回顧歷史而考察過去的時代時，就好像醫生論病一樣，不是豫推某病底將來，只是從事後來說明其經過，這是比較容易的；便是假使社會之生產力久在停止的狀態時，我們便以爲是該社會組織停窒了的證據；又假使社會之生產力還駁駁乎表示着發展底蹤跡時，我們便以爲是該社會組織還未停窒了的證據。但是把這話頭移到現在來時，社會之生產力在現存組織之下究竟已否發展到了可以發展到的程度之處，這以我們現在的智識是不能適確地判定的；便是馬克斯（及恩格爾斯）把以上的理論嵌合於具體的事勢時，也不免時有誤解。

由這樣觀察的時候，我們可以理解得『共產宣言』中的迫在眉睫的政治革命之期待。『共產宣言』是一八四八年發表的。當時的經濟狀態以現在的眼光觀察時，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力還有不少可以發展的餘地存在，然而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已經把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衝突看作已經進行到可以實行社會革命的程度了。所以

『共產宣言』上明白說道：

『就好像用魔法一樣喚起了這樣偉大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的資本家的生產及交通關係，資本家的所有關係，現代資本家的社會，到了現在恰好像一個魔術師自己唱着咒文喚起了下界諸力，然而已再沒有駕御着牠們的力量了。數十年來工業和商業之歷史對於現代之生產關係——對於有產者之生活條件及彼等所支配的所有關係——不外是現代生產力之叛逆之歷史。我們只消舉那商業恐慌——間隔一定的期間循環來襲的，常常威駭着有產者社會之全存在的商業恐慌——以為證據便夠了。……應該供諸社會使用的生產力在促進資本家的所有關係上已經不中用了，而生產力對於這些關係顛轉過於強大，因此竟受着妨害；此等生產力每逢決破一次束縛時，便把有產者社會陷入於無秩序的狀態，而威脅着有產者的所有權之存在。有產者的諸關係，要包含由牠所生產的富量時，是過於狹小了。……』

他們從他們所主張的唯物史觀立足點上——從『一種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尚有餘地足以使牠盡量發展時，是決不顛覆』的見地上——以為實現資本主義的組織向社會主義的組織推移的社會革命之可能性，在當時是已經具備着了；我們據以上的引用文便可以明白了。他們以為『社會革命之時代』是已經近了，然而有產者階級之頑強的態度中沒有餘地可以使這社會進化之必然的過程的『社會革命』實現；所以馬克斯和恩格斯要主張無產者運動以為是應該『爆發成公然的革命』是應該辦到『無產者強壓地使有產者顛倒而自樹立其支配』採取這樣見解的他們，所以要說『公然地宣言他們的目的只有由強壓地顛覆一切從

來的社會秩序纔能達到，『要說『使支配階級在共產主義者革命之前戰慄，』這決不是難於理解的了。這樣看來，像戎巴達和豚涅司之解釋，以為和他們歷史的實證主義的社會發展觀到底不相容合，不過是因為生涯中多麼辛酸的亡命客之病的心理之發現的，是沒有成立的必要，而且沒有存在的餘地的了。不消說馬克斯剛從大學畢業後在成爲社會主義者以前，便已遭罹筆禍而被追放了。他生來是富於反抗權力的氣魄的人，這恐怕是無疑的事實。我們看馬克斯自己說的：Ich bin das Schwert und ich bin die Flamme（我是劍而我又火焰）的話，便可以明白了。並且『共產宣言』發表的當時，正是政治革命底潮流澎湃於全歐天地的時代；有那樣的氣魄和這樣的環境，驅迫他去絕叫着政治革命，這正是有力的因子呢。但是這決不能說是『馬克斯學說中有種類不同的本流交錯地奔流着，即使把世界一切詭辯家請來，也是不能調和的。』

馬克斯和恩格爾斯一八四八年於『共產宣言』早已唱導着政治革命之必要，這是因為他們早已觀察到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在當時是已經將近停窒了的原故；這和他們在唯物史觀上所採取的歷史的實證主義的進化的見解毫無矛盾之處，我們由其後五十年（一八九五年，在恩格爾斯之死前不久），恩格爾斯自己回想當時所記錄的文句，便可以得到一個極明白的證明。他序馬克斯所著的『法蘭西的階級鬭爭』底序文上說：

『歷史證明我們及和我們同見解的（即在一八四八年以為無產者之政治的革命在最近的將來是必要的見解）一切的人都是錯了。歷史上所表明了，是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的發展狀態，在廢除資本家的生產上，還遠遠地尚未成熟。歷史是把那個經濟的革命（異常的經濟）來證明了的。這個經濟的革命是從一八

四八年以後普遍於全歐大陸，在法蘭西，奧大利，匈牙利，波蘭及最近的俄羅斯國內纔使大工業實行普及，並使德意志成爲了第一等工業國的；但是這些現象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起的，即是在一八四八年資本主義的組織不能不看爲還有十分可以擴張的可能性的了……」Marx, Klassenkampf in Frankreich, (Berlin, 1895) S. 8.

假使有人以爲這是在馬克斯死後經過了十餘年，單由恩格爾斯一個人所寫的，而不見尊重時，我要從一八七二年（在馬克斯死前約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兩人署名的『共產宣言』之序中，更引用一句：

『於過去二十五年間事情雖很變化了，但此宣言中所開展的一般原理就在現在也大體 (im grossen und ganzen) 依然維持着十分的妥當性……至於說到此原理之實際的應用，上這如宣言中所已明記的，是無論何地何時都依係於現存的歷史的各種事情的；第二節終末處所提出的革命諸方策，全沒有何等特別的重要。那兒的章句，在今日看來，有多少是當然錯了的。照過去二十五年間大工業之偉大的發展，及隨之而進步了的勞動者階級之政權組織看來，更照二月革命之實地經驗和更重要的巴黎自治團——在那時無產者掌握過兩閱月的政權——之實地經驗看來，此宣言在今日已有多少地方歸於陳腐了。』

照此等文句上看來，恰如我前所說明的，是說着『一般的原理』大體是不錯，只是『此原理之實際的應用』是錯誤了的了。他們在一八四八年雖以爲社會之生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組織『過於強大，因而受着妨害』，便斷定了『有產者的諸關係，要包含其所生產的富量時，是過於狹小了』，但是這是錯了的；到一八七二年回顧的時候，纔

有『過去二十五年間大工業之偉大的發展』更到一八九五年回顧的時候，歷史更明明證明了『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的發展狀態，在廢除資本家的生產上，還遠遠地尙未成熟了』。『一種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尙有發展的餘地可以使其儘量地發展時，（該社會組織）是決不顛覆的』。這個歷史的實證的進化的『一般的原理』——即是以一八四五年一月由巴黎移至普魯塞爾，更於其地繼續研究之結果，『馬克斯所得到的，一旦得到之後永爲其研究之指南的一般的結論』——其後一生之中雖沒有多少動搖，但其原理之『實際的應用』則不免有所差誤。寡聞的我，雖於這樣的解釋上不能爲有力的學者作左證，但我自己是頗有自信的。

第五節 政治革命之必要——平和的革命之可能

以上的解釋如無錯誤時，一生之中始終是唯物史觀之信奉者的馬克斯與恩格爾斯從早便倡導着有政治革命之必要的決不能說是自相矛盾；但是他們關於政治革命的意見究竟是哪樣的呢？這項意見在他們一生之中全沒有若何的變化嗎？我將更就此點考察以終結此章。

據我所見，他們一生之中不會拋棄過這樣的見解：便是要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之推移的社會革命，是無產者由政治革命以至攫取政權的所能成就的任務。他們何故認定有這樣政治革命的必要呢？其理由且讓諸他日，此處只想記述他們自始至終是政治革命之肯定者罷了。

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共著的『共產宣言』極有力地倡導着政治革命之必要，已如前述；馬克斯於一八五〇年更有言如次：

『……此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革命之永遠宣告——爲階級差別依然存在的全生產關係廢止之故,爲適應於此等生產關係的全社會關係廢止之故,爲顛覆從此等關係所發生來的一切思想之故,要要求無產者之階級的執權(die Klassenherrschaft des Proletariats)作爲一般地廢止階級差別上所必要的必然之通路。』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S. 94, 95.

這個思想差不多終生沒有改變的。即如前章已詳記過的,據他在死的八年前的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寫給剝拉克的信上看來,其中亦明明說着:

『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由此至彼的一個革命的變革時期存在。與此相應亦有政治的過渡期,此時期之國家,不能外乎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die revolutionär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無產者底政治革命,不消說是無產者之攫取政權,這不必一定限於訴諸暴力的流血革命。如何去實行政治革命,這是關於革命戰術的問題,這是由種種的條件,尤其是由敵手的有產者階級之態度如何而決定的。即是這種革命可以表現於慘淡的流血之巷戰,也可以在平和談笑之間不滴一血而行政權授受。

在馬克斯初期的作品中,他本是自己說着:『我是劍,我又是火焰』的人,我們在他的文字中可以『讀着應該打碎的鏗鏘的鐵鎖,潮湧來的革命,流血之爭鬪,殺戮,虐殺。』前面引用過的一八四八年底『共產宣言』中明明有『使支配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前戰慄』的話,翌年五月十九日底『新萊茵日報』(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上又說着『我輩不知憐憫，也不從汝輩(指有產階級)要求何等的酌量。輪到我們當事的時候，革命的恐怖政治上斷不塗以砂糖的呢！……要把舊社會之死的苦惱和新世界之誕生所伴隨的流血之努力弄簡便些，弄短縮些，弄集中些的方法只有一個——即是革命的恐怖。』(Simkhovitch, 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194——195頁所引) 同時他又以為在有產者的支配下，向新社會推移的施設，幾乎甚麼也沒有實現底希望。我們再引『共產宣言』來做證據罷。據『共產宣言』所說，無產者攫取政權昇到支配階級之後，『無產者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漸次地把一切的資本從有產者剝取；把一切的生產品集中於國家之手，即組織成爲支配階級的無產者之手，由是盡力迅速地以增加生產力之總量；』然而具體地思索時，究竟是怎樣地實行呢？他又說『此等方策自然依國別而差異，』但是在進步的國度之中，次列的條項大概是可以適用於一般的，』於是在『宣言』中列舉了十條：

- 『(一) 土地所有權之廢止，取其地租以供國庫之歲出；
- (二) 強度的累進稅；
- (三) 相續權之廢止；
- (四) 一切移住民及叛徒之財產沒收；
- (五) 設立有國家資本及壟斷精神的國立銀行以集收信用於國家之手中；
- (六) 集收交通機關於國家之手中；

(七) 擴張國有之工場及生產機關，由共同經濟之計畫行土地之開墾與改良；

(八) 對於一切人們行平等的勞動之強制，產業軍之建設（尤其是農業上的）；

(九) 農業與工業經營之連絡，調節人口之分配，使都會與村落之區別漸次消失；

(十) 一切兒童由公家無報償地教育，廢止目前現狀的兒童之工場勞動，教育與物質的生產之連絡等。」

在這『共產宣言』所主張的革命的名號之下，便到現在恐怕也還有人戰慄的罷，但是無產者攫取政權後，第一步的實在『宣言』上揭示着的，便在『進步了的國家』中所行的也只限於如上的各種方策。無產者自行陞到支配階級，就是要實行『專制的侵害以加於所有權及有產者之生產關係』懷着杞憂的人，以為會鬧到怎樣厲害的程度，其實以現在的話來說時，宣言中的大半是在進步的社會政策之範圍內可以實現的。譬如就是社會政策的立法很形落後的現在的日本，宣言中以爲在無產者之獨裁下始能實行的方策中之某某項，如設累進稅（雖然不是強度的），集收交通機關於國家之手（鐵路郵政電信電話等已經如是），一切兒童由公家無報償地教育（小學校便是這樣，歐美還有供給食養的）等已經早見施行，又如相續權之課稅是相續權之一部分的廢止了。在一八四八年的當時，連這樣的事情在有產者的支配之下都以為是不能實現的，所以馬克斯們底政治革命之要求便自然會帶着幾分殺氣了。這是無謀的壓力所挑撥出的殺氣。這件事情我們把『共產宣言』起草時由恩格爾斯所著的共產主義問答（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herausgegeben von E. Bernstein, 1919, S. 23）一讀時，便更明白了。問答第十六是：

問：依平和的路徑可以廢止私有財產否？

答：能够這樣時自然很可盼望，共產主義者的確是反對牠的最後的人罷……但是他們也知道差不多一切文明國底無產者之發展都是強壓地被抑制着的，而共產主義之反對者正以這樣的行為舉全力以挑撥着革命。由是被壓服着的無產者終被驅迫於革命的時期時，我們共產主義者要和現在用口舌一樣，我們將要用行為來擁護無產者之事業。」

假若有人說這是恩格爾斯底話，不能作為解釋馬克斯之助手，我們且引用馬克斯自己的文章罷。馬克斯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寫的信中說：『勞動者階級之政治運動當然以自行攫取政權為其究竟之目的，而為攫取政權之故，當然以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從前的勞動階級之組織——這是由他們經濟的鬭爭自然發生的東西——為必要。』(一)又一八七二年在安牟斯達坦的演說中也說：『勞動者為樹立勞動之新組織，在甚麼時候總有掌握政權之必要。』(二)但是依怎樣的路徑纔能攫取政權呢？他對於此明明白地說道：

『(勞動者為樹立勞動之新組織，在甚麼時候總有掌握政權的必要。)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路徑，我們不是主張着隨處都是同一的。我們曉得種種的地方制度，習慣，慣例，是不得不顧慮的。如像美國和英國，一樣的國度裏——我假如把荷蘭國底制度更知道得明白的時候，我恐怕把荷蘭國也加添上了——勞動者能以平和的路徑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是並不會否認的。但是一切的國家不能說都是這樣。』

(1)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e,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1921, Bd. II, S. 59.

馬克斯不消說不是暴力革命之否定者，但是同時他不僅以平和的革命為可能 (possible)，而且以為在若干國度內更是有望 (probable)，我們就看上面一句也就很明瞭的了。這假如不是馬克斯自己說的，是從別的馬克斯主義者口中說出時，他立地會被他的同志——以馬克斯階級爭鬥說嵌合成一種定型的同志——斥為背教者而受破門的處分了，然而馬克斯自身却認定了由平和的路逕而實行的無產者政治革命之可能性與機數了。不消說，如何去成功政治革命，這是關於戰術上的問題，在戰術底性質上當然有屬於 opportunism (權變主義) 的時候，順風則張帆，逆風則捲帆，不能永遠地守株待兔；本於實際的經驗，馬克斯雖然這樣地明言了，但是是毫不足怪的。

臨末我還禁不着要引用恩格爾斯在馬克斯死後在其晚年所敘述的文字。他在我前面所引過的「法蘭西的階級爭鬥」序文中說：

「……在當時(一八四八年時)的事情之下，對於大決戰之將破裂，且將綿亙長久而多變化的時期以決雌雄，然最後終歸於無產者以究竟的勝利以結局，我們是毫無何等疑慮的……」

『然而歷史證明了我們仍然是錯了，暴露了我們當時的見解只是一個幻想。歷史更還進步了，牠不僅粉碎了我們當時的謬誤，牠更把無產者應在其戰鬪的諸條件也全然改變了。一八四八年的爭鬥方法，在今日於一切的關係上都已歸於陳腐了，這是在這個機會有更加詳細討論之價值的地點。』(第六—七頁)

他在這樣的冒頭之後，接着說無產者階級由普通選舉議會政治可收得許多的效果，他說『像這樣，有產者與政府對於勞動黨之合法的行動比對於不合法的行動還要恐怕，對於選舉底效果比對於叛逆底效果還要恐怕了』，於是他關於爭鬪方法之變更，便明白地說道：

『就這樣爭鬪之條件在本質上生起變化了。舊式的造反，築防壘的巷戰，……明明已化爲陳腐了。……』
(第十三頁)

『襲擊之時代，立於無意識的羣衆之尖頭的，僅鮮的少數者所能成功的革命之時代，已經過去了。……過去五十年之歷史把這事教給了我們。(第十六頁)』

『世界史之反語，顛倒了一切。『革命家』「破壞者」的我們，依合法的手段時，比依不合法的手段，及顛覆時，還要更容易成長。(第十七頁)』

合法的手段之採用，這不消說不是說把運動之究竟的目的拋棄的。就在力說着極平穩的手段時，恩格爾斯果然也決不會把『使這成長不斷地進行，使牠不合於支配着牠的統治制度之手，這正是我們的主要職分』(第十七頁)的話忘記。總之，無論流血不流血，到甚麼時候勞動者總不能不有攫取政權之一日，這是馬克斯和恩格爾斯至死不渝的思想。

第三章 社會革命與社會政策

我在前章之末，說明了『無論流血不流血，到甚麼時候勞動者總不能不有攫取政權之一日(即實行政治

革命之一日，這是馬克斯和恩格爾斯至死不渝的思想了，不錯，這種政治革命之主張正是馬克斯派社會主義之一特徵，這是與非馬克斯派區別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在現在凡是於近的或遠的將來切望着社會革命——社會組織之改造——的人都得爲廣義的社會革命家，得爲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如以爲不必通過政治革命便可以貫徹或完成其所切望的社會主義，並且全然排斥實現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時；他們雖是社會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斯主義者。要成爲馬克斯主義的時候，不得不以社會革命家而兼政治革命家。然則這以社會革命家而兼政治革命家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對於社會政策究竟取的是怎樣的態度呢？答覆這個問題的便是本章底目的。

第一節 共產宣言中所含的社會政策

一八四八年馬克斯與恩格爾斯共著的『共產宣言』說無產者實行政治革命攫取政權之後，第一步所當行的方策雖是『自然依國別而差異』，『但是在進步的國度之中，次列的條項，大概是可以適用於一般的』於是他們列舉了十項政策——這是前章已引用過的，但爲行文之便不妨重引：

- 『(一) 土地所有權之廢止，取其地租以供國庫之歲出；
- 『(二) 強度的累進稅；
- 『(三) 相續權之廢止；
- 『(四) 一切移住民及叛徒之財產沒收；
- 『(五) 設立有國家資本及壟斷精神的國立銀行以集收信用於國家之手；

(六) 集收交通機關於國家之手中；

(七) 擴張國有之工場及生產機關，由共同經濟之計畫行土地之開墾與改良；

(八) 對於一切人們行平等的勞動之強制，產業軍之建設（尤其是農業上的）；

(九) 農業及工業經營之連絡，調節人口之分配，使都會與村落之區別漸次消失；

(十) 一切兒童由公家無報償地教育，廢止目前現狀的兒童之工場勞動，教育與物質的生活之連絡等。』

這是共產主義者底宣言，而且所列舉的是其所主張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後所當實施的方策，但是此等方策之中即使政治革命不必成功，換言之，便是無產者不得攫取政權，社會依然在有產者底支配之下，有不少是到某種程度能夠實現的政策。在有些國度中——即是該國底有產者十分賢明，而其無產者又有相當的威力時——此等方策可以說即使在有產者的支配之下，換言之，即使不至於由政治革命以樹立無產者的執權制，而到某種程度，一切都是可以實現的可能性的。並且在這宣言發表後約過七十年的今日，其中的某某項方策已經在完全的有產者支配之下，輕易地實施着了。便在社會政策的立法很形落後的日本——這是前章已經說過的——在『共產宣言』中要無產者執權制樹立後纔能實行的政策，例如（二）強度之累進稅（日本現行的累進稅不待說還決不能算是強度的），（三）相續權之廢止（日本現行之相續稅是相續權之一部分的廢止），（六）集收交通機關於國家之手中（鐵路郵政電信電話等早已如是），（十）一切的兒童由公家無報償地教育，廢止目前現狀的兒童之工場勞動（現在日本小學校都是無報償地教育一切兒童的，工場法制定後於某種程度對於童工之保

護是實行着的)等等,都到某種程度已經實施着了。

這是甚麼意思呢?

這是說: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斯和恩格爾斯以爲非在無產者執權之下終不能實施的各種方案,在其後某某國中在有產者支配之下作爲所謂社會政策也很可以實施到某種程度了。簡單地說時,社會革命家所要求的某項在若干程度之內與社會政策論者之要求得以致。

然則社會政策與社會革命畢竟是同其歸趣的嗎?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可以互相攜手同住在一個陣營裏的嗎?

第二節 奕斐爾特綱領與社會政策

我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想更把一八九一年在奕斐爾特大會所決議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綱領思索一下。其綱領底原理(Grundsätze)之一部有如次之一節:

『……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在從前是使生產者確保其對於生產物之「所有」的一種手段;但在今日,成爲了使掠奪農民職工及小商人的非勞動者——即資本家大地主——確保其由勞動者所生產的貨物之「所有」的手段了。但只有把對於生產手段——即土地礦山原料用具機械交通機關——的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變而爲社會的財產,把商品生產變而爲社會主義的生產,即是變而爲替社會與由社會所行的生產時,那大規模的經營和不斷地增加的社會的勞動之收益力纔能替從來被搾取的階級,把困窮及壓制

之源泉變成流向最高福利及全面調和的完成之源泉了。

『此社會的變革不僅是無產者之解放，實在也是困苦於現時狀態之下的全人類之解放。然而這、只能作爲勞動者階級之事業，何以故呢？因爲其他的階級雖然在他們相互之間競爭利益，但都是立腳於其生產手段之私有權底基礎上，以維持現時社會爲其共通之目的。』

『勞動者階級對於資本家的榨取之鬭爭，必然地是一個政治的鬭爭。勞動者階級沒有政治的權力時，他們不能實行他們經濟的爭鬭，他們也不能使他們的經濟組織發展。他們若還沒有握到政治的權力的時候，要把生產手段移爲全體公有，這是他們終久所不能實現的。』

『把勞動者階級底這種鬭爭形成一個有意識而且有統一的東西，向着牠指示出自然的必然之目標——這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之職分……』

我們由這文字看來，這明明是這樣主張着的：即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變革只能作爲勞動者階級之事業』和『他們若還沒有握到政治的權力的時候』那種社會的變革『是他們終久所不能實現的』——簡單地說時，社會革命之貫徹或完成是只有在無產者執權制下纔能實現——那兒是明白地這樣主張着。不消說，文中沒有用着馬克斯所嘗用過的 *die revolutionär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底字樣，但是明明說着無產者 *ohne in Besitz des politischen Macht gekommen zu sein*（若還沒有握到政治的權力的時候），社會革命是無望，這歸根是同一的了。三十年前曾經承認了這個綱領的馬克斯主義者逮到

在俄羅斯國內無產者之執權實際上樹立了的時候，他們纔在事實之前戰慄了起來，這在他們宣言着『使支配階級在無產者革命之前戰慄』的馬克斯信徒，真是可以笑止的了。

但是奕斐爾特綱領是分出一般理論與實際政策之二部的。其實際政策之部承繼上述的理論的陳述之後說道：

『從此等原理出發，德意志社會民主黨要求次列各項：

- (一) 一般的平等直接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二) 本於法案拒絕權及法案提出權之國民的直接立法；帝國，邦國，縣，市村的自裁與自治……
- (三) 國民一般地施行軍事訓練；廢常備軍爲國民軍；由國民代表議決宣戰及媾和……
- (四) 廢止一切制限或壓制言論自由及集會結社之權利的法律；
- (五) 對於男子廢止其在公法上及私法上之關係使女子不利的一切法律；
- (六) 布告宗教爲私事……
- (七) 學校之民衆化；小學教育作爲義務教育；在公立小學校免除學費用品費及食宿費；能力優越認爲可
以更授高等教育的學生，不問男女，於更高等的教育機關內給與同樣的特典；
- (八) 司法及辯護之免費；由人民所選出的法官行使判決權……
- (九) 包含助產及服藥的醫療之免費；埋葬之免費；

(十) 公家經費由租稅中支辦時，供於此項用途的收入稅及財產稅課以累進稅；收入之呈報；以相續財產之大小及血緣之親疏為標準的累進之相續稅；廢止為少數受特惠者之利益而犧牲一般之利益的一切間接稅關稅及其他經濟政策上之施設。』

這樣十項的要求可算是比較進步的社會改革之要求，但這些要求都是屬於所謂社會政策之範圍，社會改良家即不棄其社會改良家之資格，換言之，便是不必進列於社會革命家之林，也是可以贊成的。奕斐爾特綱領在其原理之部，如上所述，是專主張着無產者之政治革命的，而到實際政策之部，卻列舉着可以看作是全然別樣的主張的：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莫里司威廉在其近作『社會的史觀』中批評着說道：

『我們把世界各國社會黨之實際的綱領研究時，我們可以發見出甚麼呢？我們可以發見出一排列的要求，與由資本家的及專制的政府以及最有先見的資本家等所擁護的要求幾乎全然一致。此等改良案與國際社會主義所引以為理論的基礎的馬克斯之諸原理，究竟果能有若何的關係呢？……世界各國之社會黨在理論上是承受馬克斯之諸原理，而在實際上却排斥着他。一切黨爭之基礎便是安放在這種根本的矛盾之內的。社會主義者剛說到實際政策底問題時，他們的意見立地便生懸隔。此等意見之懸隔，和採用社會改良之實際的綱領同時擴大，終至陷入一個大大的破綻，把黨員分割為兩個主要的陣營，尚不能挽回。其一是前後一貫的馬克斯主義者，主張着本於馬克斯原理的實際的綱領，其實際的綱領只是革命的煽動，教育，

組織，及經濟的鬭爭。其二是與此對立的陣營，理論上雖採用馬克斯原理，但於實行方面所採用的綱領，其構成上不惟全不能由馬克斯原理所是認，而在事實上寧是排斥其原理的。』Maurice William,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21, pp. 29, 35.

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在世界大戰以後四分五裂，逮至一九二一年九月纔從新採用桂爾里繆綱領，而同時破壞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有最重要意義的奕斐爾特綱領，這是不僅在實際政策底部分，要更進而至於原理底部分，也都想從馬克斯學說之束縛脫離，纔能於其主張上贏得論理的統一的嗎？

第三節 社會革命之要素的政治革命

我在此處所提出的問題，要我自己去解決時，實在是過於重大。但是我由馬克斯學說全體之結構上看來，我覺得我可以說出次列的事項。

一、在本章開首處已經說過，要貫徹或完成社會革命，不能不通過一個政治革命以顛覆有產者之支配而樹立無產者之支配。這是馬克斯主義底特徵。假使拋棄了這種主張，那便是同時從馬克斯叛去了。即是馬克斯主義者在主張爲社會革命之政治革命底一點上，他們是一個革命主義。關於此點，我以考次克在其『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第一章中所說的，大概是正確的。

『一切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希望着廣義的社會革命的，但是社會主義者中有排斥革命，想單以改良而實現社會之變革者。於此社會革命與社會改良便成爲兩相對立的……』

『革命與改良之對立，並不是因為前者須用武力，後者不用武力。一切法律上及政治上的施設都是權力施設，是由國家之權力所施行的。權力使用之特殊種類如巷戰與斬殺等，也不是對於改良的革命的實質上之特徵。這是由於特殊事情所引起的，並不是必然地附帶於革命上的，並且在改良時也是可以引起的。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七日法蘭西第三階級之代表組織國民議會，這雖是一種堂堂的革命行爲，但於外形上並沒有伴隨着甚麼強制。而一七七四年及一七七五年同是在法蘭西所發起大變亂是爲防止食糧騰貴之目的而起的，這卻全沒有甚麼革命的目的。』

『但是一說到革命時，我們總會聯想到巷戰與砍殺，在此中我們也可以得到關於革命之本質的一個教訓。從一七八九年開始的法蘭西大變革到今日成爲革命之典型了。我們說到革命時，時常會想起法蘭西革命。即是我們藉此是可以把革命之本質與革命和改良之對立學習得很明白的。現在我們就法蘭西革命考察時，在其前有種種的改良是早就規畫着的，尤其是題爾果之改良案在許多關係上，計畫着與革命所實現了的同樣的事項。然則題爾果之改良與其所同然的革命施設間有如何的區別呢？二者之間有一新的階級之政權攫取的事實存在。改良與革命之間，其本質之區別便存在於這個事實裏。使法制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適合於變化了的經濟的各種事情之施設，假使是由從來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支配着的階級實施時，這便是改良；即使不是出於自由意志，或是由被支配者階級所強求，或者由於事情之壓迫而齎致時，也只是改良。假如從來在經濟上及政治上被壓服着的階級從新攫得政權，而此階級要利用其新得的政權爲他們自

己的利益上必然地把社會之政治的及法律的上層建築之全部，或徐徐地或急劇地變革，因以造出一個社會組織之新形態時，則由該階級所實行的施設，正可看爲是革命之流出物。

『由此看來，從來被壓服着的階級之政權攫取，即政治革命，是與社會改良 (soziale reform) 對立的，狹義的社會革命之本質的特徵。原則上反對以政治革命爲社會改革之手段，以爲這種改革只能由於現存的支配階級之施設始能實現的人——不怕他的社會理想如何地與現存社會狀態十分對立——他只是——他是一個社會改良家 (Sozialreformer)。反之，凡努力於使從來被壓服着的階級攫取政權的人一切都是革命家。不怕他就想藉由支配階級所得來的社會改良以準備且促進其政權之攫取，他也是不失爲革命家的。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之分點，不是在努力於社會之改良與否，是在於其社會改良上設置截然的限度與否……』 K. Kautsky, Sozialreform und Soziale Revolution (1902)

二、像這樣，馬克斯學說是主張着無產者之政治革命的。然而其政治革命是以貫徹或完成社會革命爲目的。所以這種革命要在目的之社會革命有實現底可能時，然後纔能承認。但是據馬克斯之意見，以爲在現存的社會組織內一切生產力如尙未發展到盡頭處時，社會革命是決不能實現的。『一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尙有餘地足以使其盡量地發展時，(社會組織)是決不顛覆的；並且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未含孕於舊社會底母胎之前，亦決不會出現。』——這是唯物史觀底根本主見。所以馬克斯主義者雖然承認爲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之必要，但不是無條件地贊成於任何時期都可以企圖政治革命的。

然而，在一定的社會組織之下，一切的生產力究竟發展到了盡頭處與否，這以我們的智識是不容易判斷的。在此雖然說着『一定的社會組織』，但這決不是木石所製造的箱匣，依支配階級之態度如何，牠是很有伸屈性的。唯物史觀之創始者馬克斯與恩格爾斯，早在一八四八年時便倡導着政治革命之必要了，這已如前章所說明，是因為當時的他們是以爲推移向新社會所必要的諸條件，在有產者的支配之下再不能更實現一步的原故。但是，他們的觀察是錯了。『共產宣言』中所列舉的各項方策要無產者支配樹立後始能實行的，然其後到某種程度上於有產者的支配之下已實施着了，並且同時在『資本家的基礎之上』偉大的生產力之發展也得實現了，這是他們後來自己承認了的。

第四節 社會政策論者與革命家之同異

三、然則社會革命之諸條件尙未完備，從而還不是企圖爲社會革命之政治革命的時候，馬克斯主義者所當做的事情是甚麼呢？他們會如威廉斯說，前後一貫的馬克斯主義者要樹立本於馬克斯原理的實際的綱領時，在這樣的事情之下，他們的實際綱領也只是政治革命之煽動，教育，組織，及經濟的鬭爭嗎？要求各種社會政策之實施，便會成爲馬克斯原理之排斥嗎？

馬克斯之原理在實際運動上有這樣嚴格的論理的必然性，這是我所不能想到的。要實現社會革命時機還早，因此企圖爲社會革命之政治革命時機還早的時候，我以為馬克斯主義者所當採取的手段是在助長使社會革命及爲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促進的各種方策。

然而從馬克斯主義之見地上說來，今日之資本家的組織是決不顛覆的，如其一切的生產力在其組織之內尚未發展到盡頭處的時候。所以在資本家的組織之下盡力迅速地使社會之生產力發達，這決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所宜妨害，宜是所大歡迎的了。馬克斯主義者之利害與資本家之利害相一致處正在此點。所以像威廉所說的：『我們把世界各國社會黨之實際的綱領研究時，我們在那兒可以發見出一排列的要求，與由資本家的及專制的政府以及最有先見的資本家等所擁護的要求幾乎全然一致，』這並不是大大的理論上的疑問，實在是毫不足怪的了。

有一部分的人把馬克斯主義解釋得很偏狹的，他們以為只要是於資本家有利益的事情總不得不反對；他們以為凡是資本家為自己的利益所提出的或贊成的事項，即使對於勞動者階級是有利益也不能不取風馬牛不相及的態度，決不積極地去贊成。他們以為自己所能贊成是對於勞動者階級有利，而同時對於資本家階級是不利益，因而不得不強壓資本家以求博取。但是，這是錯了。在近代的文明國中所實行的勞動者保護之種種施設，不消說，對於勞動者是有利益的，但是也沒有一樣不是保護着資本家之積極或消極的利益，因而纔至於得到支配階級的資本家之承認的。就比如把國民教育底問題來檢核，多數國民無智時，其結果是強盜殺人放火傳染病之流行，這在資本家的利益上是不好的，所以資本家的社會為保護自身之故，纔負擔些關於教育的費用而建設各種教育機關。尤其是機械工業發展後，無智的工人漸次沒中用了，這直接從經濟上之利益說來，凡普及且提高國民教育，也是為資本家的社會之利益的。所以『一切的兒童由公家無報償地教育』（與奕斐爾特綱領中所揭

的實際政策之第七項相當)在『共產宣言』中是要無產者執權樹立之後纔能實施的方策，而在有產者支配之下，目前也好好地實行着了。不消說，各種的社會政策之見諸實施，社會主義者宣傳之功效本是不少，但就不是這樣，也不能有甚麼可以非難的。社會之進化以爲只由社會主義者之運動所能實現，或不得不實現的，這是對於唯物觀的非常的叛逆。社會之組織不是由少數個人意識所能自由創造的，這是唯物史觀最有力地所主張着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來，把社會主義輸入到日本的，究竟是大倉喜八郎(資本家)還是堺利彥(共產主義者首領)這可以說是難於判斷的。不消說，前者是無意識的，是盲目的，而後者是有意識地睜開着活眼的。這種差異在意識明瞭的人說來，誠是很重大的差異，但姑且把意識內的緊張丟開，專就事實上的結果說時，實在是社會全體的人有意識地與無意識地行着同作用或反作用，由其綜合之結果使社會向着一定的方向前進的。資本家階級無論由何種動機而贊成社會政策，我們是沒有因此而反對牠的理由的。

四，考次克說過『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之分點，不在於努力於改良社會與否，而在於其改良社會上放置截然的限度與否；』在資本家的支配之下，社會之改良和生產力之發展只要還可能時，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可以暫時同住於一個陣營之內。但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的改革，無論是若何進步的，到頭終不會至於顛覆資本家的支配。此處是改良主義，社會政策之制限。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走到此點之前，即使能互相攜手偕行，而走到此點以後便明明是仇敵了。社會革命家要由政治革命以顛覆有產者之支配，而樹立無產者之執權，因以實現社會革命，使階級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向平等無差別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秩序推移。而社會改良

家却投到有產者之陣營，援助他們為維持有產者的支配之爭鬪。在這時候親仇是很分明的。動機本來不同，偶因利害有一致處的社會改良家與社會革命家走到此點時，便全無妥協之餘地了。社會黨之綱領中，其原理之部（無產者政治革命之主張）僅僅是空文的時代時，有多少人士僅以贊成其實際政策（各種社會政策之要求）之理由，而奔赴於信奉馬克斯主義的社會黨之傘下。然到政治革命底機會迫到臨頭時，黨員便分裂為二個主要的陣營，而無法挽救了。馬克斯之陣營內所起的目下之內亂，有一半是從這樣的原因生出了的罷。

第四章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之企圖

馬克斯底有名的唯物史觀之公式中，已經在本書中引用過好幾次的，有一句有名的文句：『一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尙有餘地足以供其盡量地發展時，（社會組織）是決不顛覆的；並且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未含孕於舊社會底母胎之前，亦決不會出現。』關於這一句我想在此提出一個問題：便是社會之生產力在從前的社會組織之下雖還有發展之餘地，而早有人想顛覆牠的時候，其結果究竟是怎樣？這個問題一見好像是很小的問題，其實這要回過過去的歷史中凡關於社會組織改造之企圖歸於失敗了的事件中之主要者，要探究其種種史實而綜合之，然後纔能回答；至少在我現在是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了。我此處所述的，只是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二個不甚重要的指示。

第一節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招致生產力之減退（英領殖民地奴隸解放之實例）

舊有的社會組織還有使生產力發展之餘地，而勉強要顛覆牠的時候，在這時最先便要生出生產力減退之

現象。此事徵諸奴隸解放史，便可以見其一斑。

一八六一年倫敦所發行的梅里維爾之『關於殖民與殖民地之講演』中，其第十一講有如次的記錄：

『奴隸解放當時的英領奴隸殖民地，我們依其商業的狀態，覺得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是我國殖民地中之最古者，設立於 Antilles (西印度羣島) 中之各小島的……：在此等地方中，土地幾乎是被佔領了的人口極其稠密，耕作是早見施行，並且資本也是堆集着了的。巴爾巴妥司是這樣，這在西半球，並且恐怕在全世界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安梯古娃也是這樣。並且恐怕聖紛生慈，采米尼加，及其他一二地方也是一樣。在這些地方人口及生產在長久的年數間已經差不多是靜止的了……：此等殖民地，在廢止奴隸買賣時不受甚麼損害，因爲勞動之供給是十足的。此等地方由奴隸解放之直接的結果所受的損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因爲黑奴除繼續工作之外不能得何等的資源。在那兒已經沒有他們所可有的無主之土地，他們沒有可倚爲獨立營生的方法，『習慣』使他們羨慕的種種奢侈品更無從到手了。在此等地方之大部分，無論在生產上，或在社會生活之常態上，全沒有發生甚麼重大的中斷。』 Herman Merivale,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1839, 1840 and 1841), 1861, p. 313.

我們看這歸入於第一分類的此等殖民地中，梅里維爾明明說『人口及生產在長久的年數間已經差不多是靜止的』，這可見從來的生產方法已經走到盡頭，所以『由奴隸解放之直接的結果所受的損害比其他任何

地方都少』因之『無論在生產上，或在社會生活之常態上，全沒有生出甚麼重要的中斷。』不僅如此，『在長久的年數間已經差不多靜止的』生產，在奴隸解放後，更漸次發展了。梅里維爾在該書之附錄中（三四〇頁）陳述着道：

『在巴爾巴妥司地方，由奴隸解放所惹起的產業之擾亂是輕微而且是一時的。殖民地不久之間便恢復到比以前更繁華的地步。土地之面積雖受着極度的限制，地力亦在次第衰減，而生產却是增加並且就在現在也還以不斷的正確率增加着呢！』

梅里維爾更說到第二類的殖民地時，他說：

『屬於第二類的殖民地內，豐饒的土地或在便宜的位置的土地大概都被耕種了，並且地力也漸次的枯竭着。但是在那些地方還剩着些比較不甚肥沃的無主的土地，人口與全面積比例時亦不甚稠密。這樣的事情……在我國最重要的熱帶殖民地買賣依加地方最爲顯著……最適於栽培甘蔗的土地，其面積亦甚有限，並且已經使用到百年以上了。但是在那個地方還有許多開墾地與未開地可以供黑人勞動者利用，以製出足以滿足他們必要的慾望的食糧和其他之物品……此等殖民地因爲奴隸買賣禁止之故，便多受損害。要強制黑奴使服務於雇傭勞動終是困難——因爲他們有可以供他們的食糧的土地及其他的資源在手——自奴隸解放以來，至今還感覺着不便。』（三一五頁）

不厭煩雜，更抄譯其附錄中之所記述時：

『賈買依加是第二類的重要的楷型。在賈買依加地方，並且幾乎只限於賈買依加地方，自奴隸解放以後，生產減退，並且減退得非常厲害，其地面之多，大部分廢止了蔗糖底耕作，那些土地不是用去充作不甚生產的、別的用途，便是全然荒廢了……在那地方誠然有廣大的未開地，但是不宜於甘蔗底耕作……有雖未耕作而土味豐饒的地面，有廣大的山地之牧場和草原，在那兒人們可以不要多大費用，便能生活，便能繁殖，這從商務上看來，的確不是好事情，只是一個弊害。因此被解放了的勞動者可以不做一定的工作，便能維持其生活，甘蔗栽培者要雇用他們，就出高貴的工錢，他們也不甚願意地，只隨隨便便地服務於勞動。』(三四二頁)

即是在此等第二類之殖民地中與第一類恰相反對，奴隸之解放反轉使生產力減退了。梅里維爾更說到第三類時，比第二類之特徵尤甚。『在那些的某某地方，耕地之土宜尚未枯竭，餘外也還很有豐饒而無主的土地』(三一六頁)，例如多里尼大達，巨尼亞等便是實例。在此等殖民地中，奴隸之解放更使生產力甚形減退了。『砂糖及與此關聯的物資之生產，巨尼亞地方於奴隸解放之第一年便跌落到以前的四分之一，又在多里尼大達地方也是同樣。』(三一七頁)

據梅里維爾之記述看來，『在此等自然之富源充溢着的地方，黑奴們得生活資料是很容易的……他們有足以維持他們的許多的土地……他們只有得最高的工錢時纔肯從事於勞動』，這是奴隸解放後所以頓然使生產減退了的原因。

豐饒無主的土地多量存在着的時候，奴隸制之廢止遂使生產減退這明白地證明着雇傭勞動制之成立要
以不能得到生產手段的多數勞動者之存在爲前提。不能得到生產手段的勞動者，因爲得不到生產手段，所以只
得賣自己的勞力以謀生；要到這地步，這些人纔成爲所謂自由勞動者。在法律上雖是被解放了而成爲自由的，但
他們不能自行利用生產手段（奴隸制時生產手段之重要者是土地）以獨立營生，所以不能不被雇於人以從事
於勞動。所以在不測的時候無論何時都可以有坐守的生產手段殘存於社會時，要結合多數勞動者之勞動的時
候——勞動之社會的結合之發展與物質的生產手段（土地之開拓，用具與機械之發明等）之發展，同爲社會
生產力發展之最大條件——只有剝奪這些勞動者之自由而奴使；但是社會之事情變了，即使把奴隸解放，奴隸
們也尋不出甚麼可以依賴的生產手段的時候，他們要維持生活，總不得不去求有力的人，因此多數的勞動者勞
動之結合依然繼續，並且勞動者因爲得到自由之故而增進其能率，其結果是社會之生產力比以前更顯著地增
加了。但是在解放奴隸的時候，要他們尋不出甚麼可以依賴的生產手段，那總要在奴隸制下可開拓的富源已經
開盡，人口也增加到盡頭處的時候纔行；因爲那時一方面沒有無主的土地之殘存，而他方面要求生活之人口又
有過剩——簡單地說時，總要在從來的社會組織之下，社會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無可發展的餘地後纔能夠辦
到。假使時期未到而實行奴隸解放，則被解放的奴隸各自坐守無主之富源而復歸於小規模的孤立的自足經濟；
即是在奴隸主之支配下所統一了的多數勞動者之勞動結合，隨着強制的束縛之解除，便立地解體；生活組織不
惟不能進展於更高級的組織，反降退於較低級的組織，其必然之結果自然是生產力之減退了。馬克斯說的「一

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尚有餘地足以供其盡量地發展時，（社會組織）是決不顛覆的；並且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未含孕於舊社會底母胎之前，亦決不出現，」正是這個道理。

第二節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終歸於失敗（以社會革命爲目的的政治革命即使成功也只是單純的政治革命而已）

生產力在從前的社會組織之下還有發展的餘力而勉強施行社會革命的時候，生產力不惟不增加，而且反轉減退，這是已如上述；生產力不斷的發展是社會進步之第一義的條件，預計的社會組織之改造只是爲該社會招來退步與滅亡；不消說，這種計畫是終歸失敗的。

例如今日的資本主義之組織即使有如何的弊害，社會之生產力在這組織之下尚有發展的餘地時——這是這種組織對於社會還是有用的證據——要圖謀顛覆資本主義的計畫當然也會不收成效的。不消說，在資本主義之組織下可發展的生產力之限量究竟有多少，這以我們現在的智識是很難於精確地預測的。假使是屬於歷史上的一个期間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得牠在這期間之中的消長怎樣；假使生產力之發展繼續進行不斷，我們便以爲是社會組織還沒有窮窒的證據；假使生產力之發展長久停滯在中止的狀態，我們便以爲是社會組織已經窮窒了的證據；但是說到對於現在的觀察上來，社會組織究竟能以今日爲走到了窮極處與否，這是甚麼人也很难判定的。便是堅持着唯物史觀的馬克斯與恩格爾斯，他們在一八四八年便早以爲有社會革命之可能的，正由此點可以說明。然其後世界各方面之資本主義國中，其生產力之發展不僅證明他們當年的觀察和期待之

錯誤，並且使他們信奉唯物史觀的人也自認是錯誤了。一八九五年恩格爾斯在馬克斯的『法蘭西的階級爭鬥』序中說道：

『歷史證明我們及和我們同見解的一切的人都是錯了。歷史上所表明了的是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的發展狀態，在廢除資本家的生產上，還遠遠地尚未成熟。歷史是把那個經濟的革命來證明了的。那個經濟的革命是從一八四八年以後，普遍於全歐大陸，在法蘭西，奧大利，匈牙利，波蘭，及最近的俄羅斯國內纔使大工業實行普及，並使德意志成爲了第一等工業國；但是這些現象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起的，即是在一八四八年資本主義的組織不能不看爲還有十分可以擴張的可能性的了。』

『一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尙有餘地足供其發展時是決不顛覆的，』立在這個信念之上，恩格爾斯在他的晚年竟反省着說道：『襲擊（Ueberumpelung）底時代，由立於無意識的羣衆之尖頭的僅鮮的少數者所能成功的革命底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毫不奇怪的了。

預計的社會革命是必然地失敗的。即使以之爲目的的政治革命成功，然在目前只能是政治革命之成功而已。政權之掌握者雖然瓜代，社會之經濟組織立於不能由權力者之任意而變更的物質的基礎之上，單是政權移動是決不能立地變更的。所以欣德曼在其近著中所說明的（見前）奴隸制廢止之物質的諸條件尙未具備時，其他的條件即使如何完備，奴隸的叛亂終竟是歸於失敗的；即使成功，亦不過是奴主易位而已，舊奴隸變爲新主人，舊主人變爲新奴隸，奴隸制是終竟不會廢止的。我以爲這個道理於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組織爲目的的無產者革

命亦當然膠合。預計的無產者革命恐怕只有歸於失敗的，即使成功，在目前也只是政治革命之成功而已，社會革命是不能那樣輕易實現的。即是從前的無產者從新掌握政權，在他們的支配之下，革命後的社會依然是只有依着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發展。

目下俄國所實現了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究竟是預計與否，我不得而知。但牠無論是與不是，在此後數十年間的歷史，對於我們想知道社會組織進化之理法的人，自會呈出無數有益的資料的。至於由這些資料以指示出比今日更有意識的社會運動之方針，這恐怕是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們底事業了。

第五章 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第一節 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

我們要說到俄國革命的時候，宜先把『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底意義嚴密地決定，這在種種的機會上可以避去多少無用的混雜。依這個語彙底用法如何，我們可以說現在的俄國是已經實行着社會主義革命了，或者也可以說並不是已經實行，是從此將要實行的。同是一個字却有種種的用法，若不把這種種的意義弄清晰，對於問題全體是會惹起重大的誤解的。

『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名詞，據我想來，至少含有兩種的革命，第一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的政、治、革命，這是實現於馬克斯所說的『無產者的政權之握取』(seizure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proletariat)，或者無產者的『執行政府的權力底時候』(the time of the seizur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第二是實現社會主

義的經濟革命，這在馬克斯主義上，是要在「坐獲收入」之源泉的一切生產手段都已歸爲社會所有，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階級區別在社會上已經是全然絕跡的時候纔能完成的。要正確地使用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字的時候，我覺得這兩種革命都應得包含在內，所以在政治革命剛纔發起，經濟革命還全未實現的時候，我們只能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但我們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實行了。然而我們在論述俄國革命的時候，每直指其最近之政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或單稱爲『革命』——單稱爲『革命』時容易誤解爲社會主義的革命，——我雖然不以爲有甚麼不好處，但我所願注意的是俄國革命僅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的政治革命，革命以後還有一個時期之中社會主義之實現幾乎是全未就緒的。以下我想選用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一語以表示與包含經濟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別。

革命一語在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都可以使用，這並不一定是限於社會主義的革命而然的。例如一八四八年所起的法蘭西二月革命，這本是政治革命；但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所行的英國底產業革命，便可以說是經濟革命。兩者底性質本自不同，然各於其方面是從根本上的變革，所以從往昔以來便通用着革命一語；但一方面是政治的，一方面是經濟的，前者雖可突然發生，而後者則只能漸次地實現了。所以通常說到政治革命的時候，如同一八四八年二月法蘭西所爆發的革命一樣，我們可以指定牠的年月；但說到經濟革命的時候，如同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產業革命一樣，我們雖能約略畫出一個期間，但不能指定出牠的年月了。

社會主義革命之重要而且困難的部分，不待說是經濟革命。經濟革命需要長久的歲月，所以社會主義的革

命是不能一朝一夕企及的。便在現在的俄羅斯，其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雖然成功了，但其經濟革命是纔在動工的；假使有人以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已經實現着了，這要算是莫大的誤解。

第二節 社會主義革命史之三時期

從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革命——之見地上看來，社會革命之歷史可以分爲三時期。第一期是精神的準備時代，第二期是政治的戰鬪時代，第三期是經濟的經營時代。這些區別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在列寧底各著述中是表現得很明白的。我現在要一面引用着他的文章，一面說明着這三時期之區別。

列寧底 *The Soviet at Work* 出版於一九一八年，說是在博勒斯脫、梨安斯苦休戰條約後所著的，據英譯出版者言，恐怕是『俄國革命所生產出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部』了。書中『波耳顯微主義之進化』底項下敘述着共產黨之三問題：

『第一問題：成立於國民之多數信任其綱領及政策之正確。這是帝政時代以及錢爾諾夫斯與澤勒達里斯們（在共產黨執政前於克倫斯奇治下列入內閣的妥協派）和克倫斯奇與科修林輩妥協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到了現在，這個問題雖說不見得便是全然解決了，但在俄羅斯的勞動者與農民之多數，大體是決定着的。他們是決定的波耳顯微克的同志，我們據莫斯科最近的蘇埃特會議之態度看來，全然無懷疑底餘地了。吾黨底第二問題：就是政權之獲得及壓制掠奪者（指有產階級）之反抗。這個問題是還沒有決定着的。一方面有皇黨與科歹刺（信奉有產者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存在，別方面又有與他們相呼應的門顯

微克及社會革命黨之右翼，他們想團結着以推倒蘇埃特權力，這個事實我們是不能蔑視的。但是由掠奪者之反抗所引起的問題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共產黨執權之日）至一九一八年二月——波格鳩斯克降服時期——的期間中，大體是已經解決了。第三的問題是最緊要的，這是目前時期底特徵——這便是俄羅斯之產業的組織。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後繼續着在處理這個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在前此掠奪者之反抗以公然的內亂形式表現時，這個經營的問題竟不能成爲中心的問題。現在已經成爲中心的問題了。』

讀此文時，三問題都各有一個中心問題，我們可以明白地知道，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中自然有三個時期之區別了。列寧又接着說：『我們波耳顯微克黨使俄羅斯信服了』——這是第一期底事業，『我們替貧窮者，從富豪手中，替受難者，從掠奪者手中，得到了俄羅斯了』——這是第二期底事業，『而目前我們的事業是在經營俄羅斯了』——這是第三期底事業。這第三期底事業是『社會主義革命中最困難的（又是最屬望的）問題。我們的能力使民衆信服了並且戡定了內亂，但在其上我們的成功還要依係於我們對於組織的能力；這件事情我們千切不要看掉，這是頂困難的問題。這是說要爲數千萬人在一個新的地址上建設經濟的基礎。然而這同時是最可屬望的問題。何以故呢？我們要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纔能說俄羅斯不僅是蘇埃特共和國，並且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了。』（註）——爲實行第二期之政治革命及彈壓反革命運動之故，俄國纔實現蘇埃特制的一種特別的政治形態，但這不過是俄羅斯成爲了蘇埃特共和國罷了。要第三期之經濟革命使俄羅斯全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的

經濟組織之後，俄羅斯纔能成爲社會主義國。

〔註〕以干見 Lenin: *The Soviet at Work*, N. Y., 1919, 5th ed., pp. 6-8.

第三節 今日之俄羅斯還不是社會主義國

俄國革命纔僅僅走到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三期了。社會主義要在這第三期中實現的；聽說俄羅斯起了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便以爲社會主義是在俄羅斯國內實現了，這是大錯而特錯的。

列寧在前揭的論文中明明說道：

『我們的革命與西歐革命相比較時，我們大概是達到了，一七九三年及一八七一年法蘭西所達到的地點。我們已經達到了這一點，並且我們還有一點明明是更進了一步，即是我們在全俄羅斯國中布告了成立了一個更高級的國家之典型——蘇埃特制，這些事實我們是有可以矜誇的權利的。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此等成功而自逸，何以故呢？因爲我們是纔開始向社會主義推移，關於此點我們還沒有甚麼具體的成就。』(第十頁)

關於此點，列寧在其近作『農業稅之意義』一文中更鄭重地反覆說明着。我把牠翻譯了改題爲『革命後俄羅斯之經濟地位』收於次章；雖是太重複了，但在理解俄國之現狀上是重要的文章，我在此處且引用次列一語：

『我以爲凡是研究着俄羅斯之經濟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牠的過渡的性質的。『社會主義蘇埃特共和國』這個名稱只是表示着蘇埃特政府之決心，定要實現着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並不是說現在

的經濟秩序已經可以目爲社會主義的用意；要想否認這個事實的人我恐怕在共產主義者中也不會有一個罷。」

所以如前所引用的列寧論文中所說：今日的俄羅斯雖稱爲『社會主義蘇埃特共和國』，但其實只是『蘇埃特共和國』，要解決了經濟組織之改造的最難問題之後纔能稱爲『社會主義國』而名實相符了。不錯的，今日的俄羅斯『在物質的，經濟的，產業的意義上，還沒有走到社會主義底大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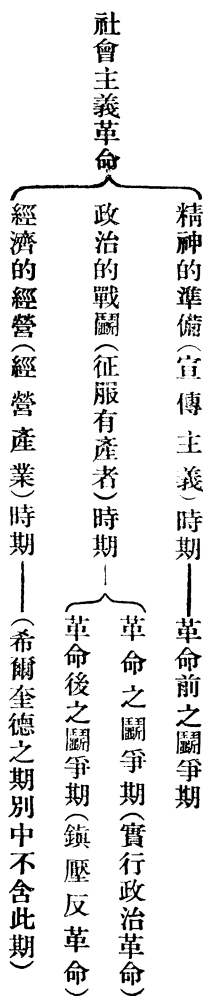
第四節 政治戰鬪（征服有產者）之時期

以上我把俄國革命底形勢已經瞥見了一個梗概了，我在下面想再稍說其細目。

我先說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這是可以稱爲政治戰鬪之時期的。

政治戰鬪之時期由無產者握取政權而開幕，由反革命之鎮定而閉幕，這便是列寧所說的『政權之獲得及彈壓掠奪者之反抗』——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據馬克斯主義，便是這無產者之政權握取。無產者握取政權，有產者因而喪失其從來之政權時，這時候是起了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由之而入於第二期之政治戰鬪之時期。但是這個時期此後還要暫時繼續。政治革命雖然成功了，政治的戰鬪不能立刻便告終結。有產者階級之反革命運動還要猛烈地繼起，不徹底地鎮定這反革命運動時，一旦成了功的政治革命終會失敗，政權將再恢復於有產者之手裏。所以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中，接着政治革命之後暫時還有鎮壓反革命運動之時期，兩者相合而成爲『政治戰鬪之時期』。此時期因此又可以分爲實行革命與鎮壓反革命之二時期。

希爾奎德『從馬克斯至列寧』一書中是把『革命』一語只限於政治革命（無產者擷取政權之一舉）的，他以此革命為中心，以為『社會主義運動之全期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一）準備着博得政權之鬪爭，（二）權力攫取，（三）已得政權之防衛——即是革命前（pre-revolutionary）之鬪爭期，革命（revolutionary）之鬪爭期，革命後（post-revolutionary）之鬪爭期』（Hilquit: From Marx to Lenin, 1921, p. 92）把這配合於前述的社會主義革命史之三時期則如次：



社會主義革命之三時期中最短的是第二的政治戰鬪（征服）之時期。在其前的精神的準備（宣傳）時期，比他長得多了。從馬克斯發表『共產宣言』以後至今已七十餘年，在其間各國之社會主義者費種種的方法，費非常的苦心，費不少的犧牲，不斷地以努力於主義之宣傳，然而經過了宣傳時期的國家，在世界中只有俄羅斯一國。俄羅斯以外的任何國家，要起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不知還要等待幾時——或者終竟不起也說不定——一直要等待那個時候，俄羅斯以外的諸國都是要把時間來費在準備期之宣傳上的。政治戰鬪期之後的經濟的（產業）經營時期也是很長的。這隨各國之物質的經濟的產業的條件而異，有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有的或比較的

在短時期內便可以結束；總之『要爲數千萬人在一個新的地址上建設經濟的基礎』這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然而只有政治戰鬪之時期在三期之中比較不費時日。此期之開始是無產者之握取政權，這個政治革命是和胎兒出產一樣，產事過長時，恐怕有產死的時候。至少胎兒出產的這件事情是在一個特定的時辰上起的，所以凡是生在世上的人都有他生庚年月。胎兒在母體要懷孕十個月光景，這是出產底準備期，與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一期相當。在此準備期之最後，母體產痛一來便把胎兒產出，這恰是與報告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期之開始的政治革命相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克倫斯基政府倒滅，波耳顯微克首領列寧與突羅次克奪取政府，而成立了蘇埃特政治。這是胎兒之產生了。這是無產者握取政權之成功了。繼此還有鎮壓反革命運動之時期。但是這個時期也不能太長，太長了社會全體是要疲弊的——無論若何社會，內亂太繼續久了時，其結果不外是『相爭之各階級兩敗俱傷』——要使社會革命成功，不得不相當地把時期縮短。並且這是有可以縮短的性質的。所以社會主義革命之三時期中，第二的政治戰鬪期比前後兩期都很短促，這是牠的特色。關於此點，列寧在 *Soviet at Work* 中說道：

「……握取中央之國權即使於數日之內可能，鎮壓掠奪者之軍事的反抗及怠業，在大國之全國中即使於數禮拜之內可能，而增加勞動者之生產力的問題之健全的解決（尤其是最悲慘的而且破壞的戰爭之後）至少是要數年。這個事業之決定的性質是依純粹的客觀的各項而決定的。」（二三頁）

宣告政治戰鬪期之開始的革命在數日之內可以成功，鎮壓反革命運動也可於數禮拜之內完結，然而屬於

經濟的經營期之事業的經濟組織之改造至少還有數年。並且這樣的經濟組織之改造不實行時，馬克斯之唯物史觀上所說的『社會革命』是還沒有實現，社會革命依唯物史觀所指示的要以物質的經濟的產業的客觀條件之具備爲前提，不是單以人之希望，決心，理想等所謂主觀的動因所能實現的。此等主觀的精神之動因要以客觀的物質之狀態爲條件。這樣的物質之狀態在政治戰鬪期——實行政治革命及彈壓反革命運動——剛好結束後不是便能完全具備的。要具備這些條件，所以至少要費數年的歲月以從事於經濟的經營；但是說到俄羅斯時，在政治革命以前在具備這些條件上比英美德法諸國都不完備，經濟的經營期間恐怕不僅數年，恐怕還要綿亙到數十年乃至百年罷。列寧說這個時期之事業之性質是『依純粹客觀的各事項而決定的』正是這個道理。

假使唯物史觀是正確時，則經濟的經營期，尤其是在俄國，是應該要糜費長久的歲月的；而在革命家之常情，便如俄國之共產主義者，最初好像每每以爲是不甚長久的一樣。然而隨着『社會主義革命』之進行，他們不久便注意到了，他們所豫想的時間纔次第地延長了。列寧在 *Soviet at Work* 上說『我們在制作着對於前進運動之種種條件，其前進恐怕比我們最初所想像的還要緩慢罷。』（二二頁）他更在『農業稅之意義』中說道『俄羅斯全國一般所行的是先資本家的關係，要從此狀態一直推移到社會主義去，究竟是可能嗎？可能，但只有在一個條件上於某種程度之內可能。這個條件便是電氣化。但是就是這一個條件至少也要費數十年，我們是很知道的』（參照次章）。這是說使『一直推移到社會主義去』的工作『於某種程度之內可能』的條件，『至少也要費數十年』的歲月。

總之今日之俄國只是有向社會主義推移之決心的『蘇埃特共和國』，還不是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他纔僅僅經過了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此後纔要走進第三期的。但是這第三期比第二期還要很長的歲月，尤其在與俄國一樣經濟發達很落後的國度中更是要這樣的。

第五節 政治革命與暴力

我本來是想論究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的，無心之間把話頭又說到第三期的經濟的經營去了。事理之性質上，間或要說到牠的前前後後始能明瞭，這是不得已的。我現在要回頭再說政治戰鬪之時期，因為我關於這一時期還有可以說的若干資料。

政治戰鬪期可以更分爲革命之鬪爭（實行政治革命）期與革命後之鬪爭（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這是已如前述。現在關於這期最足以爲問題是暴力（Gewalt—Violence）底問題，但在實行革命期與彈壓反革命期內其狀態迥不相同。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中，暴力之行使作爲手段使用的大概是限於反革命之鎮壓期，對於反革命者（在此處是有產者階級）之暴力的反抗，這是不得已的『必然之過程』。這個暴力之行使是極多的『溫文爾雅』的『理想主義者』所矚目的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過程，牠究竟如何是『必然之過程』？我們有公平地考察的必要。

我們第一所當注意的，是社會主義者之『政權攫取』，即是我所說的『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這以今日底經驗看來，差不多不用暴力便可以實現的。希爾奎德說：

『他們（馬克斯與恩格爾斯）關於具體的社會主義革命（希氏所指的是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連一

個歷史的實例也沒有，所以他們不能由於以歷史的實例為基礎的這種革命之性質和心理下得確實的歸納的結論。他們所知道的無產者革命之唯一的事實只是巴黎的自治團（Commune of Paris）而已……

『但是在近年來社會主義者在他們各自的國內明白地握到了政府之權力已經不少了，革命之科學的理論到現在已不能把這些有價值的經驗置諸計算之外。

『我們從年代次序說來，應該以芬蘭為社會主義者得到政治上之優越權的最初之國家。這種權力之獲得，最初是純然由議會的勝利得來的。在一九一六之總選舉，芬蘭社會黨於議會總員二百名之中佔得一百零三名，於是在社會主義者之奧斯科、安科野之下便成立了聯立內閣，其他關員是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參半。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八日宣佈芬蘭獨立的是在此社會主義者統率下的議會。而俄國之克倫斯基政府與芬蘭之有產者連絡不承認芬蘭獨立宣言之効力，下令解散議會重新改選，但是社會主義者及勞動團體不承認新選舉及以此為基礎的有產者的政府之合法性，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告總同盟罷工，驅逐新政府，於「芬蘭人民共和國之臨時政府」的名目之下建立了革命的社會主義。這事差不多是沒有用暴力而成就了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所起波耳顯微克之革命，也是發端於波耳顯微克在勞農議會佔了多數，這也可以命名為一種議會的勝利的。由握到政權的聖比得堡之「勞農代表者會議」及「軍事革命委員」之布告，便把臨時政府廢止了。

『關於政權之交代只有點比較輕微的反抗而已，新政府便得以「只流這樣一點血便這樣順手地使革命成了功，這是稀有的事」之滿足而登諸記錄了。

『在德國社會主義者之短的插話以前，有海軍的溫和叛亂之勃發和一月間的總同盟罷工，革命自身幾乎是用官僚的形式交代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威廉第二應議會多數之要求而退位，同日宰相馬克斯封巴登自行讓位於社會民主黨之佛里德里夷奕伯爾脫，於是非廉勃蟹達曼便從議院之窗頭宣告共和國之成立，有網羅社會主義各派的政府。十一月十一日「人民委員會」由多數派社會黨之代表者三人和少數派社會黨之代表者三人所組織，與由各部長所成立的內閣有同一的作爲。革命之犧牲只限於十一月九日示威運動時因爲小有變亂偶發，僅僅殺死幾人而已。

『奧大利之革命大部分是德國革命之撮影。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赫普司堡王朝廢位時，議會宣告共和制度，由社會民主黨統率之下組織臨時政府。此推移全然是沒有流血而實現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匈牙利之社會主義革命，在大體上也是自發地由本國勞動者所成就。：聯合國政府之過重的平和條件與對於此國所行的飢餓封鎖與愈見增大的民衆不安之不穩的形勢，使科祿里內閣不得不讓位於「無產者之執權」了。』(Hillquit, *Ibid.*, pp. 96-99)

更回遡到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所成立的巴黎自治團之歷史，也大概是同樣的，在當時也是『政府之更替沒有流血而成就了的。』

徵諸以上所列舉的歷史的經驗，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的政治戰鬥時期中政治革命之成就，都幾乎是以『不流血』而實現的。不消說，巴黎自治團是在普法戰爭時發起的，其他最近的諸革命是承着世界大戰之餘波而起的，這雖不能用以推察平時的形勢，然而本來政治革命與其起於『平時』，寧是起於『變時』。『變時』權力之組織廢弛，一般民心呈着異常的狀態，乘此機會政治革命便爆發了。在這樣的機會，不怕就是經過了好幾百年的大木，不消要甚麼烈風便如枯朽一樣立地摧折了。平時要想起政治革命是很難的，即使可能——因為在平時激起的原故，或許不免有流血之慘，——然而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可以不必經過『暴力行使』之慘淡的一幕而實現，這據以上列舉的歷史的經驗看來，是很明白的。暴力之行使在這個範圍內決不是『絕對的』『必然的』之過程。

第六節 反革命之鎮壓與暴力

然而經過革命之鬪爭期後，走到革命後之鬪爭期，舞臺便全然一變。我再把希爾奎德底記述譯出罷：

『無產者要維持其在革命中所握得的政權時，暴力之必要又成爲另一問題。在此，歷史告訴我們以與上面不同的故事。

『法國之共產革命黨人，他們沒有注意到要他們的政府之軍事的防衛纔是比甚麼還要重要的死活問題。他們對於反對者之攻擊，要有強大的一致的有訓練的對抗時，他們不能不埋葬自己的政見而組織他們的權力與資力；然而他們不然，却向書生的議論與黨派的討論上把時間虛棄了。像這樣，無產者革命之首

領們在談論的時候，有產者的反革命之狡猾的首領們却在忙着舉事的準備。在最初的小戰鬪時雖然互有勝負，然於五月二十一日費爾塞由軍（反革命軍）得着多數軍事的俘虜之應援——此等俘虜是以應援反革命軍之故由普魯士解放的——而攻入巴黎。革命軍雖然衆寡不敵，然猶強毅地距戰八日，而勞動者共和制之最後的英雄的防衛者們終竟敗北了。有產者階級恢復權力，這些「法律及秩序」之擁護者們爲祝賀他們勝利所舉行的獸的復讎之亂舞，便不知其限度了。

「據共產革命之雄辯的歷史家里塞格來（一八九四年由斯圖德格爾德刊行的「一八七一年之共產革命史」之作者）所記述：「鬪爭過後，軍隊變爲死刑執行之一大射擊隊。伯爾拉鮮司附近所收集的五千以上的人們都被投入於拉羅凱塔監獄中。獄長立在牢門看着這些囚犯。他不問他們一聲，只是或左或右地命令着。被命到左手一方的便立遭槍斃了。」像這樣有產者在恢復政權之第一日一同處於死刑的勞動者在二萬人以上，其後軍法會議之結果，處於死刑刑懲役的差不多達到一萬四千人云……」

「芬蘭之社會主義革命之領袖們，他們決不是不知道反革命之危險的。他們組織了赤衛軍，是由芬蘭勞動者之精華所成；凡以防衛之目的而起的組織中要算是有訓練有決意的，在有力的點上是未曾有的團體。假如只是在壓服國內之有產者而濟事時，芬蘭之勞動者無疑地是可以維持其優勝的地位的。但是掠奪者（卽有產者）之國際的連合對於他們是過於強有力了。芬蘭有產者之「白衛軍」從瑞典及其他等國得到武器彈藥之供給，又得着了有訓練的德國軍之聲援，於是此小國之革命的無產者敗北於優勢的資本主義

之國際的勢力，接着資本主義便敢於復讎了。乘勝的芬蘭有產者開始了「白色恐怖」之時代，冷酷，殘虐，出人意料之外。十萬人以上的男子婦人及小兒都被投入獄中，一萬五千人的勞動者不費事地都處以死刑，一萬五千人以上的都被餓死了。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及勞動運動除出於法令保護之外，他們的機關報禁止發行，他們的本部變為「白衛軍」屯駐所。

『俄國的波耳顯微克政府於其成立之初期對於革命之防衛不甚用心，正規之軍隊解除了，革命的無產者所依賴的唯一之武器僅是由勞動者之志願兵所組成的編制不完全的少數軍隊。死刑廢止了，對於反對派也容許他們的言論及出版之完全的自由。這個時期……約畧繼續了六個月。但到一九一八年的春天積極的反革命運動之計畫表現了最初的徵候，確實地增加了牠的範圍和重大了……俄羅斯革命不見敗北於此等攻擊之下的原故，是因為有種種幸運，得到可以組織有力的防禦力之時間。俄羅斯之有產者貧弱了，比歐羅巴其他各大國之有產者都還要貧弱，他們連獨立地組織有效的反革命之資力和能力都沒有了。諸外國之資本家的政府又纔經過有史以來未曾有的大戰，他們困憊了，人民也疲勞着正在萎縮；所以他們對於俄羅斯軍不能公然地行大規模之戰爭而且也不敢。並且俄國有廣大的面積，比較地能保經濟的自給，所以能緩和了封鎖之影響，並且也得免掉了被敵人軍隊事實上的佔領。

『不僅這樣，俄羅斯革命政府剛在危險之徵候發現的時候，立地便極力講求防衛之策；一九一八年四月赤衛軍組織了，其組織在以後更漸次改良增大，竟練到可以對應一切武裝的攻擊而能制勝了。而於別的

方面又以政治的壓制之峻嚴的種種方策以對抗反革命之宣傳。蘇埃特俄國得以遇救之處是由於組織赤衛軍之得時與彈壓反革命計畫之敏捷。

『德國及奧國之經驗，於研究革命後之鬪爭（即鎮壓反革命運動）上，沒有甚麼貢獻。在德奧兩國因戰敗之後人民均茫然自失，態度冷淡而士氣衰頹。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在德國，也沒有統一和力氣。社會主義者等於兒戲地便把政權受取了。他們對於有力的反對沒有維持政權的希望，也沒有防衛牠的準備。他們在他們的同劑之中也不能保持其統一，在接連的選舉上也不能維持其黨羽，於是政權落到他們手裏時，同時又清靜地平淡地從他們的手中脫去。』

『匈牙利蘇埃特共和國之首領們也對於革命之防衛方策沒有熱心講求：他們得到政權之後四閱月間，好像是以爲他們的地位大體依賴着人民底好意而安全了，他們是住在一種惡人底天國裏。其後他們模仿俄國之外形，組織了赤衛軍與革命裁判所，但是全然是不完全並且是無氣力的東西。』

『羅馬尼亞軍之侵入對於吞聲久待的國內之有產者賜與以對於革命的無產者規行流血的復讎之機會；他們把蘇埃特政府推倒了，由是在他們的殺伐與獸性上開始了一個出類拔萃的恐怖時代。』(Hill-quit, *Ibid.*, pp. 100-105)

以上所述的史實假使沒有甚麼錯誤的時候，我們由這些事實看來，不得不承認使『暴力』之不得行使的，是在『革命後之鬪爭期』的有產者階級之『暴力的反抗』。能够鎮壓暴力的是只有暴力的。這是社會主義革命之

正當防衛，離去了是非善惡的不得已的手段。便是平和主義之羅素也說道：『我是不能贊成世界革命的，但我不能逃出這個結論：主要的資本主義國之政府在做着一切招徠牠的事情』（Russell: Bolshevism, 1920, p. 32）假如有人劈頭便不承認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這不消說是莫有話說。但是有一部分或多數的論者一面承認着『社會組織之改造』——把今日之資本主義組織改造為社會主義的組織，即是『社會革命』之一種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一面又絕對地否認着『暴力』，這以甚麼理由而否認，並如何可以免脫上面的難關，這是我所不想討論的。

第七節 精神的準備（宣傳思想）期與無產者之執權

馬克斯說過：『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由此至彼的一個革命的變革時期存在。因之乎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期與之相應，此時期之國家不能外乎無產者之革命的執權』。這句有名的話現在有提在念頭上的必要。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的政治的戰鬥時期內，反革命之彈壓是重要的問題，這已如前述；反革命派要以暴力企圖顛覆革命；無產者如與這一派人攜手，他們便不能實行他們的革命事業，這是當然的事情；所以在這時不能不實行『無產者之執權』（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了。

便在今日的俄羅斯，這種無產者之執權是實行着在的。如前所述，最初六個月間雖曾完全允許過反對派底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但到反革命運動之徵候一旦發現了後，對於此派的言論與出版便加了嚴峻的束縛了。有選舉權的人只是無產者，有產者及有產者的分子之選舉權是全被剝奪了。形勢一朝逆變，許多的自由主義者對

此很是鬻首蹙額。羅素自己說他『是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走進俄國』的，但在離開俄國的時候，他成爲非波耳顯微克了。然而這從俄國革命主義者方面說時，在彈壓反革命期中而談自由，猶如在戰場上講國際法，在火災場上講禮儀了。這是他們由以上所述的歷史的經驗得來的教訓。

他們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一定的期間內雖是容許暴力之行使，但我們如把他們一概看成暴力革命主張者，這是錯誤了的。我想要釋明這件事理，我在此不得不說轉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一期的精神的準備時期去。

此時期如前所述，是社會主義宣傳時代，是無產者之政治革命想要成熟的時代，不是所謂『革命後之時期』。這個時代自然還是有產者執權時代。在這個時代有主張用暴力的人如像俾特林，剎朗克之流，這是馬克斯所極端反對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一期的精神的準備時期，這從馬克斯主義上說來，是以無產者之階級形成爲目的的思想宣傳之準備期。目的既在『精神的戰鬥』，既在『思想之宣傳』，則此時期之武器當然是筆與舌，不是劍與力。時期還是屬於『革命前的時期』，掌握着社會上之組織的權力者是有產者階級。現在有少許的無產者對於他們就想加以無組織的叛變，但不消費吹灰之力便立地會被人鎮壓的。或者又大聲疾呼地喊道：把有產者底言論集會禁止，只使我們無產者有這樣的自由喇！這樣叫一陣，握着權力的有產者他豈是會聽你的？假使有人要求選舉權只應該給與勞動者的時候，他會被人當成狂人投入精神病院了。所以在這時期的馬克斯主義者只要求言論與集會之一般的自由，要求普通選舉。不消說，在這個時期的無產者之自由是極有限的，但如無產者一旦握取政權經過政治革命時期而走入彈壓反革命時期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忽然一變。他們是以在有產者社會得來

的言論集會自由，發展到這步田地的，但他們對於有產者之反革命運動禁止其一切的自由；他們是因為有產者社會讓步，得以由普通選舉而在議會上佔多數的，但他們却不許有產者有選舉權。無產者之專權，暴力之行使，要到這一期纔能成爲問題。

第八節 經濟的經營期（產業經營）與社會主義革命之成就

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經過第一期之精神的準備，更終結了第二期之政治的戰鬪後，纔走到第三期之經濟的經營（產業經營）之時期。不消說，此等時期之區別是以其中心問題爲標準，雖然說走到了經濟的經營期，但精神的宣傳和政治的戰鬪並不全歸無用了。這等事業依然是在並行，不過不能成爲中心的重要問題罷了。我現在就想就這第三期加以說明以告終結。

第二期政治的戰鬪期之困難是與其前的思想、的、準備程度有關係。主義之宣傳如已十分時，不惟無產者階級之大多數得了理解，便是有產者階級之進步的分子也得了相應的首肯，那時如政治革命實現的時候，無產者之團結鞏固，有產者之反革命也會微弱了，反革命鎮壓期之困難依這樣的事情如何而加減。同樣，第三期之經濟的經營之困難與其前的物質、的、準備程度大有關係。政治革命前的社會假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高度時，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比較的容易，因之乎在比較的短時期之內可以實現。但是假如政治革命前的社會在經濟的產業的方面比較的幼稚時，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比較的困難，因之乎要需用比較長久的歲月。俄國便是這後者之一例。

『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精神的主觀的要素和物質的客觀的要素之結合而實現的。這是唯物史觀所主張的：物質的經濟的事情之具備是實現理想時不可缺之條件。所以即使決定了方針要由政治革命以實現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在實現此決意上却需要有一定的物質的條件之具備；第三期之經濟的經營便應着這樣物質的條件之具備如何而定其時期之長短。但是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之勃發時機並不是專依存於這樣的物質的條件之發展如何的。這樣的革命之勃發是一個歷史的事件。凡為各個歷史的事件，其原因是極複雜的，不消說是不能專歸着於物質的條件。所以經濟的發展比較地落後的國家，比較地進步的國家，得以早時發起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目前的俄羅斯便是一個實例了。但是這只是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之發起，要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俄國是還不得不經過此後第三期之經濟的經營的。

社會主義之實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企及的，我在前面已經反覆說過了。現在的俄國此後正要講究經營產業底方策，列寧已明明說過：假使俄國此後不依資本主義的方策以求發展時，恐怕連社會主義底大門也不能走到。但是世人每每有不少的誤解，以為俄國的革命便是社會主義之實現，好像馬克斯之唯物史觀生了破綻一樣；其實那只是社會主義之政治革命，那只是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二期政治戰鬪期之開始。從政治革命經過反革命之鎮服時期，更經過產業之經營時期，社會主義然後纔能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纔是馬克斯所說的『社會革命』之成功，唯物史觀是說明這社會革命的突羅次克在俄國革命之前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之始）做有『我們的革命』一文，我在前面（下篇第二章中）已經引用過一節，我現在重錄於此以補助我的意見：

『無產者隨資本主義之成長，而成長且得勢力。由此見地說來，資本主義之發達是趨向執權制(Dictatorship)的無產者之發達。但是政治上的權力歸到勞動階級手中的時日，不是由經濟力之資本主義的發展之程度所直接決定，寧是由於階級鬭爭，由於國際的地位，又由於種種主觀的要素，例如傳說、敵愾、決意等所決定的。所以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的發達比較低度的後進國中，比在高度發達後的資本主義國中，可以更容易早佔政治上之優勢。……有人以為無產者之執權與一國之技術的及生產的資源間，好像有一種自動的關係存在，這是想用極幼稚的方法去理解唯物史觀的了。這樣的思想與馬克斯主義沒有甚麼關係。』

政治革命之勃發，這是社會組織進化途上之一個插話，這不是唯物史觀所想說明的。這決不專依存於物質的條件，是以種種的要素——尤其是主觀的要素——而決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要由政治革命所樹立的決意和足以實現其決意的物質的條件之具備纔能完成的。

總之，政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期之政治戰鬭期之開始，在這時候，社會纔走到馬克斯之所謂『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隨着第三期之經濟的經營期之延長而延長。馬克斯有名的唯物史觀公式中說是『於此社會革命底時代纔來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之全部便或徐或急地起了變革。』便是這個過渡期底說法了。由無產者執權所行的政治革命是報告『社會革命底時代』的晨鐘，應此鐘聲，社會纔走入過渡期，此後更由經濟的經營之結果，經濟的基礎纔或急或徐地起了變動，隨之而上層建築之全部也纔變革了。暫且從政治上說來，社會主義的組織一實現時，階級之區別漸次消滅，無產者執權之強制的政治也隨之而漸次微

弱，於是乎強制組織的『國家』自身也長歸於『永眠』了。馬克斯正是這樣思索的（參照本書下篇第一章）——關於俄國革命本還有不少的問題當得思索，但我現在暫且在此把本文告個終結。

第六章 政治革命後俄羅斯之經濟的地位

此文據作者原註是從列寧著的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Tax*（農業稅之意義）譯出的，載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發行的 *Soviet Russia*, Vol. V, No. 1, pp. 2-7 中。又新近出版的 *The New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 中亦已收入。兩英譯小有出入，原譯文是依據後者。又德譯文標題為 *Die Vorbedingung und die Bedeutung der neuen Politik Sowjet-Russlands* (Ueber die Natural Steuer) ——『蘇埃特俄國新政策之前提及意義（論自然物稅）』與英譯文比較時，英譯於末尾處大有省略處云云。

第一節 序言

現在的農業稅問題很引起人注意了，而且是衆論紛紛的題目。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牠實在是現時狀態之下的最重要的政策問題之一。

因此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問題，這總要算是有用處的。我們不從其『日常方面』去討論，只從原理之見地上去接近，換句話說，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背景，我們依據以規畫着現時政策之具體的實際的手段。我現在要嘗試這個研究，但在必要上我先要引用一九一八年我所公佈的小冊時論 (Pamphlet) 之一 (*Tasks of Our Times, On 'Left' Childishness, and Petty-Bourgeoisism*)

當時的論爭現在是無用的，我們暫且捨開，但是我只想記憶着其中關於『國家資本主義』之議論及由資本

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現時之過渡期中基本的經濟要素之諸點。

當時我這樣說道：

『……在我們蘇埃特共和國現時的事態，國家資本主義應該是我們的前進之一步。假如此後六閱月內，國家資本主義能在我國建設時，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並且是一個確實的保證，保證在一年之內社會主義能夠樹立並且能得必勝之勢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看見了這些話頭會以為大不應該而發雷霆之怒。甚麼向資本主義之推移在蘇埃特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前進之一步？……這豈不是對於社會主義的謀叛嗎？

我們不得不細細研究的便是這一點。

第一，我們不得不分析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之性質，這是使我們有自稱社會主義蘇埃特共和國的權利和基礎的。

第二，我們應該指摘這些人底謬誤，他們不知社會主義之正敵是我國小資本家的經濟狀態和跋扈於我國的小資本家的思想。

第三，我們應該正當地理解蘇埃特國家與資本家國家之區別。
讓我們研究這三項罷。

第二節 現時俄國經濟層之種種

我以為凡是研究着俄羅斯之經濟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牠的過渡的性質的。『社會主義蘇埃特共和國』這個名稱只是表示着蘇埃特政府之決心，要實現着走向社會主義之推移，並不是說現在的經濟秩序已經可以目為社會主義的；我以為凡是共產主義者恐怕也沒有一個人會否認這個事實的罷。然則『推移』這個字是甚麼意思呢？把牠嵌合到經濟方面上來，豈不是說在現在的制度之中，其中的成分有『一部分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的』嗎？不錯，這是甚麼人都是知道的，但是俄國現存的社會經濟層中有多數種類的成分，却不見得是甚麼人都能知道。這正是問題的難關了。

讓我把這成分舉出來罷：

- (一) 家長的，即程度甚低的農民生產。
- (二) 小規模的商品生產（此中包含販賣五穀的農民之多數）。
- (三) 私的資本主義。
- (四) 國家資本主義。
- (五) 社會主義。

俄國是這麼大而且富於變化的國家，社會經濟層之各種形態都是混存在這兒了。這兒正是目前事態之特徵。

問題是那一種是最優勢的要素。小農民儕輩間只能有小資本家的思想，這是明瞭的。農民之多數，大半是小

規模的商品生產者。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外殼（五穀專賣，對於工業者，商人，資本家的消費協社的管理）次第被投、機、者、破、壞、而投機之重要商品便是五、穀。

主要的鬭爭正在這一部分發展。是在誰人之間鬭爭呢？照我前面所列舉的順序說來，可是在第四與第五成之間鬭爭嗎？明明不是。這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之鬭爭，是小資本家和私的資本主義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宣戰的一個鬭爭。小資本家不問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他們是對於一切形態的國家之干涉和管理都是要反抗的。這是絕對不容置辯的事實，對於這事實的不明是生出多數經濟的謬誤之根本……

國家資本主義比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在經濟上實在是高到不能比較的地步，此其一。其二，我們對於蘇埃特政府也沒有恐怖的必要：因為蘇埃特國家是對於勞動者與貧民保證其權力之國家。

第三節 德意志的國家資本主義

要使這件事理明瞭，我最好是先引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之實例。無論甚麼人都是知道的，那便是德意志了。在這一國內近代大規模的資本家的技術與系統的組織，隸屬於貴族的、有產者的、帝國主義之下，可算是到了進步的絕頂。假如德意志不是軍國的，貴族的，有產者帝國主義的國家，而是別一種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形式，不同的階級內容的國家，一個蘇埃特制，即是一個無產者的國家時，諸君可以由此得到產生社會主義的各種條件之總和了。

沒有由科學上最新之智識所建的大規模之資本家的技術，沒有系統的國家組織可以使數百萬人服從於生產物之生產及分配的同一標準之嚴密的遵守時，社會主義到底是不可可能的。我們馬克斯主義者常常說到這件事情，但是和不理解這件事情的人，如同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之大部分的人們，就使費一分兩分的時間來議論，也覺得是不值。

更次，沒有國內的無產者之支配，社會革命也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屬於純粹的初步。歷史是奇奇妙妙地進行的（除去頭等傻瓜的門顯微克反對波耳顯微克的社會主義者恐怕沒有甚麼人會向着歷史要求牠圓活地，平和地，簡單地而且平易地產出『完全的社會主義』）一九一八年就好像從國際的帝國主義之同樣的卵殼中生出了兩匹雛鳥一樣，把社會主義各各產下了半分。德國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前者是極明白地爲社會主義具備着物質地實體化了的經濟的，產業的，及社會的各種條件；而後者則具備着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的政治的各種條件。

在德意志國內無產者之革命一旦博得勝利時，會極容易地立刻打破帝國主義之外殼全部（不幸這個外殼是百煉鋼鑄成的，無論怎樣的『雛鳥』到底都是不能打破的）而且不費甚麼困難或者是極少的困難——不消說，此處所說的『困難』不是狹義的，是由世界史的見地上來看取的——便確實地可以齎致世界社會主義之勝利了。

第四節 國家資本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之通路

假如德國革命延期時，我們的事業是明瞭了的，即是我們從德國學習國家資本主義，並且要盡全力地學到。我們要使野蠻的俄羅斯迅速地歐化時，我們是不能迴避任何專擅的方法；並且要征服野蠻時，我們也是不能躊躇於使用任何的野蠻手段。

現時在俄羅斯佔優勢的是小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從這兒出發時有一條路，要經由介在中間的一個同一的驛站，名叫『生產與分配之國民的計算及管理』，以通於國家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之兩者。不了解此點的人們每陷入於不可容忍的謬誤，他們是不看事實，不能與事實觀面，或者把自己限制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抽象的衝突而不能走進我們現在所通過的時期之具體的形態或階段……

像這樣，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所共通的——國民的計算與管理時，從俄國現在之經濟的地位要想前進，全然是不可能；所以說談着『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以自驚驚人的，是絕對的理論的呆滯，正是這個原故。這是迷亂人心使從現實發展之道途上逸失的說法。這在實際上和小規模的私的資本主義把我們牽着，倒退的是一樣。

我把國家資本主義看得很『高貴』，並不是從今天纔起頭的，我在波耳顯微克未得權力以前便早已主張着的了；我要使讀者見信，我且把我一九一七年九月脫稿的我的小本時論『威脅着的危機及其對策』中引出幾句來罷：

『試把貴族的資本家的政府，置換成革命的民主的政府，即是以革命的態度打壞一切的特權，敢用革

命的方法以實現最完全的民主主義的一種政府罷。那時諸君可以知道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在真的革命政府之下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社會主義之一步。

「……何以故呢？因為社會主義不外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前進的一步。

「……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全的物質的準備，是走進社會主義的「大門」牠是歷史這個階梯中之一級，在此級與可以稱為社會主義之一級間，沒有別的階段存在了。」（二七——三八頁）讀者可以看見的，這是在克倫斯奇時代所寫的東西，我所寫的只是論究「革命的民主主義」不是、無產者之執權，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把這政治上的階段登得愈高，我們向蘇埃特社會主義之國家，向無產者之執權走得愈近時，我們懼怕「國家資本主義」之必要更少，這是很明瞭的了。在物質的，經濟的，產業的意義上，我們還沒有走到社會主義底「大門」，並且我們不經過這個「大門」時沒有路可以走進社會主義，這是很明瞭的了。

第五節 農業稅與「軍國共產主義」

社會革命黨之左傾派對於「右翼波耳顯微克」之所謂「妥協」政策，盛倡其非難。此等人們不知道如何去解釋革命運動之歷史及其發展，關於此等問題我們可以得到的，是甚麼教訓；妥協政策之有害究竟是甚麼，他們也不十分明白。

克倫斯奇之妥協政策是要把行政權交給帝國主義的有產者階級，並且權力問題是一切革命之根本問題。

但在現在，政府的確是在一個政黨之手裏——無產者政黨之手裏，爲謀有產者階級之利益而分割政權，或賣却無產者之獨裁制，這是決不會有的；然而還要使用着『妥協』這個字樣，這豈不是無意識的鸚鵡之學舌嗎？我們現在以一國底政府想努力採用資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材對於小規模所有權之威脅着的混沌以救助我們，而他們纔把我們的政策稱爲『與有產者階級之妥協』這是表示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造政策全然無智的了。

前所引用的一九一八年當時之議論，關於期間之點上有種種的錯誤。現在證明得所需的期間比當時所想像的更見加長了。這是不足驚異的，只是我國之經濟生活之基本的諸要素依然和當時是同樣，這可不要忘記。農業的『貧民』（無產者及準無產者），其大多數在現在是成爲了中等階級之農民了。由此使小規模之所有權和小資本家的運動增了氣勢，而同時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內亂極端地使我國荒廢了，阻害了生產力之恢復。又加之一九二〇年之荒歲，糧秣不足，家畜死亡率增添，更阻害了運輸和產業之復興；因爲重要種類的燃料和木材之運輸平時是用農民之馬匹的。其結果到一九二一年春天，竟迫到絕對不可缺的地步，不得不取最敢斷的例外的處置以改善農民之狀態而增高他們的生產力了。

何以要改善農民之狀態而不改善勞動者之狀態呢？
因爲要改善勞動者之地位時，不能不要麵包與燃料。

關於現時之國民產業最普通的故障是歸於此點，不改善農民生活不增加農民之生產力時沒有方法增加生產力，增加穀類及燃料之貯藏，即是改善生活有從農民開始之必要。不解此理的人以爲是與農民以特別的待

遇，是和背叛無產者獨裁制一樣的一種『背叛』。這樣的人把問題之考察弄錯了，只是埋頭於文字之爭論而已。

有這樣的原故，最先所必要的是能提高農民生產力之直接而認真的手段。這不把我們的食糧政策大加改變是不能的，於是我們不行食糧之強徵而行農業稅——納稅後是至少有局部的自由交易之權的，——正是這樣的改變之一。

我們不行強徵而行農業稅，其本質是甚麼呢？

農業稅是從特殊的『軍國共產主義』推移來的一種形式，要實現生產物之適當的社會主義的交換，因為極端的必要與荒廢與戰爭之故，不得已而採用了特殊的『軍國共產主義』，這『軍國共產主義』也是由具有人口之大多數為小農所佔而造出種種特性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推移之各種形式中之一。

『軍國共產主義』之特徵存在於斂取農民生產物之剩餘，有時且斂取其所必要的部分，以贍養軍隊及勞動者。我們大概是把信用來代替紙幣，以斂取其生產物。在荒廢了的小農國內要打破地主及資本家，除此而外別無方法。我們（不怕國內的榨取者受着世界最有力的國家之援助）終竟得了勝利的事實，不僅證明了勞動者與農民為他們的解放之故所發揮的可驚嘆的英勇，而且還證明了若干事項，即是證明了門顯微克，社會革命黨，考次克一派的人們，他們關於這『軍國共產主義』而非難我們，他們却纔是有產者階級之奴隸。採用『軍國共產主義』可算是我們的功績。

然而樹立這『軍國共產主義』所得的利益，我們也要曉得牠的真實的範圍。『軍國共產主義』是因為戰爭及

荒廢之故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這與無產者的政策之各種問題不相適合，也不能適合。這只是一時的權變。無產者在小農國內要實現其獨裁制的正當政策，是把對於農民所必要的工業的產物與穀類交換。只有這樣的政策纔能滿足無產者之要求，只有這樣的政策纔能鞏固共產主義之基礎，而導引牠達到完全的勝利。

農業稅是向此政策之一推移。我們仍然還在荒廢之狀態，仍然還為戰爭（這在昨天是狂暴了一陣，明天為資本家之貪慾和忿怒恐怕又要爆發）之負擔所壓縮，我們不能有十分的工業產物給與農民以換取我們所必要的穀類之全部。由於這樣的原故，所以我們纔採用了農業稅，即是我們把勞動者之武裝所必要的糧穀之最小量以租稅之形式取入，其餘便使與工業上的生產物交換。

關於此點我們又有不能不記憶着的事情，是我們現在還在窮乏與荒廢裏，我們是不能立地建立大規模之國家社會主義之工場生產的。要經營這樣的大規模之生產，要在大工業之中心地點有穀物及燃料之儲藏，並且消耗了的機械要有替換。然而『經驗』使我們確信着：這樣的事業不是一時可以成就的，我們也知道現在在由帝國主義的戰爭所引起的破壞之後，便是最富最進化的國家也要經過長久的歲月纔能解決這個問題。這件事情是說：在某種範圍內有幫助小工業再興之必要——這是不必用機械，也不必原料燃料食料等政府之大儲藏，對於農業可以立地效助，而能增高其生產力的。

試行後的結果是怎樣呢？根本上生出了自由交易（不怕只是局部的）之一定額，招徠了小資本家及資本主義之復活。這是不可疑的事實，對於這事情閉了眼睛的人當得可笑罷。

我們要受人質問道：這是必要的嗎？這是不妨事的嗎？這是不危險的嗎？

這樣的質問由許多人提出，而在極多的時候只是表示提出這種問題的人們之愚直（丁寧地自行表示的）。請參照一九一八年五月我所論定的種種社會經濟層之經濟的要素（構成部分）罷。從家長的即半原始的起頭，那些五層的構成部分或是五個之階梯之存在，我們是不能否定的。且於小農國內，小農層即半家長的半小資本家的經濟層最佔優勢，是很明白的。既然我們還有交易，小產業之發達便是小有產階級，資本家的產業之發達。這是不磨的真理，經濟學上初步的真理，是由街頭巷口的普通人由日常經驗與觀察所確定了的真理。

對着這樣的經濟狀態，社會主義的無產者當取怎樣的政策呢？最可希望的而且最『正當』的政策，是把小農所必要的工業產物，一切都於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場中生產，舉以與農民交換其所生產的穀類與原料。這是我們最初所企畫的，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供給這一切必要的生產物，就使再隔些時日也不能供給，至少不到我國電氣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第八）之事業完成時是辦不到的。

然則留給我們做的事情是甚麼呢？我們不能完全禁阻非國家的私的交易，即商業，即資本主義——這和無數小生產者之存在是不可避的——之發達。這樣的政策對於想實行牠的黨派是愚而自殺的蠢計。因為在經濟上是不可能，所以為愚。因為要使想實行牠的黨派必然崩壞，所以為自殺。若干共產主義者要想蔽覆其『思想上，行為上』關於此政策所陷的罪過，這是無用的。我們要打算改正這個過失。我們要着手改正這個過失。我們改正這個過失是要緊的，假使不改正時我們會遭慘敗。

或者（這是唯一可能而且是實際的政策）我們可以不必禁阻資本主義之發達，而努力把牠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之途上。這在經濟上是可能，因為無論何處凡是自由交易與資本主義之要素存在時，國家資本主義總是於某種的形態與某種的範圍內存在着的。

第六節 利權割讓政策

但是無產者之獨裁制與資本主義究竟能夠結合而兩存的嗎？

問題之全體，無論從理論上與實際上說，都是存在於尋覓正當的手段順着國家資本主義之道路，以利導資本主義之不可避的（於某程度內且向某時期）發達，又要發見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轉化成社會主義時，應該樹立如何的條件並且如何去樹立。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有充分地明瞭的觀念：要曉得國家資本主義在我們蘇埃特制度中，在我們蘇埃特國家之結構中，實際上究竟代表的是何物。

蘇埃特政府怎樣纔可以導引資本主義之發達使順着國家資本主義之道路？怎樣纔可以『種下』國家資本主義呢？最簡單的實例之一是利權割讓。這個政策現在是甚麼人都以為是必要的，但是不見得甚麼人都很能見得到牠的意義。然則從社會經濟之諸層及其相互間之關係看來，究竟以甚麼來做蘇埃特制度下的利權割讓呢？這是對於小規模之私有制度（家長的及小第三階級的）由蘇埃特即無產者國家與國家資本主義所結合的一個協商，一個同盟。受利權者是資本公司。他為得利潤而經營事業。他之贊承和無產者政府協商，是因為要得特別的

利潤，或是要得一種原料，不這樣時便不能入手或難於入手。而蘇埃特政府則於生產力發達之形式上得占利益，由此可以立地或於短時期內增加可供利用的生產物之分量。例如我們有幾百的營業，礦山，森林等，我們不能使牠們一切發達，因為我們沒有十分的機械，食料，或運輸。同理，我們也使他種方面之發達遲鈍。大企業發達之不良或不十分，其結果是使小私有財產運動得佔優勢，因而生出種種之結果——即都市郊外的（到後來是各處的）農業之退化，其生產力之分散，對於蘇埃特政府的信任之減退，盡耗公款，及大小（最可怕的）投機事業。

蘇埃特政府於利權割讓之形式『種下』國家資本主義，由此對於小規模生產可以使大規模生產得勢，對於未進步的可以使已進步的得勢，對於手工經營可以使機械經營得勢；增加其掌中的大規模產業之生產量，使經濟關係之國家的規制得以對抗小第三階級的無政府的經濟關係。割讓政策之合宜的而注意的採用可以使生產狀態及農民之地位於一定的程度內迅速地改良——不消說，是要提出一定的犧牲的，即是要把最有價值的生產物之幾百萬『普達』（pood——衡量名約合我國二十八斤）以割讓於資本家。利權割讓要在如何的範圍及條件之下纔於我們有利並且纔於我們不危險呢？這種決定是依存於勢力之關係，能由鬭爭而決定的，因為利權割讓也是一種鬭爭之形式，是他種形式的階級鬭爭之繼續，階級鬭爭無論在甚麼時候是決不能由『階級平和』所能置換的。鬭爭之方法是甚麼呢？實際的經驗會指示我們罷。

利權割讓之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比較在蘇埃特制度內的國家資本主義之他種形式，是最簡單，最明瞭，而且最有限界的。在這兒我們有和最開化的，先進的西歐諸國直接表現於形式的契約。我們精確地知道我們的損

失和利益，我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精確地知道我們割讓權利的日期，我們也知道期限滿後的買收之條件（假使契約中有關於這樣的買收之條約的時候）我們向資本主義之世界貢獻一定的『糧稅』，我們卻好像『買回』某種關係，立地領受了一定的手段足以鞏固蘇埃特權力之地位，而改良我們產業之各種狀況。關於利權割讓之全部困難是在締結割讓條約時，要用心權度種種的事項，在條約締結以後要監視着條約之履行。不消說，這兒是有種種的困難，在最初的時候更會時常失敗的，但是這種困難和社會革命之他種事業比較時，尤其是和國家資本主義之他種形式的發達，採用，培植相比較時，簡直是不成問題的。

第七節 合作的資本主義

關於農業稅之採用，一切共產黨員和蘇埃特職員最重要的職分是要把『利權割讓』政策之原理（即與利權割讓或國家資本主義同樣的政策）適用於資本主義之他種形式——如局部的自由貿易。

請以消費合作（協社）爲例罷。農業稅之布告立即招來消費合作的諸種法律之改訂和其『自由』及權利之某種程度的擴張，這決不是毫無意義的。消費合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之一形態，但是牠不是那麼簡單，沒有那麼明顯的區劃，牠更複雜，所以牠對於我們的政府會引起多少實際的困難。小規模商品生產者之合作（我們此處所說的是在小農國內佔優勢的典型的合作即此等小規模商品生產者之合作，與勞動者之合作）不免要製出小第三階級資本家的各種關係，助長這些關係之發達，而送最大之利益於資本公司。小規模之生產者佔優勢，在交易之可能與必要還存在時，事態是不得不如是的。在俄國現時狀態下的消費合作之自由與權利是資本主義之

自由與權利。對於這個真理要閉眼睛的人，不是愚人，便是罪人了。

但是『合作的』資本主義在蘇埃特權力之下是與私經濟的資本主義對立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別一形態，牠以這樣的資格於我們是適用而且有利的，不消說，是限於某種的範圍以內。農業稅既是允許殘餘的（納租所剩的）生產物之販賣自由，我們當竭盡全力以引導這個資本主義之發展——因為自由貿易是資本主義之一發展——使順着合作的資本主義之道路。合作的資本主義在容易實行國家（在此是蘇埃特國家）與資本家間的契約關係之管理，監察，與維持上，與國家資本主義是同樣的。消費合作是交易之一種形態，比私的交易更有利而適用，不僅是因為前述的理由，並且是因為容易使大多數的人口結合。這從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之推移上看來是沒有大的利益。

讓我們把利權割讓和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之一形態的消費合作比較罷。利權割讓之基礎雖然在大規模產業與機械經營之上，而消費合作之基礎是在小規模產業，手工經營，有時或竟在家長的產業之上。利權割讓是允許於一個資本家及一個公司，一個 syndicate，一個 cartel，一個 trust。消費合作是包含數千，乃至數萬的小企業者。利權割讓要有一定期間的一定之契約，而消費合作則沒有一定之契約或一定之期間。廢止關於消費合作之規律，比破棄關於利權割讓之契約尤為容易，因為關於利權割讓的契約之破棄即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同盟或經濟的『結婚』之破棄，而關於消費合作的規律之廢止，或是一般的法律之廢止，不僅不會解除蘇埃特政府與小資本家間的事實上之『野合』，且於一般的經濟關係全無影響。監視受利權割讓的人容易，監視合作的

事情困難。由特許事業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是由大規模生產之一形態向他種形態之推移。而由小企業者之合作向社會主義之推移是由小規模生產向大規模生產，即是向更複雜的生產形態之推移。但是合作也有一種相償的好處，他於包含大多數人口之點而收成效時，則能拔除社會主義以前或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舊關係之更深而且是致命的根蒂，此等關係對於一切種類之革新是呈出最頑強的抵抗的。利權割讓政策如成功時，可以送給我們不少的模範的大企業，與近代進步的資本主義立於同等的水平線上；數十年後這些企業終必全歸於我們所有。合作政策成功時，可以使小產業勃興，而在不能確定的若干之時期內，更容易使牠向任意協同之基礎上的大經營方面推移。

第八節 向社會主義之推移

我們且說及國家資本主義之第三形態罷。國家歡迎資本家來做商人，送他以一定的賄賂，使販賣國家之生產物而購買小產業之生產物。又其第四的形態，是國家把國有的經營或工業或森林或土地等租借於資本家；此時之租借契約最與利權割讓契約相類似。現在我們究竟承認不承認這第三及第四的資本主義之形態呢？（此在德譯文中譯成十行以上）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不要把我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之論文中所列舉的我國種種之社會層之全成分忘記。『我們』先驅者，無產者之先鋒隊，是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但是這先鋒隊不過是無產者階級之一小部分，而無產者又不過是全人口之一小部分。『我們』要想把直接向社會主義推移之問題解決成功，我們不可不知道應採何種間接的道路和方法使資本制以前的各種關係（pre-capitalist relations）——還未達到資

本家的關係以前的幼稚的狀態)向社會主義推移。這便是問題之難關了。

(德譯文在此有敘述俄國現狀之一節)

俄羅斯全國一般所行的是資本制以前的關係，要從此狀態一直推移到社會主義去，究竟是可能嗎？曰可能，於某種程度之內可能，但只需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據我們所知的是可驚的科學的工作之賜。這個條件便是電氣化。(此處德譯文有闕)但是，就是這「一個」條件至少也要費數十年。(德譯文是「在第一段之工程」)我們是很知道的，並且要英德美等國的無產者革命成功時，我們纔能把這個時期縮短。

在目前數年之內，我們不得不想到容易使家族主義及小規模生產向社會主義推移的間接的連鎖。「我們」現在也還愛說「資本主義是患害，社會主義是慶福」的話，但是這樣的議論是錯了，因為是把現存的社會經濟層之全部置諸意外，而只取得其中之兩層。

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原是一種患害，但是資本主義比諸中世的制度，小規模生產，小規模生產者之分散所伴生的官僚政治，還要算是一種慶福呢。由小規模生產向社會主義之直接推移，我們還不能實現的時候，在那時候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乃小規模生產及交換之本質的產物，是不能避免的，在那時候，我們不能不把資本主義(尤其是把牠導引到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上的)當作小規模生產與社會主義間的間接的連鎖，利用來作為提高我國生產力之手段，過程，方法。

我們要堅毅和患害鬪爭，我們不能不大膽地和患害覷面。大工業建設之不得不延期，工業與農業的產物交

換之不能禁止，既已經昭示了我們，我們不能不依賴更容易着手的小工業之建設。我們不能不從這一方面動工，以支持我們這一方面的殘局，這幾幾乎被戰爭與封鎖全盤毀滅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採取一切的手段以使交易發展，我們不怕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底範圍由於地主與有產階級之經濟的廢滅，由於勞農政府之存在，已經十分受了限制，十分受了調節了。這是農業稅之根本觀念，這是牠經濟的意義。

（沫若附白）此文初稿亦係由日文譯出，後由何公敢兄借“Soviet Russia”雜誌一冊來得以校對一遍，改正處殊不少。日譯與雜誌原文稍有出入處，但無關緊要，故仍舊。唯最末處一小節日譯文中完全省略了，茲特補譯出來使成完璧。日譯者所據英譯單行本及德譯文均未能到手，殊引為遺憾。此文於社會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國人對此頗多誤解，有人以為列寧改宗，遂援引為例，欲於中國現狀之下提倡私人資本主義者，這真是污辱列寧，遺害社會了。譯此文竟，倍感列寧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來搖震心旌，不禁淚之潛潛下也。

民國十三年七月一日夜半校改後誌此

勞農俄國研究

是書專述俄國勞農主義經過之原委，對於俄國革命之歷史，勞農政治之特質，組織之綱要，社會文化設施的方法，解放婦女之原由等，均敘述甚詳。讀之不僅明白勞農制度之現狀，且可了解勞農主義的宗旨之所在。

李達譯 一册定價一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163)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日本河上肇

譯述者 郭沫若

代售者 商務印書館

分代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八九八四分

世界叢書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趙作雄編 一册一元

是書首章總論社會學，二三章論進化論及心理學與社會問題之關係，以下羅列家庭人口都市等問題，而一一詳論之，持論穩健，見解平和，留心現代社會問題者不可不讀。

世界叢書

社會問題——改造的分析

王造時譯 一册六角

本書為美國愛爾烏特原著，分七章，述社會問題中各重要元素，及社會問題的解決等，注重改變習尚，造就社會領袖，反對片面政策及革命手段。社會改造為近今切要之圖，讀此書可恍然矣。

世界叢書

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

何飛雄譯 一册一元

本書係美國經濟學家伊利教授所著，對於社會主義的性質與其長處短處，及社會改良的要義，闡論詳盡。著者雖為美國社會說法，然其至理名言，任何國人均有研究之必要。

諸君不是狠注意社會問題麼？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封底